

激流集

章乃器著

上海生活書店經售

激 流 集

章 乃 器 著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月

激 流 集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著 者 章 乃 器

經 售 者 生 活 書 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目次

第一編 國際一般

矛盾百出之世界經濟會議	一
世界經濟的前瞻	一五
世界政治經濟概況	二五
各國金融恐慌與貨幣戰爭	三六
大戰前夜各國的貨幣政策	五三
國際貨幣戰爭的剖視	六六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工人	八七
我們應該怎樣應付醞釀中的世界大戰	九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前途	九五

太平洋問題之史的展開……………一〇六
國際的和平陣線和各國的人民陣線……………一〇五

第二編 中日問題

-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經濟狀況及其對華政策的前途……………二一九
對日妥洽有出路嗎……………二三五
日內瓦莫斯科與東京三條外交路線之得失……………二三八
三年來之遠東戰爭……………二四五
激變中的遠東局勢……………二六〇
研究現階段中日問題的任務……………二七三
遠東形勢的蠱測……………二八二

第三編 抗敵救亡

今日的馮玉祥 一八七

現在的慈禧太后 一九〇

國難芻言 一九三

國難四週告國人 一九六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國慶日 一九九

我決不悲觀 二〇三

由愛國救國說到誤國賣國 二〇七

給青年們 二一一

關一套亡國論——唯武器論和唯武器史觀 二二八

四年間的清算 二三四

最低限度的犧牲決心 二三四

良心陣線與無恥陣線 二三七

民族解放鬥爭中的幾個最低要求 二三九

從酷刑拷訊說到民族道德 二五二

怒吼吧，長江流域的大衆 二五六

誰是內戰的挑撥者 二六六

第四編 中國經濟

改進中國經濟問題 二七五

崩潰中的中國經濟社會 二八八

中國經濟的過去與今後 二九四

當前的災荒問題 三〇七

中國國際貿易之檢討 三二三

對於土地村公有制之意見 三四六

國民經濟建設的先決條件 三四九

第五編 雜文

婦女與婦女運動	三三七
我的來年計劃	三六一
半殖民地型的中國知識分子	三六三
我的研究動機和研究經歷	三六六

第一編 國際一般

矛盾百出之世界經濟會議

目下資本主義國際間的矛盾，大概可分爲三種現象來表現：（一）軍備戰爭，（二）關稅戰爭，和

（三）貨幣戰爭。

資本主義國家爲銷售剩餘商品計，不能不積極開拓海外的市場——殖民地的經路。而經路殖民地，便不能不維持甚大的軍備。這種軍備，更要不斷的加以擴充。因爲，在消極方面，倘使要想維持原有的海外市場，那末，在別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擴充軍備，或殖民地人民反抗情緒高漲的時候，她就就不能不跟着擴充軍備。而在積極方面，新殖民地的取得，本來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的企圖，在新殖民地的奪取上面，軍備的擴充尤其是必要。

資本主義國家一面要開拓海外的市場，而一面却要防止別國的商品侵入她自己的市場。她的防止的手段，就是提高關稅率，建立起來一個嚴密週至的關稅壁壘。國際上的剩餘商品，常向着關稅壁壘較低的方向流。所以，當一個國家，感覺到自己的關稅壁壘還比較別人低的時候，或者別的國家增高關稅壁壘的時候，她一定馬上把自己的關稅率儘量的提高。這樣，你提高百分之五，我提高百分

之六，他却要提高百分之七，你再度提高到百分之八……就成爲資本主義國際間的關稅戰爭。

這種戰爭，必然是「有時而窮」的。至多，等到各國不需要的進口貨物完全斷絕了，這種戰爭，就成爲沒有意義了。因此，貨幣戰爭就出現了。貨幣戰爭的意義是怎樣呢？牠是用停止金本位或者減低貨幣內含金的分量的種種手段，使自己的貨幣價值低跌。一面貨幣價值低跌，而一面物價未能照樣的跟着增高，於是，她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就容易和別人競爭了——因爲貨幣的跌價使她的商品在海外的市價低落了。

貨幣戰爭和關稅戰爭不同，並不是隨便那一國都可能參加的。倘使一個國家的海外投資的利益比貿易上的關係還要重要，那末，她就要顧慮到貨幣跌價以後投資收入在價值上的減少了。在目前的資本主義國際間，依然還有少數國家不願意放棄金本位，這就是因爲她們覺得放棄金本位以後，貿易上可能的受益，還抵不過海外投資上所遭的損失。也許有時她們國內的政權操在金融資本家的手裏，那末，即使貿易的關係比投資的關係還要大，她們也不願意使貨幣跌價。

在最近的三四年中間，資本主義國際間差不多是不斷的想調和這種種的矛盾。所謂軍縮會議，到目前還不斷的在日內瓦開會議。關稅休戰會議也曾經在國際間哄動一時。只有貨幣戰爭，因爲是

國際間一件新的玩意兒，所以還沒在國際間公開的討論過。

最近在倫敦舉行的所謂世界經濟會議，可說就是以調和上邊的三種戰爭爲牠的主要的使命。其他關於某種商品的生產的限制，似乎還是次要的。

世界經濟會議能得到怎樣的結果呢？五月號的本刊中已有過一篇文章，斷定牠不會有切實的效果。而事實也告訴我們，日內瓦的軍縮會議，不獨在軍縮方面沒有些微的效果，反而成爲各國參謀部偵察別國軍備虛實的一個線索。過去的關稅休戰會議，也差不多等于幫匪開火以前的所謂「吃講茶」。倘使過去的都不過如此，目前的自然也不過這般。在資本主義壽終正寢之前，孝子賢孫們自然少不了還要在他未斷氣之前請他吃幾口人參湯，然而，「旁觀者清」別人早已經斷定這是徒勞了。

翰盛頓的爐邊談話，也給我們以若干的暗示。英法代表挾着滿腹的希望橫渡大西洋的時候，美國忽然取消金本位了。這是自己先武裝起來要求別人解除武裝的一種政策。繼之，在世界經濟會議召集會議宣告關稅休戰的時候，英日的關稅戰爭很劇烈的開始了。在會議場中，德國的代表還要要求蘇俄一部分的領土做她的殖民地。會議就是在這樣的矛盾百出的狀態之下向前進行着。

目下的難關，就是貨幣安定問題——以法國為領袖的金本位國家要求美國中止她的貨幣戰爭。然而，這是羅斯福政府的一個中心政策，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注強心針，在整個經濟問題沒有得着妥洽以前，她怎肯放棄這個武器呢？我們要認清，胡佛時代的美國，因為他所代表的是金融資產階級，他為海外投資的分上，不能不希冀歐洲的繁榮，以免債權之無着。在一個代表產業資產階級的羅斯福看起來，這問題的重要性就大大的不同，必然的，美國只有拋棄了以前不完成的世界主義，而走上極端的國家主義。因此世界經濟會議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世界經濟的前瞻

不論站在任何的理論的立場，恐怕都不能否認世界經濟的兩種顯明的趨勢：（一）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而呈現崩潰的慘象，和（二）社會主義蘇俄的經濟社會矛盾漸消而轉有欣欣向榮的狀態。這是時代的問題，而不是統治者和人民的賢不肖的問題。資本主義的矛盾，反映出來牠的衰老；而社會主義的繁榮，却正因為牠的健壯。

資本主義在崩潰的過程中，必然的發生出來「步步爲營」的掙扎。掙扎的目的本來是要調和矛盾，然而因為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太嚴重了，掙扎的手段裏也依然表現出來種種的矛盾。這種矛盾在這世界資本主義的代表美國——在資本主義的英雄羅斯福進行所謂復興計劃之後——尤其是十分顯著。

在資本主義國際與中國（申報叢書之一）內，我曾經指出：羅斯福的剷除棉苗政策固然可以減少棉花的生產，然而同時要增加雇農的失業，所以依然是一個矛盾。然而，矛盾又何止於這一端？在一切現象連繫的原則之下，資本主義下的一切經濟政治的部門，都遭受同樣的命運。在遭受同樣的

命運的前提之下，一切救濟方策必然是「剜肉補瘡」。能使甲部門苟延殘喘的手段，同時必然是乙部門或者丙部門致命的打擊。而乙部門或者丙部門的致命的打擊，必然回轉來再變成甲部門的致命傷，釜底抽薪的辦法，恐怕只有制度根本的改造。

我們要研究資本主義下各種經濟現象的連繫關係，和牠們相互間的損益盈虛，我們或者可以把這許多的現象，分爲通貨、物價、生產、失業、消費和貿易等六種項目，加以分析，再研究牠們的相互關係。

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裏面，有貨幣中心學派。他們認通貨是整個經濟組織的樞紐，所以，只要在貨幣政策上加一種操縱，一切經濟問題就都可解決。通貨膨脹論者就是這一派的代表。通貨膨脹論者認定貨幣數量和物價的連鎖關係，以爲通貨膨脹——數量增多——可以提高物價；物價提高了，恐慌就過去了。我在這裏，先要提出下面的四個問題把牠解釋：

- 一、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價的區別。
- 二、通貨膨脹政策和通貨膨脹狀態的區別。
- 三、通貨膨脹和物價的關係。

四、貨幣貶價和物價的關係。

一般人往往把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價混為一談。其實通貨膨脹未必一定能使貨幣貶價，而貨幣貶價也並不能使通貨膨脹。美國胡佛政府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曾經命令聯邦準備銀行向市面收買十億零八千五百萬美金的國債。這就是所謂通貨復原政策。這種政策的目標，就是要使通貨膨脹——是要使市面增加十萬零八千五百萬美金的通貨。通貨膨脹的目的，本來是要使貨幣貶價，就是要使貨物漲價。然而，結果物價非但不漲，反而下跌。反過來說，就是貨幣不單是沒有貶價，反而漲價。這可見通貨膨脹並不能使貨幣貶價。等到羅斯福上台了，通貨膨脹政策不久就開始了。整個的通貨膨脹政策，由放棄金本位以至尚未實現的減低貨幣成色，無非是要使貨幣貶價。幾個月來的工作，貨幣是貶價了。以英金計算，本年三月間是英金一鎊等於美金三圓四角左右，目下是每鎊等於美金五圓三四角。以金價估量，本年三月間是黃金每盎司值美金二十圓零，目下是三十四圓左右。這樣，美國的幣價是跌去了百分之四十而弱了，然而通貨却並沒有膨脹。美國全國紙幣流通的數字是這樣：

日期

紙幣流通數（單位百萬圓）

一九二三年三月

五、五五二

一九三三年八月

四、八八七

這表示通貨膨脹政策施行以後，紙幣的流通數反而減少。不單是美國如此，日本也有同樣的情形。日本全國各銀行紙幣的發行數，在放棄金本位以前是盤旋於十四五億圓之間，目下却要減少了。一億圓左右。這樣，我們又可以明白的見到，貨幣貶價並不一定能使通貨膨脹。也可以說：通貨膨脹政策並不一定能使通貨膨脹。

因為通貨膨脹政策並不一定能使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政策和通貨膨脹狀態的區分，已經是很顯然。通貨膨脹的狀態往往是自然的——這也是資本主義下的無政府的生產狀態之一種。歐戰告終以後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大恐慌開始的時期中間，資本主義列強差不多都走向通貨膨脹的一條路。這是因為戰後物質補充生產力猛進的結果。一面是無政府的生產造成的無政府的通貨，而別一面是無政府的通貨再刺激起來無政府的生產。那時的各國政府，不單是沒有施行什麼通貨膨脹政策，反而都紛紛的整理幣制，把戰時發出的不兌換紙幣收回或者重予兌換——事實上所取的是通貨緊縮政策。這又反證出來通貨膨脹狀態不一定需要通貨膨脹政策。要之，通貨的膨脹基於通貨的需要。假使沒有通貨的需要，任何的通貨膨脹政策都是無效。在歐戰的時候，通貨膨脹政策的確曾經

使通貨膨脹，這是因為軍需浩繁通貨需要激增之故，而不是政策的人為的力量。這是通貨需要膨脹，而並不是政策能膨脹通貨。所以，除非第二次大戰發動，通貨膨脹政策是不容易收效的。這樣，在通貨膨脹政策的觀點上，資本主義列強是需要一個戰爭的。

2. 現在再說到通貨膨脹和物價的關係。因為通貨膨脹並不一定能使貨幣跌價，自然通貨膨脹不一定要和物價發生關係。通貨膨脹可提高物價，但是有條件的。第一，通貨必須要在工商業者或者消費者的手裏，而不是在普通銀行的金庫裏。胡佛通貨復原政策的失敗，就因為聯合準備銀行以國債收買的方式向市面放出的通貨，依然在普通銀行的金庫裏面。普通銀行賣出國債收入通貨之後，並不能把牠轉放給工商業者，消費者自然更談不到。這樣，在聯合準備銀行看起來，通貨是膨脹了——牠們把金庫裏的貨幣送到市上去了；而在整個的銀行業看起來，通貨却不會膨脹——通貨依然在銀行的金庫裏。銀行金庫裏的通貨，既然不會轉變為商品，物價自然不會提高。第二，貨物的數量必需不變。因為，即使通貨能照上述的條件膨脹了百分之三十，倘使同時商品的數量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那末，乘除相殺，結果不變。只有在貨物的數量不變的條件之下，物價才能相當的提高。

貨幣的貶價自然就是物價的提高，然而，也要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物價才能在提高之後穩定起

來。第一，倘使一面貨幣貶價，而另一面貨物的數量不斷的增加，那末，物價在一度提高之後，依然要跌落。第二，倘使貨幣貶價而工資指數不依着貶價的成分增加——貨幣對於勞動的購買上並沒有照樣的貶價，那末，因為勞動階級購買力的衰退，物價一度提高之後也依然要跌落。事實上，通貨貶價是對勞動階級的進一步的剝削，那結果必然是使勞動階級的購買衰退下去。

以上說了通貨和物價的關係。只因為方面太多，所以說得似乎有點雜亂。要之，通貨復原政策和通貨膨脹政策爲的都是要使通貨膨脹狀態，在人爲的方法之下實現，然而結果往往相反。通貨復原政策所用的手段是不變貨幣的價值而只是直接的增加貨幣的流通；通貨膨脹政策所用的手段是先使貨幣貶價，然後貨幣自然不能不增加流通。通貨膨脹可提高物價，但是，有條件的；通貨貶價必然一時的要提高物價，然而提高後的穩定也是有條件的。我覺得羅斯福政策頂悲慘的現象，就是通貨貶價之後，而通貨並沒有膨脹。依通常的因果，幣賤物貴之後，貨幣在支付的用途上必然要增加，然而現在却適得其反。這表示物價雖然增高，而貨物的交易的數量，却大大的減少。也許有人說：這或者因爲貨價支付的方式，不是使用貨幣而是使用支票。但是，美國的交換所的支票交換金額，也沒有相當的增加：

日期

交換金額(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一九、八二四

一九三三年三月

一六、四五〇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一八、二一八

這表示通貨膨脹以後，金額雖然增加了一些，然而遠不如貨幣貶價成分之大。而較之去年同月，反要減少。

* * * * *

我在上面曾經指出，只有在貨物的數量不變的條件之下，通貨膨脹才能使物價增高；也只有貨物的數量不變的條件之下，因貨幣貶價而起的物價增高，才能穩定。但是，任何通貨膨脹政策必然要使生產指數增高。那結果，必然是生產過剩進一步的掉到深淵裏去。美國自從施行通貨膨脹政策以後，生產指數由本年三月的五一·三漲至本年七月的八〇·七（一九二九年基準）。這是因為在無政府的生產狀態之下，熱狂的投機必然要引起不需要的生產。而不需要的生產，必然的反過來使物價在暴漲之後狂跌。

我曾經指出：失業是資本主義發展剩餘價值成分增高後必然的結果。倘使資本主義再發展上去，必然有一天機械完全代替了人工而造成全體工人的失業。然而，資本主義內在和外存的矛盾自然不會容許有這樣的一天的出現。內在的矛盾就是生產過剩，而外存的矛盾就是社會革命。跟着失業人數的增加，社會的購買力自然就衰退下去，生產就必然要過剩。同時，因為生產的過剩和隨之而起的物價的跌落，工廠只好減工或停工，失業人數便必然更要增加。這兩種現象的互為因果，恐慌便達到無可救藥的地步。羅斯福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會使失業問題減少牠的嚴重——或者可以說只有增加牠的嚴重。到現在為止，復工的人數有的說是四百萬人，有的說只有二百萬人，有的說只有六十萬人。事實上恐怕二百萬人的數目，比較的合理。在盛大的減短工作時間的運動之下，在生產指數激增的過程中，而只能在一千二百萬的失業羣衆裏面拔出來二百萬人。將來生產指數跌落，失業問題不會更趨嚴重嗎？至於德國希特勒的救治失業方案，尤其是滑稽。德國政府自稱已經使失業人數由六百萬減少到三百八十萬，然而據說那減少的方法，是使多數失業工人去當挺進隊的隊員！請問：這能解決失業問題嗎？恐怕在不久的將來，只好送他們到戰場上去做犧牲品！要之，所謂給失業羣衆以工作，都不過是騙人的話，即便把工作時間減少，我相信那減少的成分也決計趕不上因機械改

良的結果的人工減省的成分。

目下的生產過剩，事實上可說是消費不足；而消費之所以不足，是由於一般購買力的衰退。上文曾經提出，倘使物價增高而工資不跟着增高，那末，因為這占人羣的大多數的勞動階級購買力的衰退，物價一度提高之後依然要跌落。還有，倘使失業的人數不減少，人民的購買力便決不會恢復。這兩點本來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嚴重的矛盾，然而矛盾還決不止此。各國政府的減俸運動，當然也是使購買力衰退的一種行動。而目下希特勒政權下的節食運動，尤其是自掘墳墓。倘使他明白目下的恐慌是生產過剩的恐慌，那末，一面固然應該使失業的人有他們的衣食任，一面更應該使有業的人，充分消費。使有業的人減少消費以救濟失業，那末，對於眼前的購買力，是乘除相殺，依然無補；而這種節食運動所造成的節約空氣，却要使整個的購買力受着嚴重的打擊。這樣，他們是連他們的經院學派的奢侈論都忘記掉了！

說到貿易，矛盾尤其顯著。貿易本來是帝國主義處分剩餘價值的唯一手段。牠們是應該如何的鼓勵以期麻醉殖民地人民？然而幾年以來關稅壁壘的高築，驚醒了殖民地人民貿易可以致富強的迷夢。自從世界經濟會議失敗以後，各國紛紛退出關稅休戰，關稅壁壘有愈築愈高之勢。尤其對於日

貨的排斥，風靡一時——參加的有二十七國之多！一面英、日、美、德、法各國的生產指數，都在增高，而一面國際貿易却是束縛加重，那唯一的結果，恐怕只是殖民地爭奪的大戰！

上文指出了種種的矛盾，而這種種矛盾所顯示給我們的一個結論，就是資本主義一日存在，剩餘價值一日存在，矛盾必然是日趨尖銳。一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都表現出來是徒然。資本主義各國不是有一個社會革命，便必然要有一個戰爭。

* * * * *

最後說到蘇俄。社會制度的改變都是這樣的：在舊時代的外圍發展出來新時代的基礎。也正和封建殘餘做資本主義的營養料一般，資本主義是在做社會主義的營養料。帝國主義政治和經濟間的矛盾，——牠們在政治上雖然是反蘇俄，而在經濟上却在爭奪對蘇俄的貿易——使蘇俄很從容的完成了牠的五年計劃。牠們相互的政治的矛盾，使蘇俄穩定了牠的政權——目下帝國主義捨着向蘇俄送秋波。將來呢，恐怕是牠們相互的戰爭，使社會主義擴大牠的領域。

世界政治經濟概況

一 緒言

分析世界底政治經濟是如何一件泛大的工作，倘使我們只抓住一個日內瓦做中心，而僅僅用國際聯盟、軍縮會議……等種種一切的表现做資料，那只是算介紹國際舞台前台幾齣滑稽戲底劇本，而國際舞台前台的戲劇，是極端虛偽的。起碼，要把隱藏在幕後的後台的一切——幾位主角是怎樣的化裝，怎樣的倒串和怎樣的模擬做作——赤裸裸的敘述出來，或者還能暴露一些國際的真相；然而，依然還是不夠。

倘使我們再把華盛頓、紐約、倫敦、巴黎、柏林、羅馬、東京……等處底政治領袖和經濟界要人們底活動，一件一件的分別敘述出來，那我們也不過做了一大批要人們的起居注，也是極端沒有意義的。即使再加上一些金融和商品市場上的幾個行市，和關於社會問題的幾種數字，而不能把種種一切的現象作連繫的觀察和有系統的敘述，那依然也不過是一篇支離瑣碎的大事記，而不能算是分析。

那末，我們是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是應該由經濟危機去認識戰爭危機和革命危機，再由革命危機的加強去認識戰爭危機的迫切；由戰爭前夕的軍事準備去認識當前資本主義暫時的穩定，同時由最後掙扎的法西斯運動去認識資本主義暫時的穩定中資本獨占化的加強和所加于勞動階級的剝削的加強，再由資本獨占化的加強和所加于勞動階級的剝削的加強去認識資本主義國際和國內的矛盾的尖銳化，由資本主義國際和國內的矛盾的尖銳化去認識反蘇聯戰爭運動的加緊。在這種種的基本認識之下，去分析日內瓦的一切和要人們的種種活動，然後能了解那內中的底蘊。

二 戰爭前夕的經濟恐慌

在這戰爭準備白熱化的時期，資本主義下的恐慌在深淵底下得着了牠的暫時的穩定；這種事實我們是應該承認的。但是，這個穩定是如何得着的呢？這答案是很簡單的：就是在戰爭的準備當中得着的。

在戰爭前夕，各帝國主義的法西斯化，用整個的資本主義做觀察的對象，可說是牠們的最後掙扎；而用眼前的一階段做觀察的對象，却可說是製造戰爭的主要方式。在法西斯的政權之下，帝國主

義可以減低工人的工資，或者用變相的通貨膨脹方式剝削工人，而同時以暴力壓服他們的反抗。在軍閥專政方式下法西斯化的日本，物價指數（一九二九基準）由一九三一的六九·六升到本年四月的八〇·五，而工資指數（一九二九基準）却由一九三一的八四·七降到本年四月的八一·五。在國社主義下法西斯化的德國，物價指數（一九二九基準）由去年三月的六六·四升到今年三月的六九·九，而工資指數（一九二九基準）却由去年三月的八〇·四降到今年三月的七九·〇。說到對於工人的壓迫，連那一向號稱「自由極樂國」，到目下還只自認是經濟的法西斯化的美國，都毫不客氣的向工人羣衆開槍屠殺——最近便有碼頭工人被屠殺的實例。其餘的國家就不必說了。

不管是政治的或是經濟的法西斯化，在產業方面所造成的，必然是資本獨占化的加強。在資本主義之下，「大量生產」和「剝削勞動」兩個原則，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放棄的。法西斯政權在經濟上的妙用，就是使生產進一步的大量化和對勞動進一步的剝削，以減輕本國製造品之成本。在理論方面唱得頂頂動聽的美國復興運動——經濟的法西斯化的一種方式，牠的如何削弱中小資本的勢力，如何榨取一般消費者，和如何剝削勞動者，「在復興運動評議會」所發布達羅氏的報告書中，已經盡

情披露了。「復興法規促進資本的獨占化，復興法規不過是大工業的附庸，消費者加重負擔而購買力無由增加」……是連參議員奈義氏一流人物都這樣的說了。

必然的，在以通貨貶價的政策提高物價刺激生產，以獨占化加強和剝削加重的方式減低生產成本，結果，利潤是必然可以增加的。有人比較美國八百家代表的工廠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兩年間的損益，一九三二是純損美金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圓，而一九三三是純益四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圓。倘使這就代表復興運動的成績，那末，顯然的，在這個成績中間，資本主義已經自己種就更大的危機。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本來就是因為利潤無由化為購買力；所以，利潤的增加必然的代表購買力的降低。改良主義者對於羅斯福之期望，本來是利潤之合法的消滅，藉此很和平的走上社會主義的領域。而結果呢，是「適得其反」吧？

法西斯化的日本，在經濟方面，是在「統制經濟」旗幟下進行着。在理論方面，如鄉誠之助氏的經濟政策之革新，公然的主張「託辣斯」和「卡忒爾」是生產統制的核心組織；而久原房之助氏的非常時國策根本義，更露骨的主張用主要的產業所組成的大企業聯合底方式來增大利潤，而以政府的投資方式，把可能的損失，轉嫁給人民。對於工人的剝削和壓迫，鄉氏主張「工資的縮減」，河合良成

氏的國家改造原理及其實行，主張禁止妨害國家經濟及大小利益的罷工及怠工……這些都並不是空洞的理論，而只是替已在實行的政策做理論上的辯護工作。甚至連代表資產階級的朝日新聞，都要在社論裏批評：「企業統計，只着眼于增加事業家的利潤而全不攷慮一般社會，再沒有像現在的日本了。」

老牌法西斯的意大利，增加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在牠的深刻化的恐慌，牠的占歐洲大陸第二位的失業人數，已經可以概見。法西斯化的德國，用壓迫國內少數民族——猶太人——的方法緩和內部的矛盾；一面剝奪猶太人的獨占資本，而同時增強日耳曼人的獨占資本。牠用改充挺進隊隊員，減縮失業救濟之範圍，用恐怖手段使在業和失業的猶太人和反對黨的工人出亡或入獄甚至被殺……等方法來減少表面上的失業人數。顯然的，猶太人的生產資本，是不會馬上消滅的；而所得的結果，不過是在威嚇之下，使日耳曼人得着一個以低廉代價併吞猶太人資本的機會罷了。在德國「排猶運動」開展的時候，猶太人在市場上大批的出賣股票，就是一個事實上的證例。而德國經濟部長史密特氏在宣布他的經濟大綱時，甚至公然說要希望「卡忒爾」的存在，也可見國社黨必然要促進資本獨占化的一班了。

三 戰爭準備中軍事工業的飛躍

日內瓦底「軍縮會議」實際上已經變成「軍擴會議」，在允許德國擴充軍備一點上，就已經是十分明白。

上節，我已經說明法西斯化的結果，必然是資本獨占化的加強，對勞動剝削的加甚，和資本家利潤的增高；而利潤的增高，却剛好促進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因為利潤是不能化為消費的購買力的所以，利潤的增加恰好代表購買力的降低。於是便發生了如何緩和這個問題，就是如何處分這代表利潤的剩餘商品之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却依然逃不出「以隣為壑」的市場的爭奪和殖民地的攻略。這樣，製造戰爭的法西斯政權，不單是在主觀上本來要製造戰爭，在客觀上也只有促進戰爭危機。在這一點上，日本的法西斯理論家鄉誠之助氏，已經毫不客氣的提出：日本的貿易，倘使要進攻到各國的防線裏面去，尚須準備更完整的武裝。而「亞細亞之獨霸政策」，却就在他的同路人中野正剛和河合良成二氏的口喊出來。意大利的公然要求新殖民地，德國的公然在國聯要求蘇俄一部分的領土做殖民地，和已經實際化的日本對於中國積極侵略的進行，以及德意對於奧

的爭奪，都表明法西斯政權需要新殖民地的迫切。

在片段的報紙記載上，不斷的看到各國備戰底逼切。在一個月餘所見到的就有德國擴充常備軍到三十萬人的要求——等于目下凡爾賽和約所允許的軍額之三倍；美國開始造艦一百零二艘和飛機一千一百八十四架；意國撥款四萬八千萬利爾，參加海軍競爭；英國擴充空軍，至少達現有戰鬥力之兩倍；日本用「滿洲國」的名義，擴充海空軍力；法內閣總理在國會說明擴充軍備的必要……這一切的一切，已經足夠告訴我們準備戰爭之白熱化吧。

在軍事工業方面所給予我們的消息，也是很多。美國的鋼鐵生產量，由一九三三年三月間的百分之十五，漲到目下的百分之六十；美國銅的市價，由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每磅五·六二五分，漲到今年四月的八·三七五分；銑鐵市價，在同一時期中，由每噸十四圓，漲到十七圓；錫，由每磅二四·三分，漲到五五·〇〇分。日本底鐵生產指數，由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八六·四，升到今年一月的一四四·五；在同時期中，鋼鐵生產指數，由六九·〇升到一四二·〇；硫磺，由九四·二升到一八三·九。日本政府準備戰爭的意義之下，用救濟農村的幌子，大量的買入米穀——到今年四月七月為止，已經買入一千萬石以上。這雖然不是軍事工業，却確然的是軍需的購買。此外，英國歐斐爾鍊鋼廠正在日

夜趕出製造飛機用的鋼鐵，而英國飛機廠的股票市價，正在飛漲……這種種突飛猛進的軍事工業之發達和軍需購買之急激化，就代表一部分的目下資本主義暫時的穩定。

四 一時的穩定呢還是繁榮底恢復

這資本主義之所謂穩定，自然是一時的。然而，資本主義下的樂觀論者却告訴我們，恐慌已經過去，而繁榮漸漸恢復了。他所提出唯一有力的證據，就是英國財政的贏餘。此外，他當然不敢提出英國的失業問題和國際收支差額；而只是空洞的說，「倫敦的戲院裏擠滿了人，人民熙熙攘攘，充滿了太平的景象。」

英國財政上的贏餘，是拿什麼代價換來的呢？第一，是犧牲了貿易上的自由主義，課進口貨物以很高的關稅。關稅是舊時代的稅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稅制；關稅之負擔，最後是轉嫁給一般的消費者，要便勞動羣衆受着最嚴重的剝削。第二，是犧牲了「世界的銀行」的地位，首先放棄了金本位。利用放棄金本位後通貨跌價的方式，變相的減低工人的工資；這樣緩和經濟方面的危機。再利用放棄金本位後通貨膨脹利率低跌的機緣，發行低利的國家債票，換回高利的國家債票；這樣減低國庫的負

担。第三，是犧牲了整個的工黨的改良主義，毫不客氣的減低失業保險金和救濟失業的公共建築費，以減少財政上底支出；同時，把所得稅底徵收，擴充到中下階層，以嚴重的剝削方法增加財政底收入。要之，這財政上的贏餘，是用「竭澤而漁」的方法，抓破了種種一切欺騙大眾的假面具換來的。

以上說明英國經濟暫歸穩定的原因，現在再討論穩定的程度。

在理論上，這問題的解答是很簡單的。倘使當前的恐慌已經過去了，資本主義已經重復得着牠的繁榮了，戰爭自然就不需要了。然而，在事實上，戰爭的準備只有加緊。這是很明白的，連帝國主義自己也知道，穩定不過是暫時的。

然而，我們終得拿一些事實出來做證據。下面是英國國際收支差額的數字（單位百萬鎊）：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收 入	一三三	一〇三	二六	一〇四	五六	四
支 出	一三三	一〇三	二六	一〇四	五六	四
收 入 超 過						
支 出 超 過						

在國際收支上差不多經常的是收入超過的英國，從一九三一起忽然變成鉅數的支出超過；這種不利的差額，到一九三三依然還有四百萬鎊。這樣的情形，能夠說是繁榮的恢復嗎？同時，英國的失業人

數，到今年三月依然還有二百二十二萬人——比較最高的時候，不過減少了六十萬人。自己誇耀得頂頂厲害的英國，事實上的顯露却不過是「如此這般！」這是很明白的，恐慌不過在深淵裏暫時穩定着，而決沒有並且絕不可能直接轉變為繁榮。

五 戰爭危機和革命危機

由這發展達到極高度的資本主義下的恐慌過渡到繁榮，唯一的橋樑是戰爭，由戰爭危機過渡到和平，唯一的橋樑是革命。恐慌決不可能直接轉變為繁榮，而戰爭危機也決不可能直接轉變為和平。因此，目下整個世界的局面，成了戰爭危機和革命危機相持的局面，革命固然是反對戰爭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而戰爭也是壓服革命的頂厲害的方法。

戰爭的時候，在經濟方面，帝國主義希望可以因軍需的購買提高物價，用炮火之威力破壞別人的生產力，用戰場上的犧牲解決失業問題，這樣，因為經濟得着戰爭時的繁榮，便可以減少革命危機。在政治方面，牠們可以用「為祖國犧牲」為大日耳曼民族光榮而戰……一類的欺騙的口號，激動愚昧的民族意識，以減低社會意識下的革命情緒；可以用法西斯化的戒嚴令的力量，進一步壓服

革命勢力。然而，這還不夠，牠們要把帝國主義間的火併，轉變為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以圖根本剷除這世界革命的大本營。這樣，才算完成了以戰爭壓服革命之最高任務。

然而，上次世界大戰之慘酷印象，究竟還沒有在人們的心理上消滅了去。不單是各國的勞動階級依然深深的認識，他們是戰爭中間最大的犧牲者；一般人民也還在詛咒戰爭的罪惡。因此，以革命消滅戰爭的運動，是在任何帝國主義國內都是很高漲的。世界上頂頂兇狠的日本帝國主義，牠在出兵侵略中國的時候，也不能不拿出「保障東亞和平」的謊語來騙人。「爲戰爭而戰爭」畢竟是任何帝國主義者所不敢公然提出的。甚至「爲和平而戰爭」也只有在未曾嘗過上次大戰的滋味的日本，可以偶然拿出來騙騙人；在歐洲，牠們還僅僅只能拿出「爲和平而擴充軍備」的鬼話呢。這樣，就在革命的威嚇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延遲了牠的爆發。

帝國主義國際本來是一個矛盾的體系，而反蘇聯戰爭不過是矛盾體系中的一個小小的統一。可是，這個小小的統一，依然不能克服先天的矛盾。法西斯運動在主觀上是要對外製造反蘇聯戰爭，對內消滅革命危機的；然而，客觀事實所表現的結果，剛是適得其反——民族意識之挑動，只是增強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而對內壓迫所引起的作用，也只有革命危機之深刻化。希特勒上台以後，歐洲各

國便波瀾迭起，就是一個明證。最近德意兩巨頭威尼斯之談話，和最近將來美日在夏威夷的會晤，本質上都想調和內部的矛盾，使德日兩位自告奮勇的英雄，安心爲進攻蘇聯的先鋒。然而威尼斯談話雖然已經在公布「並非對法」的意義下暗示「實爲對蘇」，而法國的疑慮，只有加重——杜邁格在國會裏主張擴張軍備的演辭，露骨的代表對德的備戰；而法國領導下的小協約國的承認蘇聯，更顯示這種矛盾的激化。同時，奧匈兩總揆張惶中的會晤，更可見他們是不願意做反蘇聯運動下的犧牲品。這種種一切，我們不能不認爲是帝國主義先天的矛盾無可調和；而蘇聯和平政策的成功，不過是「因勢利導」的一種結果罷了。

六 結論

在這戰爭危機和革命危機相持的時候，中國應該怎樣做呢？不明世界大勢不顧民族利益的人們，或者是在那裏期望戰爭的到臨，但他們沒有見到，日本剛在第一步準備進攻蘇聯，東北四省「已非我有」。他們也沒有想到，中國之被瓜分，將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幕。他們更沒有意識到，中國在大戰當中要成爲別人的戰場。中國應該希望戰爭之到臨嗎？戰爭爆發之後帝國主義所加于中國

的更嚴重的壓迫，還能夠容許中國從容以求出路嗎？倘使不然的話，我們除了立刻發動民族革命，增強以民族革命消滅國際戰爭的運動之外，還有什麼呢？

二三·七·一五·申報月刊·

各國金融恐慌與貨幣戰爭

一 目下金融恐慌的分析

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現階段的金融資本時代，達到了牠的最高峯。

蒸汽機的發明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而信用制度的發達却是資本主義成熟的元素。金融資本之所以能完成目下資本的獨占化，而成爲牠「登峯造極」的特徵，不能不歸功於信用制度的發達。

信用制度是現代金融資本的骨幹。信用制度之所以能推進生產力，是因爲這充作交換媒介的貨幣，在信用制度之下，才開展了大量生產的規模。本來，蒸汽發明以後，商品的大量生產構成商品的大量交換，而大量的商品交換就需要大量交換媒介——貨幣——的供給；在這個情形之下，有限數量的金屬貨幣必然是無以應命，而脫離金屬的信用制度就必然要產生。所以信用制度的產生，本來是受動的——是商品的大量生產推進貨幣的大量生產，不過，在信用制度發展之後，貨幣的大量生產却又反過來推進商品的生產力。

這裏所謂貨幣，是廣義的；牠包含支付工具——狹義的貨幣——和信用工具——票據及證券。

在信用制度尚未產生以前，支付工具只有有限數量的金屬貨幣——硬幣；自從信用制度產生，我們便有更大數量的紙幣——軟幣。紙幣的發行，在平時自由兌現的時候，已經可以使貨幣數量大大的增加——假如紙幣的現金準備是五成的話，貨幣的數量，就已經增加了一倍。在目下不兌現的管理貨幣制度之下，貨幣數量的增加更是沒有限制。

現在再說到信用工具。在原始的信用制度之下，放款方式的運用，能使生產者在產品尚未售出以前從事再生產；這種方法，已經可能推進商品的生產力。然而，這是不夠的；因為還沒有知道利用信用工具。以後信用制度進步，我們就有第一種信用工具——流通票據。在票據貼現的方式之下，生產者能在售出商品尚未收到代價以前從事再生產。這種方法，進一步的推進商品的生產力。其後信用制度又進步，我們更有第二種信用工具——產業證券。在產業證券——股票和公司債——的購買和承受的方式之下，生產者能在資本積蓄未完成的時候取得新資本，從事於更大規模的生產。這種方法，使商品的生產力發展到最高度。

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先進各國產業的發展，有賴於公司組織的發展。公司組織的發展，就是第二種信用工具——產業證券——運用的結果。依賴產業證券的發行，大資本，大規模的生產機關逐

漸的設立；依賴產業證券的購買，產業資本逐漸的集中——大資本家用收買產業證券的手段，吸收小規模的產業機關，而成爲獨占的托辣斯。一面，工業資本家在托辣斯化的過程中間很自然的變成金融資本家——爲了資金吸收及運用的便利，和在證券市場上的活躍，這種轉變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金融資本家在產業證券的購買和承受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總轄公司（*Holding Company*）的組織，把許多產業公司收羅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這兩種運動的結合，就使金融資本取得各部門產業資本的獨占。

無疑的，在信用制度發展的過程中，產業證券是頂頂重要的一個工具。流通票據在本質上，還不過是商業資本開展到最高形態的一種方式；牠所能解決的，不過是短期流動資本——在工業資本社會中變了質的商業資本。工業發展上最基本的長期固定資本的取得，就非產業證券不爲功。同時，流通票據的生產，數量依然是有限的——不能超過現存商品和債權的數量。產業證券的生產，才是無限制的大量生產，才能和商品的大量生產相適應。產業家只要有足以動人的計劃，就可以經過金融資本的機構，發行產業證券。所以，流通票據的基礎，限於現有生產資本的領域；而產業證券的基礎，却包括將來的資本——因此牠才能創造新資本。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間，產業先進各國的信

用膨脹就以產業證券爲主要工具；也只有這樣，信用才能膨脹到雲霄那樣高。

資本主義社會在繁榮的時候，信用的大量膨脹——貨幣的大量生產——和商品的大量生產是交相爲用的適應着。然而，正和牠的商品生產是無政府的生產一樣，信用的膨脹也是無政府的膨脹——也可說是無政府的信用膨脹造成無政府的商品生產。到了恐慌爆發以後，起初是商品過剩，經過了相當時間，便發生資金的過剩。在目前，資本主義先進各國金融業所有過剩的資金，正和倉庫裏堆存着的過剩商品左右輝煌，而商品價值的跌落也正和利息的跌落一般無兩。

二 各國之貨幣金融政策

在百無聊賴之中，各國的當局只在貨幣金融政策上五花八門的大掉手法。他們認爲恐慌和繁榮的轉換，應該是循環不息的；目下的「經濟車輪」，只須有一種力量推動牠，就自然會向前轉動，繁榮就自然會恢復；而這推動的力量，便是一切巧妙的貨幣金融政策。

金集團主幹的法國，可說是列強當中對於貨幣金融政策最保守的國家。牠不單是在貨幣方面仍然保守着金本位，在金融方面也仍然保守着貼現率操縱政策。這種政策的內容，是由中央銀行在

信用過分膨脹的時候，提高貼現率以示限制；反之，在信用過分緊縮的時候，降低貼現率使市面鬆動。還有，在現金外流的時候，提高貼現也可能相當的加以阻止。法國在一九二六年，法蘭西銀行的貼現率曾高至六厘五毫八；一九二九年是三厘五；一九三二年以後，通常的站在二厘五。只有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至四月間，升到三厘；那就因為當時黃金流出頗多，法蘭西銀行，不得不提高貼現率，以圖補救。

法國所感到苦悶的，便是短期資金雖然低廉，而長期資金依然騰貴，上文已經說過：票據貼現所能周轉的，只是短期流動資本；長期固定資本的周轉，則有賴於產業證券。法國近年來有了低廉的貼現率，然而還不能有利率低廉的證券市場；國債發行的利率，差不多依然是盤旋於六厘左右。這一面要加重財政的負擔，而另一面要阻礙產業的發展；法國近來產業證券發行額的低落，是可怕的。

完全放棄金本位的國家，英國和日本可算是代表國。在財政、金融和產業的穩定上，英國自誇牠的成績；而在商品傾銷的力量上，日本被認為是一個勝利者。

英國自從一九三一年九月間放棄金本位後，幣值下跌，對法匯兌由每鎊兌一二四法郎降到本

年三月間的七二法郎，目下約爲七四·五〇法郎。同時，市場貼現率由一九三一年下期的平均數四厘六毫七下降到目下的一厘以下。

倫敦金融市場，素以自由著稱。跟着票據貼現和承兌業務的發達，短期資金的通融就十分便利；因此，牠成爲國際間的清算所。然而，不僅止此，長期資金的募集，在倫敦一向也是很自由的。自從金本位放棄以後，牠的國際清算所的地位，低落了許多——目下，牠只能算是英鎊集團間的清算所。到了一九三二年六月，英政府進一步禁止外國債券在英國的發行，使英國長期資金，不至外流，藉以造成低廉的長期資金市場。同時利用這個機會，發行低利的新國債，換回高利的舊國債。那結果，國庫的負擔，的確是減輕了許多，然而自由市場的意義，却是格外微薄了。以後國債掉換步驟完成，雖然把這個禁令取消，而代以一種限制法規，而非英鎊集團國家，依然不能在英國發行債券。要之，很明顯的，倫敦金融市場，是捨棄了國際化的形態，而步入集團化的領域了。

英國膨脹政策的最大成功，要算是財政收支的平衡。上述低廉的長期資金市場，使政府能以低利國債掉換高利國債，每年減少三百萬鎊的利息支出，自然是收支平衡的一些助力。然而，正也因為收支平衡，人民對於國債的信仰力增強，然後低利債券的掉換，能夠成功。

英國所感到苦悶的，就是在放棄金本位之後，短期資金利率由四厘六毫七下降到一厘以下，而商業資金的貸放，依然是沒有起色。倫敦全體交換銀行的貸放額是這樣（單位百萬鎊，每月平均餘額）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三月
拆 款	一四〇	一二一	一一六	一〇二	一三四	一三三
票據貼現	二六四	二五六	五〇八	三五四	二三〇	二〇七
放 款	九六三	九一九	八四四	七五九	七五三	七六七

——英蘭銀行月報——

在日下，在倫敦短期資金市中活躍的，不是商業資金的貸放，而是財政部短期債券的承受；後者的金額，已經由一九三一年末之五六九百萬鎊，而升到一九三四年末之七九九百萬鎊。

同時，長期資金利率的跌落，除了國債由四厘半，五厘掉換為三厘，三厘半以外，我們還可以在下列的債券市價指數上得着更顯著的成績（一九二三年基準）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上期
九八·七	一一二·四	一二四·三	一三〇·二

——世界經濟之現勢——三麥

但是，在這樣的低廉長期資金市場中，產業證券的發行，也只有衰落牠的數字是這樣（單位千鎊）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上期
二二一、〇七八	一四四、八七五	六二、四六一	七五、三九七	七八、〇七二	五〇、八八二

——世界經濟之現勢——三麥

我們倘使以最近的數字和一九二九年的數字比較，真有「不可同日而語」之慨。「長期蕭條」的特徵，在這裏也已經充分表示出來吧？也正因為產業證券發行的依然衰落，英國的物價指數和生產指數，也只能保持一個「平淡無奇」之局，失業問題也依然不能得着顯著的進步；湊合起來，便成爲整個經濟界的長期蕭條！

倘使恐慌是可以永久循環的話，目下低廉的資金市場，應該是恢復繁榮的一個樞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破壞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幣制尊嚴，去造成一個低廉的資金市場，而影響於經濟界的，只落得一個長期蕭條！這個長期蕭條的代價，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還要加上大不列顛帝國的集團化，用

「以隣爲壑」的手段排斥別國的商品，攘奪別國的權利「竭澤而漁」而收穫不過爾爾；英國前途的隱憂，真是不容漠視呀！

日本自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間放棄金本位後，幣價跌落的形勢，可說是一時無兩。以黃金價值爲標準，英、日兩國幣價跌落的百分數如下：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四月
英 國	六·九一	二八·一九	三一·九〇	三八·二三	四〇·九八
日 本	二·〇〇	四三·六〇	五九·六五	六四·四四	六六·一三

——國聯月報——

這也並不完全是日本有意使牠的幣價狂跌，而一部分是因爲日本是一個貿易入超國，經常的要賣出本國貨幣兌取外國貨幣，以支付貿易入超的代價，幣價的跌落是必然的。

日本放棄金本位後的形勢，一面是財政收支無從平衡，赤字預算，成爲絕大的危機；而另一面是產業證券的發行積極增加，自誇爲貨幣政策的絕大成功。關於前者，另詳專篇，茲不贅述。關於後者，新

產業證券發行額的增加，有如下表（單位日金百萬圓，每月平均數）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四月
一一五・〇	五一・六	三二・〇	九六・八	七〇・七	二〇五・九

——日本銀行——

自然，跟着幣價的狂跌，日本物價的上漲，也在英國之上。下面是兩國批發物價指數的比較：（一九一三年基準）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英國（商務部）	一三六・五	一一九・五	一〇四・二	一〇一・六	一〇〇・九	一〇四・一
日本（日本銀行）	一六六・一	一三六・八	一一五・六	一二一・七	一三五・六	一三四・二

因為物價上漲的刺激，生產指數的向上，是沒有問題的。產業證券發行額的增加，也就是生產指數向上的必然結果。日本的生產指數是這樣（一九三〇年基準）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〇二・四	一〇七・九	一一四・一	一三五・〇

這表面上恢復繁榮的日本經濟界內容是十分可怕的。生產指數的增加，含有備戰的意義者，大略如下（一九三〇年基準）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生 鐵	八五	九三	一二三	一四五
鋼 鐵	八五	一〇九	一三七	一七三
硫酸鉀	二二〇	二七六	二八七	三二二
人造絲	一三〇	一七九	二五二	三八三

—三 菱 月 報—

說牠是「軍需繁榮」，恐怕是很準確的吧？

* * * * *

對外維持金本位，國內流通紙幣，而用限制輸入，停付國際債務等手段，維持國際收支均衡的國家，以德國為代表。

德國自從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登台以後，因為國內黃金已幾告竭，乃將外人存在德國的款項，及德國應付國外債券的本息，改爲「封鎖馬克」及「登記馬克」。此種馬克，只能在一定限制之下，轉讓與德國人或游歷德國的外國人，在德國消費。這樣，德國便可以國內消費和德國商品的輸出，逐漸的清償國際債務，而不必輸出僅有的黃金——實際上是和「賴債」相去無幾。然而，牠依然不願債權人輸出過多的商品，而甯願他們在國內用旅行，居住，留學……等方式，把他們的債權完全消費在德國；所以，對於封鎖馬克及登記馬克的轉讓，要有一定的限制，每人每日能使用的數目，也有一定的限制。

德國人民，可以拿馬克紙幣在國內自由使用，然而不准匯至國外。又馬克紙幣流至國外之後，因爲德國對外依然是保持金本位，所以仍然有兌現的義務。因此，紙幣是不許攜出國境的。出國的人要把紙幣換成外幣，照平價要吃虧百分之四五十。私攜紙幣出境是要處以重罰的。

德國產業證券發行額的低落，是十分悲慘的。下面是牠的數字：（單位百萬馬克）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上期
八〇・二	四六・六	六五・二	一一・三	七・六	八・三

依這種數字推測，幣制改革後的德國，也還不見有絲毫恢復繁榮的影踪吧？

* * * * *

美國是一個善於製創新名詞的國家。在胡佛時代，我們所聽到的是所謂「通貨復原政策」(Reflation Policy) 這種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所謂「公開市場的運用」(Open Market Operation) ——由聯邦準備銀行向市面購買國家債票，以增加市上流通貨幣的數量。

自從羅斯福登台以後，金融恐慌使牠曾經一度於一九三三年四月放棄金本位，到了一九三四年一月間，牠又將貨幣含量減低百分之四〇·九四，使國際間恢復金本位，而只在國內流通紙幣；有人認為他目下是採用金塊本位，是有相當的準確性的。但是，自一九三四年六月購銀法實行後，牠是向「金銀複本位」的途徑上開展着。

美國利率下跌的情形，幾乎和英國差不多：短期資金的利率，已在一厘以下；長期資金的利率，依目下國債的收益為標準，亦僅在三厘左右。但是，短期商業資金的貸放，也依然沒有起色。美國全國銀行的承兌票據月終餘額如下：(單位美金百萬圓)

一九二九年三月	一九三〇年三月	一九三一年三月	一九三二年三月	一九三三年三月	一九三四年三月	一九三五年三月
一、二〇五	一、五三五	一、四六七	九一一	六七一	六八五	四六六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又，全國九十一城市聯合準備會員銀行之按期報告放款額者，其月終餘額總計如下（單位美金百萬元）

抵押放款	一九三二年三月	一九三三年三月	一九三四年三月	一九三五年三月
其他放款	四、七四四	三、六四四	三、五一四	二、九七四
	五、八八七	四、六八八	四、六四七	四、六三五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產業證券的發行，也沒有進步；新發行的數目如下（單位美金千圓）

一九二九年三月	一九三〇年三月	一九三一年三月	一九三二年三月	一九三三年三月	一九三四年三月	一九三五年三月
一、〇七三、五〇八	六五八、四七三	五五二、八五四	一六一、四四一	一六、五一七	九、三一五	一〇八、〇七九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依上述的數字，以觀察美國在通貨膨脹以後，資金已甚低廉，而經濟界也依然逗留在長期蕭條的局面之下；前途的可慮，殆和英國不相上下。生產指數也未見有顯著的進步。而財政狀況的惡劣，却和英國大相逕庭，目下美國通貨的膨脹，可說完全是以財政膨脹為手段——藉國庫支出的增加，以增加通貨的數量。預算不敷之數，已達四十萬萬圓以上，至本年三月底止，國債餘額，達二八、八一七百萬圓。銀行對於商業資金的貸放減少，而對於國債的購買增多；造成空前未有的畸形發展。一時「甚囂塵上」的復興運動，法律方面的失敗，還是最近的事；而事實方面的失敗，却已早現端倪。在這種狀況之下，復興何日，美國何處去，真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呀！

三 各國政策的比較與貨幣戰爭的展開

各國貨幣金融政策之所以歧異，實因背景不同，利害相左。法國在大戰以後，幣值曾一度減低；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不平衡，曾經一度清算。戰時與戰後幣價狂跌，物價高漲的痛苦，猶深印人民腦海中；政治方面，左傾各黨勢力甚大，均一致反對減低幣值，以保障消費大眾之利益。同時，法國為債權國，年來存金不斷增加；本年三月底止，紙幣流通數八三、〇四四萬法郎，而存金數達八二、六三五

百萬法郎。就金融本身而言，牠對於國內兌付及國外支付，均可應付裕如而沒有放棄金本位的必要。物價跌落和財政困難，也許是法國應當放棄金本位的理由。但是，通貨膨脹能不能解決物價問題？然在不可知之列。而以通貨膨脹解救財政困難，却必然是要「積重難返」而終於慘敗。金集團國家之所以堅持掙扎，誰說是無故的呢？

德國在戰時和戰後的教訓，可說是和法國差不多。德國人民對於通貨膨脹的恐怖和反對，決不在法國之下。因此，希特勒登台以後，對於貨幣在國內的購買力，未敢使其減少。但在國際間，德國是一個債務國，與法國剛剛相反。倘使牠也任令黃金之自由出入，存金早化烏有。即退一步以商品支付到期債務，也要使國力大減，物價高抬。德國在這軍需製造十分緊張的時候，是不能留出偌大的生產力，製造商品，以作支付國際債務之需的。因此，牠除了限制黃金的外流以外，還要進一步停付國際債務，然後可以保存國力。牠對於若干貿易關係重要的國家——若英國，不能不遷就一些，訂立一種債務，清算的條約，然而依然是量力而行，而且償還數很微的。

英國本來是一個大債權國；不過到了近年，牠和殖民地間的矛盾，日趨深刻——像加拿大，真不過是掛了英國旗罷了。殖民地的投資，逐漸的就地化；正如羽毛豐滿的雛鳥，離母懷而高翔，這種資本

已經不是英國的資本了。沃太華會議可說是調整英國與殖民地間關係的一個最後的企圖，但是所得的結果，連貿易的集團化都還不能十分美滿。英國的國際收支，最近要變成入不敷出的慘象，不是無因的。原來，倫敦市場中的資金，有極大的流動性；不獨別國的存款，可以隨時提取，連殖民地的存款，也不易加以控制。一九三一年歐洲金融恐慌的牽動，使英國喪失三千五百五十萬鎊的黃金，金本位就不得不被逼而放棄。

但是，倫敦國際市場的地位，不獨在殖民地的控制上有極大的威力，在手續費的收入方面也足為國際收支之一助。所以，放棄金本位後的英國，依然不能不致力於英鎊國際信用的恢復，以期重建倫敦國際市場的地位。英國迫切希望國際貨幣價值的穩定——如牠在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所提出的，不是無因的。牠在目下，依然不肯輕易為貿易戰爭的緣故壓低幣值，也是權量輕重，煞費苦心的。好在牠有廣大的殖民地；只須在殖民地適當的驅逐別國商品，貿易的調整並不是十分困難的。

日本在貿易上，是一個長期的入超國；牠在朝鮮、台灣、中國，以及南洋一帶投資的猛進，使牠在國際收支上不能不處於逆勢。一九三〇——三一兩年間，存金由日金一、〇七二百萬圓銳減到四七〇百萬圓，再加以對華用兵和英國放棄金本位的影響，牠不能不放棄金本位。日本是一個比較後進

的資本主義國家，牠的金融勢力，在國際上還是十分微弱；所以，牠不必像英國一樣，急急於幣值的穩定。同時，牠因為生產力的膨脹，狹小的殖民地不足以容納牠的過剩商品；所以，牠在貿易上要奪取別人的市場，是十分迫切的。在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中，英法兩國提出穩定幣價的建議時，日本的對案是關稅壁壘的撤廢。這就是說：你們倘使要保持着很高的關稅壁壘，我只好以「貨幣傾銷」——以低廉幣值為傾銷工具——向你們進攻；如果你們能撤廢關稅壁壘，我相信我的「社會傾銷」——以低廉工資為傾銷的工具——可以戰勝。也許在未來的世界經濟會議中，牠還要提出獨占中國市場的對案，以為穩定幣值的交換。

顯然的，在日本的立場，不能不認幣價繼續低落之害少利多。因此，牠在目下依然是國際貨幣戰爭的主角，而日金價格的跌落程度，要超過任何列強的貨幣。然而，貿易入超能使一國幣值跌落，幣值跌落能使輸出增加，輸出增加自然會使入超減少，而入超減少的結果，幣值必然要上漲。這一個循環，終久要使貨幣傾銷感到苦悶的。日本對於這個苦悶，應該用什麼方法去解除呢？

日本對於這問題的解決，就是不顧一切的利用「非常時」的造成。對華的軍事費，對華的產業投資，軍需的大量購買……能使日本的國際收支，經久的處於逆勢，能使日金不斷的傾向跌落。然而，太

平洋是從此不能太平了！

美國處在債權國的地位，與法國相同；而存金的豐富，則遠過之。牠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有美金四、二一二百萬圓的存金，而只有五、八〇六百萬圓的紙幣；在一九三四年美金貶值以後，紙幣發行數是五、五三六百萬圓，而存金數變爲八、二三八百萬圓。牠所和法國不同的，是大戰時未受貨幣跌價的痛苦，債權人和債務人間的關係，亦未嘗經過清算；所以，債務人對於通貨膨脹的要求；那時是很高的，一九三三年四月間金融恐慌中，資本逃亡和窖藏現金的風氣，復盛行一時。當時倘使不停止金本位，存金減少的趨勢的確也是可怕的。爾後一面在國際上恢復金本位，而一面減低幣值以減輕債務人的負擔，同時刺激物價，正和當時的國內形勢相適合。而紐約的國際市場的地位又與倫敦並駕齊驅，且時欲取倫敦而代之；因此，美國目下對於美金的價值，也採取穩定的政策，以期恢復牠在國際上的地位。

自從世界各國相繼放棄金本位後，各國相率以貨幣戰爭爲貿易戰爭的一種手段——利用本國幣價的低廉，使本國商品在海外市場價格低廉，易於傾銷。這種戰爭，在美國放棄金本位以後，進一步的開展起來。當時英美兩國，都曾運用牠們的大量的「匯兌平準基金」，互相的提高別人的幣價，

同時壓低自己的幣價。但是，到了近來，這種戰爭的方式似乎是沉寂下去了。本年比利時放棄金本位，因為牠在國際貿易上關係不大，也並未引起嚴重的競爭。而且，在若干方面，矛盾的發展已經出現一種統一——就是，非金本位國對於金本位國，予以扶助，使能保持金本位於不墜。本年春間法國金本位動搖的時候，美國在法國賣出大量的美金，使法國黃金減少運赴美國的可能，就是一個證例。本來，非金本位國應該希望金本位國的存在，然後可以保持其利益。而英美兩國，目下都有穩定幣值的要

求，牠們自然更不願意法國幣制的動搖，使貨幣國際間又增一重新的糾紛。似乎，目下依然重視貨幣戰爭在貿易方面的意義的，只有日本。在其他各國，貨幣戰爭的方向，已經移到集團化的方向去了。

四 貨幣集團化與銀問題

在帝國主義列強間矛盾深刻化的時候，政治和經濟的各部門都由國際化轉變到集團化。經院學派國際分工的幻想，就在這上面遭遇着沒落，而戰爭就是這樣醞釀成功的。目下，除了軍事同盟的暗中締結，外交陣線的明暗折衝之外，貿易和貨幣的集團化，也是呼應着進行。

無疑的，金本位制是一種國際本位，而金本位制的傾覆是貨幣國際化的沒落。在政治的貨幣本

位——紙本位和管理本位——之下，集團化就自然的展開。貿易上由關稅壁壘的高築發展到最惠國條款的廢棄和特惠稅率的協定，也不過是關稅同盟方式下的貿易集團化。

貨幣集團化的開展，不獨在國際金融中心市場的爭奪上有重大的意義，在殖民地的控制和開發上也有重大的意義。假如世界上一個二等以下國家的貨幣，是和英鎊採取聯繫，牠的國際上的收付，就自然的以倫敦為中心；牠自然平時就要在倫敦保持相當的準備，而需要的時候更要向英國要求借款。同時，牠國內的商人，在採購外國商品的時候，自然就先放慮向英國購買；因為買入英國商品，只有物價下跌的危險，而沒有匯兌上的危險。他們要借入國外資金時，自然也向英國借入為有利；因為可以避免匯兌上的危險。這樣，英國便可以向那個國家輸出更多的商品和更多的資本，而儘可能的使牠殖民地化。我們再回想：假如一九一八年曹汝霖經手的金券條例當時實行，目下集中在上海的發行準備金，不早已安然移至東京嗎？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勢力和金融上的控制力，不更加強嗎？貨幣集團化和貨幣權的爭取，就是這樣的意義。

目下國際間的貨幣集團，有金集團，英鎊集團，美金集團和日金集團。內中金集團組織最為渙散，意義也最為薄弱；因為牠本來是貨幣國際化的殘餘，是在對付貨幣戰爭的時候勉強湊集成功的。英

鎊集團與國最多，除了英屬地之外還有十多國。美金集團與國較少，但因為美國是世界上的「金圓王國」，所以勢力却很大。日金集團的勢力，僅及於朝鮮和台灣；以前很少有人提出，是在最近爭奪中國的貨幣權，才引人注意的。

世界上未分割的半殖民地，只有阿比西尼亞和中國，而中國自然是頂頂惹人注意的一片土。因此，中國貨幣權的爭奪，便成爲目下國際貨幣戰爭的焦點。我曾經指出：美國白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奪取中國的貨幣權。牠在提高銀價到適當的程度——假定是每盎司等於美金一圓二角九分——之後，隨即使之穩定，使金銀有一定的比價；那樣，牠在國內就已經採取金銀複本位制，而銀本位的中國，就自然已經加入美金集團了。這裏，英國自然不肯坐視，因此就提出借款與中國使中國改用英鎊本位的建議。日本也不甘落人後，更倡議日本改用銀本位，而以日本爲中心在遠東組織「銀集團」；甚至還有人主張中國加入日金集團。

在本年五月間，報紙載登英美法意四國派遣代表來華研究中國幣制的改革；惟英國主張中國改爲英鎊本位，法國主張中國改用金本位。其後，我們還見到日本反對各國協助中國改革幣制，而主張由牠一手包辦。這中間爭奪的情形，大致和我從前的估量吻合，只添了一個法國的參加。

最近，英美兩國的代表都已派定而且動身了。這爭奪醞釀出來的結果是怎樣呢？

五 前途的展望

國際間的事情，在任何方面都遭逢重大的演變。貨幣政策由採取安定自己幣值的手段轉變到相率減低自己幣值的貨幣戰爭手段，自然也是很重大的一個變化。本來，以破壞幣制尊嚴和貨幣信用的方法去挽救崩潰中的信用制度，在方式上是「抱薪救火」，而在事實上是「計無所出」。這種政策的成果，如上文所舉的事實，不是長期蕭條，便是軍需繁榮。轉動「經濟車輪」的力量已經用竭了，然而繁榮在那裏？

本來，對內以通貨膨脹提高物價的方法，正好比改用短尺去衡量同一的標的物。尺數即使增加，也不過是「狙公」朝三暮四與「暮四朝三」的把戲；愚弄人民，鼓勵投機則有餘，恢復繁榮則不足。

現時代資本主義列強間的主要矛盾，第一是國家擁有大量的黃金，而財政弄得沒有辦法——如美法兩國；第二是銀行擁有大量的過剩資金，而工商業資金不足；第三是倉庫裏堆積了大量的過剩商品，而許多人民在半飢餓之下度日；第四是社會上充滿着失業的工人，而工廠不能開工。這內中

的關鍵，不是枝節的貨幣問題，而是整個的私有財產制度問題。財政困難之無由解決，是私有制阻隔了政府和人民中間資財的溝通；信用緊縮之無法解救，是私有制阻隔了金融資本家和中小企業家中間資財的溝通；生產過剩問題之無由解決，是私有制阻隔了資本家和勞動大眾中間資財的溝通；而失業問題之無由解決，是私有制阻隔了資本家和勞動羣衆中間資財的溝通。這種阻隔減低目下人類的幸福，其害猶小；抑滯人類文明的進步，其害乃大。無怪乎掙扎徒勞的羅斯福，目下是要進一步主張「均富」了。然而，姑無論羅斯福均富政策的內容是怎樣，均富政策的本身就是有弊害的。如何積極的充分利用目下的生產力？如何使目下的生產力成爲社會的生產力？如何使生產結果在滿足人民的需要之外，再使剩餘的價值轉變爲推進人類文明的新資本？才是當前的根本問題。消極的「劫富濟貧」方式的均富，會有什麼前途呢？

然而，國際間目下的形勢，是走向更可怕的一條路。經濟戰爭到了貨幣戰爭的階段，已經是「無以爲繼」的最後一着。繼起的便只有軍事戰爭。而貨幣制度由國際化的金本位轉變爲國家主義的政治貨幣，再轉變爲貨幣的集團化也是戰爭降臨的一個重要特徵。

在經濟戰爭中，半殖民地的中國已經弄得「遍體鱗傷」。在將來的軍事戰爭中，我們應該何以

圖存？我們能用外交儀式上的「國際地位抬高」一句空洞話，來自欺欺人嗎？

二四·七·一五·申
報月刊

大戰前夜各國的貨幣政策

一 貨幣的三種不同作用

目前世界各國正在利用貨幣政策以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要說明這種貨幣政策的種種複雜關係及其前因後果，必須先說明爲一般人平時所不注意的貨幣的三種不同作用。

第一、貨幣的作用是因人而異的。一個麵粉廠主人賣出一包麵粉收進三圓銀幣，一個農民賣出七斗小麥收進三圓銀幣，和一個麵粉廠工人做了五天工作收進三圓銀幣；同是三圓銀幣却包含着絕對不同的意義。麵粉廠主人將本求利，他所收進的三圓銀幣包含着「利潤」而農民和工人却是用勞力換來的收入和工資。

假定每包麵粉的原料價值是二元八角，則麵粉廠自身的生產價值就是每包二角。假定每一個工人每天可以生產十包麵粉，那末，每個工人每天的生產價值就是二元。然而，每一個農民每一年工作往往只能生產二十担小麥，除了種子肥料和地租以外，每担小麥假定淨餘二元，則每年生產總價值亦不過四十元。這樣，一個農民每一年的生產價值僅等於每一工人工作二十天所生產的價值。

這樣說來，似乎工人比較農民佔了便宜了。可是在事實上並不如是。因為每一工人每天所生產的價值雖然是二元，而他所得到的工資是六角。加以工人收入雖然比較農民多一些，但他們給房東的房租，却要比農民大十倍以至幾十倍。因此，工人每天工作所得的生產價值，大部份付給廠主及房東了。廠主雖然是要付地租利息等等，但在平常時候，總還是賺錢的。並且廠主可以把出賣麵粉所得到的貨幣，作為購買原料等再生產的資本，而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僅不過作為勉強維持生活的消費，同時又受到零賣商的剝削。因此，就在貨幣的不同運用之下，一小部份的人，一天天的富足起來，他們的生產資本一天天的擴大起來，而另外的大部份人——農民和工人——是一天天的貧困下去了。

第二，貨幣的作用是因地而異的。例如在資本雄厚設備完善的美國，每一個工人每天工作所得的生產價值，就可以比較中國工人多三四倍。美國農民因為利用機器耕種的緣故，每人每年的生產價值，也可以比較中國農民多一二倍。因此，美國的小麥和麵粉的售價，可以比中國低廉。中國的麵粉廠主人，曾因為美國麵粉在中國的低價傾銷而不能不跌價以致於虧本。所以，在國際競爭上，中國的廠主也是處於被壓迫的地位。

就在貨幣因地而異的作用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生產資本，就因為能力薄弱，敵不過帝國

主義資本勢力的壓迫而一天天地衰落下去。民族資本工業不能抬頭，的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個致命傷。

第三、貨幣的作用是因時而異的。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貨幣的活動可以操縱一切，不但貨幣擁有莫大的權威，就是代表貨幣的種種證券票據，亦大爲人所歡迎。信用膨脹的結果，生產力就更加大規模的擴展。但另一方面工農大衆的購買力，不但不能追隨大量生產的增加而同樣進展，而且剛剛相反，因爲機器發達的緣故，工廠雇用工人的數目，大大減少，結果，造成千百萬的失業工人，完全失却購買力。到了最少數人生產力發展到最高度的時候，正是最大多數人沒有工做沒有飯吃的時候，遂形成空前未有的經濟恐慌。表面上是生產過剩，實際上却是購買力的不足，因爲工農大衆，雖極需要各種物品，因爲手裏沒有貨幣不能購買。

等到恐慌發生以後，貨幣便常常躲在各銀行的庫房裏，不敢再向工商業界活動。工商業界得不到足夠的貨幣以應付當前的需要。結果，工廠商店因缺乏流動資本而停工或倒閉以增加失業者，使恐慌更形深刻。在這時候，大金融資本家却擁有巨額的貨幣，保持着無上的權威。他們對於工廠押款，土地押款的無力取贖者，一律沒收或拍賣，直接或間接成爲他們的產業。而很多的小銀行，也在這暴

風雨中犧牲了。

貨幣就是這樣一件東西；而到了現在，已經可以說是貨幣的轉變時期。因為經濟恐慌的日益深刻化，貨幣在最近數年，已經發生了不少的變化，這就是本文下面各節所要敘述的。

二 最近五年間的貨幣革命

最近五年間貨幣制度底變遷，的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阿真廷和烏拉圭首先停止紙幣的兌現；因為牠們都是比較小的國家，在世界金融市場並不占重要的位置，所以一般人都都不大注意。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號稱「金融帝國」的英國突然的停止金本位以後，國際金融市場才受着重大的震驚。到了同年十月底，英國統屬下的自治領和殖民地，除了南非聯邦之外，都放棄金本位；瑞典、挪威、丹麥、葡萄牙、埃及、玻利維亞及芬蘭也相率放棄金本位。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宣布禁止金出口，十八日並停止紙幣兌現。一九三二年四月，希臘放棄金本位，五月，暹羅和祕魯也放棄金本位，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美國的金本位也終於停止了。

到現在為止，世界上號稱維持金本位的，雖然還有法蘭西、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德意志、捷克

斯拉夫、波蘭、盧森堡等國，但其中德波意捷克各國，在嚴重的貿易統制、匯兌統制和通貨管理之下，事實上金本位已經是「骸骨無存」。尤其是德國，牠的金準備才占發行額百分之二，所謂金本位，正和希特勒的別種政策一般，只是騙騙人罷了。

在今年十月十五日，中國又採用加征白銀出口稅及平衡稅，其原因和意義，在後文再為說明。

三 幾個重要的新名詞

事實底教訓，使一般人漸漸的能夠了解從前不能了解的事情，然而，這種了解往往是表面的，而且是不準確的。比方，「通貨膨脹」許多人認為就是「銀根鬆濫」；然而，正確的說，銀根鬆濫往往只是通貨膨脹原因或結果，而並不能代表通貨膨脹。通貨底膨脹和緊縮，只能用通貨的數量來表示；而銀根底鬆緊，却是用通貨需要和供給底關係來決定的。比方，在經濟繁榮的時候，通貨是膨脹了，然而因為需要太多，銀根的緊急依然是可能的。嚴謹的說，通貨是指流通在市上的貨幣而言。所以，國家銀行底庫存，雖然是貨幣，然而不是通貨。中國還沒有嚴整的統計；所以，計算中國底通貨本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而，在所謂「上海存銀」之中，一部分洋商銀行所有的存銀和各銀行發行紙幣準備金

項下的存銀，是顯然不能認爲通貨的。所以，要用存銀多寡來測定通貨的膨脹和緊縮，是不正確的；能夠表示比較正確的狀況的，還是各銀行紙幣發行額。

爲要使讀者便於了解起見，我現在再插入這一節，說明幾個重要的新名詞。

「放棄金本位」或者「停止金本位」已經成了很常見的名詞。這個名詞和「禁金出口」及「停止兌現」有什麼關係呢？簡單的說，禁金出口是對外的停止金本位，因爲那種貨幣在國際上成了「不兌換紙幣」了；而停止兌現是對內的停止金本位，使國內人民不能再拿紙幣兌取黃金。這兩種手段可以同時的用，也可以單獨的用。比方，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宣布禁金出口的時候，紙幣並沒有同時停兌。又如，目下的德國在國際上並沒有停止金本位，也並沒有公然禁金出口；然而牠一部分的——其實是大部分的——貨幣，已經轉變爲不兌現的「封鎖馬克」；很有限的「自由馬克」事實上對於國民也是不兌現。

在這裏，我們得先研究一下所謂統制匯兌底意義。統制匯兌在放棄金本位的國家，固然也需要；而在掙持着表面的金本位的國家，尤其是需要。擁着金本位虛名的德國，就在統制匯兌名義之下，實行其「通貨管理」。牠在一九三二年五月頒布了匯兌管理法，規定出來「封鎖馬克」；一九三三年

更產生了「註冊馬克」這兩種馬克都是管理通貨，只可以在德國國內使用，而不能匯至外國。此外，所謂「自由馬克」依然是存在，然而牠用種種方法使自由馬克轉變為封鎖馬克或註冊馬克，這樣逐漸的減少自由馬克底數量，自由馬克在法律上是兌現的，然而對於國內人民，牠用政治手段使之不兌現，而轉變為封鎖馬克，對於國外匯來付給外僑的自由馬克，牠用兌價上的便宜，使之兌成註冊馬克——有時一個自由馬克，可以兌成一個又四分之三的註冊馬克，同時，對於自由馬克——自然是紙幣，限制攜至國外；國民固然不准攜赴國外，外僑攜至國外的數量，也不得超過原來帶入的數量，這樣，自由馬克，就不會再有甚大的兌現可能性了。就是在這種種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手段底運用之下，德國能以百分之二的金準備，維持牠的名義上的金本位。

「管理通貨」底意義，在上面已經說明了一部分了。然而，這當然還是不夠的。要進一步明瞭管理通貨底意義，我們還得研究英美兩國底制度，說到管理通貨，牠的主要作用，還是使貨幣價值，能在通貨數量底伸縮當中，取得一種自由的控制。易言之，就是用通貨膨脹或者緊縮的手段，使貨幣價值安定在所需要的標準之內。因為美國到目下為止，管理通貨底目的，在於使金元貶價；所以，牠所取的手段，幾乎完全是通貨膨脹手段，減低金元成分至百分之六十以下，事實上也是膨脹手段之一；金元成

分減低之後，使美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強的金幣。此外，如政府收買國債，收買白銀，收買黃金等，都不外使紙幣到市面上去，都是膨脹政策。

英國的管理通貨政策，雖然也有許多方法，而平準基金的運用，要算是主要的辦法。英國平準基金，目下有三億五千萬鎊。在英國放棄金本位之後，英鎊價值暴跌之際，政府開始運用平準基金，一面向海外買入英鎊匯票，一面向國內賣出外幣匯票，使英鎊在國際匯兌市場上，價值提高。在美國放棄金本位之後，美金跌價，美貨價廉，使英國貿易受到打擊；英國使幾次的運用平準基金，一面向國內買入外幣匯票，一面向國外賣出英鎊匯票，使英鎊跌價。現在，美國也有二十億金元的平準基金——就是金元減低成分中政府所得的贏餘，可說是和英國勢均力敵。在上海金業交易所做外匯投機的人們，顛倒成敗在美金和英鎊起伏之間，他們多數在那裏把功罪歸到命運上去，其實冥冥中就是平準基金在那裏主宰他們的命運。哎！可憐的人們！

在最近給與他們以重大的打擊的，就是中國政府的白銀出口加稅。加稅底動機，是因為在美國收買白銀政策實施之後，中國白銀大量的出口。美國收買白銀，是使美國對白銀跌價，而中國政府加徵銀價出口稅，是中國銀幣對金幣跌價，銀出口稅底基本稅率，是百分之十；然而，倘使倫敦銀價比上

海銀價，高過百分之十時，再要依高出的百分數，加課「平衡稅」；比方，倘使倫敦銀價比上海高百分之十五時，那末，中國出口白銀除了百分之十的出口稅之外，還要課百分之五的平衡稅。這樣，中國銀幣在國際匯兌上，便要永遠比海外白銀價值低——所低的數量和課稅的數目差不多。因為中國白銀出口加稅不過是對於美國收買白銀政策的一種對策，所以，在事實上，這許多受着白銀出口加稅的打擊的投機家，依然是間接的受到美國通貨膨脹政策之賜。

四 國際貨幣形勢底分析

在說明幾個重要的名詞之後，我們可以把幾年來的國際貨幣形勢，作一個歷史的分析了。

貨幣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一件法寶；貨幣底活動是資本主義下一切經濟活動的樞紐；而貨幣戰爭是多方面的經濟戰爭底一環。我們聽到國際間所謂「黃金底爭奪」為甚麼要爭奪黃金呢？因為黃金是世界上的貴金屬，是國際償付的主要工具；倘要在平時能以金融資本勢力壓倒別國，在戰時能以財力量取得最後的勝利，就不得不爭奪黃金。在戰時能以黃金勢力取得勝利，戰後便可以賠款方式爭取更多的黃金。

歐戰以後，世界黃金，紛紛流向美法二國。法國之所以能取得黃金，基於凡爾賽和約下的賠款，而美國則來自戰債者居多。因為黃金被少數國家壟斷了，其他用金國便感到金融枯窘，結果就被迫而放棄金本位。

然而，美國擁有多量黃金，為甚麼也要放棄金本位呢？這一面，是因為羅斯福上台之後，許多人估量到幣制要有改革，紛紛把美金換成外國貨幣，或者購買外國證券，這就造成嚴重的「資本逃亡」。資本逃亡的結果，美國黃金便大量的運向別國，這就造成「歡迎羅斯福上任」的大金融恐慌。為緩和金融恐慌及保持黃金起見，美政府就只好禁金出口了。另一方面，美國的物價，除了用打強心針方式的通貨膨脹之外，也更沒有別種方法使之上漲，所以，美國的放棄金本位，和別國不同，是無意的，而同時又是有意的一——在緩和金融風潮及保持黃金存量的意義之下，牠是無意放棄而終于被迫放棄的；而在提高物價的意義之下，却是有意。

在放棄金本位之後，「通貨膨脹」是必然要跟着表現的，然而，所謂通貨膨脹，也有不同的意義。有的是因為財政的窘迫，不得不以發行紙幣為彌補，因而膨脹通貨的；還有的却是因為要使通貨貶價——為貨幣戰爭——而通貨膨脹。膨脹通貨的技術，目下是大大的進步了；即使是為財政而膨脹通

貨，也多不採用發行紙幣的直接手段，而採用發行債券的間接手段。債券經由銀行購買之後，銀行金庫裏的貨幣，就交給政府，而政府復以「政費支出」的方式，使之流入民間，事實上，恐怕只有為財政而膨脹的通貨膨脹，是一個比較澈底的膨脹。因為，在上述收買國債，收買黃金及收買白銀的方式之下，貨幣往往不能流到消費者的手裏——在若干情形之下，貨幣依然存在普通銀行底金庫裏面。那種膨脹底效力，是很微弱的。

為甚麼在這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放棄金本位的時候，少數國家依然保持金本位呢？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歐陸諸國，戰後曾經飽嘗通貨膨脹底痛苦，不願意再度嘗試；而經過一次泛大的通貨膨脹之後，債權債務，即經一度澈底的清算，債權人和債務人間的矛盾，也比較的輕微；同時，若法國進口稅底增高，其他各國底貿易統制，也儘足阻止黃金外流，放棄金本位便成為並不切需了。然而，一旦形勢突變，或者戰爭開始，金本位是隨時可以放棄的。

有些人以為放棄金本位的國家，不斷的企圖使金本位國也放棄金本位；這是錯誤的。我們只要認識放棄金本位是通貨戰爭，各國為貿易計，是利在本國幣價底低落，就可以明白了。然而，在英美運用平準基金買入金本位國貨幣的時候，要使該國黃金發生外流的趨勢，那便要使牠的金本位動搖，

然而，這決不是有意的。

通貨膨脹究竟能「昭蘇」目下的經濟恐慌嗎？恐怕這不過是「膨脹論者」片面的幻想罷了。在事實上，這「盤根錯節」的恐慌，決不是「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所能解救的。膨脹論者對於物價，只看到商品和貨幣的關係，而沒有看到商品本身的供求關係；他始終只是盤旋在「幣賤則物貴幣貴則物賤」的定律之下，而如何能使「幣賤」的方法，也往往只有根據「貨幣數量說」增加貨幣的數量——美國的減低金元成分是比較進步的一種方法。

倘使貨幣能夠自己起來購買商品，那末，膨脹論者的策略是可以成功的。不幸得很，貨幣依然是有待於人的運用，然後能變為購買力。不是貨幣產生購買力，而是「消費大眾」產生購買力；而消費大眾之所以能夠產生購買力，依然是靠着「工資」。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生產力和購買力中間，隔着一個「利潤」的鴻溝，使生產力和購買力無從調和。一方面，資本底累積和機械底發明使生產力不斷的擴大，而另一方面，人工需要底減少却使工資不斷的縮小。工資底縮小一面代表購買力底降低，而另一方面却代表利潤底高漲。於是，在「利潤」的鴻溝儘量向購買力方面擴展之後，消費大眾變成「無錢購買消費品的大眾」——飢餓和半飢餓的大眾。倘使利潤的鴻溝不消滅，通貨數量底增加，不過

使普通銀行金庫裏的「游資」增加，購買力底增加決計談不到；即使一時能使物價因「刺激」而高漲，也不過是一時的興奮作用罷了。

事實告訴我們，通貨膨脹不單是不能增加大衆的購買力，却正是相反的削弱大衆的購買力。像德日英各國，在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時候，工資指數却是下跌；這表示工人的支出因物價上漲而增大，而他的工資收入反而減少。

通貨膨脹對於國內的勞工，是一種剝削；而對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很顯明的，在「貨幣跌價傾銷」之下，不單是中國的民族工業資本受着重大的打擊，中國的農民也在外國廉價農產物的傾銷之下逐漸的破產。這樣，勞工和殖民地人民，是做了通貨膨脹底犧牲品。

然而，畢竟因為通貨膨脹所起的作用是強心針的作用；牠的興奮力使資本家盲目的增加生產，而牠的剝削力使消費大衆進一步的喪失購買力。所以，通貨膨脹所造成的，不是繁榮的恢復，而是更大的恐慌底胚胎。於是，二次，三次……的膨脹，就必然要跟着做下去，以企圖消滅這個胚胎。美國銀行家說：通貨膨脹要成爲「積重難返」之勢，這是完全的確的。然而，通貨膨脹底過程能有幾何呢？牠的「有時而窮」恐怕是眼前的事吧？

五 貨幣與戰爭

通貨膨脹要「有時而窮」，這是歐美各國的統治者都見到的，他們也知道，在現階段的資本主義之下，只有戰爭可以消滅恐慌。所以，目下的貨幣政策，和未來的大戰是有密切的連繫的。

以前，通貨膨脹本來是戰時的狀態。倘使目下的經濟恐慌發生在歐戰之前，戰爭已經先通貨膨脹而起。因為歐戰底教訓，因為各國的一般大眾多反對戰爭，因此，戰爭就落在通貨膨脹之後了。然而，帝國主義間的「非武裝戰爭」，由關稅戰爭到貨幣戰爭，已經達到了「無以為繼」的階段。所以，武裝戰爭要繼貨幣戰爭而起，已經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事實上，在目下的通貨膨脹政策之下，各國的通貨數量依然沒有膨脹。德意美日各國的紙幣流通額，幾年來只有減少；英國也只保持一個平穩之局。所以，要使通貨膨脹政策能收到切實的膨脹結果，是有待於戰時；而目下的膨脹政策，卻剛好安排好將來戰時的膨脹基礎。美國的收買白銀，許多人已經認為有備戰的意味，而土耳其最近更有鑄造銀幣以代替紙幣的消息，更值得我們的注意。以銀幣代替紙幣，事實上是不可能而且不必有的；在戰前以「餘閒」鑄造銀幣，以為戰時通貨膨脹的準備，

那才是聰明而有意義的一着。

我們再看看美法兩國，一面集中世界上過半數的黃金，而一面還在那裏鬧財政恐慌。這固然表示現制度下的矛盾，而同時也表示，牠們所囤積的黃金，是要留作戰爭時的用度的。

六 結論

五年來的貨幣底改變，是貨幣史中重要的一頁。

教科書告訴我們：國際貿易所產生的國際分工，固然可以促進世界大同，貨幣底國際化也可以促進世界大同。而目下是怎樣呢？生產在「自足自給」的「關門主義」之下固然成了極端的國家主義化，貨幣也照樣的成爲國家主義化。世界大同的任務，只好留待未來的社會制度。

教科書還告訴我們：商品底生產量能用供求律去控制牠，貨幣底流通量也能用供求律去糾正牠，而經濟恐慌也能由供求律自己去消滅牠，而目下呢，商品底生產顯然的已經變成無政府的狀態，經濟恐慌更決非供求律所能自然的加以消滅。目下的貨幣，不單是離開金屬學派或法制學派底領域，而且完全在政治手段控制之下了。

國際貨幣戰爭的剖視

一 貨幣戰爭的開端

貨幣戰爭是一個新名辭；是從一九三一年世界上許多國家停止金本位以後才產生的。停止金本位這一件事，在歷史的觀點上，是很嚴重的。第一，就各國的貨幣本身而言，牠們不是財政上或者經濟上的困難，到了無法解救的階段，決不至放棄金本位。第二，就國際的關係而言，金本位是一種國際貨幣本位；放棄了國際的本位而採取國家的，政治的貨幣本位，是國家主義突破了國際主義的表徵。這在學理方面，表示現制度下矛盾的開展，使經院學派世界大同的幻想，完全破滅；而在事實方面，表現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已在目前。我們回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交戰國放棄金本位的情形，能不觸目驚心嗎？

事實上，國際金本位自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摧毀，元氣始終未復。我們一檢查下列的表格，就可明白。國際貨幣戰爭雖始于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以後，而放棄金本位，却並不是由英國開

端；甚至有若干國家大戰後始終還不曾恢復金本位。

(甲) 世界放棄金本位國家表

國名

放棄金本位日期

西班牙

土耳其

哥斯德黎加

阿根廷

巴西

澳洲

烏拉圭

墨西哥

英國

英屬馬來

英屬印度

派利斯丁

大戰中放棄金本位，並未恢復。

一九二九·一二·一六

一九二九·一二·一六

一九二九·一二·一七

一九三一·七·二五

.....一九三一·九·二一

哥倫比亞

埃及

新西蘭

玻利維亞

愛爾蘭

丹麥

瑞典

挪威

薩爾瓦多

芬蘭

加拿大

日本

葡萄牙

厄瓜多

智利

一九三一・九・二五

一九三一・九・二六

一九三一・九・二九

一九三一・一〇・八

一九三一・一〇・一二

一九三一・一〇・一九

一九三一・一一・一三

一九三一・一二・三一

一九三二・二・九

一九三二・四・二〇

(乙) 世界貨幣減值國家表

希臘	一九三二·四·二六
暹羅	一九三二·五·一一
秘魯	一九三二·五·一八
南菲聯邦	一九三二·一二·二八
愛斯多尼亞	一九三三·六·二八

國名	放棄金本位日期	減值日期	減值百分數
美國	一九三三·三·六	一九三四·一·三一	四〇·九四
南斯拉夫		一九三二·一〇·一七	二八·五〇
捷克斯拉夫		一九三四·一一·一七	一六·六六
比利時	一九三五·三·三〇	一九三五·四·一	二八·〇〇
盧森堡		一九三五·四·一	一〇·〇〇
但澤		一九三五·五·二	四二·〇〇

(丙) 世界採用管理匯兌制國家表

德國 意大利 匈牙利 保加利亞 拉脫維亞 羅馬尼亞

(丁)世界維持金本位國家表

法國 荷蘭 荷屬東印度 波蘭 阿爾巴尼亞 瑞士 立陶宛

——根據國聯統計月報——

事實上，乙表所列各國，只有美國在幣值減低以後，恢復匯兌和金輸出的自由，而成爲「國際用金，國內用紙」的金塊本位制。自從去年六月十九日頒布購銀法以後，牠有採用金銀複本位的姿態。其餘的國家，大抵在貨幣減值之後，除國內必然用紙以外，國際的匯兌，也和丙表各國一樣，施行嚴厲的管理；所以，實際上，黃金並未能自由輸出。牠們在減值之後，也不過保持一個名存實亡的金本位制罷了。

丙表上各國，對外是用停付外債，管理貿易，管理匯兌等手段，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對內是停止兌現，通用發行額有限的紙幣。牠們和乙表各國所不同的，就是依然保持原來的平價，而沒有把幣值減輕。本來金本位的特點，就是牠的國際性。用停付外債，管理貿易，管理匯兌等手段，消滅了金本位的

國際性，所保存的自然只有金本位的骸骨了！

就是丁表所列維持金本位的國家，目下也在施行取締匯兌投機，以阻止資本的逃亡。這是管理匯兌的第一步。照這種趨勢看起來，金本位制的總崩潰，真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二 各國貨幣政策的背景

在國家主義衝破國際主義的時候，自然，一切的政策，都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前提，而不會再有人顧及國際的大局。貨幣政策之所以有這許多種不同的方式，就是因為各國的歷史不同，利害不同。衰落的英帝國，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於殖民地的金融，已有尾大不掉之勢，牠對於殖民地在倫敦的存款，已不能加以自然的控制。同時，因為戰時及戰後世界各國幣制的紊亂，國際間信用，依然沒有恢復；國際金融市場的資金，多數短期化，因為短期資金，形勢不穩時易于提取逃避。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報告，在一九三〇年終，國際市場上的短期債務，數達瑞士法郎七百萬萬，這數目超過了世界各國的存款數。而歷史上著名的英國麥米倫報告（該報告為英國放棄金本位之原動力），估計在一九三〇年終倫敦市場上所有的短期債務，數達四萬五千萬鎊，約當英蘭銀行存款數之三倍，

而爲倫敦市場所有短期債權的二倍。這種形勢，自然是十分嚴重；英國之放棄金本位，實爲計無所出之一着。

在那時，英國的存金數，處世界的第三位。倘使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依然憧憬過去世界唯一金融中心的地位，那結果必然不堪設想。放棄了世界金融中心的憧憬，退而鞏固牠在大不列顛帝國內的領袖地位，英國金融家這種退却，是很明哲的。

因爲放棄了金本位以後的英國，依然是向着集團化的方向發展——牠雖然不再企圖做國際的金融中心，但是依然要做英鎊集團中的領袖，所以，牠在幣值一度跌落之後，必然要設法使之穩定。否則因爲英鎊地位的不穩，英帝國對殖民地的統治，要起了更大的動搖。英國近年來要想在國際協定的方式之下，使英鎊價值穩定，是十分明顯的；一九三三年牠在世界經濟會議裏穩定國際貨幣價值的提案，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美國的放棄金本位，動機和英國不同。英國可說是完全出于被動的，而美國却有一部分出于自動。紐約在一九三〇年終，外人存款數達美金二十七萬萬元，（註）而那時候美國全國的存金量，也

（註）見密特爾銀行月報。

不過美金四十二萬萬元。(註一)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羅斯福總統就任的時候，外人存款的提取，數目是驚人的。據說：在一九三三年終，紐約的外人存款就只剩五萬萬元。(註二)同時，美國人所有的資本，也大量逃亡；還有許多人把現金窖藏起來。這就組成當時美國金融的危機——美國放棄金本位的被動因素。

美國放棄金本位自動的理由，可以分三點來解釋。第一，是美國對於經濟恐慌的克服，在保持金本位的原則之下，胡佛總統已經運用過他的最大的努力，試驗過種種一切的方案，而結果徒然；所以羅斯福總統可能走的一條路，本來只有放棄金本位。第二，美國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的繁榮當中，信用的過度膨脹使人民負債數也空前的高漲。恐慌發生以後，商品，證券以及其他種種一切的財產，價值都暴跌，而債務的負擔，却依然未減。這對於多數的債務人的確是十分不平允的，尤其是農民。所以在清理債權債務間不平衡的意義上，美國當時也有減低幣值，提高物價之必要。第三，自從世界多數國家放棄金本位以後，美國的對外貿易，深深的感受到貨幣傾銷的威嚇。爲保持國外商品市

(註一)見國聯統計月報。

(註二)同註一。

場起見，放棄金本位也甚屬必要。

就是爲了上述被動的和自動的種種原因，美國就只好犧牲了海外債權的利益，而放棄金本位了。好在，占海外債權最大成分的美國在歐洲的債權——最顯著的如戰債——已經被賴債了；海外債權也許已經成了不足十分重視的條件。

對於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爭取和保持，英國和美國是有同一的願望的。殖民地的衆多和殖民地面積的廣大，是英國的優越條件；倫敦放棄了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企圖以後，退一步居然還能夠做一個廣大的英鎊集團的中心，就是受這個優越條件之賜。美國是目下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牠的存量，也占世界的第一位；牠雖然沒有很大的殖民地，但是在傳統的門羅主義之下，運用牠的金圓資本勢力，牠實際上已經統治了新大陸內的大多數國家。因此，這「後起之秀」的紐約，居然有取倫敦而代之的趨向。就是爲了這樣的企圖，放棄了金本位的美國，在世界經濟會議中雖然拒絕了英法穩定國際幣值的要求，但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一度貶低幣值之後，牠不但在國際上恢復金輸出的自由，最近並且已經表示貨幣不再貶值了。這種穩定幣值和儘量維持金輸出的自由，以爭取國際間金融中心地位的企圖，英和美是相同的。

在列強當中，日本的金融勢力，還是比較薄弱的。牠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間，存金數由日金一、〇七二百萬圓減到四七〇百萬圓，再加上英國和許多屬國放棄金本位的威嚇，以及「一九一八」事變後戰時金融準備的開始，牠就不得不放棄金本位。

放棄金本位後的日本，形勢和英美兩國都不同。英國有廣大的殖民地，在貿易方面勢力的保持，只須加強英帝國與殖民地間的集團化，儘量排斥別國商品于大不列顛集團之外，即爲已足。渥大華會議，目的即在于此。因此，英國放棄金本位以後，如上文所云，仍然努力貨幣價值的穩定，以保持英鎊集團的榮譽和牠對殖民地金融的支配權。牠不能，而且也不必，因爲貿易上的利益而犧牲牠的金融上的利益和地位。美國放棄金本位以後，在貿易方面，不過採取一個守勢，抵制別國用貨幣傾銷的手段，侵入牠的市場。自然，顧名思義，「金圓帝國」也不能犧牲金融上的利益和地位，以爭取貿易上的利益的呀。日本就沒有這種種的顧慮。牠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本來沒有什麼地位；所以，牠不妨儘量的抑低幣價，以求輸出貿易的發展。因此，在貨幣傾銷的戰術上，日本變成唯一的勝利者，日本商品，侵入世界任何國的市場。

支持金本位的法國，自然也有牠不得已的原因。法國貨幣，在大戰以後，曾經一度的減值；債權人

和債務人間的不平衡，在戰後法郎價值暴跌的時候，已經一度的清算。而當時幣值暴跌，物價高漲的痛苦，則依然深印于法國人民心理中。法國目下在政治上，左傾勢力抬頭；此種不利于消費大眾的貨幣貶值運動，也難得國會的通過。此外，法國的對外貿易，向來注重于殖民地貿易的發展。這種貿易的基礎，事實上並不需要貨幣傾銷的手段。目前，法國迫切需要通貨膨脹的，恐怕還是財政。但是，為財政而膨脹通貨，是很危險的，而且，在法國是不容易實現的。佛蘭亭內閣為爭取財政金融的較高權力，竟至傾覆，也可見一斑了。

法國之所以能支持金本位到現在，自然也非偶然。法國戰後，因為賠款收入甚多，存金數增加甚速。在一九二六年的時候，牠的存金數及所有外幣數還只有一八、五六四百萬法郎，而在今年五月，却有七三、九二九百萬法郎。今年同月的紙幣流通數是八二、七七六百萬法郎，準備數已經和發行數差不多。法國的金融市場，國際化的成分很低，資金被提取的可能性，較英美為小。這些都是法國的優點，也就是牠能保持金本位的原因。此外，已經放棄金本位的國家，主觀上是希望法國不放棄金本位；例如在最近一次的金融風潮中，美國就給法國以許多的援助。法國所怕的，倒是本國資本的逃避和投機家對於法郎的攻襲；然而，現在已經着手對於投機的干涉了。

採用匯兌管理制的國家，主要的是德國。德國人民戰後所受通貨跌價的痛苦，可說是在法國人民之上；所以，倘使政府要採取任何足以動搖貨幣價值的政策，必然要遭受人民的激烈反抗而至於傾覆。在這一點上，德國的情形，可說是和法國差不多。牠和法國不同的：第一，是存金數的消乏。牠在本年五月，所有外幣和存金數合計，不過八千六百萬馬克，而紙幣流通數，則有四、一八七百萬馬克，準備數只當發行數的百分之二而強。第二，是外債的壘疊。倘使外債照付，不獨存金立罄，而且國將無以為國。因此，德國的貨幣政策，遂不得不採取維持貨幣表面上的平價，而以停付外債，管理匯兌等手段，以求國際收支的平衡。

三 貨幣戰爭中各國的形勢

上文已經說過，在貨幣戰爭中，在貨幣傾銷的戰術上，日本是一個勝利者。現在，我們再把各代表國幣值跌落成分和出口貿易的狀態，列表如下：

國名

幣值跌落成分(註一)

輸出金額(以各國國幣計算單位百萬)

一九三一年(每月平均數) 一九三五年五月

德國	(十)〇・七〇(註一)	七六七・二〇	三三七・〇〇
法國	—	二、五三六・〇〇	一、三二一・〇〇
美國	四〇・五九	一九八・一七	一六〇・七一(四月)
日本	六五・二五	九三・二〇	二一四・〇〇
英國	三九・六四	三二・四三	三五・二一

——根據國聯統計月報——

依上表以觀察，幣價的跌落，以日本為最烈，而輸出貿易，亦以日本為有顯著的進步。英國在貿易集團化之下，雖然充分擴充對殖民地的輸出，然而增加甚為有限，不過表示出一個「長期蕭條」而已。日本的所謂「繁榮」，在「非常時」財政，「非常時」經濟……一類的口號之下，無疑的是「非常時」的「軍事繁榮」。我們本來可以很容易的提出幾種生產指數來證明軍事繁榮的內容，但是這並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註一)以本年五月之市價為標準，而表示其較金平價跌去之成分。如日本之跌去成分為六五・二五，則其目下幣值，僅等於金平價之百分之三四・七五。

(註二)德國幣值，較金平價略高，但因在匯兌管理之下，這也不過公定價值而已。

日本貨幣價值不斷的跌落，自然一部分也由于軍事繁榮的開展。我個人以為日本目下在貨幣上的國策，一面是用貨幣傾銷的手段，增加輸出貿易，而另一面是用軍需品的購買，使貿易永遠的處于入超地位。否則，因為輸出增加的結果，貿易便很容易變成出超；隨而幣值回漲，而貨幣傾銷政策就立刻碰壁。

放棄金本位的國家，利率往往下跌甚速，下面是主要各國的市場貼現率（單位厘）

國名	一九三一年每月平均	一九三五年五月
美國（紐約四至六月商業票據）	二·六七	〇·七五
日本（六十天商業票據）	四·八五	四·三八
英國（九十日銀行匯票）	三·六一	〇·五九

根據國聯統計月報

倘使資本主義的發展依然是正常的發展，那末，在利率下降的時候，應該由信用膨脹過渡到繁榮。目下各國所感到苦悶的，就是利率下降，而短期資金的貸放，沒有顯著的增加，有的甚至反見減少。且看下列的幾種資料：

美國全國銀行「承兌票據」月終餘額（單位百萬美金）

一九三一年三月 一九三五年三月

一、四六七 四六六

——根據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日本銀行商業放款及貼現每日平均數（單位百萬日金）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五年二月 一九三五年四月

六八三・九 七二八・三 六七九・四

——根據三菱月報——

倫敦全體交換銀行貸放額（每月平均數，單位百萬鎊）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三月

貼現 二五六・〇〇 二三〇・〇〇 一三三・〇〇

放款 九一九・〇〇 七五三・〇〇 七六七・〇〇

——根據英商銀行月報——

長期資金的利率也大致下降。下面是主要各國的債券收益表（單位一厘）

國名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五年
美國	三・三一	二・六四(四月)
日本	五・四四	四・五四(三月)
英國	四・三九	二・八九(五月)

——根據國聯統計月報——

但是，正和短期資金市場一樣，利率下降，而資本的發行，除了在軍事繁榮期內的日本以外，也未見顯著的增加。茲摘錄上述三國的資本發行數如下（每月平均數，單位各該國國幣百萬）

國名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四年
美國	五八五	二六〇	一〇七(十一月)
日本	二〇五	二六一	三二九(九月)
英國	一九・七	七・四	一三・四(十一月)

——根據國聯統計月報——

此外，紙幣的流通額，增加亦甚有限；這可見通貨膨脹政策，結果並不一定能膨脹通貨。而人民購買力未增，經濟界未恢復正常的繁榮，紙幣的流通額本來是不可能增加的。上述三國的紙幣流通額

如下(單位各該國國幣百萬)

國名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五年五月
美國	五、六四七	五、五三九
日本	一、三三一	一、三五五(四月)
英國	三六四·二	三九〇·四

——根據國聯統計月報——

四 國際貨幣集團與貨幣戰爭之現勢

國家主義的「政治貨幣」突破了國際金本位以後，就促成國際間的貨幣戰爭，在貨幣戰爭的過程中，貨幣的集團化是必然的，這正和軍事戰爭時期中，「同盟國」和「協約國」運動的開展一樣。

目下，世界上有三個貨幣集團——英鎊集團，美金集團和金集團。內中，英鎊集團的範圍，最爲泛；大牠的組織成分如左：

英帝國；

英屬國及自治領——加拿大除外；

葡萄牙、瑞典、挪威、丹麥、芬蘭、比利時；

日本、阿根廷、巴西、智利及其他匯價依附鎊價而升降之若干國家。

其次當推美金集團，其組織成分如左：

美國；

墨西哥、巴拿馬、哥倫比亞、佛內瑞拉、及西印度非歐屬各國；加拿大介于英鎊與美金兩集團

之間，但屬于美金集團之成分較多。

復其次即為金集團，其組織成分如左：

法國；

荷蘭、瑞士、波蘭；

比利時及意大利，原屬金集團，但目下比利時已停止金本位，牠在貨幣減值以後，已與英鎊

聯繫而成英鎊集團中之一員。意大利則早已管理匯兌，金本位名存實亡。

以上劃分，根據美國商務部國內外貿易主任穆紀生氏（Oaudius T. Murchison）之報告，而參以近月間之變化。國內學者有認日金集團之存在者，但鄙意不以為然；穆紀生氏的看法，與鄙見相同。我個人的觀察，認為目下各國競自抑低幣值的貨幣戰爭手段，已暫告一段落。不過在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形勢之下，法國的放棄金本位，恐怕是在戰爭開始前實現的；即使不公然放棄金本位，也要像德國一樣，施行嚴格的匯兌管理。到那個時候，國際間是不是要再度競自抑低幣值，還是一個問題。

總之，目下國際貨幣戰爭的焦點，似乎在中國貨幣權的奪取。這土地廣大的中國一旦加入任何貨幣集團，影響是很大的。但試問中國今日究竟應該怎樣善為自處，而將何所適從？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工人

說戰爭不過是少數英雄發揚威力的把戲，那還是過去時代的話。

現代的戰爭，已經不是少數英雄的事，而是整個資產階級的事；少數英雄不過做了資產階級的
工具或者代表罷了。

資產階級爲甚麼需要戰爭呢？這是因爲利潤的緣故。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之下，利潤的取得是資本家投資的目的。而利潤的取得，自然只有生產多而分配少的一種方式。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間，生產超過消費是必然的。資本主義在某一個國家裏而發展到高度的時候，那個國家就必然有多量的剩餘的商品，這就是所謂富強之國。然而這種剩餘商品的處分，却要成爲問題。就是說，倘使這些剩餘商品不能找到消費的市場，那個國家就要發生生產過剩的恐慌。怎樣去找消費市場呢？最後的方法逃不了是這殘忍的恐怖的戰爭。這就是資本主義演進而爲帝國主義的一階段。

「一將功成萬骨枯」，現在應該是說「復興功成百萬骨枯」了。帝國主義所發動的戰爭，不是處女殖民地的攻略，便是固有殖民地的爭奪。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本來已經遇到了重大的

難關，就是在殖民地的開發上面，他得着了一服續命湯。以後，每次遇到了大恐慌的關頭，差不多都是用戰爭做復興的有效手段。所以，在經濟學上有恐慌週期，而在政治學上便有戰爭週期，這兩種週期是二位一體的。

這次自從一九二九世界大恐慌開始以後，資本主義國際間的和平空氣迅速的烟銷雲散。幾年以來，繼續不斷的醞釀了一個二次世界大戰。到了目下，這個戰爭是將次成熟了。他們是希望在戰爭開始的前後，在軍用品購買的方式之下提高物價，在砲火之洗禮之下摧殘別人的生產力，在屠殺的狀態之下解決失業問題；將來，還可以在殖民地的重分割之下，取得新市場。

在戰爭的時期中，犧牲得頂頂厲害的，當然是勞苦工農羣衆，戰場上的犧牲者，固然大都是勞苦羣衆；戰爭所造成的饑荒，受罪的也是勞苦羣衆，甚至戰爭時期所頒布的戒嚴令，目的也在壓迫勞苦羣衆。等到戰爭完了之後，倘使是戰敗國，賠款的支付還是要榨取勞苦羣衆的汗血。就是幸而爲戰勝國，勞苦羣衆所得着是什麼呢？美國的退伍兵士，曾經啼飢號寒的在那裏抗議取消年金；日本的退伍兵士許多流而爲乞丐；法國的退伍兵士，年金也正要打折扣。這就是在槍林彈雨中以血和肉替「祖國爭光榮」的人們的末路！

所以，在資本主義之下，說戰爭是爲「祖國爭光榮，爲民族爭出路」這是統治者欺騙勞苦羣衆的妄言；事實上，不過是爲資本家爭幸福罷了！

以上說明帝國主義製造戰爭的用意和他們的工人所受的影響，下文再說到戰爭對於中國和中國的工人所受的影響。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製造戰爭是不可能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因爲戰爭的目標，是要解決近東問題，中國雖然也參過戰，日本雖然也曾經乘機提出二十一條，然而戰爭對於中國並沒有多大的影響。這醞釀中的二次世界大戰，牠的意義就大大的不同了。二次世界大戰的目標，主要的在解決遠東問題，所以，在戰爭的時候，中國主要部分的領土，要變成帝國主義火拼的戰場，而戰爭的目的，就是要分割中國的土地。看罷，日本帝國主義不是已經強占我們的東北四省，在那裏布置對蘇俄的軍事嗎？最近，牠不又是要求華北的管理權，以鞏固牠對蘇俄作戰的後防嗎？而且，牠不又是在那裏招募華工，幫助牠完成軍事的設備嗎？牠在強占東北四省的時候，已經屠殺了幾十萬的中國人民——當然這裏面大都是勞苦羣衆；目下，牠正在那裏訓練幾十萬的東北勞苦羣衆——就是所謂「滿洲國」的偽軍，預備驅使他們作戰場上的犧牲品；將來，牠還要驅使幾十百萬的中國勞苦羣衆，做

牠的戰爭的工具！而將來日本帝國主義炮火下面所要毀滅的，必然還有幾千百萬萬圓的中國人民的財產，和幾千百萬的勞苦羣衆的生命！

中國勞苦羣衆遭受這樣歷史上所未有的犧牲，所爲的是什麼呢？所得的結果又是怎樣呢？不過是替我們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爭取利益，不過是要替牠的資產階級救經濟恐慌！中國民族所得的，只有國土的被瓜分和民族的被消滅！日本的勞苦羣衆固然是一個犧牲者，中國的勞苦羣衆却是一個更嚴重更慘酷的犧牲者！

中國的士大夫們，有的在那裏說：日本不過是對蘇俄備戰，和我們不相干。有的在那裏幻想：在日蘇戰爭的中間，我們可以「漁翁得利」的找到出路。他們却沒有覺到，別人是在我們的國土裏面作戰；更沒有見到日本帝國主義是要先併吞中國大部分的國土，然後再向蘇俄作戰。他們更不會估計過：用這樣重大的犧牲，以求一渺茫的出路，究竟值得不值得？我們要請他們擺正了良心，想一想戰地人民的痛苦，而不要忘記他們自己是中國的人民！

站在中國民族的立場，我們必須立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們的國土，反抗日本帝國在我們的國土上面作軍事的布置，反抗一切帝國主義利用我們的領土，領海領空做戰場。我們一面要喚

醒東北的勞苦羣衆，不單是不做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的工具，而且要奮起和牠抗爭；喚醒被誘騙的華工，不要做自掘墳墓的工作。我們同時要喚起全中國的勞苦羣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牠的代理人漢奸。這樣，我們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完成一個反戰反帝的陣線，發動一個反戰反帝的民族革命！

固然，革命免不了流血，免不了犧牲，然而要明白，戰爭所給我們的流血和犧牲，要比革命大一百倍甚至一千倍！我們還要退縮嗎？最嚴重最慘酷的大難要臨頭了！

我們應該怎樣應付醞釀中的世界大戰

在日內瓦的軍縮會議奄奄一息的時候，列強軍備的競爭，幾乎每天都出現新紀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方式，究竟是帝國主義聯合向蘇俄進攻，或者是帝國主義間相互的火拼，雖然還在不可知之列；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必然要在最近的將來降臨人們的頭上，却已經是無可否認的結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中國總算「微天之幸」做了一個「隔岸觀火」的閒人。除了日本帝國主義進佔青島的時候，曾給我們一些刺激外；中國反能以「打落水狗」的方式參戰，佔得若干的便宜。這醞釀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牠的性質就完全不同了。不論牠的爆發點在什麼地方，也不論牠的方式是怎樣，遠東問題都必然是戰爭中待解決的問題，而中國必然是重要的戰場之一。日本帝國主義的佔據東北四省和在東北四省的整軍經武，以及最近布置沿長城察哈爾以圖推進內蒙的戰線，都是使中國戰場化的鐵一般的事實。

日本帝國主義向蘇俄進攻的策略，是「一箭雙鵰」的——進可以攻擊蘇俄，退亦可以囊括中國。只有「認賊作父」的人，才會說日本沒有領土的野心。也只有準備出賣民族的官僚，才會自欺欺

入的說：日人在察東的軍事佈置，專在對蘇俄，與中國無關。在「一箭雙鵰」的策略之下，無疑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認定中國是牠的進攻的目的物——過去佔奪東北的事實，更是官僚漢奸們無從替他們的主子辯護的鐵證。到了別人已經劃定了我們的土地做戰場，而還認為和我們無關，這種人的斷送民族，真可說是寬宏大量。

少數的官僚漢奸固然預備出賣民族，四萬五十萬的民衆，一定不甘於被人出賣。所以談談應當怎樣對付的問題，即使不是新鮮的問題，依然不失為重要的問題。

中國依然想在第二次大戰當中「打落水狗」嗎？要認清中國自身就必然是「落水狗」之一。依然想「隔岸觀火」嗎？要認清別人正是在我們的房子上放火。教我們目下「力持鎮靜」等到大戰開始的一天，我們就可以得着生路；那是官僚們騙人的話。要曉得大戰開始之日，正是中國民族大難臨頭之時。官僚們的金錢財產，在帝國主義保護下的租界裏面，他們自然可以「隔岸觀火」；說風涼話；戰場裏的老百姓和整個的中國民族，卻只有做犧牲品。中國要想得着出路，是要消滅第二次大戰的禍根——最低的限度也要不許別人劃定我們的國土做戰場。做了別人的戰場還說是有出路，那只有「隔岸觀火」的官僚才會說得出。

怎樣消滅第二次大戰的禍根呢？帝國主義是戰爭的製造者；戰爭的目的是在市場的奪取；而市場的奪取，卻是處理剩餘商品的必要的手段——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的必然要帝國主義化，而帝國主義也就是這樣的必然要製造戰爭。我們要避免在第二次大戰做犧牲品——做一個被解決者，我們必須立刻反對帝國主義劃定我們的國土做戰場。而要做到這個，也決不是空言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須發動一個反帝的民族革命。

中國民族過去在廣州和英法帝國主義的鬥爭，在漢口，九江和英帝國主義的鬥爭，是民族革命的一個標本；過去鬥爭的勝利更明示我們民族革命前途的光明。有些人認為這樣未免犧牲太大，卻沒有見戰爭中的犧牲要比這個大百倍以至千倍。不肯坐以待斃的人們應該趕快起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前途

一 二次世界大戰底本質

自從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國際間開始發現空前的恐慌，到現在差不多整整是五個年頭；雖然中間經過資本主義英雄們底努力掙扎，經過若干次小小的穩定局面，然而穩定往往只是更深一層的恐慌底前奏，而恐慌依然還是前進的恐慌。

在這恐慌前進過程當中，世界上的和平空氣，由黯淡而瞬歸消滅；代之而興者，乃有突飛猛進的軍備競爭。過去日本和德國在日內瓦軍縮會議當中提出擴充軍備底要求，本來已經是很滑稽的事；然而目下，是連這「奄奄一息」的軍縮會議都要「壽終正寢」了！

由經濟危機轉變到戰爭危機，本來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之後的一定不易的方式。倘使資本主義底壽命再能延長幾十年——這自然是一種不可能的假定——恐慌週期和戰爭週期一定都會成爲很密切的連繫。這就是說：倘使資本主義不在最近的期間傾覆，戰爭底恐怖是不會消滅的。

在資本主義國際與中國裏面，我曾經寫了下面一段：

「資本主義國際間的變化怎樣呢？一面必然是對殖民地侵略底進一步的加緊，而另一面呢，貨幣戰爭之後，只有一個軍事戰爭！要把幾百萬幾千萬的人民，送到戰場上去犧牲；這樣解決了資本主義下底失業問題。要在軍用品底製造上消耗過剩的商品，要在礮火底洗禮下毀滅目下的生產力，然後可以解決資本主義下的生產過剩問題。當然，這是殘酷的，悲慘的，而且不合理的；然而，在矛盾百出的資本主義之下，在客觀上只有這條路可走；就是在主觀上，多數的資本家也在希望有這一天呢……」

這或者可以說明現代戰爭底意義吧！

要之，封建時代的戰爭，動機是由於糧食不足，而所要解決的，是土地問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初期，是有它的價值的。到了資本主義發展而為帝國主義，戰爭的意義就大大的不同了。它的動機，是由於剩餘價值底膨脹，而它的目的，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分割和造成。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裏面，帝國主義取得輸出商品和資本的市場，取得原料底供給，而且可以造成一個低等的勞動階級。因為這樣，所以，在現代的戰爭之下，土地的占領，不過是取得市場，取得原料和造

成低等的勞動階級底保障，並不是土地本身底利用。帝國主義倘使能用別種方式，建立起一個代理人底政權，以達到它們的目的，它們是不一定要採取併吞領土的手段的。

二 戰爭底犧牲

「恐慌週期論」所詔示我們的，不單是週期底關係，而還有更重大的「變」底關係。就是，恐慌底內容，是隨每個週期而變為格外嚴重——上一次恐慌底高峯，剛剛等於下一次恐慌底低峯。戰爭底犧牲，差不多也有相類似的演變。第一次世界大戰底犧牲是：

死亡者

八、五三八、三一五人

受傷者

二一、二一九、四五二人

這個數字，在歷史上，自然是空前的。然而，我們預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區底擴大，幾年來殺人方法底進步，和各國軍備不斷的擴充，已經可以斷定：第二次大戰底犧牲，比第一次大戰要大數倍甚至數十倍。

在許多人的腦子裏，往往還有一種錯覺；他們以為革命時代的犧牲，一定比戰爭還要大。對於這

種錯覺底糾正，我們也用不着做很多理論上的工夫，只須引用韋爾斯氏在他的世界史綱裏面的幾段話：

「恐怖時代告終矣，前後被處死刑者幾約四千人……抑吾人有須記取者，恐怖時代之被殺者僅數千人，且其中確有多數極其活動之敵人，衡以當日之標準，法蘭西共和國實有誅戮若輩之正當理由……英國諸將於一九一六年七月在索謨河上取攻勢時，一日間所戕之生命，且較法國革命全期中所殺者爲多……」

在比例上，四千人和八百五十三萬八千人底比較，還不到萬分之五！真所謂「九牛一毛」哩！韋爾斯氏對於一般歷史家的偏見，還指出：

「法國恐怖時代殉難之烈士，吾人之所以屢有所聞者，半因此輩皆係貴人，半因有人爲之宣傳其死難之慘烈也……其實法國平民處恐怖時代，較其在一七八七年，爲自由富庶快樂也。」

這裏，我們還可以補充幾句話。在資產階級政府命令之下，在「爲祖國犧牲」、「爲國家的光榮而戰」……一類的迷陣之下，用科學方法大批的屠殺人民，是一般人認爲「分所應爾」的。屠殺了之後，很簡單的樹立一個無名英雄之墓，以盡他們的「貓哭鼠」底悲哀，以誘騙未來的赴死者！這就是目下帝國

主義爲少數人底利益驅逐多數人上戰場犧牲底真相。

這是毫無疑義的，戰爭中最大的犧牲者是勞動羣衆。在募兵制度之下，兵士的大多數自然是失業勞動者底化身；就是在徵兵制度之下，有錢的人也往往可以收買貧苦的人去做替死鬼。勞動羣衆除了血肉底犧牲之外，在經濟上還要受更嚴重的剝削底痛苦。戰時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勞動羣衆自然是最大的受害者；生活資料缺乏下的「啼飢號寒」者，也都是勞動羣衆。這種剝削，不單在戰時，而還要引伸到戰前和戰後。在帝國主義製造戰爭底現階段中，各國的勞動羣衆，不是已經受到更嚴重的剝削嗎？

三 製造戰爭底現狀

這是無疑的，帝國主義間包含着重大的矛盾；然而，在這矛盾當中有一個統一，就是帝國主義聯合一致向蘇聯進攻。戰爭本來是解決恐慌的有效手段；而反蘇聯戰爭，却還有消滅世界革命運動中心底重大意義。倘使帝國主義真能聯合一致向蘇聯進攻，就可以希望收「一箭雙鵰」的結果。帝國主義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底時候，曾經聯合向西比利亞進攻。因爲那時人心厭戰，帝國主義國

內的革命危機，十分嚴重，戰後整理工作，更是千頭萬緒，而蘇俄當時的革命勢力，也未可輕侮。所以，結果是落得一個失敗。一九二二年日本帝國主義曾經單獨出兵西比利亞，結果也不討好。在以後幾年當中，因為經濟剛走上繁榮的階段，帝國主義列強自信能在建設方面樹立百年的基礎，因此，反蘇聯戰爭便暫歸和緩了。自一九二九年恐慌開始後，反蘇聯運動重復緊張起來。不言而喻的，帝國主義是要把內部的矛盾，轉變為反蘇聯的戰爭。

然而，何以經年累月，反蘇聯的聯合戰線依然還沒有完成呢？對於這問題底解答，我們不妨簡單的提出「統一之下的矛盾」底理由。我們總還記到，國際的反蘇聯戰線，從前是由法國領導的；波蘭和小協約國，是預定的反蘇聯戰爭底前鋒。可是因為歐洲霸權底爭奪，英國要不斷的給德國以援助；而德國底擡頭，却予法國以很大的威嚇。法國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得不改取「遠交近攻」的策略，結歡蘇聯以對付德國了。

法國拋棄了反蘇聯戰線底領導權之後，英國便負起這重大的使命來。英國進攻蘇聯底計劃，在東方以日本為中心，在西方以德國為中心，同時取夾攻之勢。它在中日問題上，默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權，主張置東北於國際共管之下，無非是想在東北建築起反蘇聯的基礎；它對於日本在華底行動，大

抵贊助日本的北上政策，而阻止日本的南下政策。英國對遠東態度底模稜，有時甚至表現矛盾，都可以在反蘇聯這一點上得到說明。英國在歐洲方面的活動，是贊助德國重整軍備，鼓勵德國的東進政策，以緩和法國的反感；以蘇俄領土烏克蘭底共同取得，歸給波蘭，爲波蘭走廊還給德國底代價，以緩和德波間的衝突。這樣「勾心鬥角」的設計，就是英國外交家底「苦心孤詣」。

然而，很不幸的，這矛盾中間底統一，它裏面所發生的矛盾，也常常和外圍底矛盾相呼應，而很嚴重的阻礙統一底發展。法西斯化的德國，固然曾經幾度告奮勇願爲進攻蘇聯底前鋒，究竟它決不會忘記自身的利害——它決不願在進攻蘇聯犧牲兵力之後，依然做凡爾賽條約下的俘虜。它是要先恢復大德意志戰前的威力，然後再東進以攻蘇聯，這麼一來，不單是法國不放心，就是英國和意大利也覺得勢難坐視。於是，「先下手爲強」，意大利居然用威逼利誘的方法，把奧匈拿到自己的肘腋之下了。倘使德意中間的衝突，能因這次慕梭里尼和希忒勒的威尼斯談話而得着諒解，德法間的矛盾，能因英美的周旋而歸於和緩，西方反蘇聯運動，就可以擡頭。不過我們聯想到法國底衛星捷克和羅馬尼亞正在承認蘇聯，德法間的矛盾，恐怕是不易調解的。

四 戰爭——和平——革命

在世界已經由經濟危機轉變為戰爭危機底時候，我們倘使馬上就希望再由戰爭危機轉變到和平，那是決無此理的夢想！世界底和平，決不是外交官的活動所能保障；這即是說紙面的和平，也決不能消滅戰爭；能消滅戰爭的，只有革命。在事實上，年來戰爭危機所以能幾次和緩下去，革命危機底迫切也算一個重要的原素。這是上述帝國主義國際間矛盾之外的一個國內的矛盾。

因為帝國主義國內勞動者底覺悟，以革命消滅戰爭底運動，自然一天一天的嚴重起來。然而，同時，以戰爭壓迫革命底反動，也跟着增高。這種情形，是在法西斯化的方式之下進行着。法西斯政權當前的目的，是在以暴力制止國內的革命運動；同時提出「大羅馬民族」、「大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一類歷史上過時的口號，以迷惑國內的人民——以偏狹的民族意識，來蒙蔽一般人底社會意識。帝國主義就在偏狹的民族意識之下，製造它們的戰爭。

以上所述，是帝國主義國內法西斯化的方式，在半殖民地裏面，法西斯化的方式是稍微有點不同的；顯著的例子，就是奧國。他們不敢提出民族意識，甚至公然主張向帝國主義賣身投靠，一面幫同

帝國主義製造戰爭一面壓迫國內的革命勢力，半殖民地底法西斯政權和帝國主義國內的法西斯政權取得「殊途同歸」的連繫。

上文我已經說過：「紙面的和平決不能消滅戰爭。」那末，日內瓦的和平使者裏面，爲甚麼要有蘇聯的代表呢？對於這問題底解答，我們應該認定：紙面的和平固然不能消滅戰爭，究竟可以和緩戰爭危機；就在戰爭危機和緩底當兒，革命就可能追趕上去消滅戰爭危機。這樣，紙上的和平畢竟可能做一座由戰爭危機過渡到革命危機底橋梁。同時，蘇聯還可以利用日內瓦底「和平廟宇」做它的宣傳和平政策底工具。它可以提出很具體的和平條件，使帝國主義無從接受；使世界底勞動者，因此可以認清誰是戰爭底製造者？這樣，無形中，就可以推進世界底革命運動。在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出蘇聯外交底辯證法的妙用了。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

倘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危機和緩下去了，對於中國底影響是怎樣呢？倘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對於中國底影響又是怎樣呢？

假如戰爭危機底和緩，是由於革命危機底迫切，這自然是對於中國有利的。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也不能忘記了自身的任務；因為中國底民族革命，本來占整個世界革命底重要部分；中國決不能坐待世界革命潮流底到臨，而必然要發動自己的民族革命。

除了革命危機底迫切可以和緩戰爭危機以外，中國底和平瓜分和進一步的殖民地化也可以和緩戰爭危機；而中國底怠於革命，却可以招致和平瓜分的實現。目下世界的經濟危機，如能把半殖民地的中國完全殖民地化，使帝國主義能夠用科學的方法充分的加緊剝削，是可能和緩一時的。然而，倘使中國有相當的革命勢力，進一步的殖民地化自然就不會實現；即使不幸而實現，中國也可用革命來報復加緊剝削，帝國主義也要「得不償失」吧！

可是，有些人的意見，却認為中國在目前進一步的殖民地化，是不妨事的；中國只須等待着，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戰底降臨，那時中國就可以用「投機取巧」的方法得着出路。

上文我已經指出：由戰爭危機直接轉變到和平，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國進一步的殖民地化，也只能使戰爭危機暫時和緩；而在這和緩底過程中，却要醞釀一個更大的戰爭。中國進一步的殖民地化，在經濟方面，可以暫時的和緩恐慌；而在政治方面，却可以使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起一個反蘇聯的

大本營。帝國主義明知道，單取得中國底進一步的殖民地化，只能和緩當前的恐慌，而決不能解決當前的恐慌；所以，反蘇聯的戰爭，依然是迫切需要的。

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起來反蘇聯的大本營底情況之下，無疑的，中國是一個未來的戰場；而在大戰前夜進一步的殖民地化底條件之下，中國人民不單是要做低等的勞動羣衆，而且要做最前線的礮灰！在東北四省，日本帝國主義不是在那裏造軍用鐵路、築飛機場、準備對蘇聯的戰爭嗎？東北四省的偽軍，不是在日人的訓練之下，預備做反蘇聯戰爭最前線的礮灰嗎？甚至，關內的勞苦羣衆，也是成千累萬的被漢奸們誘騙過去，在日人的鎗頭底威嚇之下，充當兵役！看到這種種一切，中國進一步的殖民地化，究竟是如何景象，已經是不難洞見了。在領土做戰場，人民做礮灰的條件之下，我們從什麼地方去找出路？我們能用這樣重大的犧牲，去找「投機取巧」的出路嗎？

無疑的，教中國人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戰降臨的時候再找出路，不過是帝國主義代理人欺騙中國人民的鬼話！中國人倘使真要得着出路，只有馬上立刻拿民族革命去消滅戰爭，而不能期待戰爭的到臨！

太平洋問題之史的展開

世界上的某一區域倘使成爲國際的問題，在那個區域看起來，往往是很不幸的。

爲什麼在報紙和刊物上，我們看不到英國問題，美國問題，日本問題，法國問題，以致意大利問題，而只看見近東問題，遠東問題，中歐問題，東歐問題，北歐問題，多腦河流域問題，巴爾幹問題，以至非洲問題呢？這就因爲後者是列強宰割的對象，而前者却是操刀宰割的列強。

爲甚麼我們也不大看見所謂印度問題，澳洲問題，朝鮮問題，以至台灣問題呢？這因爲他們是已經分割好的殖民地。印度問題可能變成英國底問題，然而不是國際問題。朝鮮問題可以成爲日本底問題，然而也不是國際問題。

在研究政治經濟和地理的人，他可以提出英國，日本，美國……做研究的對象，然而這些都不是國際問題，我們可以說「研究英國」，「研究日本」……然而，倘使我們說「研究英國問題」，「研究日本問題」……那就有「語病」。

*

*

*

*

*

*

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太平洋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太平洋問題之所以成爲國際問題，是因爲太平洋還存在着未分割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列強企圖如何的分割半殖民地，再分割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企圖如何的反抗帝國主義底分割？這便成爲太平洋問題底主要内容。倘使有人問：太平洋底水有幾多深，太平洋裏有幾多種的魚？那又是國際問題中的太平洋問題以外的問題了。

不幸得很！太平洋問題底主要對象，就是中國！太平洋未分割的半殖民地，只有中國和暹羅；而太平洋爭執中的殖民地，只有太平洋委任統治各島。必然的，中國是成爲主要的被宰割的對象了。因此，站在中國民族底立場，太平洋問題便成爲我們如何反抗帝國主義的問題——一個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

* * * * *

歐洲是帝國主義底策源地。好望角底發見和蘇彝士運河底開通，使歐洲列強併吞了非洲、澳洲和亞洲底一部分；這就是歷史上的印度洋問題。新大陸底發見，使歐洲列強在美洲樹立了廣大的殖民地；這就是歷史上的大西洋問題。目下，在印度洋和大西洋裏面，已經沒有可以分割的殖民地。在東

非，雖然最近還有意大利對於阿比西尼亞的攻略；然而，可憐的阿比西尼亞，牠早已成了一個沒有海口的國家，這個問題已經和海洋無關了。北冰洋和南冰洋，日下的科學文明，還不能使牠們適宜於「高貴的」白種人底生活；所以，牠們都還不可能成爲當前的國際問題。羅斯福在幾年以前曾說過「現在是太平洋時代底開始了。」這話是對的，因爲五大洋中間只有太平洋存在着國際問題；然而不是完全對的，因爲太平洋問題早已開始了。

在歷史上，遠東問題可說是太平洋問題底全身。在東亞大陸，還只有歐洲列強「問鼎」的時候，牠們把東亞問題和近東問題對比而稱牠爲遠東問題。自從美國在十九世紀末葉西向太平洋發展，先後取得檀香山關島以及菲律賓；日本在一八九五年戰勝中國，在一九〇五年戰勝帝俄之後，太平洋問題平添了兩位主角——美國與日本。於是，在守舊的歐洲人口中，雖然，仍舊是遠東問題長，遠東問題短，然而遠東問題這一個名詞，無疑的已經失去牠的時代性；遠東問題已經不是歐洲列強底遠東問題，而變成英日美爭霸的太平洋問題了。

* * * * *
在日下所謂列強的當中，德國自戰敗以後，海外殖民地盡失，對於太平洋問題，已無力過問；意大

利雖雄心勃勃，但在太平洋方面，還沒有一個根據地，可發揮牠的威力，所以也還不能直接干預太平洋問題。法國方有事於歐洲大陸，在太平洋方面，消極的只求原有殖民地底保存，積極的也只能追陳人後，分得杯羹；太平洋霸權底爭奪，事實上是「無暇及此。」因此，太平洋問題底主角，就只剩了英美日三國。

日本在「四一七」聲明書中，已經儼然以東亞盟主自居；牠最近還企圖更進一步，締結所謂中日「滿」同盟；牠在太平洋問題中地位底重要，是沒有疑問的。有人說英美將被迫放棄在中國底權利，那是十分錯誤的。英帝國底主要殖民地印度和澳洲，都隣接中國，牠在中國的投资，居列強的第一位；牠日下在中國雖然聲勢已經不像從前的煊赫，然而依然處於舉足重輕的地位。牠在太平洋的軍事勢力，能否制勝日本，固然是個問題；然而，倘使和美國聯合起來，却必然可以給日本以一個重大的威嚇，所以，牠在過去，是想利用這舉足重輕的地位，和日本合作，平分中國底權利。

美國在歐戰告終之後，曾想運用牠的金圓勢力，奪取歐洲底霸權，可是，自從世界恐慌發生，歐洲各國底經濟和金融基礎日在動搖之中，財政底困乏，使他們聯合起來拒付應還美國的戰債，在國際信用整個破產之際，美國才覺悟到：海外投資，終少不了軍事勢力底保護。因此，牠對於這強國林立的

歐洲，只好快刀斬亂麻，忍痛決絕；而移轉目光，對付太平洋問題。羅斯福所謂太平洋時代開始，或者就這是種意義。牠目下在太平洋方面整軍經武，最終的目標，自然是中國。等到牠在太平洋的軍事勢力可以壓倒英日，牠的大量的商品和資本，自然就要在軍力保護之下，向中國輸入。

二十世紀的殖民方策，自然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殖民方策不同。十八世紀以前的殖民問題，是人口過剩糧食不足底結果；所以，那時候殖民地經略底形式，是略地攻城，驅逐土人，以移徙國內過剩的人口。有許多歷史家，說這是「海盜方式」，是不錯的。現時代的殖民問題，就大大的兩樣了。牠的目標，是在工業品底消售，原料品底取得，和低廉勞動力底購買；武力底運用，自然是需要，但只限於鎮壓當地人民的反抗。帝國主義也不必一定在殖民地有自己的直接政權，而還要儘可能的要利用當地的反動勢力，建設一個傀儡政權，藉以緩和當地人民底反感。

有人說：東北底傀儡政權將要和朝鮮王室底結果一樣，那是不一定對的。日本帝國主義只要能有一個唯命是聽的傀儡政權，又何必多所變更？不過，殖民政策底分歧，的確成爲目下日本軍閥和財閥的衝突；日本軍閥依然還固執着十八世紀的殖民方策，以武力占領和大量移民爲主要手段；而日

本財閥則主張現代化的殖民方策，以商品傾銷，資源取得和產業發達爲主要手段。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發展，就成了複雜錯綜，目迷五色；而牠的對華政策，也有矛盾迭出的現象。

然而，很切要的，我們不可忘記了歷史決不重演的定律，而誤認今後太平洋問題底發展，仍然是「海盜方式」的發展。倘使那樣，我們便要受帝國主義和牠們的代理人底欺騙，在「提攜」，「親善」……一類的口號之下，做了殖民地而不自覺。

帝國主義在麻醉的宣傳當中，還往往要提出人種問題和地域集團問題，以迷亂弱小民族底意識。所以，處在弱小民族底立場，對於種種一切的「大××主義」要有充分的認識——如「大黃種主義」，「大東亞主義」……之類。我們只看看黃色的朝鮮人和台灣人底情形，就可以明白：所謂大黃種主義，不過是少數的日本人企圖在大多數黃種人底犧牲上面建立他們的「大」；而所謂大東亞主義，也不過和法國曾經提出過的大歐洲主義的一套把戲一樣罷了。「大」底希求，只有讓帝國主義去發揮；弱小民族倘使也隨聲阿附，那就做了掘自己坟墓的傀儡！

弱小民族唯一的要求，是自己的解放。弱小民族要爭取解放，先要有澈底的覺悟；在覺悟底過程中，團結自己的力量，向帝國主義作革命的抗爭。倘使想由「弱小」一躍而爲「大」，那不單是不可能，

而且是不應有。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切民族底平等；我們不甘自處於「以大凌小」狀態下的「小」，也不希冀做「以大凌小」狀態下的「大」。

* * * * *

太平洋問題固不自今日始，然而，目下的確是在空前緊張的時候。太平洋問題之所以空前緊張，表面的理由，是均勢底失墜；然而均勢之所以失墜，依然有牠的原因。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國內的經濟制度，已經到了最後沒落的階段，恐慌「滑車」跌到深坑裏去，而沒有力量再起來重演牠的「循環」。帝國主義也明知道恐慌之所以空前的深刻化，一半是由於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人民底貧乏化。然而，牠始終還幻想：倘使牠能把一個共有的半殖民地獨占起來，犧牲了其他帝國主義底利益，或者還可藉以苟延自己的殘喘；即使結果是得不償失，牠也可以用「擴充領土」的口號，鼓動國內法西斯蒂的熱狂，以和緩內部的矛盾。就是爲了這個原因，目下太平洋問題底焦點成了日本企圖獨占中國和其他列強企圖瓜分或者共管中國的鬥爭。日本獨占的企圖，就是太平洋均勢破滅底原因；而在瓜分或者共管底意義之下，雖然還有「英日平分」，「英美平分」，「英美法日分潤」……種種不同的運動，表面上提出的要求，却都是均勢底維持。這樣，我們可以明白：均勢底失墜並不是太平洋問題空前嚴重底

核心的原因，而均勢底維持也並不是中國民族所希求的條件。根本的所謂均勢本來是帝國主義使中國淪爲半殖民地以供共同宰割的圈套，中國人民固然應當堅決的反對中國底完全殖民地化，然而也決不能以久處於半殖民地自滿；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是整個民族底解放。

* * * * *

均勢底破壞和保持，是帝國主義間的鬥爭，而不是中國民族底要求，上文已經說過了。同時，我們還得明白；在帝國主義內部及相互間矛盾極端尖銳化的時候，均勢底保持和重建都是不可能的事。太平洋問題將來可能的解決，只有兩條途徑：不是中國底完全殖民地化，便是中國底完全獨立。所以，目下一般的所謂太平洋問題，只是問題中的一面——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而太平洋問題整個的內容，却是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的鬥爭。一方是中國人民要求解放的革命陣線，而別一方是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革命的陣線。

凡是中國人民，在這空前嚴重的形勢之下，應該覺到：只有中國人民一致奮起以爭取中國民族底解放，才能使太平洋問題得着合理而且澈底的解決。中國底殖民地化，是中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所以，牠即使能一時的解決太平洋問題，不久的將來必然要釀成更大的糾紛。中國人民還得

澈底的認識：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企圖，既然不過是牠們自身最後沒落底反映，中國人民在客觀的條件上，應該可以摧毀這樣脆弱的敵人；但是，倘使中國人民不爭氣，不能努力的運用這客觀上有利的條件，中國是可能一度沉淪的。所以，太平洋問題底澈底解決——中國民族底澈底解放，依然有待於中國人民的努力。

中國人民還不應該立時奮起，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在謀求自身解放底過程中，根本的解決這最嚴重的太平洋問題嗎？

國際的和平陣線和各國的人民陣線

自從一九二九年世界大恐慌開始以後，資本主義各國社會發生了兩個最嚴重的矛盾——兩個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

第一個矛盾是一面有了少數人感到生產過剩的恐慌。而另一面有大多數人感受到消費不足的恐慌。少數生產過剩的人們，要拿麥子燒火，要把咖啡倒在海裏，要把牛奶傾在河裏；而大多數消費不足的人們，却在那裏慘呼「給我麵包」；咖啡和牛奶他們自然也是需要，然而還不敢提出要求！

第二個矛盾是一面有少數人要封閉起來他們的工廠，要讓機器在停頓中鏽爛；而另一面却有多數人找不到工作，而在那裏慘呼「給我工作」；少數人也願意重新讓工廠開工，然而社會制度使他們開不了；多數人自然更願意直接使工廠重新開工，然而法律和他們說：「你們沒有這個權利。」

這兩個矛盾的發展，使全世界人類分成兩條陣線——戰爭陣線與和平陣線。

戰爭陣線裏有極少數的幸運兒。他們因為資本大，設備好，工廠是依然不會停工，而且往往還可以乘機併吞其他的較小工廠。他們要保持這種優越的萬世之業，然而認為社會問題必須要給牠和

緩一下：他們主張用最殘酷的戰爭手段，減少人口，消滅一部分的生產力，以和緩社會問題。

和平陣線裏的大多數人，認為社會問題必須根本解決，而不可能再使之和緩。他們在上次大戰中，飽受了炮火的威脅和流離的痛苦，深深的了解戰爭的滋味；他們在戰後的一年中，從經驗上更發覺出來：社會問題是始終不會因為戰爭而和緩，而僅僅只有在戰爭的痛苦之後，在和平重臨的安慰當中，許多人一時的降低了對於生活的要求，因而取得一個表面的穩定；然而，在這個表面的穩定當中，却正好醞釀成功社會問題更嚴重的一個階段——一九二九年以後的大恐慌。

這兩個陣線在國際上所表現的，一面是法西斯的戰爭陣線，而另一面是以蘇聯為領導的和平陣線。

在法西斯戰爭陣線當中，第一個巨頭是日本帝國主義；他首先在四年九個月以前，以戰爭侵略中國，到如今已經屠殺了三十萬的中國人民。第二個巨頭是意大利帝國主義；牠在七個月以前以戰爭侵略阿比西尼亞，用毒氣殺死了幾十萬的阿比西尼亞人民。第三個巨頭是德國帝國主義，牠正在要求殖民地，正在預備一個戰爭。

在國際和平陣線中，大國有蘇聯，牠為主義而奮鬥；有法、英、美各國，牠們的政權，現在已經慢慢的

移到愛好和平的大多數人的手裏；此外，便有許多弱小民族，做這個陣線的基礎。弱小民族是一天一天的覺悟了，牠們都明白：在國際上，戰爭的最大犧牲者是弱小民族。且看歐洲的小協約國，本來是戰爭的因素，現在却變爲和平陣線中的努力者。此外，如巴爾幹協商各國，近東四小國，波羅的海三小國，以至斯堪特納維亞三小國，現在都一致站在和平陣線上了。不用說，西班牙更是和平陣線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和平陣線在各國內的發展，便是人民陣線。人民陣線是愛好和平的大多數人的集團，牠的目的，便在反對製造戰爭的法西斯。頂頂著名的是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在其他各國，這種陣線都存在，而且勢力也都很大；甚至在日本、意大利、德國，這種陣線也非常之好，只是不能公開罷了。

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中國應該很堅定的站在國際和平陣綫，中國人民應該組織爭取和平的人民陣線，是沒有疑義的。這是中國民族的國際任務，而同時是中國民族的歷史任務。然而，還不止此，國際形勢已經告訴我們只有這一條路，歷史經驗——幾千萬人的血的經驗——也已經告訴我們只有這一條路：我們爲着自身的利益，爲着民族的生存，爲着廣大的國際援助，只有走這一條路。

現在，中國的大眾覺悟了，我們已經發展了偉大人民救國陣線。人民救國陣線的外交政策，便是組織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泛太平洋國際和平陣線。這是當然的，國內的人民和平陣線和國際和平陣線是互為表裏的。

我用不到指出，在和平陣線當中，是要很辯證法的包含不和平的因素的——我們為要爭取和平，我們不惜運用武力，我們得認識：在目前的環境當中，沒有武裝力量是不可能取得和平的。

第二編 中日問題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經濟狀況及其對華政策的前途

人類的行動，本來是一還不自覺的受着經濟條件的支配，尤其是政治上的演變，必然有它的經濟的因素，而且必然是受這種經濟的因素的策動。這淺顯的意義，我在最近的年餘中間，曾經不斷的提出請求國內學者的注意。我在最近提出中國經濟學社年會「關於中國經濟改進的幾個問題」的一篇論文裏面，更有下面的一段話：

「……這十年來國事一團糟，與其說是因為軍人不懂政治，無甯說是因為政治家不懂經濟。與其說是因為政治家不懂經濟，更無寧說是因為學者不顧事實。日本人佔據東三省了。政治家還認為是偶然的衝突，一部分的學者還認為這不過是日軍閥的野心。舉國皇然，不知所措，倘使政治家懂得一些經濟，何至于此？倘使學者顧到一些事實，又何至于此？九一八事變以後二十二個月的經驗，足夠告訴我們，這是事實上不可避免的經濟鬥爭，而不是偶然的野心的發作吧？」

因為這一段文字特別的解剖中日問題，所以就把它摘錄下來做本文的一個開場白。照樣的，我現在是根據經濟上的統計數字，推測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前途。

日本的經濟統計，第一點使我們驚奇的，就是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指數銳減的時候，牠的生產指數却反要激增。下面舉出來日本、英、美、德、法五國的生產指數（以一九二九年爲基準）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日本	九七·九(五月)	九一·八(五月)	九五·六(五月)	一一七·三(五月)
英國	九九·二(三月)	八五·〇(三月)	八五·〇(三月)	八四·一(四月)
美國	八八·二(五月)	七四·八(五月)	五一·三(五月)	六六·四(五月)
德國	八九·七(平均)	七三·三(平均)	六〇·九(平均)	六八·二(五月)
法國	一〇三·七(四月)	九四·二(四月)	六八·四(四月)	七七·一(四月)

照上面的數字看起來，美、德、法三國最近的指數，雖然比去年增加了一些，然而始終沒有超過一九三一年的指數，而且相差還很遠。只有日本，她的最近指數，不單是超過一九三一年的指數，而且要超過一九三〇年的指數。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狂的背景，還是逃不出牠的經濟上的生產狂。有了這樣的猛進不已的生產指數，那能不向外侵略？

這裏，也許還有人不明白經濟上的生產和政治上的侵略的連鎖關係，我不能不加以解釋。原

來資本主義下的分配方式，資本家是以資本的使用取得分配，而勞工則以勞力的出賣取得分配。資本家所得的分配——利潤，通常要遠多於他們的消費，而勞工的消費却不能超過他們所得的分配——工資。這樣，在整個生產社會通盤計算起來，商品的生產量必然要超過從事生產的資本家和勞工的消費的總和。那超過的部分，就代表利潤當中資本家所不能消費的部分。這一部分剩餘的商品，要歸生產社會以外——資本家和勞工以外——的不參加生產的第三者去消費。這第三者就是中產階級和殖民地人民。資本家要把剩餘商品賣給他們，換取金錢，以圖資本的聚積。那程序，自然是先就近榨取國內中產階級的金錢，等到中產階級坐食山空歸于消滅了，再進一步榨取殖民地人民。所以，殖民地的經營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必然的結果——所謂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化，而經濟上生產力猛進的結果，必然要形成政治上的侵略。

九一八和一二八的事變，我曾經指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恐慌中找出路的可能性。而照下列的日本文庫貨物存額統計看起來，這種可能性更加來得顯著而且嚴重：

年

月

報告倉庫數

貨物件數

價格(日金千圓)

一九二九	五月	九九	二四、六〇八、〇五五	五三八、七四四
一九三〇	五月	九九	二五、五二五、二〇五	五九六、九八〇
一九三一	五月	九六	二三、三〇七、四八七	四五七、八六五
一九三二	五月	九八	三一、五九〇、七二四	五五七、〇一六
一九三三	四月	九九	三一、二五八、六〇三	六三一、四四二
一九三三	五月	九九	三〇、七一一、五〇一	六三二、六七二

從上面一九三一年五月和一九三二年五月的數字比較起來，我們就可以明白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存貨的增加，達八百萬件之鉅。到了目前，仍然沒有顯著的減少。這許多的所謂過剩的商品，就是日本資產階級的利潤的堆積。他們要用軍事的勢力奪取市場，使利潤能夠貨幣化，實在是勢所必然的。然而九一八東三省的搶奪，既然還不能遂他們的心願，而且反增加他們的危機，所以就不得不再進一步以飛機大砲壓平中國中部的反日運動。然而，依然還沒有收效，所以更有華北的軍事行動。然而，生產力的增高，決計不是什麼「野心」所造成，它依然還有經濟上的原因：就是物價的上漲。下面是日本的物價指數（一九二九基準）

一九三二(平均)

一九三二(平均)

一九三三(六月)

六九·六

七三·三

八一·七

物價本來是應該隨供求定律而升降的。像日本，一面有倉庫存貨數量的激增，而一面却有物價的上騰，可見這上騰的趨勢，並不是供求的關係。那末，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主要的原因，是停止金本位後通貨的跌價。日本的通貨價格用美金表示起來是這樣：(日金百圓)

一九三〇(平均)

一九三一(平均)

一九三二(平均)

一九三三(六月)

四九·三六七

四八·八七一

二八·一〇六

二四·九九〇

這裏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一九三三年的日金價格，因為停止金本位的緣故僅及一九三一年的二分之一；一九三三年因為美國也停止金本位，美金跌價，所以還能維持二四·九九的價格。不然的話，恐怕已經跌到一七·〇〇左右了。貨幣的本身跌價了，以貨幣表示的物價，自然就要上漲，這本來是很單純的一個理由。尤其在日本，許多原料都要由外國進口，貨幣跌價的結果，原料的成本自然就增高，生產費也就增高了。

以貨幣跌價的手段抬高物價，倘使沒有需要的增加做後盾，是不能持久的；在資本主義之下，生

產是沒有控制的。物價上騰了，製造家覺得有利可圖，必然要拚命生產。這時，倘沒有激急的需要，增加生產必然要成爲嚴重的過剩，物價終于是要慘跌的。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急切的開拓海外市場的原因，而開拓海外市場的成績，可以在下述的貿易數字裏看得出：

年 份	輸出金額(日圓)	輸入金額(日圓)
一九三一	一、一四六、九八一、三二六	一、二三五、六七五、二六六
一九三二	一、四〇九、九九一、七〇七	一、四三一、四六一、二二六
一九三三(四月止)	五〇四、三九七、一七九	六九八、七七五、六七六
一九三二(四月止)	三四四、五一四、七八七	五五三、三〇〇、六〇三
年 份	輸出(日圓)	輸入(日圓)
中國	一五五、七五〇、六六八	一四五、六九七、一九七
關東州	六五、五四一、九三二	九〇、一六五、〇五一
一九三一		
合計	二二一、二九二、六〇〇	二三五、八六二、二四八

依照價格的數字看起來，日本的貿易似乎有很大的進步。然而，日圓的跌價和因此而起的物價的上騰，是必須加以考慮的。關於這點，我們只須將中日貿易的雙方的統計，比較一下，就可以得着佐證。依照日本大藏省的數字，對華貿易的狀況是這樣：

一九三二 (四月止)			一九三三 (四月止)			一九三二		
合計	滿洲	關東州	合計	滿洲	關東州	合計	關東州	中國
六九、八一七、四四〇	三、八五八、〇〇五	三二、九九六、九二二	一二五、二六九、八一八	二二、〇五〇、九二二	六二、一八九、七一四	二六一、七六〇、二一九	二六〇、五八三、五一一	一四一、一七七、七〇八
八〇、四一九、一一四	一五、四三九、三二〇	四三、〇七四、四七九	九七、三一八、七二〇	五八、九八一、二九九	六、〇三八、一七二	一七九、四六四、八三五	七六、七一八、七七五	一〇二、七四六、〇六〇

照上面的數字看起來，日本的對華貿易，這兩年來依然是有進步。這裏有須加說明的，就是日人對於進出大連的貨物，一向另列關東州項下，旅順和大連是她一向就認為她自己的領土的。滿洲一項，是到了今年才添出來的。我們自然要把各項合計起來，以便對照。日本的對華貿易，固然顯出來很

樂觀的數字，而我們的對日貿易，却是猛烈的減退，有如下表：

年 份	輸入（關平銀千兩）	輸出（關平銀千兩）
一九三二	二八四、九一二	二四九、二七九
一九三三	一四五、七九五	一〇七、四八三
一九三三（上半年）	七二、五七七（銀圓千圓）	四四、八四〇（銀圓千圓）

這樣，一九三二年的貿易，據日本方面的統計，對華輸出要增加百分之十八，輸入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一；而照我國海關的統計，輸入要減少百分之四十九，輸出要減少百分之五十七。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的貿易，照日本方面的統計，比去年同期增加甚多，但是我們海關統計，輸入要比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四十八，輸出減少百分之六十二。這樣的背道而馳的統計，看起來實在有點令人奇怪。然而日圓的跌價，當然是一個極大的原因。就日本方面的統計講，日圓跌價，物價騰昂，即使輸出入貨物數量不增，輸出入金額已經要增加。就我們的統計講，即使輸入貨物的數量不減，輸入金額，也已經要大減了。然而，無論如何，數量一定也是減少的，尤其是一九三三年的上半年，最為顯著，因為那時的日圓，並沒有重要的價格的跌落。舉一反三，我們就可以斷定日本的貿易，用日圓表示起來，雖然是在增加，而

用別國的貨幣表示起來却必然是減少，在數量上也是必然減少的。那樣，日本兩年來開拓海外市場的計劃，可說是失敗。

同時，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的社會問題，也是日趨嚴重。本來所謂停止金本位的策略，是對外加重的剝削殖民地，對內加緊的剝削勞動階級的變管齊下的辦法，受益的自然只有資本家，然而也是不能持久的。所謂對於殖民地的剝削就是過剩商品的傾銷，而對於勞工的剝削，就是生活的騰昂。跟着物價的上漲，生活指數自然也上漲，而工資却是照舊的。這事實上是變相的減低工資。（註）這種使勞動階級生活陷于窘迫的政策，終久要引起社會的革命。還有，在所謂產業合理化的運動之後，勞動人數日低，也是一個可怕的現象。下面是勞動人員的指數：

一九二六——一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八二・〇〇

一九三二——七四・七〇

再從反面觀察失業人數統計：

一九三一（三月）

一九三二（三月）

一九三三（三月）

三九七（千人）

四七四（千人）

四三四（千人）

（註）一九三三年五月日本的工資指數，只有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八一・二，可見一面貨幣跌價，一面工資還在減少。

也可以見到一九三二年的失業人數，較一九三一年增加甚多。一九三三年雖然減少一些，但是和生產指數增加的程度比較起來，仍然是瞠乎其後。同時，我們須得注意到，日本是沒有什麼失業救濟金或者失業保險的，所以，許多的失業者都在潛伏着。作者于一九三一年秋間赴日遊覽，有一位銀行家和我說：「銀座——東京的一個鬧市——目下的繁榮，正是代表不景氣，許多的料理館和咖啡店，都是失業的人勉強籌集資本開設的，他們的目的是找出路，然而結果是多數失敗。」

現在，再談到日本的財政。跟着經濟恐慌的進展，各種經常的財政收入，幾乎沒有一樣不減收。一九三二年度應納租稅的滯納，要達一萬三千五百萬日圓，各種租稅的應納額，自然還往往要減少。因此，公債證券的發行，就成爲財政救濟的唯一來源。下面是一年間的公債證券的餘額（單位日圓）

	一九三二（八月）	一九三二（五月）	一九三三（五月）
國 債	五、九六一、七八〇、〇四二	六、二四四、二五七、一一九	七、〇七〇、七五七、一一二
米穀證券	五七、二六七、〇九一	八三、三九二、二八六	二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大藏省證券	——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 計	六、〇二一、〇四七、九三四	六、四二七、五四九、四〇五	七、四六五、七五七、一一二

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一九三三年五月間的增加數目，達日圓十萬萬圓以上。這還僅指餘額的增

加而言，那時期中的發行數，自然還要大。

我必須忠實報告的，就是日本的兌換券發行額，並沒有驚人的增加。它的統計是這樣：

一九三一年八月平均

一九三二年六月平均

一九三三年六月平均

九九二、〇四二（日圓千圓）

九九二、〇七三（日圓千圓）

一、一〇五、〇〇一（日圓千圓）

這表示日本的財政，並沒有走上兌換券發行的一條路。一個金融有嚴密組織的國家，這本來是不需要的。市上需用的兌換券，本來不能隨意的增加，而在強有力的中央銀行制度之下，一面停止兌換券的兌現，一面由中央銀行儘量承受國債，那結果，等于以國債掉取兌換券，的確是一時不至于竭蹶的，不過，一個國家經常的要舉債度日，前途是很危險的。人民會因為失去財政上的信仰的緣故，對于國家也根本失去信仰。這層，日本帝國主義自然很明白，所以，她覺得為財政的前途計，也不能不在侵略方面打出一條生路。

現在，我們再檢討日本輸出貿易的國別關係。一九三二年日本的輸出，美國居第一位，中國居第二位，印度居第三位，荷屬東印度羣島居第四位，對美國的輸出，有日圓四萬四千五百萬圓之鉅，約莫是兩倍于對華的輸出。對印度的輸出，是日圓一萬九千二百萬圓，和對華輸出相差無幾。對荷屬東印

度羣島的輸出，是日圓一萬萬圓。現在，美國、印度和荷屬東印度羣島都在排斥日貨了。萬一一旦完全實施，或者可能使日本對各該國的輸出，打一個對折，那就是日圓三萬六千八百五十萬圓，幾等于對華輸出的一倍半。這個鉅大金額的輸出貿易的損失，的確是日本的當頭的大難。也許有人以為日本可以自然的減少輸入以資抵補，然而事情不是那樣的簡單的。日本的資產階級，是靠着一面輸入原料，一面輸出製造品以博取利潤的。所以，倘使輸出入同時減少，在國際收支上面的確是乘除相殺，不發生問題，然而，日本的製造工業必然要停頓，而失業問題必然要格外嚴重，經濟恐慌要一發而不可救藥！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在任何條件之下，必須要開拓海外市场。

日本去年對華輸出的減少，可說是取償于印度和荷屬東印度羣島，對那兩處的輸出的增加，為數甚鉅。現在，她又取償于什麼地方呢？恐怕事實上只有中國！從前，日本人口中的生命綫是滿洲，現在，已經公然提出中國市場是她的貿易的生命綫了！——貿易的生命綫，事實上就是她的整個國家的生命綫。有些人聽到全世界排斥日貨，覺得很痛快，却沒曉得全世界排斥日貨的結果，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進一步的加緊侵略！依我個人的觀察，日本非在短時期貫澈她的亞洲門羅主義，置全中國于她的附庸之下，決不能解救當前的難關，——當然，結果就是做到了也不過是苟延殘喘。她必然要在

中國造成第二甚至第三個「滿洲僑國」，然後可以一時的滿她的慾望。

我曾經說過：日本的對華侵略，呈內部矛盾演變出來的一個向外的矛盾，然而這向外的矛盾，反過來依然是她的內部矛盾。資本主義國際當前的恐慌，是生產過剩的恐慌，所以，她們的對外侵略的目標，是市場的取得，以傾銷過剩的商品。這和古時代略地攻城的侵略，顯然是不同，而且絕對相反。因為中古時代的恐慌，必然是生產不足的恐慌，所以，侵略的目標，是在土地的取得以增加生產。倘使依照合理的方式，現代的戰爭，應該是以武力破壞敵國本部的國防和生產力，然後，以城下之盟取得她的殖民地；對於殖民地的生產工具，要設法沒收或併吞，而對於殖民地的秩序，却要把它保持得好的，使她有很高的購買力消費自己的商品。

轟動一時的田中奏摺，從經濟學的觀點看起來，依然還是十八世紀的思想——自然，田中提出奏摺的時代，也還不在生產過剩的現階段。那時的日本，因為經濟恰在繁榮的綫上，正在那裏發生產狂和建設狂，所以他認為資源的取得是必要的條件。固然，日本倘使能用政治的手腕奪取滿洲，或者也不無小補。可是因為中國民族的覺悟，政治手腕的運用一時不易為功，而國內的恐慌，使她不得不急切的訴諸武力。這樣，取得資源之效未見，而市場的破壞，反先與她的輸出貿易以一大打擊。這是第

一個矛盾。其次，我們既然認清目下的恐慌是生產過剩問題，那末，資源即使給她開發了，也徒然只有增加生產的過剩。殖民地產業的發達，和本部本來是一個矛盾。倘使滿洲的生產可以自給了，日本本部的產業，不要大大的受影響嗎？固然，她可以倡生產統制的高調，可是，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統制是不可能的。有些人以為滿洲的資源開發了，滿洲人民的購買力就可以增高，就可以多買日本的商品。他們却沒有想到，代表利潤部分的商品，畢竟是找不到出路。要之，生產過剩是事實，而以生產解決生產過剩，必然是火上添油！這是第二個矛盾。

太平洋學會裏代表日本資本主義的學者，還在那裏提出人口過剩和移民滿洲的連鎖理由，中國的若干學者，也在那裏提出中國移民滿洲的重要以為抵抗；有些人甚至相信移民是日本對華侵略的原因。其實呢，目下日本的社會問題，那裏是人口過剩的問題？馬塞斯的人口學說，早已經被事實判處死刑了。我們只要簡單的問一句：倘使日本的人口過剩，生產何至于也過剩？須知人口過剩是和生產過剩不可能相關聯的。倘使有人指失業者是過剩的人口；那末，世界上應該是美國人口過剩得頂厲害。那尤其是笑話！

目下一部分日本的理想的政治家，也在覺悟到武力對華的非計，而主張對華懷柔。同時，中國方

面，也居然有「中日共存」的呼聲——還有人在研究中日經濟協調的可能性。我要堅決的說一句：這種種的運動，在日本方面是要騙人，而在中國方面是夢想！日本帝國主義所需求的，既然是第二甚至第三個「滿洲偽國」，所以，她的起碼條件，是要各地的負責者發一個宣言表示贊成亞洲門羅主義。不然呢，她就不能放心。即使少數的理想的政治家答應了，也會有人以對付犬養的方法對付他們的。同時，中國方面的妥洽派，也只能客觀的投降，而未見得肯主觀的，自願的——日本所謂自覺的——投降。這種客觀的投降，一面足以使自己的局面立刻崩潰，而別一面日本還不見得肯收留這種不「心悅誠服」的投降者。結果是兩面落空！

這還不過依民族間的惡感立論，倘使客觀的依照經濟條件來分析，所謂中日的經濟協調是不可能的呢？上文已經說過，日本倘使要解救她的經濟難關，必須要使對華輸出增加一倍半。這樣的鉅大的數目，中國人民僅有的購買力能勝任嗎？中國當局肯決然的限制別國的輸入以開拓日貨的市場嗎？這已經是一個大大的問題，然而還不止此。過去日貨秘密的傾銷，已經要使中國的新興產業瀕于破產，妥洽後的加緊傾銷，必然要把中國的新興產業斬絕根株！中國目下的妥洽派，多少還代表中國的民族資本，倘使要犧牲了新興產業以求苟安，那又是他們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們結果必然

要後悔。

這樣，日下的妥洽運動，至多只能取得一時的苟安，使人民遭受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的剝削；結果呢，依然不會有結果的。

對日妥洽有出路嗎

站在民族的立場，我們不單是不主張對日妥洽，對任何的帝國主義都不主張妥洽。也並不是不主張妥洽，是事實上不可能妥洽。半殖民地對於帝國主義除了鬥爭就只有投降，根本沒有具備和她們妥洽的條件——根本談不到妥洽。倘使有人和我們說，他可以設法和那一個帝國主義妥洽，那一定是他欺騙我們：他所謂妥洽不過是投降的面具。

不過，假定的站在現當局的立場，我們不妨研究研究對日妥洽有沒有出路。

說到半殖民地人民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我們根本的應該提出剝削殘餘的農工羣衆的鬥爭情緒和覺悟分子的社會意識。然而，我們既然假定的站在現當局的立場，這些問題便無從提出——這些問題的提出要使這假定的立場根本消失。

那末，我們且退一步提出民族意識。在民族意識上，目下除了日本人象養的奴才，漢奸……以外，有人贊同和日本帝國主義妥洽嗎？除了若干客觀的、不自覺的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的幻想的學者，政客和商人之外，有人會在意想對日妥洽嗎？世界上的國家，凡是走進新時代的圈子的，必然

有她的社會意識的基礎；掙扎在舊時代的邊緣的，必然要鼓舞起來殘餘的民族意識。高之談不到社會意識，卑之還夠不上民族意識，這樣的一個政權，牠的基礎在那裏？想用愚民政策嗎？現時代的愚民政策，終逃不出民族意識的鼓舞；神怪論的愚民政策和復古論的愚民政策是不能收效了。倘使一面向敵人乞憐，一面又埋怨人民不肯諒解，那個結果，便只有心悅誠服的投降到敵人的膝下去！

我們就再退一步認定威力的壓迫可以制服民族的情怒，這種妥洽也依然是無出路。目下的妥洽論者，大抵不外代表新興的民族資本。他們是因為自己的資本關係，所以要求一種苟安的局面。然而倘使我們仔細研究日本帝國主義的內部經濟狀態，就會明白這種苟安的局面之後，必然跟着會有一個民族資本大難臨頭的局面。日本帝國主義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一面是生產率的增高，一面是倉庫存貨額的增高。這表明東三省的侵略，並沒有能夠解決她的生產過剩問題，而在貨幣跌價的刺激之下，生產反增加了無政府的狀態。目下美國、印度和南洋羣島，紛起排斥日本商品，她的生產過剩狀態，將來必然還要增高。她除想以中國為尾閘外，別無他法。她目下不是已經公然說中國是她的貿易的生命線嗎？

過去日貨的非公開的傾銷，已經使中國的民族資本半數破產，將來在妥洽的局面之下的公然

的傾銷，就非完全消滅中國民族資本不止那樣，妥洽者爲自己的資本關係而主張妥洽，結果必然因妥洽而喪失僅有的資本！這是妥洽論者自身的一個重大矛盾！

有人說：我們可以用「政治妥洽經濟鬥爭」的手段對付日本。這是完全沒有明白現代的侵略意義的說法。日本帝國主義是爲求經濟的出路所以要對華侵略，她能容許你的政治妥洽下的經濟鬥爭嗎？經濟鬥爭的結果，只有招致進一步的政治侵略，而決不能維持政治妥洽。

總之，目下只有兩條路：心悅誠服的投降和破釜沉舟的鬥爭。

日內瓦莫斯科與東京三條外交路線之得失

——申報月刊社第四次座談會席上——

章乃器：說到外交，第一要有實力，第二要有政策，第三才談得到路線。

外交不過是實力的和平的運用；所以，不知運用實力和不敢運用實力的人，就不配言外交。「弱國無外交」嗎？不然，不知運用實力或者不敢運用實力，才無外交哩。實力是什麼呢？帝國主義的實力是飛機大炮；而弱小民族的實力是民衆。飛機大炮固然有很大的威力；然而民衆的怒吼和抗爭，很可以使飛機大炮無由施展牠們的威力。過去中國革命羣衆在沙面、武漢、九江等處反抗帝國主義的勝利，就是很好的例子。

有了外交的實力，然後可以決定外交的政策，是應該取強硬的政策呢，還是取退讓的政策？強硬可以到什麼地步呢？退讓不能超過什麼地步呢？這是應該拿民族的利益和自己的實力以及對方的情形配合估量而後能定立下來的。比方，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的外交政策，有所謂「焦土外交」、「協和外交」和最近的「水鳥外交」；這都是配稱爲外交政策的。我們的外交政策是什麼東

西呢？

有了外交的實力，才有外交的政策，外交的路線那一條都可以走，而且幾條路線可以同時走。沒有外交的實力和外交的政策，任何的路線都會變成死路。倘使外交官的口吻，不過是說：「甲國的外交總長，是我的老師，」我和國際聯盟的祕書長友善，「我個人能得某國當局的信任，」我的妻子是某國人，「我能走東京，」我能走長春，「我能走台灣，」……那不僅是官僚外交，簡直是西崽外交。因此，所謂「親×派」「××派」……對於國家，對於民族，都是毫無利益的。倘使外交而有政策，外交而不至於誤國，各種路線就都應該在整個更高的政策之下充分的運用，路線之爭是萬萬不會有的。外交上可以有「日本通」「歐美通」……然而不應該有「親×派」「××派」。

前提確定了，現在再來分析這三條路線的內容。

日內瓦可認為外交上的一條路線，然而國際聯盟決計不是我們的外交實力。所以，「依賴國聯」的外交政策是不成爲政策的。我們可以在國聯宣傳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可以利用國聯的和平偶像，攻擊日本的軍事侵略，更可以利用國聯的「正義人道」面具，揭破帝國主義的無正義無人道；然而，要明白，這種種的宣傳與揭露根本的作用，還是在增高民族抗日反帝的情緒，而在夢想任何國

家出來替我們「打抱不平」。倘使在國內反而要壓迫民衆的抗日反帝運動，那末，在日內瓦的外交工作，便成爲矛盾而無意義。倘使再拿了國聯的所謂「道德的制裁」以自誇外交的勝利，那末，這種外交便也逃不了爲誤國的外交！

莫斯科也不過是一條路線。在這一條路線上，我們應該贊助蘇俄的和平政策以擴大反帝反戰的威勢；我們不單是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我們的領土，還要進一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們的領土，領海，和領空，作任何侵略第三國的軍事準備。但是，倘使希望蘇俄出來替我們打日本，那便是夢想。倘使再希望在日蘇發生戰事中找求夢幻的出路，而不惜以自己的領土作別人的戰場，那更是麻木不仁，在租界裏享樂而不知戰區中悲慘痛苦的冷血動物！

東京自然也可說是一條外交路線；然而，這條路線，倘使照目下某種外交家的走法，也是一條死路。我們要走東京這條路線，是應該告訴日本帝國主義，中國目下的民衆是如何的覺悟，民衆的反日情緒是如何的熱烈，任何的官吏都不能再像從前的任意違反民意；更要警告她，倘使不立刻停止侵略行動，中國就不惜破釜沉舟的來反抗。中國有二百萬以上的軍隊，幾次的抗日，僅僅犧牲了幾萬人；有人就公然的說，中國沒有抵抗的力量了。他們一面對各處的當局要求禁止反日運動，而同時就對

日本帝國主義表示中國人是不抗日的。這樣委屈求全真是所謂「滅自己志氣，長他人威風。」如果這樣的外交方式，能夠挽救民族的危亡，不單是中國的歷史要重新寫過，世界的歷史也要重新寫過！最後，我再堅決的說：目下中國的外交，必然要有一個民衆外交，才有出路。換句話說，再有一度的民衆反日的運動。不然長此以往，日本侵略，日益加甚，結果將使中國民族淪於萬劫不復的境地。故由目前情形看來，中國民族倘使要有出路，就只有擴大民衆組織，以增強外交實力；而在這個實力之下，我們即應採用一個「人棄我取」的「焦土外交」，因為必定要在這「焦土外交」政策之下，我們大可活潑的運用上述的三條外交路線。

畢雲程：我不想發表甚麼整篇的談話，而只想參加討論，隨時發表一點片斷的感想。方才聽了章先生的談話。我覺得十分贊成。我以為要解決中國的外交問題，須把章先生所說的實力、政策等先決問題謀得適當的解決。否則，先決問題一日不能解決，中國的外交便一日沒有出路。

記者：章先生是一位金融家，我們到有個問題要請教他：即拉西曼的報告書發表了，國聯對華技術合作與日本的衝突在何處，她未來的趨勢如何？對於中國有何重大的影響？

章乃器：關於拉西曼的報告書，我想提出下列三點來討論：不過，我得首先聲明，我現在並非站在

金融界的立場，來討論國聯技術合作及日本反對等諸問題，我祇以客觀的國民的觀點，來述說個人對於這些問題所抱的意見。

(一) 技術合作和日本的衝突在何處？這些衝突有沒有消解的可能？技術合作和日本衝突的主點，自然是因爲日本已經退出國聯，和她妄想東亞門羅主義的貫徹。但是在拉西曼的報告書中間，也有和日本利益衝突的兩點：第一，拉西曼的報告書內，有振興中國絲業之一章。假使中國絲業振興之後，日本絲當然將遭受很大的打擊。其次，拉氏報告書內更有振興中國棉業的建議，這也是給予日本的一個很嚴重的威脅。上海的日本紗廠，在華佔有很大經濟勢力，且屬日本經濟侵略中國的重要工具之一。要是一旦華紗恢復了主人翁的地位，將日紗排擠出去，其所予日本帝國主義的影響當然極大。以上二點，大概是日本反對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的比較具體的因素。但我們進一步要問，衝突有沒有妥協的可能呢？我以爲具有十分妥協的可能。因爲列強對於中國，採取的始終是分贓主義。所以技術合作的將來，不難把和日本衝突的幾點設法緩和，或竟取消，而把不衝突的幾點保留着。那末可使日本沒有閒言，更在牠的領導之下，而達到國際共管中國的目的。同時，我們更得認清一點，日本現在所抱的反對的態度，正是異日取得妥協的一種手段。

(二)技術合作對於中國民族之利害如何？拉西曼的報告書中所建議的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的幾個項目，分別觀察起來，如衛生、水利、及絲、棉等幾項，對於中國尙有相當利益。但建設公路的一項，却是一種在現狀況下對於中國農村，不十分有利益的建設。本來，沒有生產工具，根本就談不到交通工具。我們可以說，某處有礦產，所以需要有交通工具；但我們如說，某處有消費市場，故要有交通工具，這却大謬了。不消說，公路造好之後，立刻又是汽油、汽車等的大量輸入，試問：這又是換去了誰的金錢？至於公路的效用，牠只能把輕巧的都市工業品運到農村去銷售，却不能把笨重的農產物帶到都市裏來發賣；同時，她只能把農民一批批地從破產的老鄉帶到都市裏來求生，却不能使都市裏的人，坐着汽車到農村去開發。所以，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公路所予中國的利益，是得不償失的。

(三)技術合作的未來之趨勢如何？剛纔我說過，技術合作和日本衝突的幾點，將來頗有妥協的可能，所以我以爲未來的趨勢，可稱爲瓜分與共管並進。何以言之？先就瓜分說，列強對於我國西北及東北兩部，是採取瓜分的形勢；即以西北歸歐美人來建設，而以東北的建設讓於日人。同時，歐美日本兩方面，並可在反蘇聯的一點上，取得聯絡和合作。至於中國中部，我以爲牠們將在共管的狀態下實行分贓。而共管又被「公開投資」及「技術合作」等比較好聽些的名目遮蓋着。總之，我們根本要

認定，目下的所謂瓜分共管，並不一定依着歷來的方式——並不一定在圓桌會議之後，分配土地才算瓜分，也並不必設中國共管委員會才算共管，他們是可以比較巧妙的方式實行的。還有，我個人始終以為讓外國人來替中國起草建設方案，終究是不妥當的。我們只宜請外國技師在局部的工程上幫助我們，却不能請他們來計劃整個的方案。因為這不僅是加於我們一種侮辱，並且實際上使我們得不到絲毫益處的。

二三年來之遠東戰爭

一 緒言

所謂三年來之遠東戰爭，從世界一角的中國底觀點來說，就是我們所痛心疾首的「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戰；從整個世界的觀點來說，却不過是反蘇聯戰爭底前哨戰；而在整個的歷史裏面，牠是資本主義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序幕。因為牠具有這樣複雜的意義，所以，當我們敘述這個戰爭的時候，我們不能忽視這三點當中任何的一點。

二 歷史上的意義

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二十世紀，不僅是經濟危機底內容一次次的嚴重化；牠所引起的政治危機，也必然的跟着嚴重化，帝國主義對於經濟危機底應付，固然是需要一個戰爭；而對於政治危機——革命危機——底應付，也更需要一個戰爭。

帝國主義在一九一四年發動了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到一九一八年才告了一個結束。在大戰的時期中間，六千五百萬的參戰軍士，在壕溝中受了千辛萬苦——死傷的人數達二千九百萬之多；幾萬萬的勞苦羣衆，在戰爭當中遭受凍餓和驚惶；幾百萬的中產階級，因為戰時和戰後的通貨膨脹，喪失了他們僅有的資財。然而，少數的大資本家，却能「因緣時會」，不單是依然過着很舒適的生活，而且還得着空前的暴利。占有世界面積六分之一的俄羅斯，雖然是在戰爭中變成赤色；而美國和日本，却增加了大批的富豪。而且在大戰之後，從一九二四年開始，資本主義還得着一個空前的「繁榮」。

但從一九二九年世界大恐慌開始之後，帝國主義表面上是依然喊着和平，骨子裏却個個都希望有一個戰爭。固然戰爭是危險的，而且是含有十分的投機性的；可是，在崩潰已在眼前的「千鈞一髮」的當兒，向來「不可一世」的帝國主義自然會感到，與其「坐以待斃」，何如「鋌而走險」。在帝國主義的計算當中，自然最好是讓別人火併，而自己坐收「漁人之利」，或者是發動一個勝利「可操左券」的小規模戰爭。倘使萬不得已而必須冒很大的危險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戰爭，那末，帝國主義自然也想到與其自己相互的火併，何如聯合一致向蘇聯進攻，消滅了牠們底共同的敵人，而同時

解救了牠們底經濟和政治的危機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歷史上的因果關係上，在這樣的一個精密的計算之下，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三 戰爭開始前的日本

日本帝國主義在過去數十年中間，在叢爾的三島之內，安置着急激膨脹的人口，正好比是「背水而陣」；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擴張牠底愚昧而足以麻醉人民的所謂「武士道精神」，因而逐漸養成牠底軍事上的優勢。牠運用這優勢的軍力，開始牠底擴充領土運動，先後併吞琉球、台灣、和朝鮮、割取旅順、大連、和庫頁島底一半。可是，畢竟因為牠本部資源的貧乏，而且新得的領土和屬地的礦產蘊藏也不很豐富，所以，在經濟上，日本還不足以成爲一個強大的「帝國」。

在這樣一個薄弱的經濟基礎之上，剛遇着第一次大戰的機緣——未蒙戰爭底損害而受着戰爭底利益的機緣，日本底產業因爲軍需品底供給，發生了畸形過度的發展。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雖然是首先在美國發現，然而受到影響最烈的，恐怕要算是日本——關稅壁壘跟着恐慌底進行，愈

築愈高，使這過度發展的日本工業生產品，得不到適宜的市場；同時，因為牠底產品大多數是輕工業產品，連殖民地國家都能追趕上來和牠競爭，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生產過剩的狀態因而格外的嚴重。日本底躉售物價指數，（三菱，一九二一基準），跌落到五三·三；雇傭指數（三菱，一九二六基準）跌落到七四·五。這些數字，表面上似乎並不比別的帝國主義列強格外嚴重，然而，日本到底還是一個後進國家，經濟基礎沒有到根深柢固的時候；所以，所受的影響便比較別人嚴重了。頂頂顯著的，就是日本銀行的存金，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一億圓減到一九三一年的四億圓，貿易總額由一九二九年的四十三億圓跌到一九三一年的二十三億圓；這是當時世界上任何帝國主義所沒有的。

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薄弱，是比較深思遠慮的執政者都見到的；從伊藤博文到田中義一，「一脈相承」的保持着所謂「大陸政策」。那嚴重的恐慌當中，牠底侵略底對象中國，却剛剛沉醉在「內爭」底旋渦裏面；牠就覺得不能放棄了這個機緣了。

四 軍事動作之一斑

自一九三一年六月宇垣一成被任爲朝鮮總督，內田康哉被任爲滿鐵總裁以後，日本帝國主義

就已經下了侵滿的決心。同年七月二日，就發生了萬寶山慘案，跟着便有朝鮮排華事變；而日本帝國主義，就在這時候對於所謂中村大尉失蹤事件，竭力加以擴大。到了九月十八日夜間一時許，空前的瀋陽就發動了。當時的東北當局，正酣嬉在「金迷紙醉」的生活中間，於是，在「逆來順受」的「無抵抗主義」之下，一日夜之間，就造成「失地千里」的新紀錄！而且瀋陽飛機場內的二百餘架飛機，儲藏豐富的軍械庫和規模闊大的兵工廠，都變成日本帝國主義殺中國人的工具了！

這時，東三省南部，尚留錦州一角，北面黑龍江全省尚未入敵手。東北當局乃於九月二十三日開始在錦州設立行署。日人認此仍為東北當局無誠意底表現，於十月初旬開始以飛機轟炸錦州一帶。東北軍隊仍因無抵抗命令，不加射擊，至十月九日，行署人員，逃避一空。

迨十月中旬，日本帝國主義復令漢奸張海鵬部，向黑龍江攻擊；代理黑省主席馬占山起與抗戰，擊敗敵軍。日軍增援再進，復在嫩江鐵橋為馬部擊敗。「孤軍苦戰」究竟不能抵當壓境的大敵；結果，到了十月十八日那一天，黑龍江也淪陷了。

到了十一月八日，天津方面，復有敵軍便衣隊底侵襲。雖然因為我方事前已有防範，外交團復出而斡旋，總算在短期間內得着了一個和平了結；然而，日本浪人首領土肥原，已經乘機挾溥儀以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次津變又復發生。結果，由我方自動將保安隊撤退河北，始告平復。

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軍以「剿匪」爲名，開始攻擊錦州，三十一日，東北軍全部不戰退入關內。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錦州亦告失陷。當時抗敵的，只有零星的義勇軍。至此，東三省遂全部淪入敵手。

其時東南方面，反日抵貨風潮，頗爲高漲；英美有奪取日本在長江流域及華南市場之勢。日本帝國主義底對華侵略，主旨原在緩和內部的經濟危機，對此自難容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駐滬日總領事遂以「最後通牒」致上海市當局，主要的是要求制止反日行動，二十八日下午四時，市當局答覆日領，完全接受要求，同時查封各反日團體。不意在同日晚間，日海軍陸戰隊仍開始向閘北攻擊；我駐防閘北之十九路軍本已奉命撤退，猝受攻擊，軍心大憤，遂起抵抗；因而造成有歷史意義的淞滬戰爭。雙方相持，歷一月餘，我軍屢挫敵鋒，日軍屢次增援，四易主將，調遣兵力，達十萬人以上。這時，敵人兵力，已經較我三倍，而器械底銳利，更遠非我軍所能及；淞滬底抗日戰事，乃復成「孤軍苦戰」的局面。結果，在三月二日收退。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高揚無抵抗主義的東北當局，始終認爲因歷史的關係，不能算是親日的勢力。所以，對於關內的東北軍，尤其是曾經抗敵的王以哲部隊，認爲終須鏟除。因此，在一九三三年元旦，

遂開始牠底關內軍事動作。山海關和九門口兩要隘，經我方少數部隊奮勇抵抗之後，在旬日間盡陷敵手。二月二十五日，日軍復開始侵攻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遇敵退縮，不戰而敗。至三月二日，熱河亦全部被佔。日軍進一步再由熱河攻擊長城各口；那時，宋哲元部在喜峯口及羅文峪勇猛拒抗，商震部在冷口應戰亦烈。但是，至四月中旬，終于全部被佔。其時，日軍在東路於五月八日進攻灤東，同月十一日進攻灤西，至十五日全部被佔。察東若干縣，是時亦已陷敵手，以後，便有塘沽協定底簽訂，中國正式軍隊之抗日行動，至此暫告一結束。目下，只有東北方面的義勇軍，仍然還在那裏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戰！

五 和平運動與國際動向

在「國際終有公道」的原則之下，中國底對日政策，自然只有「求神問卜」之一途了。在「無抵抗主義」之外，同時產生的，便有「依賴國聯」的政策。自從中日問題迅速的提出國聯之後，日本代表屢次在國聯議席上聲明撤退軍隊至南滿鐵道地帶，而日本軍隊，依然是不斷的北上南下，軍事行動反而天天的擴大。結果，國聯除通過了幾次的決議案，組織了幾次的委員會，派遣了一個調查團

之外，事態只有嚴重化。日本除在軍事上充分發揮牠底「威力」之外，在政治上更組織滿洲偽國，進一步再嚇使溥儀稱帝。到了日本脫退了國聯之後，日內瓦底滑稽劇才算告一段落。同時，和國聯不承認「滿洲國」的決議案東西呼應的，還有美國史汀生底宣言。這些固然都已經是成爲「陳跡」，然而在當時，都曾經在上流人士底口中和報紙底紀載上，誇耀的稱爲「道德的勝利」的。

反映到遠東的和平運動，便有錦州劃爲中立區的提議，上海協定和塘沽協定。第一種提議是因爲當時國人底反對，終於沒有實現；第二和第三兩種協定，是分別在淞滬戰事和華北戰事之後簽訂的。在這三個和平運動中間，英國底在華外交官都是一個主要的脚色。

日本底對華侵略，固然有上文所述的原因，而中國外交上的孤立，有些人也認爲是原因之一。因此，一部分的外交界人士，就感覺到以前對蘇俄絕交底失策；同時，依賴國聯的政策，又已至「圖窮七見」的階段；「外交另闢新路線」的呼聲，於是喧騰一時。結果，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中蘇回復了邦交。

六 外交的歧途——兩種方式三條路線

無疑的，過去三年中的外交，是在歧途上徘徊着。在方式上，究竟是取直接外交呢，還是維持間接外交，在路線上，便有日內瓦、東京和莫斯科三條路線之爭。然而，根本的問題，恐怕決不是方式問題，而是實力問題；主要的問題，也決不是路線問題，而是政策問題。我們能運用怎樣的實力呢？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政策呢？

半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一個民族革命戰爭；半殖民地底外交實力，是廣大羣衆底鬪爭情緒。倘使沒有勇氣發動一個民族革命戰爭，便決沒有膽量來策動廣大羣衆底鬪爭情緒，沒有策動民族革命戰爭的最後決心，便談不到有力的外交政策。然而，民族革命戰爭是中國上流人士所懼怕的；所以，根本便談不到外交實力，也更談不到有力的外交政策了。

過去三年中的對日政策，由無抵抗主義轉變到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轉變到長期抵抗，再由長期抵抗轉變到先安內而後攘外。這些，能不能就算是外交政策呢？

不能運用外交實力，不曾確立外交政策，而空談外交路線，是沒有意義的。那樣，走東京路線便必然是投降，而走日內瓦或者莫斯科路線也只是「秦廷之哭」，用表示誠意的方式希望東京底諒解，那恐怕只有鄭孝胥輩才能辦到。不示敵人以最後的決心和可用的實力而希冀敵人的讓步，那只是

「與虎謀皮。」依賴日內瓦、莫斯科而希冀牠們「仗義與師」那也只是「望梅止渴」聯絡與國以取得國際的同情，是對於日內瓦和莫斯科的最高希望；取得了這種「道德的勝利」之後，依然還需要一個實力去取得事實上的勝利的呀。

七 東京路線之謎——二重外交三方軍事

在歧路徘徊百無聊賴之中，對日親善的聲浪，忽然在某一部分的上流人士間高漲起來。我們倒也不必堅決的反對親善政策，而只要問親善這條路走不走得通。我們也不必計及人民允許不允許，而只要問親善能不能得着敵人一致的同情。

日本底外交是二重的外交，這是誰都知道的；代表政府的外務省所決定的政策，軍部可以軍事所造成的事實去推翻牠。同時，除了二重的外交之外，還有一個三方的軍事。在東北的軍事行動是日陸軍底行動，在淞滬的戰事是海軍底行動，而在天津、廈門和塘沽協定簽訂以後華北的擾亂，却是浪人底行動。我們並不能說日本底軍事勢力是不守紀律的，也不能說日本政府無力制裁浪人，而應該認明，在日本帝國主義底見解「中國是一個無組織的國家」所以，不單是不適用國際法，而且不

適用任何的法律。宣戰依照憲法，應該由議會的通過；然而日本在中國的不宣之戰却可以用「自衛」
「偶起衝突」……等口實任意的造成。

一面方在高唱經濟合作，進行通車和改訂稅率，一面却就有藏本事件底陰謀；這還是最近的事實。這樣的一個頭緒紛繁的親善對象，親善工作將從何處下手？有什麼方法可以面面俱到呢？

八 西進乎南下乎

強佔了東北四省之後的日本帝國主義事實上是在西進政策和南下政策底歧途上徘徊着。在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企圖上，西進和南下都是需要的；而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着想，南下似乎比西進合算。牠倘使能夠先南下征服中國本部，那末，在牠西進以攻蘇聯的時候，不單是無後顧之憂，而且有廣大的人民可以供牠驅策以赴戰場，大量的軍需品可以供她「予取予求」的徵發。

然而，在牠南下政策底進行上，和其他帝國主義的衝突是足以顧慮的——尤其是英帝國主義。英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勢力，或者還不足和日本周旋；然而，倘使英國以資財援助中國底實力派，是可使給日本以相當的打擊的。上文曾經說過，日本底對華侵略，是反蘇聯戰爭底前哨戰。在反蘇聯的意

義上，英國可以允許日本佔領東北，作爲進攻蘇聯的軍事根據地；然而，倘使日本南下以攻關內，就要和英國底經濟利益衝突。

英國底遠東政策，三年來充分的表現出來，忽而袒華，忽而袒日的矛盾現象，只有在反蘇聯的意義之下，得着了明白的解釋。就是，在日本進行西進政策的時候，英國便表示袒日；而在日本進行南下政策的時候，英國便要抬出「正義公理」的旗幟，表示袒華。爲甚麼上文所說的三次和平運動，英國都是幕後的主要腳色呢？這是因爲牠在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一致立場上，不能容許殖民地在武力反抗帝國主義的行動上得着公然的勝利，而只能容許殖民地在和平交涉中取得相當的結果；牠在軍力上，也不能以實力制止日本的南下政策。因此，牠就不能不負起這「和平使者」底任務了。

我們與其說日本是在西進和南下兩種政策底歧途上徘徊着，似乎還不如說牠是把這兩個政策「交相爲用」的輪流運用着。牠在運用南下政策的時候，必然的取得相當的結果；而在適宜而不過分的運用之下，牠却可以保證英國不至於「趨於極端。」同時，日本也決不願單獨的冒大險以進攻蘇聯，牠必然要得着其他帝國主義底共同行動；而南下政策的運用，却恰好是取得別國共同行動的一種有效手段。牠在南下的時候，就是表示，倘使其他帝國主義不卽速和牠聯合進攻蘇聯，牠

就不能不南下奪取這列強底公共市場——中國本部。

矛盾是取得統一的手段。正和火油托辣斯奪取市場一樣，不經過互相跌價的競爭，便不會有公定市價的妥洽。日英間種種對華政策的矛盾，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說明。爲甚麼最近在山海關日英操演事件底衝突之後，跟着就有復活日英同盟底傳說呢？這一面可說是日本底南下政策取得英國對於日本底西進政策的協助，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英國底阻止日本南下推進日本底西進政策。在日英「平分秋色」的妥洽之下，英國勢力下的西藏和新疆間的反蘇聯陣線，就可以和日本勢力下的滿蒙反蘇聯陣線接合起來。於是，我們就看見日蘇間的戰雲，跟着緊張起來了。同時，歐洲底德國和波蘭，也經由這國際反蘇聯戰線底領導者英國底拉攏，而訂立盟約了；東西兩方底反蘇聯戰，都呈顯著的進步。有人懷疑我底推論嗎？英國在否認日英同盟復活之後，已經公然聲明，牠有在西藏和新疆樹立防止蘇聯赤化印度的防線底必要。這還不是「情見乎辭」的明證嗎？

九 日本底經濟現狀

日本帝國主義自「九一八」事變以後三年之間，表面上是在誇耀牠底經濟繁榮，實際上並沒有

減少牠底經濟和政治的危機。根據三菱月刊底指數，日本底生產指數由一九二九年底一二〇·六漲到本年五月底一五三·三，而貿易總數，却還在一九二九年底數字之下；這很足以表示生產過剩底轉趨嚴重。物價指數由一九三一年底一〇五，漲到本年六月底一三三·三，而工資指數則由一九三一年底九一·三，跌到今年四月底八三；這表示勞動階級是在生活高漲和工資減低底兩重嚴重剝削之下呻吟着，同時還表示國內購買力絕對沒有增加，而過剩的商品依然是急切需要海外的市場。這事實告訴我們：日本底經濟危機需要一個大規模的軍事投機，而日本底社會秩序也只有在戰時的狀態之下能夠暫時的保持着。日本的戰爭製造正和牠底商品生產一樣，只有趨向擴張的一途。

十 中國將何以自處

在西進和南下兩種政策「交相爲用」的輪替運用之下，日本是要在進攻蘇聯的過程中間併吞了中國，或者瓜分中國本部底一部分。日本不單是要中國人民消極的任牠宰割，而且要中國人民積極的到牠底進攻蘇聯的戰線上去做無謂的犧牲品！關外的偽軍，已經在日本帝國主義底驅策之下奔赴前線，華北的勞工，也已經成千成萬的受牠底誘騙，出關去充任兵役。

在歷史的使命上，我們應反對帝國主義底戰爭，在人道主義上，我們應該反對一切殘殺人類的戰爭；而在民族底立場上，我們更決不能幫助我們最大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然而，在形勢上，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強逼我們做牠底最前線的犧牲品！所以，今後的局勢，是比過去三年間更嚴重的局勢，我們應該怎樣對付這空前嚴重的局勢呢？中立嗎？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所萬難容許的。我們除了服從，恐怕就只有抗爭！

怎樣抗爭呢？由淞滬之役，我們可以認識民衆底力量；這一個月餘的苦戰，不是軍事底力量，而是民衆的力量。由歷次的戰事，我們更可以認識孤軍一隅之戰，徒然犧牲了英勇的戰士，而結果終不免被敵人各個的擊破。所以，倘使我們以後再要抗爭，我們必須集中全國民衆底力量，發動一個舉國一致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要以民族革命戰爭，一勞永逸的消滅帝國主義戰爭！

激變中的遠東局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鑼鼓，是愈敲愈緊了！在這種形勢之下，無疑的，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焦點遠東，是要有空前的嚴重發展了。

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侵略戰的爆發，是現階段遠東局勢開展的一個主要因素。在意阿戰爭中，英國爲了在阿的權益，爲了非洲殖民地的安全，更爲了印度洋和太平洋裏面殖民地的保障，都不能不和意大利爭取這重要關鍵的地中海霸權。帝國主義對於這一套「文化任務」是誰都不肯放鬆的。

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成功（？）使意大利了解侵略的滋味，而增加牠侵略阿比西尼亞的勇氣。這是過去的事。目下呢，反過來，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也恰好使日本感覺到「吾道不孤」，而增加了牠對中國進一步侵略的野心。太平洋上「舉足重輕」的英國，剛在這時候爲應付意大利起見，調遣牠在太平洋方面的海軍力量增援地中海，這也使日本減少了許多牽制，而認爲是滅亡中國的「千載一時」的良機。

但是，在另一方面，阿比西尼亞民族的奮勇應戰和國聯對於意大利的制裁，也使這憤懣中的中國民族，得着一個重大的刺激。自然，阿比西尼亞的國力和文化，都遠在中國之下。阿比西尼亞的人口，才不過上海市人口的二倍。而意大利的軍力，一般看來也並不在日本之下。因此，「阿比西尼亞民族可以流黑色皮膚裏的血，中國民族爲甚麼不能流黃色皮膚裏的血」的呼聲，就在中國民族各個階層裏潮湧起來了。

國聯本來是英法兩國的御用機關；「九一八」事變以後國聯對中日糾紛的態度，多半還是秉承英國的意旨；就是中國對日政策的軟弱，甚至不敢在國聯提出盟約第十六條，英國也是一個「發踪指使」者。然而，最近英國不管部大臣艾登的「外交辭令」，竟說國聯之所以不能對日本制裁，是因爲中國當時不曾對日本宣戰而且不曾主張援用盟約第十六條。這在「俯仰由人」的中國外交官聽起來，固然不免有「哭笑不得」之慨；而中國人民却必然還要進一步的「痛心疾首」於軟弱外交的喪權辱國，而要求立刻發動一個民族革命戰爭。

意阿戰爭所引起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兩方面的相反的情緒，使中日間的矛盾，格外的尖銳化起來。

我曾經說過，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固然是低落了，但是牠在太平洋方面，依然占着一個「舉足重輕」的地位；同時，牠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也依然不容忽視——投資仍占第一位，貿易連殖民地一併計算，仍然要超過日本而占到第二位。由前之說，牠還並不需要對於遠東問題作很大的讓步；由後之說，牠也不肯作很大的讓步。英國過去在遠東方面對日本態度的軟弱，第一，是因為英美間的矛盾，也是十分的嚴重，牠不能不相當的聯日以制美；第二，是因為美國對於太平洋方面，還沒有積極西進的決心，英國即使聯美也不能藉以制日；第三，是在反蘇聯的意義上，英國依然幻想着日本可以做一個由遠東進攻蘇聯的前鋒。

當然，英國對日本這種意義下的讓步，是有限度的。那就是說：第一，假如日本貪得無厭，使英國認識到英日間的矛盾，實質上已經超過英美間的時候，英國在主觀上便會感覺到不如聯美以制日；第二，英國如真個聯美制日自然可以使美國對太平洋的態度，很快的變為積極，這使英國感覺到，在客觀的條件上，聯美實足以制日；第三，假如日本的對蘇聯態度，游移莫決，一味利用少數前哨在蘇聯邊境上的挑釁，作為國際上進攻蘇聯的宣傳資料，而一面在這種宣傳的烟幕之下，向中國作極

大的侵略，英國結果也是不能容忍的。

羅斯爵士的遠東之行，也許就是試探日本的真正意旨的吧？日本的真正意旨又是怎樣呢？

* * * * *

進攻蘇聯是帝國主義的共同基本任務，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在這「爾詐我虞」的帝國主義國際間，共同任務的負擔，決不會像單獨權利奪取的那樣踴躍。假如歐洲方面的反蘇聯戰爭能夠同時爆發，日本自然可以出兵西伯利亞，以盡這共同的任務。但是倘使希望日本單獨的向蘇聯作戰，在這一般的軍事家認為是「世界第一」的紅色隊伍前面作冒險的英雄的犧牲，那不單是日本不肯，連歐陸上幾個原來擔任着反蘇聯前鋒的半殖民地國家，都不會肯的。像一九二九年中國東北當局爲了中東路問題所演出的傻瓜趣劇，在反蘇聯戰史上，恐怕是要「空前絕後」了。

侵奪中國，可說是日本的權利；在先權利後義務的「原則」之下，日本自然是以先得中國爲快。何況東北和西北一部分中國領土的侵占，日本還可以高提「反共」的口號，而認爲是反蘇聯任務中的一個基本階段呢？日本的占領東北，在作爲反蘇聯戰爭的根據地的條件之下，事實上是得着英國的默認的。英日間的爭點，在英國方面，是認爲日本在占領東北之後，不應該再南下以攻略關內；而

在日本呢，却認爲中國問題的處置，牠有獨斷獨行的權利，在所謂「東亞門羅主義」之下，是不許別國有置喙的餘地的。換言之，英國認爲牠對遠東問題的退讓，甚至相當的幫助日本，是作爲日本進攻蘇聯的交換條件的；而日本呢，却認爲中國領土的侵奪，是牠的「天經地義」的權益，這和反蘇聯戰爭雖然有戰略上的關係，然而這種關係的如何運用，別國無權過問，更不能容許別國主張以侵略中國的權利作爲反蘇聯的交換條件。

羅斯經過日本時候所得的結果，大概就是如此。不過，這一段的意義，是帝國主義間外交最祕密的一部分，在報紙上是不能看見的。報紙上所透露出來的，只有日本向英國提出開放大不列顛帝國的主屬各國的門戶，作爲日本開放中國門戶的交換條件的消息。這就是說：日本不能承認侵略中國可能做進攻蘇聯的交換條件，而只能承認開放大不列顛門戶可能做英日瓜分中國的交換條件，進攻蘇聯的任務，日本自己會負擔起來的，用不着英國提出交換條件，而且更不容許英國提出中國權益爲交換條件。

這原來做遠東盟主的英國，日本竟想一脚把牠踢到遠東問題的大門外面去了。自然，這是超過了英國可能退讓的限度太多了。

英國如何應付日本這「旁若無人唯我獨尊」的逼人態度呢？英國的對策，是三方面的。

第一，是英國對蘇聯態度的改變。本來在主義方面，英國和蘇聯固然有根本的矛盾，然而在目下英意糾紛，十分嚴重，使英國必須「改途易轍」圖謀聯法以制意的時候，在歐洲方面的反蘇聯形勢，不能不暫時的和緩下去。英國原想教法國放棄牠對於中歐和東歐的集體安全條件——東洛加諾條約——的義務，脫離了蘇聯領導下的「和平陣線」，作為助法防德的所謂「法國安全保障」的交換條件。這樣，牠就把法國由蘇聯的懷抱中拉到自己的陣線裏來。可是，英國外交手段的狡猾，法國是嘗過滋味的，法國決不肯貿然接受這種的「邀請」。外面有了法國領導下的小協約國，堅定的站在「和平陣線」上面，內部還有勢力很大的主張聯蘇的左傾各政黨，和廣大的反法西斯，反戰的民衆力量，法國在事實上也不可能能有這樣的突變。同時，英國在自身危急的時候，才求援於法國以制意；法國自然也覺得沒有接受英國高度交換條件的必要——法助英制意，英助法制德，已經可成為「銖兩悉稱」的交換條件。

這樣，眼見的蘇聯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在短時期內決沒有加以推翻的可能，英國也不能不變

計而向蘇聯送秋波了。英蘇間的商務借款，忽然在這時候進行起來，自然也不是無因的。在英國的用意，除了一面算是遷就歐洲的客觀環境之外，另一面也帶着對日本的威嚇意味。牠好像是對日本說：「既然你對於反蘇聯的任務是這樣的無誠意，我也不必加工製造反蘇聯陣線；好在蘇聯革命勢力的威嚇，也許你要比我多受着一些。」自然，我們決不能認為英國已經真正的放棄了牠的製造反蘇聯戰爭的任務，而只能說牠是用這一套「攢紗帽」的手段，使日本能夠因為受到刺激而積極的負擔起任務來罷了。事實上，只要帝國主義能夠在歐洲方面有一個堅強的反意團結，或者在遠東方面有一個堅強的反日團結，將來都可能轉變為反蘇聯的團結。這在英國改變外交策略的現階段裏，恐怕也未始不作此想。不過，帝國主義當前的苦悶，是在任何的集合之中，都不可能有一個「共信」，更不可能有一個「互信」；於是，在「爾詐我虞」的狀況之下，一切的團結都像一盤散沙。回頭來看，這是這有主義為保證的蘇聯和平政策，比較的可靠，「共信」就不期然的一時落到蘇聯的掌握之中了。英國將來用什麼方法把這個「共信」奪取過來呢？這要看英蘇雙方將來的外交手腕了。

第二，是英國對美國態度的改變。在本質上，遮蓋着民主主義的美帝國主義，牠的威嚇性究竟沒有像這帶着封建性的日本帝國主義那樣的猙獰可怖。加拿大雖然在「金圓」勢力的支配之下，然

而畢竟還掛着英國旗呢。美國即使向太平洋西進，然而用武力奪取中國領土，甚至威嚇到英國在印度、馬來亞和澳洲的統治權，事實上是不會有的。日本勢力在太平洋進一步的飛躍，要使英國感覺到連牠在太平洋的殖民地，都要完全失去了保障。何況日本對牠所提出的條件已經分明超過牠能夠退讓的限度呢？

美國終究要向太平洋西進，是誰都不能否認的。牠目下之所以不會積極西進，顯然是爲着軍備還沒有十分把握；然而，牠的軍備之所以沒有把握，顯然是因爲除了對日之外，還要對英。只要英國能和牠密切合作以制日，牠的軍備也許已經沒有問題了，所以，只要英國決計聯美以制日，美國的西進政策是可能迅速積極化的。

然而，依然因爲帝國主義間「爾詐我虞」的心理，英美合作問題是要經過相當的折衝的。假如英國還沒有給美國以切實的保證，而美國就大吹大擂「英美合作制日」的政策，也許英國就利用這種空氣向日本作最後討價還價的張本，使日本因感到威嚇而就牠的範圍；於是，美國的一團高興，反而恰好使英日得着最後的結合；這在聰明的美國人，是不會隨便上當的。

顯然的，英美間的合作是在進行着。美國對於制裁意大利方面，已經給英國以很大的幫忙。而最

近美國放棄大西洋方面的航空線，讓給英國，同時把香港的飛機場讓給美國，使美國得以很迅速的完成橫渡太平洋的航空線，尤其值得注意；這決不是單純的商務關係，而含有重大的軍事性質。再加以南洋英國軍艦西調後由美國軍艦填防的消息，使我們相信，英美平分大西洋和太平洋霸權的談判，至少已經得着初步的成功。

第三，是英國對華態度的轉變。不管英國外交官是如何的聲辯，中國的幣制改革，顯然是得着英國的極大幫忙。聲辯自然是必要的，因為英國的用意，還不過是給日本一個威嚇，使牠能夠就範，而決不願輕於引起日本的對華軍事行動。同時，關於中國加入英鎊集團這一件事，還要引起美國的不快，那能不加聲辯呢？

中國幣制的改革，自然有牠的內部的原因；但是，這樣的一個可認為有準備戰爭意味的幣制改革，而沒有經過這以東亞主人自命的日本的同意，不能不說是對於日本的一個威嚇。自然，這個威嚇的結果，究竟受益者是中國還是英國，甚至會不會要被英國利用起來，作為英日最後妥協的一個動力，而中國反變成一個犧牲者，那都是以後的問題了。

*

*

*

*

*

*

上面所說英國對日的三方面的對策，自然都是有限度的。比方，假如反蘇聯戰爭爆發，日本積極向蘇聯進攻，第一方面的英國對蘇聯態度，便會立刻重新改變。其次，假如美國的外交手腕運用得好，促成英日的最後結合，第二方面的英國對美態度自然也要重新改變。又其次，假如中國當局最近經過幣制改革給與日本的威嚇轉使日本對英讓步而取得英日的妥洽，第三方面的英國對華態度，也要再度變更。

自然，我們不能很機械的估計，半殖民地國家不可能向某一個帝國主義作抵抗的戰爭。阿比西尼亞在英國勢力的扶持之下，也居然會向意大利宣戰呢。——自然，這種戰爭不能變成一個真正的民族革命戰爭，那是另一個問題。不過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喚起半殖民地人民的抗爭情緒，畢竟是失算的。比方，假如阿比西尼亞真個戰勝意大利，那獅吼般的民族革命情緒，就很可能的進一步，擺脫英法所加於他們的桎梏。人民用血換來的勝利，還肯安然讓別人坐享其成嗎？尤其最近埃及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會使英國深深的覺到殖民地人民「囂張之風」是斷不可長的——阿比西尼亞人民的抗敵情緒，已經傳染給埃及人民了。

因此，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人民的態度，最好是不要使他們有反抗的戰爭——最巧妙的方法，

是利用這種戰爭的空氣，取得帝國主義間的妥洽，自己從中可以得着更大的利益。假如半殖民地人民的鬥爭情緒太高了，或者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一時已經超過可以調和的限度了，那末，其次的方案，是在戰爭之後，抓取時機，重新成立帝國主義間的妥洽，以共同壓迫這種民族抗爭的情緒，同時平分那塊地方的利益。英國對華政策的前途，恐怕也逃不出上述的範疇吧？

* * * * *

目下傳說紛紜的華北事件，內裏就包含着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中間尖銳化的矛盾，而外面却籠罩着國際形勢轉變的形式，中間還夾雜着漢奸和代理人們的活動。這多方面的矛盾所產生出來的現象，自然就會令人目迷五色了。

在這種局勢之下，中國民族應該如何爭取解放呢？

用威嚇的姿勢取得不戰而勝的便宜，那是只有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可能搬演的把戲；半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抗爭，是萬萬不能有這樣投機的夢想的。半殖民地對於帝國主義的威嚇，少不了的要有真實的內容——民衆的革命力量。沒有民衆革命力量做內容的威嚇姿勢，在本質上就只有給別人利用，而不可能自己來運用；那所得的結果，軟化的話固然是進一步的殖民地化，強硬起來也不

過做別人的傀儡——即使能發動一個「神聖戰爭」，還免不了中途被別人出賣！

軍需繁榮遮掩下的日本，內部蘊藏着一觸即發的革命危險和積重難返的赤字財政，大陸政策已經成了騎虎之勢；在這牠所認為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當中，決計不是威嚇的姿勢所能壓倒的。同時，中國民族要求解放，也是沒有人能夠反對的。中國在不平等條約重重束縛之下，國民經濟只有破滅，而決談不到建設。事實就擺在我們的前面。這超過半殖民地國家威力的管理貨幣，實行以後所給與我們的教訓是什麼呢？牠告訴我們：中國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取得這種幣制改革的成功，否則便要因為幣制改革招致更大的損失。假如在這敵人鐵蹄肆意蹂躪我們的領土的時候，還有人高談國家主權，那真是自欺欺人了！中國人民在這意阿戰爭的刺激之下，是這種「畫餅充飢」的口惠，所能滿足的嗎？

中國民族革命的力量，只有民衆。我們固然也應該適當的運用國際形勢，然而不是極有限度的。倘使超過了這個限度，而成爲依賴外力的舊套，結果便只有做國際形勢激變中的犧牲者。

中國民族革命的方式，只有拿血和鐵和敵人作殊死戰。我們固然也要運用適宜的經濟和外交政策，然而也是極有限度的。過分提高了這種政策的估量，那是只圖享樂苟安的少數人消滅革命的

策略，我們是千萬不能上他們的當的。

二四・一二・一 世界知識

研究現階段中日問題的任務

四年六個月間血的教訓，顯然已經使中國人民心目中的中日問題，開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當中，中國人民除了極少數甘心賣國的最無恥的漢奸以外，大家都有了新的認識和新的覺悟。

要使敵人「得寸進尺」，只有一開始就不給他一寸，或者使他要費一尺的代價搶奪我們的一寸；這是目下中國人民一致的認識。少數人們所謂「壯士斷腕」，用放棄一寸以期保存有一尺的政策，早已經給事實打的粉碎了！

由墳墓裏抬出來馬爾塞斯的人口論，用「人口過剩」的大題目，替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做辯護；這是經濟學上的漢奸理論。在這種理論之下，日本帝國主義可以主張，爲了日本人民天賦的生存權利，牠有侵略中國的天經地義了！

事實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日本的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衰老階段中無法解救的生產過剩問題，而絕對不是人口過剩問題。日本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連米的生產都是過剩的呢！如果一個國家

是生產過剩甚至連糧食都生產過剩牠就決計沒有理由嚷什麼人口過剩。日本人民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唯一的方法是改造他們的社會制度，消滅國內的榨取階層，拿生產過剩的商品分配給消費不足的大衆，而決不是對外的侵略。在對外侵略的過程當中，日本的勞苦大衆，要被驅策到戰場上去，犧牲了自己的血肉和生命，而所得的結果，只有穩定了榨取階層的基礎，延長了自己的被榨取和飢餓生活，永遠也不會得着解放！且看，在日俄戰爭中衝鋒陷陣的勇士，有幾個人能受到一等強國的好處呢？這種意義，在經過了四年六個月的軍事侵略，而依然在飢餓線上掙扎着的日本人民，也應該是要看得很明白了吧？

中日兩民族應該共存共榮嗎？是的，豈但是中日兩民族，世界上一切的民族，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之下，都應該而且可能共存共榮。然而，所謂共存共榮，決不是日本的少數人得了暴利，日本的大多數人依然是做牛馬，而中國的大多數人再做牛馬的牛馬方式，而必然要出之以平等互助的方式。中國人固然不願意在牛馬的牛馬生活之下求存，同時也不願意日本人在牛馬的生活之下求存。

但是，日本軍閥是正在運用屠殺的威脅，利用共存共榮的美名，驅使中國人做進攻蘇聯最前線的炮灰，同時驅使日本勞苦大衆做第二線的炮灰。別一方面，日本的資本家是正在用傾銷的方式促

成中國農村的破產；在破產的農民不期然而自然的集中到都市裏去了之後，再在都市裏設立工廠，招收破產的農民給他們一個非人的生活，再來榨取他們。這種種的共存共榮，我們決不敢領情，我們決然要反抗。

要之，人吃人的制度一天不消滅，中日兩國的共存共榮是談不到的。在現狀之下可能的共存共榮，是日本的榨取階層和中國漢奸的共存共榮，是前者榨取了中國人民的膏血而後者分潤一些餘瀝的共存共榮！讓漢奸們高談「敵乎友乎？」中國人民早已經看清誰是敵和誰是友，覺悟的日本人民也已經看清誰是敵和誰是友。中國人民可以而且應該和日本人民做朋友，然而對於日本榨取階層中的帝國主義者，不能不認為是無可消釋的仇敵——勾結帝國主義的漢奸，無疑的也是無可消釋的仇敵。日本人民的仇敵，也正是他們國內榨取階層中的帝國主義者，而且也正是維護帝國主義者的中國漢奸。這樣，日本人民應該是和中國人民處在「敵愾同仇」的同一陣線，合力向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漢奸攻擊。中日兩國的人民，就應該在這樣的一個聯合戰線之下，用鬥爭的力量去培養將來共存共榮的基礎。我想，法西斯的勢力壓迫下的日本人民，和帝國主義及漢奸勢力壓迫下的中國人民一樣，必然是同樣的有這種感想的。時候到了，兩國人民要隔海互相呼應的怒吼起來，解脫他們

的共同鎖鏈！共同創造新的社會！

* * * * *

中日問題的新階段到來了！當前的研究中日問題者，不必再費辭去研究「和與戰」的問題，更不必費去研究「敵與友」的問題，而應該是集中精力去研究「怎樣戰」以至「怎樣聯合友軍，消滅敵人」的問題。當然，我們對於日本對華基本政策，及其國際背景等等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目前第一步的工作，是估計自己的實力。在估計自己的實力的時候，主要的便是研究如何團結自己的實力問題。在這裏，我要大聲疾呼的告訴全國人民：在這民族歷史都要被斬絕的時候，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保存民族的歷史，而不是保存任何黨派以至任何個人的歷史；在這國家生命要被殺害的時候，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保存國家生命，而不是保存任何黨派以至任何個人的政權。倘使同在敵人的刀口底下，還有人要回憶到過去的歷史，顧慮到將來的政權，那就要變成自私自利的愚夫！在這一剎那間，我們除了團結大家的力量，踢開敵人的刀口以外，還應別存妄想嗎？

古今中外的歷史，只有在對外抗爭中團結內部，以達安定國家的先例，而沒有對外退讓，致力內爭，以達團結自救的先例。非攘外無以安內，已經成爲歷史的公律，是不可能隨意推翻的。我希望中國

的政治人物，能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下了「昨死今生」的決心，重定國策。倘使那樣，他們的偉大，是會感動每一個國民，而永遠的留在歷史上的。

只要全中國能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之下團結起來，日本帝國主義便永遠不可能滅亡我們。現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在市場的奪取；所以，牠最怕的是被侵略國人民的團結反抗，因為那樣，便要使牠無法經營貿易，以維持牠所奪取的市場。牠最有利的方方式，是被侵略者的自相殘殺，讓牠可以坐收漁人之利，而不至遇到抵抗。帝國主義過去經營殖民地，一貫的是用策動甲酋長和乙酋長火拼的方方式；日本「以華滅華」的政策便是這一套。我們如果能團結一致，牠的毒計就不行了。

我們在團結一致免除自身的消耗的前提下，可以估計一下我們的人力了。我們應該拿中國的人口及文化水準，和過去對英國頑抗的南非洲波爾人，對法國頑抗的摩洛哥人，以及目下對意大利頑抗的阿比西尼亞人，比較一下。說到耐苦力量 and 勇氣嗎？淞滬之戰已經證明中國人民決不比別人弱。

自然，除此以外，我們的武裝力量，我們的財政，金融力量，我們的糧食問題和一般生產問題，我們的交通設備……都應該有精密的估計。這裏我要提出一個概念，就是：中國的財政金融，以及經濟的

各部門，都已經到了非用戰時設施不能支持，非戰爭不能解決的階段。詳細的說明，且待其他的作者。

* * * * *

第二步，我們更得計劃我們友軍的力量。在現今的時代，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少不了要和國際形勢配合起來——我們應該聯合國際的友軍。

「勿爲仇者所快，而爲親厚者所痛，」不但立身應該如此，立國尤其應該如此。前月北平京津日日新聞，刊載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永見俊德對日記者發表的生平最大難忘事件一篇談話，大體是說：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軍到達武漢，有席捲長江下游及西北各省的形勢。此時國共如不分家，則全中國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將遭覆滅，而日本爲尤甚。因此，當時的日本陸相宇垣焦急萬狀，就派永見和松室兩大佐作破壞中國革命的企圖。後永見不幸被捕，幾處死，以津日當局營救得釋。昨爲永見被捕十週年紀念，他縱談往事，頗引以自傲。」

我不知道參加過革命的人們，看見了仇人這樣興高采烈的慶功，革命失敗後國家的危殆，應該是何感想！我們對於親日派官僚，因爲「青年思想左傾」就不惜勾結敵人，以對內的政策，又作何感想！

爲民族的前途打算，我們的外交政策，逃不出是「利用一切國際的矛盾，接受一切國際的援助。」但是，要很正確的運用這原則，我們依然得認清誰是敵和誰是友。本來，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聯合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是任何現代革命勢力覓取友軍的原則。中國近十年間的教訓，更是每一個有心肝，有知識的人所不會忘記的。我們比較比較東四省和外蒙古的情形吧：前者是漢奸部隊在敵人的指揮之下，進一步的攻略華北，察哈爾和綏遠，後者却始終是埋頭內部建設，和從前動不動想內侵的情形都完全兩樣；前者是敵人在隨意屠殺我們的人民，掠奪我們的財產，而後者是人民生活一天一天的改善，知識一天一天的提高，目下正在發揮他們的巨力，抵抗敵人的侵略。我們再觀察觀察新疆的情形吧：到現在爲止，敵人還沒有能夠在那邊建立「偽回國」，是誰的幫忙呢？「敵乎友乎？」我們還沒有認識清楚嗎？

在中日的戰爭中間，英美法各國，是可能給與我們以援助的，然而是有有限度的——他們不願中國能戰勝日本，損失了整個帝國主義的威望。只要日本能由獨占中國退讓到瓜分中國——當然瓜分時日本要占最大的份頭，牠們就馬上可以和日本妥洽而來共同壓迫中國。我們必然聯合蘇聯然後到那時能和牠們對抗一下；而且，也許就因爲我們可以得到蘇聯的實力援助，牠們倒始終不敢壓

迫我們。

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那個力量是更偉大了！國聯能夠對意大利制裁，法國能和蘇聯攜手除了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力量以外，便是他們的力量。美國碼頭工人居然拒裝運意大利的商品，不是一個好例子嗎？日本覺悟分子對我們的同情，尤其有力量。中國人勾通日本帝國主義者，那是最無恥的漢奸，要不齒於全世界的人類；而日本的覺悟分子援助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卻是歷史上頂頂光榮的革命者，是全世界崇拜的英雄。這中間的順逆關係，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我們能從帝國主義的矛盾中間得着幾許的援助，能從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如蘇聯土耳其等——取得幾許的援助，能從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取得幾許的援助，特別是能從日本國內的覺悟分子取得幾許的援助；我們都得給他們一個正確的估量。

* * * * *

第三步，我們便得估計敵人的力量。我們自然開始就得計算牠的海、陸、空軍力，估計牠在對英美要設防，對蘇聯準備進攻的國防政策之下，究竟還能夠分出幾許的力量來對付中國。

我們更要估計牠在四年六個月的非常時期當中，財政已經弄到山窮水盡；一旦戰爭開始，財政

能支持幾個月，還有日本的經濟基礎可以說是建築在輸出貿易上面；而一九三五年的輸出，中國要占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連年來的情形，可說是日本用貿易手段，榨取中國人民的汗血，再拿榨取所得的，作為對華侵略的補助。一旦戰爭開始了，牠這一面如意算盤，勢必受着重大的打擊。這種打擊的成分，也要加以估計的。

在中日戰爭當中，國際要加日本以制裁，可說是必然的。即使國聯不能那樣做，我相信各國在大衆對中國的同情之下，會自動的來做。只要有許多國家能一面抵制日貨，一面停止供給日本以軍用品，那種壓力就十分重大，而可以使日本在短時期中崩潰。這種可能性究竟有幾許，我們也得估計。

日本國內的革命力量，可能不可能在那時候發動起來？我想，至少，他們會想法使戰爭縮短吧？這種可能性，我們也得估計的。

時候到了！我們一面研究，一面便要實做。自然，爲了實做，我們更得研究；而在實做當中，我們可以作更切實的研究。

請大家緊緊的把握住這中日問題的一個新階段吧！

遠東形勢的蠡測

對於日蘇關係，我們應該認識：進攻蘇聯是日本的義務，而不是牠單獨的義務——這是帝國主義的共同義務。不可少的，日本要在歐洲方面的反蘇聯戰爭可能同時爆發的條件之下，然後才肯起來分擔牠一分子的義務。然而，這個條件，是不容易完成的，以目下蘇聯的強大，日本即使願意傾覆蘇聯，然而決不敢單獨進攻蘇聯。

反之，併吞中國却是日本的「權利」；而這個權利，牠認為是可能單獨的攘奪的。日本為要緩和牠的經濟恐慌，為要緩和少壯軍人的盲動，最便宜的方法，是一步又一步的向中國侵略。倘使牠捨棄了這便宜買賣不做，而冒了大險去進攻西比利亞，即使勝利了，也依然無補於牠的經濟恐慌。

因此，依我的觀察，日本雖然已經向帝國主義國際告奮勇，以東亞反共的主力軍自任，但是牠刀鋒所指，依然是在中國。牠在排除反「日」共同防共的口號之下，便可以出兵占領中國任何的地點——因為反日運動已經滿布全國了！

自然，我並不是說：日本決計不願而且不會進攻蘇聯。只要歐洲方面德國波蘭和芬蘭，在英國的

指導之下一致進攻蘇聯，日本是立刻會參加的。不過，因為歐洲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尖銳，這個聯合戰線一時不容易完成罷了。

萬一日蘇開火，我們應該取怎樣的態度呢？

我以為我們的國際政策，應該是：利用一切國際的矛盾，然而不能作國際矛盾的犧牲品；接受一切國際的援助，然而不能認賊作父。

在過去，我們顯然已經做了國際矛盾的犧牲品；帝國主義要用中國領土主權的犧牲，促成日本對蘇聯的進攻。中國有一小部份的人，也居然主張中國不妨先放棄領土主權，在促成日蘇戰爭之後再圖恢復。然而，日本太狡猾了！中國東北三省在英國勸導之下送給牠了，牠不會進攻蘇聯；不久，熱河又送給牠了，牠還是不進攻蘇聯；目下，冀察二省差不多又在牠的控制之下了，牠依然不進攻蘇聯；牠只是不斷的製造國境的糾紛，犧牲了少數步哨作國際上的宣傳，而不會攻占蘇聯領土的一寸；然而中國却在日蹙百里的狀態之下，危亡在旦夕之間了！

為自己民族打算，中國萬不該有這樣以國事為兒戲的投機政策；要呢，除非中國真和蘇聯有不能共戴天的仇怨。站在人民的立場，為民族解放前途着想，我們大家都認定××帝國主義是我們最大

的敵人，而蘇聯却顯然是我們反帝鬥爭中的友軍。但是，少數別具心肝的人，却依然認蘇聯是中國最大的永久的敵人，而日本倒是次要的一時的敵人。他們是私利迷蓋了良心，私怨重過了公義，但是我們得明白，這種人只有極少數，他們絕對不能代表中國民族。

最近，又有人借蘇蒙互助協定的題目，在那裏高喊赤色帝國主義了！他們企圖用這種空氣移轉人民的目光，使大家不再注意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我們做人民的看來，對於蘇蒙互助協定的抗議，外交官不妨有此形式，輿論界却不應該張大其辭。帝國主義的稱呼是要有侵略的事實來決定的，不是少數人的愛憎可能武斷的。倘使認一切外國都是帝國主義，那便是把義和團的意識應用在現時代，是要不得的。從外蒙在近十數年來絕未派兵內侵的事實，從外蒙人民生活和文化水準提高的事實，我們可以證明目下的外蒙，已經和帝俄時代甘作傀儡的外蒙絕對不同，事實上，外蒙牠已經先我們而取得民族的解放了。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殖民地，尤其在經濟總危機的現階段當中的殖民地，是不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水準的。從外蒙人民抵抗日僞軍的力量，從牠不會放棄尺寸領土的事實，我們看了更一面是慚愧，一面却很明白，外蒙依然是我們抗日陣線中很有力的一環。如果我們不願意外蒙變為偽滿第二，或者變成東蒙第二，如果我們不願意外蒙的軍隊和偽滿的軍隊一

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驅策之下來攻擊我們，我們便沒有理由反對蘇蒙互助協定。在政府沒有力量捍衛外蒙領土主權的時候，我們對於外蒙當局在平等互助的原則之下接授隣邦善意援助的應變處置，是無可非議的。

我們在這時候，最合理的主張，是從速訂立一個更廣大的中蘇互助協定，去代替這局部的蘇蒙互助協定。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很堅強的中蘇聯合戰線，再和近東四小國的反侵略陣線連繫起來，造成一個很偉大的反帝反戰線。

第三編 抗敵救亡

今日之馮玉祥

在七月二十日的報紙上，我們同時看到了兩條新聞：（一）日偽軍二萬人集熱邊，擬反攻多倫沽源；（二）北平派赴接防之龐炳勳及其他軍隊，向察緊逼，平綏線斷阻。這樣顯然的，馮玉祥是在夾攻之下了！

平方和馮玉祥談判最後的決裂，是因為馮氏要求平方電覆「抗日爲中央之整個計劃」和宋哲元回察。而覆電問題，似乎是一個焦點。「中央對於抗日，自有整個計劃」本來是幾月以前要人們的口頭禪。自從華北協定簽字後，這個口頭禪早已經在「心照不宣」的狀態之下撤銷了。同時，我們還記得去年某要人和張學良反臉的時候，通電痛罵張因爲不抵抗而失地。而目下呢，他自己爲察事發表談話，竟歸納出來「抵抗則失地愈多」的結論。這樣，也許他現在也在佩服張學良有先見之明了——張學良是應該趕快回來爲國宣勞！要人們得了新的「覺悟」變更了他們的政策，爲了「保持威信」起見，既不好向老百姓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一般的老百姓又不善於做「考據工作」，就要覺得「無所適從」。甚至連馮玉祥，他是中央委員，多少和政治有關係的，也要提出這樣不合時宜

的要求！中國人實在是太愚蠢了！

東北四省和河北半省的淪陷，不妨以容忍求解決。一個察哈爾，馮玉祥一樹幟，便須派兵前往。這是什麼道理？在熱河失守的時候，也曾有人惋惜過去內戰中西北軍精銳的喪失，使國家失去可用的勁旅，因此詛咒到「勇於內爭」的人們。現在呢，勇於內爭的人們依然還有「餘勇可賈」！李際春可以授官，郝鵬可以釋放，馮玉祥卻未可加以原宥！

有人說：目下的北平當局，內有東交民巷裏日軍的控制，外有溥東西偽軍的脅逼，耀武揚威的向馮玉祥大張撻伐，活像是在火山旁邊跳舞。這話，從正面看來似乎很對，從反面看來卻不然，是使一個人變成火山的動物，和火山做了朋友了，他還怕什麼？東北的漢奸，在別人看來，不也是一樣的在火山旁邊跳舞嗎？他們自己卻覺得火山是「靠山」呢。在過去的幾個星期中間，我們還看見馮玉祥軍隊向多倫出發的消息，甚至北平來電馮玉祥的傷兵運到北平。現在呢，一切的真相都看不到了——說馮玉祥未折一兵而得多倫。此外，甚至常常還有馮玉祥投日的消息！明眼人自然了然於中，一般人卻莫明其妙了。

馮玉祥在今日，是以收集兩河豪傑努力抗金的岳飛自命的。倘使真如某方面所傳出的消息，轉

而投日，岳飛變秦檜，豈非滑天下之大稽！但在事實上，究竟什麼人是今之秦檜，天下人自然曉得！

古之秦檜之「飲恨終身。」我們記得一句舊滑稽話：「一縷幽魂，化作闕黨童子。」秦檜之幽魂，在今日化作什麼人呢？

馮玉祥，總是一個犧牲者。他較之得高官厚祿而自說是犧牲的人，所犧牲的雖不同，而為犧牲的則一。我的意見是，犧牲了別的不要緊，然而千萬不可犧牲了人格！

現代的慈禧太后

讀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在日本戰後，和議告成時，清廷有下面的一道上諭：

「近自和約定議，廷臣交章論奏，謂地不可棄，費不可償，仍行廢約決戰，以冀維繫人心，支撐危局。其言固出於忠憤，而於朕辦理此事熟籌審處，萬不獲已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歲倉猝開釁，徵兵調餉，不遺餘力，而將非宿選，兵非素練，紛紛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無一勝。近日關內外事情更迫，北則近逼遼瀋，南則直犯畿疆，皆意中事。瀋陽爲陵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况二十年來，慈闈頤養，備極尊崇，設使徒御有驚，藐躬何堪自問？加以天心示警，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衝沒，戰守更難措手。是用宵旰旁皇，臨朝痛哭，將一和一戰，兩害兼權，而後幡然定計。其萬分爲難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詳，而天下臣民，皆爲共諒者也。茲批准定約，特將先後辦理緣由，明白宣示。嗣後我君臣上下，惟期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實力研求，亟求興革。毋萌懈怠，毋務虛名，毋忽遠圖，毋沿積習，務宜事事覈實，力戒具文，以收自強之效。於內外諸臣，實有厚望焉。欽此。」

這一篇文章，倘使我們把旁邊加黑點的句子，加以下述的竄改，儼然是目下負責當局的口吻。

「近日華南北事情更迫，北則略取平津，南則直犯滬寧，皆意中事。北平為文化中心，上海為財政金融命脈……水旱為災，農村經濟，淪於破產……」

然而，歷史到底不是兜圈子的：目下的慈禧太后，可不是那時所謂的「慈闈」了。那時的慈禧太后祇有一位，目下卻有幾千幾萬位。那時的慈禧太后是女性的，目下却是男女性都有。凡是目下在租界裏面住洋房，坐汽車，錦衣玉食的，都是我們的「頤養備極尊崇」的慈禧太后。上面那篇上諭雖然提出許多理由，然而頂頂主要的理由，就是「不要使慈禧太后受苦。」這背後自然還蘊伏着一種意義：「朕自己也不願意受苦。」你想，那時祇有一位慈禧太后，已經要中國向日本屈服，目下有這麼幾千幾萬位的慈禧太后，中國那能不向日本投降？

目下，日本的說客野田文一郎已經勸告我們，不要「故違天意」，還是乖乖的早點投降；中國的士大夫們——現代慈禧太后的一份子——也在那裏贊美日本天皇的德政，勸中國人趕快投降。所以，在這樣的內應外合的攻擊之下，上面的一篇上諭，不久恐怕是要竄改重新發表的。

疑問的是：那時的清廷已經要在乞和之後「實力研求，亟求興革」，以圖民族的中興，然而結果怎樣？以後，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也教大家臥薪嘗膽，圖雪國恥，然而結果怎樣？目下，一面妥洽空氣十

分濃厚的當兒，臥薪嘗膽，以圖民族中興的空氣，又在那裏高唱入雲了！這一次的結果，又是怎樣呢？

甲午乞和之後，總算過了幾十年，清庭才被推翻——甲午之役，當然是被推翻的一個遠因。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不出一年就傾覆了。「殷鑑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國難芻言

有人說：我們應該茹恥含垢，效勾踐之沼吳。我說：我們可以效勾踐的臥薪嘗膽，然而不能效勾踐的嘗糞。吳越之爭，是諸侯封土之爭——可說和幾年以前齊變元和盧永祥的戰爭差不多——是和人民不相干的。因為和人民不相干，所以勾踐着夫差嘗糞，也和人民不相干。只要勾踐能博得夫差的歡心，放他回去再度治理越國，人民也無所不可。目下中日之爭，那意義可就大大的不同。即使有人不承認這是中國民族反帝的鬥爭，然而總不能不承認這是民族間的鬥爭吧？民族間的鬥爭，人民決計不能容許他們的領袖去嘗糞。反過來說：嘗糞的領袖，自然會因為威信的掃地而為人民所不齒。從事實上說，目下在那裏高倡臥薪嘗膽的人，誰不是在都會裏的大公館之外，再在租界裏安置一個安樂窩？臥薪嘗膽的內容，恐怕逃不了是「錦繡梁肉」；而對外「茹恥含垢」也不過是為對內「秣馬礪兵」的地步罷了！這，自從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就是如此這般，目下更難例外！

有人說：明之亡是由於袁崇煥妥洽政策之不行。然而，一般人的評論，總覺得還是由於清議的摧殘，和將吏的首鼠兩端。清議的摧殘使民氣——民族的廉恥——消沉；而首鼠兩端的政策，卻根本使

人心因惶惑動搖而渙散！過去的對日妥洽，表面上是要保持一個所謂文化城，實際上不過保持少數人的財產；而所失者是整個的民氣——民族的鬥爭情緒。計算起來恐怕是得不償失。而消息傳來，察哈爾又告緊急了！協定的保障到底在那裏？倘使一切公法約章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眼中都是廢紙，我真不相信塘沽協定會發生出什麼力量來！過去的所謂「安定人心」除了維持一個暢銷日貨的市場之外，還有什麼？目下的所謂「振作人心」更使我們莫明其妙。

目下，所謂接收長城各口，日本所主張的某處某處應屬「偽國」；這不啻是一個劃界交涉！他們說起來，總是長城不設關，財政上有如何的損失，關內外不通車，鐵路上有如何的損失。是的，利害固然應該估計，廉恥還要不要呢？他們說：一個女兒給強盜強奸，不能就此把她屏諸門外。現在，他們是率性把這個被奸的女兒送給強盜做小星了！

古人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目下是北隅未收，東隅又失。華北依然還是日人控制的華北，而東南卻起了變化了！對外有進一步的妥洽，內部就有進一步的崩潰；這是擺在我們前面的一個很確實的方程式！有人說：我們只消保持長江幾省的腹地，面積依然還不小。他卻沒有知道民族是整個的，一隻牛的分量固然是等於四隻羊，然而，支解了之後的四分之一的牛，卻不能像羊一樣的可以生存！戰而

敗，是不妨的。甚至戰敗而失地，也是歷史上所恆有。然而有一個條件，就是必然在筋疲力竭無以為戰之後。那時，表面上雖然割了地，人民所受的刺激和應有的諒解，仍然會使他們團結一致，整個的民族依然沒有分割。倘使不戰而失地，借內爭以規避其對外之責，而又以偏安一隅自滿，甚至同時還教人民也自滿，那結果，恐怕只有身敗名裂！

國難四週告國人

有人告訴我：今年的「九一八」言論界鴉雀無聲，像是忘記了；大概，中國人心已經死了，所謂民氣，已經完全銷沉了！

這話我不敢相信。因爲，目下的言論界那裏還配稱言論界呢！牠不是人民的喉舌，而不過是少數人的傳聲筒——這是一羣懦怯不堪的綿羊，在敵人的利刃之下所發的一些可恥的殘喘！

你試試看去找任何一個純潔的青年談話，他們沒有一個不比四年以前還要痛心疾首；你試試看去徵求任何一個平民的意見，他們沒有一個不比四年以前還要氣憤填胸。這是真正的民氣，這是真正的人心。倘使我們要認無恥的官僚和怯弱的士大夫們的意見是民意，認目下強力製造出來的輿論代表人心，那就自然只好悲觀了！

我現在用十二萬分的熱誠，告訴我們的青年下面三件事：

一、勿動搖——賣國賊在那裏趾高氣揚威風凜凜，我們不必羨慕。像鄭孝胥、趙欣伯一流人物，即使富貴尊榮，能免得了遺臭萬年嗎？將來還不會鑄鐵像給我們看嗎？就在目前，他們那種受敵人奚落，

監視，受萬人臭罵的生活，內心的痛苦真也不知多少哩！這值得我們羨慕嗎？現在，固然也有少數無恥的文妖，替秦檜、魏忠賢歌功頌德。但是你們很明白，那是完全枉費心；沒有人會受他們的欺騙的。歷史上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的人，沒有一個不成萬世的罪人的！尤其，在目下，人民是那樣的覺悟，青年是那樣的進步，賣國賊們受人民的裁判，真不過是時間問題。所以你們要咬緊牙關，堅持到底，勝利一定是你們的。

二、勿懦怯——有些人心裏十分明白，但是胆子很小，恐怕有禍水，因此便噤若寒蟬。其實呢，就講法律吧，目下也還沒有公然訂立出來愛國罪；我們站在民族的立場說幾句話，甚至做一些拯救民族危亡的工作，何必畏首畏尾呢？假如說真個有天上掉下來的禍患，那本來是防不勝防的；我們要做人也只可置之度外了。

三、勿悲觀——有些人只見表面的沉寂，就認人心已死；有些人不懂得民族解放，需要長時期的奮鬥，因為過去幾次革命失敗，就覺得灰心；因此，便有中國必亡的謬論。這，我想腦子清楚一點的人和認識實際情形的人，是不會盲從的。還有人以為目下的物質力量太大了，敵人的新武器能消滅我們的羣衆，敵人的金錢可以收買我們的羣衆，因此，認為我們的前途沒有希望。其實呢，歷史上許多革命

戰爭，都已經證明：羣衆的力量可以使敵人的槍口轉換方向。物質的力量，我們應該承認；不過這種物質力量，我們是可以另外一種方式創造的，而且可以取別人的爲己用的。只有這樣，歷史上的殖民地解放和種種革命功業，才能完成。

青年們！增強你們的信仰，發揮你們的力量，外抗強敵，內除漢奸！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國慶日

目下中國人對於國慶日，有極端樂觀和極端悲觀的兩種派別。

極端樂觀的，是憑藉革命做了大官，發了橫財的人們；他們想到了雙十節，不能不爲自己的幸福，而慶祝牠一下。固然，國事是愈來愈糟了，但是「混水裏撈魚」，軍閥，官僚們的荷包只有一天一天的飽滿起來。即使真個亡了國，他們或者依然可以在國內做富翁，或者可以到外國去做闊老。他們那得而不樂觀呢？

和他們心心相印的，還有國賊，漢奸之流，那當中，公然做國賊，漢奸的，是希望中華民國滅亡；所以我們的國事愈糟，他們的希望愈大。有一天國慶日，取消了，或者改了日子了，就是他們的成功。他們對於這搖搖欲墜的國慶日，自然是抱着無限的樂觀。此外，偷偷摸摸還未公開做國賊，漢奸的，他們脚踏兩邊船；中國不亡，他們依然是「大好老」。中國亡了，他們是「先知先覺」，是「識時務的俊傑」；雖然他們也同處于亡國奴之列，然而也是亡國奴中的「頭腦」，依然是「大好老」。且看，目下有些無恥的士大夫們，洋大人稱他們一聲「高等華人」，便志得意滿，搖尾不迭。「奴才頭腦」還不是他們所得

而甘心的嗎

抱極端悲觀的人自然是很多。他們覺得這二十四個年頭中間，幾乎無年不在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交迫之中。國家的收入，差不多半數用在軍費上面；但是，養了二百萬名的兵，外不足禦侮，內不能救災，而只是循環不絕的內戰；殺戮的敵人，到現在還是寥寥可數，而殺戮的中國人，却已經是幾十次甚至幾百次的遺屍遍野，白骨成山！幾次革命所賜與人民的，只是屠殺、兵差、饑餓、和恐慌！純潔的青年，優秀的知識分子，抱着一腔的熱血，想為民族解放努力；而結果呢，往往是犯了革命罪，有的幽禁在牢獄裏，有的甚至身首異處！還有些人起初拼命鼓動青年革命，而一轉變間，他自己就成了屠殺革命青年的兇子手；革命變成了青年的陷阱！還有，為民族革命在冰天雪地中苦鬥的東北義勇軍，像孫永清、滿洲、偽國說他們是匪，無心肝的報紙也大書特書的說他們是匪！是非不明，黑白顛倒，恐怕比明末魏忠賢當國的時代，要有過之而無不及！「革命！革命！只是革了老百姓的命！」多革了一次的命，人民只是多遭了一次的殃；弄得日下國力日衰，國運日厄，國土日削！他們對於這紀念革命的國慶日，自然就只好悲觀了！

自然，我們不能跟着軍閥、官僚、國賊、漢奸們，那樣極端樂觀的紀念國慶日，然而也不能極端悲觀

的紀念國慶日。我們對於國慶日的觀感，並不是「哭笑皆非」，而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的，是民族解放的曙光，已經在我們的前面，民族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充分完成，我們將要取得最後的勝利，已經是有確實把握的一件事。所懼的，是敵人的勢力，要跟着中國民族要求解放潮流的高漲而高漲；尤其，在這帝國主義總崩潰的前夕，牠們和牠們的代理人最後掙扎的力量，是不能輕視的。倘使中國民族革命主觀的力量，不能迎頭趕上去的堅強化起來，那末，革命的再度一時失敗，使中國一時的完全殖民地化，也是可能的。固然，歷史上的勝利，終究是我們的。然而要明白：歷史上的「一剎那間，人世也許就已經是隔世。那樣，革命者不能親見革命的完成，關係猶小；而中國民族要多受一個時期的磨難，却是關係重大！

悲觀的人們之所以悲觀，是恐怕革命變成走馬燈式的循環，而永無豁然開朗之一日。但是，事實所告訴我們的，幾次革命的結果，人民的生活雖然是格外痛苦，而人民的政治水準和革命情緒，却已經空前的提高；就在這上面，我們可以認識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還得認識：人民痛苦之所以加深，不是革命的罪惡，而是革命不徹底以至于失敗的自然結果。過去革命的失敗，這是一般人都承認的——恐怕，只有「以革命起家」的軍閥官僚，才會說中國革命已經成功。革命之所以失敗，主要的

原因自然是敵人的破壞；而身處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的退縮和人民情緒的不堅定，當然也要負重要的責任。生了毒癩的人，已經發了狠讓醫生開刀，却不能再忍點痛讓醫生擠毒，甚至於求醫生趕快給他收口，結果自然要癩毒蘊積，而要受第二次更痛苦的手術。革命而不能澈底，必然成爲革命的失敗，而要變成第二次更痛苦的革命的因素，正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紀念雙十節，是紀念中國民族革命的開始，而不是紀念革命的成功。是慶祝中國人民在革命過程中意識的提高，而不是慶祝目下的人民生活狀況——目下人民的生活狀況，只值得我們憑吊。自從洪楊和義和團事變以後，中國固然也有許多次革命的企圖；然而，那種方式，往往是少數人的英雄行動，其志可嘉，其勇可佩，而他們的行動，是不足爲訓的。是到了辛亥革命，我們才在大衆集合的方式之下，用流血犧牲的精神，發動革命。這是二十四年間民族革命的起點，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所以，我們目下依然是要在大衆集合的方式之下，用流血犧牲的精神，「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去紀念國慶日！

我決不悲觀

的確，中國民族是在空前的危機當中；然而我決不悲觀。

我爲甚麼不悲觀呢？因爲我深深的感覺到：「民非亡國之民。」

中國民族有四億五千萬的人口，這可說是我們不至于亡國的一個主要條件。但是，這一個條件是不夠的。在過去，我們已經亡了好幾次呢。

中國民族有了五千年的文化，這也可說是我們不至于亡國的一個主要條件。但是，這一個條件也是不夠的。我們的固有文化，有一部分是供少數人鑒賞的，還有一部分是教人忍讓屈服的，這都是最要不得的奴隸文化，然而恰恰就等于全部的士大夫階層的文化。

中國現有的文化，能當得起救亡的大任的，主要只有兩種：一種是固有的民間文化，另外一種是新文化。

民間文化保留着很濃厚的民族意識。比方，因爲彈詞，說書，戲劇……等民間文化的教育，岳飛變成人人崇拜的英雄，而秦檜變成萬人唾罵的國賊。目下，雖然有少數最無恥的文妖，反過來說秦檜是

忠臣，岳飛是軍閥，然而是不會有人相信他們的鬼話的。

自然，固有的民間文化也是不夠的，因為牠帶着濃厚的封建意識和個人主義。在日下的時代，挽救民族的危亡，靠少數個人做岳飛是沒有用的；最切要的，還是靠民衆的奮起。然而，民衆如何自己組織起來呢？固有的民間文化就沒有注意到指示這些了。此外，顯親揚名一類的封建閱意識，經過固有的民間文化的宣傳，反而成了有力的遺毒。

說到新文化，也要加以識別的——並不是歐化的一定就對的。被人家打了左面的耳光再請他打右面耳光的基督教文化，主張帝王偶像的康梁文化，以至最近販運過來的墨梭里尼、希忒勒文化，顯然都是新奴隸文化。主張村治救國和主張退到堪察加去的失敗主義，也顯然是新亡國文化。此外，利用新文化的外壳，鼓勵少數人做勾踐做西施，而不策動大衆奮起鬥爭的，無疑的也是封建文化的死屍還魂！

頂頂能夠保證中國民族不至于滅亡的新文化，是辛亥革命以後的羣衆鬥爭文化，「五四」運動以後反帝鬥爭文化，尤其是民十三年以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文化。這種文化附着在擁有四億五千萬的巨大人口的民族裏面，是沒有人可能滅亡的。敵人即使能用金錢收買少數的漢奸，會有什麼

用呢？反帝反封建鬥爭文化的偉大，不是因為牠有好聽的辭句，而是因為牠適合大多數中國人民的需要。他們在種種壓迫的生活之下，已經深深地體會到這種鬥爭的需要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

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民，保持着幾千年民間文化所造成的民族意識，再加上很正確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新文化的糾正，中國民族便決計不是少數人所能出賣，更不是任何帝國主義所能奴役了。販豬仔一類的把戲，到底只是對愚蠢的人們才能發生效力的。

我目下所可引為快慰的，是一般中國人民政治水準的提高。目下學校青年對於政治的見解，比十年二十年以前是大大的進步了。一個小店員對於政治問題的認識，往往比一般官僚強百倍。在今日——在全世界被壓迫羣衆奮起要求解放的今日，只要「民非亡國之民」即使「官是亡國之官」中國民族依然會取得最後的勝利的。

然而，只朝上看，不朝下看的人們，是會很悲觀的喊出「中國必亡」和「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其實呢，這種聲浪也不過是出于士大夫階層。這一階層裏大部分的人都墮落了，少數良心未死的人，或者良心雖死而對青年們還不能不裝一些面子的人，就有意無意的發出這一類的哀鳴了！這是坐

井觀天的謬見，青年們是千萬不可受他們的麻醉的。
總之，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只須我們奮起努力！

二四·一二·一四·生存綫。

由愛國救國說到誤國賣國

愛國，是不可少的要拿事實來證明的。古今中外的賣國官僚，沒有一個不是高高的抬出「愛國」的招牌，實行他們的「賣國」勾當。從秦檜到吳三桂、李完用，以至滿清官僚，北洋軍閥和偽滿漢奸，在他們的「皇皇文告」中，恐怕沒有一個人不自命愛國。然而，他們到底是愛國還是賣國？歷史上已經給我們以無可磨滅的答復了。倘使我們只聽信他們好聽的鬼話，而不注意到他們所做的事實是愛國還是賣國，我們便要受了無以自解的欺騙，而上了無以自贖的大當！

屠殺前進青年，摧毀民族元氣，和輕易斷送國家主權和領土的人，即使滿口自命愛國，事實自然已經證明他是賣國。只許自己愛國而不許大眾愛國的人，即使滿口自命愛國，顯然也是賣國的人。愛國的人必然是要很熱烈的找取伴侶，必然是要使大眾一致加入愛國集團的。只有賣國的人，才怕別人愛國，才怕大眾愛國。愛國是不許任何人獨占的。而且是不可能由少數人把持的。

愛國的人要以行動來救國，這是毫無疑義的。倘使自己沒有救國的行動，甚至沒有切實的救國主張，甚至剛剛相反的，而有賣國的行動和亡國的主張，而還要整天的高談「救亡圖存」，那和偽滿

漢奸比較起來，還有什麼區別呢？倘使一面高談「培養民力」，而一面不惜用內戰的手段來消耗民力，用屠殺來消滅優秀分子，不問他自命如何救國，事實上已經證明他是促國家的滅亡。

倘使真個要救國，我們不能犧牲一個優秀分子，更不能傷害一個勇敢的青年，更萬萬不能壓迫任何的民衆救國運動。要優秀，勇敢的覺悟分子起來，組織民衆，領導民衆，然後國家才可能得救。倘使只憑少數人的專橫，賣國是夠的，而救國是萬萬不夠的。

然而，存心賣國的人，自己不能組織民衆，領導民衆，却不許別人組織民衆，領導民衆。別人組織民衆，領導民衆，他就要說是要使當局爲難，是搗亂，是有背景，是有野心。

如果一個當局是救國的當局，民衆自己組織起來做救國運動，使只有給當局以極大的援助。他可以運用民氣，運用人民的組織力量，以取到外交上的勝利，甚至取到抗敵的勝利，如果他整天的懼怕民衆，懼怕民衆的組織，那末，他即使不是敵人的傀儡，也必定已經是敵人的俘虜了。

救國運動既然是一種運動，自然便不是坐待做亡國奴的「鎮靜無爲」。倘使說救國運動是一種搗亂，過去的革命便都是搗亂，而過去的革命人物便都是搗亂人物。這樣，有一部分人便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歷史，或者出賣自己的歷史了！

說救國運動是有背景的人，他自己的背景必然賣國。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我們只要問那個運動是不是救國運動，而用不着問牠有沒有背景。拿出紅帽子來消滅救國運動，是官僚慣用的手段。一面接見漢奸自治運動中的代表，容許漢奸隊伍的假造民意冒充民衆，而一面拒見學生救國運動的請願代表，屠殺學生救國運動的羣衆的，是毫無疑義的賣國賊，是真正戴着救國面具而有賣國背景的賣國賊。倘使這種賣國賊要說別人的救國運動有背景，他的用心就自然是不可問了。

過去外交上的妥洽路線，是便於敵人完成「以華滅華」的策略，是便於他們自己做敵人的劊子手，已經在事實上得着證明了。所謂「準備」「補充」……一套的騙人鬼話，目下所得的結果是怎樣呢？「準備」是準備好了十足十全的亡國條件，是準備好了十足十全的賣國出路。「補充」的結果毀滅了工商業，斷送了貨幣權，耗淨了金融力量；是補充完滿一個國民經濟的總破產。過去且不必談，只要我們能在兩個月以前下了抗敵的決心，宋哲元的八萬大軍還是我們的力量。而現在呢，不但不是我們的力量，而且已經成了敵人的力量。在古北口奮勇殺敵的大刀隊，現在是代敵人殺戮愛國青年了！你們能有本領在兩個月中間補充這八萬人的力量嗎？

中國的出路，只有不惜犧牲的阿比西尼亞式的出路。五百萬人口的阿比西尼亞尚且能和意大利

利一拼，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爲甚麼不能和敵人決一死戰呢？如果還有人再倡那「武器萬能」的漢奸理論，那不但是抹煞歷史上弱國復興和眼前意阿戰爭的事實，而且是忘記了自己的歷史，甚至出賣了自己的歷史。如果武器真是萬能，同盟會如何能推翻有比較高度武器的滿清政府，國民革命軍更如何能消滅有比較高度武器的北洋軍閥？北洋軍閥幕下的官僚更何必賣身投靠做三朝元老？

中國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初期要喪師失地，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失地恐怕也不會超過妥洽交下的限度吧？而且，在抗爭的情形之下，因爲人民的參加鬥爭陣綫，失了土地也不至於失去人心。妥洽政策下的出賣，才會在失去土地之外再出賣了人民。不守土地不要人民的政權，怎能使人心歸向牠呢？

在外交路線的錯誤未有事實證明以前，我們可以很原諒的說：他們是冥頑不靈，是不識國際形勢和時代環境，因而至於誤國。在妥洽外交路線已經得着事實的充分證明的今日，在事實證明妥洽只有滅亡，抵抗才有生路的今日，倘使依然還有人想走錯路——想走亡國的錯路，那我們就不能不說他是甘心賣國了！

甘心賣國的人，不但爲民衆所共棄，而且爲國法所不容。請你們留意到你們的歷史，不要身敗名裂，作千秋萬古的罪人！

二五・一・一。知識。

給青年們

這是萬分不幸的，你們生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然而，這也是萬分幸運的，你們剛剛生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你們可能發揮更大的本能，完成更大的歷史的任務。

本來，人們生在世界上面，不單是要利用，享受現代的文化，而更重要的是要負起推進文化的歷史任務。人類所以和貓犬不同，就因為人類是不斷的進化。今日的貓犬，依然還是和數千年以前的貓犬差不多，而今日的人類，比幾十年前的人類都進化多多了。這種進化，是每一個人一點一滴的堆積而成的，不過到了相當的階段，要有突飛猛進的一個時代。你們的時代，就在突飛猛進時代的初期；這種突飛猛進的進化成績，已經在蘇聯顯現出來牠的端倪了。倘使你們不願和貓犬一樣，你們就得盡這一點一滴的推進文化的任務；你們只要盡這一點一滴的歷史任務，你們就可能見到這突飛猛進的成績——這是你們的幸運。

時代是在突飛猛進的一個階段，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是在取得解放的前夜，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是在民族革命的初期。人類文化的突飛猛進，和被壓迫大眾以及被壓迫民族的取得解放，本來

是一件事情的兩面。目下的壓迫，不單是對於大衆生活的壓迫，而同時是對於人類文化的阻礙。爲甚麼全世界要有二三萬萬人沒有工作做，不能盡他們的推進人類文化的任務呢？爲甚麼全世界幾萬萬在工作的人，也受着生活的壓迫和勞動制度的束縛，而不能發揮他們的天才呢？爲甚麼特殊的中國青年出了學校以後不容易找到工作呢？爲甚麼中國大衆特殊的掙扎在飢餓線上，而不能受到文化的洗禮呢？這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同一受着現制度的壓迫，生活方面和文化方面二重的壓迫。因此，中國青年在民族解放上所盡的任務，不單是解除大衆生活的壓迫，而同時是推進民族的文化。

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在民族解放的過程中，青年要負着更大的責任。在中國，產業工人人數是那樣的少，農民是那樣的散漫和沒有組織；青年有較高的知識，有自然的集團——學校，怎能不負更大的責任呢？然而，倘使想以青年爲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主要隊伍，甚至爲唯一的隊伍，那是不夠的，是很危險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隊伍，依然是一般民衆，而青年的責任，只是喚起民衆。

霹靂一聲的北平學生運動，很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同情。是和非是不再混淆顛倒了，漢奸隊伍是不再能夠冒充民衆了。但是，只取得大衆的同情，而沒有使大衆組織起來，做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軍，那是依然不夠的。在上海學生運動中所見到的，竟就有學生拒絕民衆的參加，而認爲「分子複雜」

報紙上也居然有「複雜分子蠢蠢思動」的記載；這在前者，可說是幼稚無識，而在後者，我們不能不說牠是「漢奸輿論」了！民衆的分子，是必然複雜的。如果做救國運動的人，也懼怕起來，民衆分子複雜，那和用大刀快槍來壓迫人民示威的軍閥官僚，還有什麼兩樣呢？

青年救國運動如不在喚起羣衆的工作上努力，而只在學校裏面開會，貼標語，或者躲在車廂裏等待着往南京，那是絕對錯誤的。這樣的運動，很快的就要因為受壓迫而低落下去。儘可能的堅強青年自己的組織，儘可能的喚起羣衆的參加：那不單是對付目下破壞救國運動的有效手段，而且是國民總動員共赴國難的基本手段。分散青年的組織，壓迫民衆的組織，使整個的中國民族變成無組織的民族，那是漢奸的毒辣手腕，青年們是萬萬不可上他們的當的。

青年究竟應該不應該因為救國而曠廢學業呢？這也許是青年們當前一個難解決的問題。關於這問題的答案，我們是很肯定的說：救國急於讀書。如果國家都亡了，青年們即使讀了滿腹的書，也只好做漢奸，做順民。做順民是不必讀書的，而漢奸是最好是不讓讀書。有高深知識的漢奸，危害民族的力量，只有格外的大。

然而，這個答覆還不夠。我們應該是說：救國運動可以助長學業，而決不至曠廢學業。人類所以要

有知識，爲的是要對付自然界和對付社會；中國青年所以要讀書，爲的是要救國。因爲教育方針的官僚化，在學校裏的青年——在「工具主義」教育下的青年，和社會是一天一天的隔離。這種教育所造成的青年，他不明瞭爲甚麼要讀書，也不可能把求得的知識，活用到社會上去。在前一種意義之下，出了學校的青年要變成危險分子；他不了解政治，也不了解人生哲學；他可以救國，也可以賣國。在後一種意義之下，出了學校的青年要變成書獃子；他即使要救國，然而不知道如何救國。只有用救國運動衝破學校和社會的界限，然後青年才能認識社會，只有在救國運動的不斷刺激當中，青年才能有堅定的以救國爲己任的政治信仰；只有在救國運動的實際工作當中，青年才能活用他的知識，同時吸收活的知識。比方，在最近學生運動中，許多意志薄弱的青年，都因爲加入救國陣線，而變成堅定的救國志士；許多青年得着組織、動員、寫作、出版，以至演講的可貴的經驗和訓練，而成爲很精幹的戰士。這都是中國目下切需的青年，是國家的棟樑，是民族解放的前鋒。然而，他們都是只有在救國運動的活的教育之下，才會培養出來的。

奸人們還有一種動搖青年意志的手段：他們說救國運動有背景，說青年們受人利用。我們對於這種挑撥離間的惡意宣傳，應該很堅決的回答：我們只問這運動是不是救國運動，而不必問牠有沒

有背景。事實上，救國運動可能有什麼背景呢？拿金錢收買，那是只有官僚，漢奸們才會做的。還有人說：這是使當局爲難的一種手段。我相信，如果當局真個是救國的當局，民衆的奮起只有使他的外交立場格外堅強，而不至於喪權辱國。只有存心賣國的官僚，才怕民衆的奮起。

自然，在青年隊伍當中，還有少數受津貼，拿鉄棍子，用流氓手段來破壞學生救國運動的人。這種人很可惡，很可憐，然而並不可怕。爲甚麼可惡呢？因爲目下在青年隊伍做奸細的人，將來就可能做賣國漢奸，而目下他們的工作，也正和漢奸一般無兩。爲甚麼很可憐呢？因爲他們沒有知識，不知輕重，爲了少數的金錢，出賣了自己的良心和人格；在學校當中，固然是成爲同學的公敵，將來到社會上去，也成了公衆不齒的人物；他們的前途，是十分悲慘的——連目下給他們津貼的人，恐怕也當他們做大馬一樣。爲甚麼並不可怕呢？只要學生大衆在救國動中一致奮起，很堅強的自己組織起來，大衆的力量，一定可以壓服少數人的叛變的。不過，我請你們多多的可憐他們，儘可能的勸說他們，使他們激發了天良，走上了改過自新的途徑；他們大多數還是一時糊塗，誤入歧途的呀。

中國民族解放的前途又是怎樣呢？上面我已經指出：目下的時代是人類文化突飛猛進的時代，是被壓迫大衆取得解放的前夜了。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當中，只要我們努力，成功是必然要落在我們

的掌握裏面的。假使有人用「充分準備」的口實來和緩你們的情緒，你們就得回答他：學生在救國運動中自己組織起來，用集團行動的力量喚起民衆，是唯一的有効準備；反之，所謂「埋頭」「鎮靜」……等準備的方式，都只有準備完成十足十全的亡國條件。也許還有人會提出所謂「武器萬能」來威嚇你們；你們得認識，那是不折不扣的漢奸理論；他們自命爲「科學計算」，實底子是反科學的——忽略了社會科學定則的——機械計算。在辛亥革命中，在國民軍北伐中，中國民衆都已經用低劣的武器力量去推翻統治者的優越武器力量。目下，阿比西尼亞人更用低劣的武器力量去擊敗意大利優越百倍的武器力量。歷史中這一類以弱奪強的事實，還多着呢。只是因爲他們要做漢奸，要欺騙人民，所以都給忽略了。

青年們，你們努力，加倍的努力，社會的同情已經遍滿了空間，響應已經自上中下各階層。你們不要怕孤單，社會決不會讓青年們長期單獨犧牲的。你們不要怕任何的打擊，也不要因爲一時的失敗而灰心，最後的成功必然是你們的。

關一套亡國論——唯武器論和唯武器史觀

在全國民衆一致主張武裝抗敵的時候，漢奸們也用他們的死力，來反對中國和敵人宣戰。他們除了用盡種種的陰謀詭計，勾結敵人來破壞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外，還發明一套最無恥不堪的亡國理論——「唯武器」和「唯武器史觀」論——以期欺騙中國人民。

他們把中國民族的力量和帝國主義敵人的力量作這樣的一個比較：敵人有多少隻軍艦；我們只有多少隻軍艦；敵人的軍艦有多少噸位，艦齡是怎樣的輕，我們的軍艦只有多少噸位，艦齡是怎樣的；敵人的飛機，我們只有多少架飛機；敵人的飛機的速率是如何的高，行程可到如何的遠，我們的飛機，速率是如何的低，行程是如何的短；敵人有多少尊大炮，口徑是如何的大，我們只有多少尊大炮，口徑是如何的小；敵人的步槍能射擊多少遠，而我們的步槍，只能射擊多少遠……跟着，他們就下一個結論：中國萬不能和敵人作戰。

他們把民衆的力量和統治者的力量，也照樣的做一個比較，而下了另一個結論：民衆萬不能對抗統治者。

根據上述的結論，他們就老老實實的主張這樣的一個「策略」：對帝國主義敵人，只有澈底的投降，而對於民衆，却可以極端的壓迫，等到這樣的「策略」真個成爲國策的時候，那個政權就自然成爲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政權了。

根據了「唯武器論」，他們更發明了「唯武器史觀」。「唯武器史觀」的內容是這樣：跟着科學的進步，武器也是一天一天的進步，凡是武器的所有者，力量也就一天一天的偉大起來。他們指出世界各國近古以來朝代變更的較少，作爲武器所有者的力量日趨偉大的證明。他們更指出漢族一亡於元，僅九十二年就復國；再亡於清，就要二百六十八年才能復國，而認爲這也是武器所有者的力量日益偉大的實例。因此，他們更斷定：一旦中國亡於敵國，要到一千年才能復國。他們的救亡方案是怎樣呢？在唯武器論的意義之下，中國既萬不能和某帝國主義作戰，要避免這「亡國千年」的危險，自然就只有妥洽了。那就是說：某帝國主義有絕對的把握可以使中國「亡國千年」，而只是因爲漢奸們的妥洽，中國才有「苟延殘喘」的希望。

「唯武器論」和「唯武器史觀」是我替他們起的名詞，漢奸們平時向人游說的時候，還沒有能

夠這樣的很有體系的提出；他們是很凌亂很幼稚的用「物質萬能」、「科學計算」……等口語提出的。

漢奸們通常是唯心論者，是最懦怯，最愚蠢，最無恥的唯心論者。他們的「王道」就是道地的「奴才唯心哲學」；他們是想用忠、恕、誠去感動兇頑的敵人的。他們在對付自己的民衆的時候，就要暴露出來他們的兇殘面目，而把「王道」哲學下的忠、恕、誠一筆勾銷了，等到了敵人不買帳，不理會狗臉上的忠、恕、誠的時候，甚至公然提出不要「職業化的親某派」的時候，他們就只好露出狐狸尾巴，而提出所謂「物質萬能」了。

「物質萬能」一辭，在漢奸們的解釋，是很狹義的內容；只有「金錢萬能」和「唯武器萬能」兩個項目。「金錢萬能」是漢奸們的「立身處世」原則，那就是說：他們可以因為金錢出賣自己的靈魂，可以因為金錢出賣祖國，更可以用金錢收買無恥的小漢奸。「武器萬能」為漢奸們的政治理論，即如上文所說，就是對帝國主義敵人只有投降，而對民衆不妨極端的壓迫。這種理論還不配稱做機械唯物論，因為機械唯物論的內容，還要比較豐富得多；機械唯物論所包含的物質條件，遠不止金錢和武器的兩個部門。我們如果一定要給牠一個哲學上的名稱，我們或者可以說牠是「殖民地型機械唯

物論」吧。

漢奸們口中的「科學計算」，事實上是頂頂不科學，而且是反科學的。我們在研究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以至社會問題的時候，我們要應用社會科學的工具。然而漢奸們口中的科學計算，却僅僅只有自然科學中的武器一部門，他們把自然科學中大自然的力量和人的力量都完全忽略了，社會科學中人類進化和歷史演變的鐵則自然更談不到。

世界各國近古以來朝代更迭的較少，決不是武器所有者的力量日趨強大的結果，而是民主政治的功能。民主政治雖然帶着濃厚的欺騙性，然而這種欺騙性的確給與武器所有者以極大的助力，藉着維持他們的政權。甲政黨做紅臉而乙政黨做白臉的把戲，用甲政黨來推翻乙政黨的「苦肉計」的演出……諸如此類的政治舞台上的活劇，的確是可以滿足政治認識比較幼稚的民衆所提出更換政權的要求的。時代進化了，人民漸漸的覺悟，而要求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於是在許多國家裏，武器所有者就只好拿出牠的兇殘面目，而用法西斯獨裁來代替民主政治了。法西斯獨裁雖然骨子裏是依恃着武器和金錢；然而，表面上還不能不利用社會主義的招牌。最近法西斯獨裁的逐漸沒落，更證明武器絕對不是萬能。

漢奸們的「唯武器史觀」內容便是這樣的貧乏，見解便是這樣的幼稚，基礎便是這樣的薄弱。斷章取義，竊取別人「歷史一頁」做自己政治理論的基礎，本來是漢奸們的慣技。這種人即令是忠誠爲國，他們的低能無識和粗淺，也已經足以誤國而亡國。如果他們理論的背後，再隱藏着卑劣的自欺，甚至詭僞的欺人手段，那就無疑的是存心做漢奸了。

*

*

*

*

*

*

我們對於這一套最無恥最卑劣的亡國理論，也用不着用哲學上的真理去克服牠；因爲根本的，牠沒有絲毫哲學上的地位。

我們也用不着引證很久很遠的歷史事實來反駁牠，而只須拿中國近代史和眼前阿比西尼亞的反抗意大利的戰爭來做反證。本來，如果武器真是萬能，人類就不可能有這許多歷史的演變；歷史上，的弱小民族和被壓迫階層，便不應該有翻身的機會。二十五年來，中國軍閥官僚統治的「冤起鴉落」，特別的使「唯武器史觀」在中國站不住腳。在辛亥革命的時候，滿清政府的武器力量，顯然是遠過同盟會；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北洋軍閥的武器力量，也顯然是超越前者，然而武器優越的人們，竟都會在武器力量低劣的人民大眾前面崩潰下去。誰說武器是萬能的呢？誰說民衆是可以儘量壓

迫·的·呢？

事實上，目下高倡唯武器論者，就是過去依附北洋軍閥的官僚。如果他們的理論真有絲毫的價值，他們應該就可以永遠依附在北洋軍閥的幕下作威作福，而不必再「賣身投靠」作「三朝元老」！參加北伐的人們，如果也相信這一套鬼話，那就是忘記了自己的歷史，出賣了自己的歷史。

* * * * *

中國的大衆們，你們相信中國民族在反帝鬥爭中的力量，你們更要相信民衆的力量。敵人的力量，雖然不像漢奸們的理論基礎的那樣脆弱，然而結果是要粉碎在我們的前面的。你們要鼓起勇氣，去攻擊漢奸的理論，去攻擊漢奸的隊伍，去攻擊敵人的陣營，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二五·一·一一·大衆生活·

四年間的清算

在今天的報紙上，我們看到內蒙古又在敵人的指揮之下，宣布「自治」了！我迴憶「二二八」以來四年間的情況，我的血沸騰起來，我的氣焚燒起來！我要吶喊，要使士大夫階層中有心肝的人能激發一些天良，要使愛國的大衆更增加一點勇氣，要使無心肝無廉恥的賣國漢奸早點受民衆的裁判，要使中國民族在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關頭，能向光明的一角，殺出一條血路！我希望大衆生活的編者，把我這篇文字，一字不改的刊登出來；刀錐斧鉞，我自己來擔當！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到今朝還要顧慮到個人的死活，那就不能算是人了！

我要大膽地清算過去四年間的功罪得失；要使這血的經驗一點一滴毫無遺漏地表現在白紙上。我希望負責任的人們有勇氣立刻自己出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希望他們止於誤國，尤其希望他們由誤國而變爲救國！倘使他們到今朝還要隱過飾非，爲了要保存自己的歷史而不惜斷送民族的歷史，或者將錯就錯，甘爲敵人的虎俵而不肯自拔，那不但不是誤國，而實在是不折不扣的賣國了！這種人，只要中國民族的歷史一天不斷絕，民衆自然會起來誅伐他們的。

爲民族的利益着想，爲民族解放的前途打算，凡是愛國的人，都應該希望整個民族的力量，涓滴無遺地作爲自救自衛的藩屏。國家危急到目下的地步，民衆所迫切希望的，是一種抗敵的力量；他們決不會再追究那種力量過去的一切。只要政府立刻動員全部的力量去對付敵人，立刻停止一切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民衆自然會一致起來擁護牠，一致很熱烈地參加救國抗敵的陣線。只有喪心病狂的人，才會無條件地希望某一種勢力的消滅，才會在和敵人決死鬥的時候，作分裂自己陣線的愚妄工作。這少數喪心病狂的人，民衆自然會用最嚴峻的手段去制裁他們的。也只有祇顧自己的權利而忘記了民族前途的人，才會顧慮到自己勢力的可能消滅，而不惜苟且偷安以至於誤國賣國。所以，清算的意義，是在認清我們的前途，而決不在追究過去的過失。

乾脆的說：我們並不是要推翻政府，然而十二萬分堅決地要求有一個抗敵救亡的政府！我們希望當局的人立刻負起這抗敵救亡的責任，而勿再顧慮自己的利害，貽誤民族的前途；勿再以自殺手段消耗民族的力量。

敵人的目的，是不損一兵，不費一彈，征服全中國——假如牠要在征服中國的過程當中，犧牲很

大的軍力，牠便不能負起更大的進攻蘇聯的任務，甚至不能鎮壓國內的革命勢力。同時，假如牠在征服中國的時候，要以高度武器的力量毀滅過多的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牠就不能達到奪取市場的目的；中國人民的購買力，便不能作爲牠和緩國內恐慌的用途，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也便不能供給牠進攻蘇聯的軍需。

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我在「一二八」的時候，就主張我們應該有一個「焦土政策。」事實上，不但歐美列強不能容忍中國化爲焦土，我們的敵人也不願中國化爲焦土。「只有不惜犧牲的決心，才能避免犧牲。」這是我當時大聲疾呼地提出的。現在，是連胡適之先生都主張「焦土政策」了。然而在那時候，他還是妥洽陣線裏的有力分子，他還想做「文化城」裏的終身教授呢！是和非到現在，是完全有事實的證明了。

敵人的毒計，主要的是以華滅華；牠的內容，第一，是使中國各地政權分裂；第二，是使中國政府和民衆對立；第三，是使中國民衆渙散。

偽滿傀儡政權和中央政府的對抗，漢奸部隊的內侵，以至最近華北漢奸「自治」運動的發展，固然是使各地政權分裂的手段；就是淞滬和華北之役，一面孤軍苦戰，一面觥籌交錯，何嘗不是分裂

政權手段的一種運用？好在牠的漢奸勢力，不但盤踞關外，而且也潛伏關內；使命各有不同，手段各極其巧妙，而結果是殊途同歸的。

在使政府和民衆對立的工作上，敵人用外交官的辭令，用漢奸的陰謀，甚至用武人的威嚇，從使令各地當局壓迫民衆運動和箝制輿論入手，我們所最痛心的，就是許多負政治責任的人，也竟聽從敵人的意旨，把自己和民衆對立起來。甚至官吏公然教人民親敵：這是中外古今，除了李完用、鄭孝胥一流人物以外，沒有人會做的；這是自絕於人民的一條死路！

爲甚麼敵人要中國民衆渙散呢？因爲，只要中國人民有組織，任何的帝國主義都不可能滅亡我們——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很和平的抵貨運動，就已經要使敵人發抖。使令當局壓迫民衆運動和箝制輿論的手段，一面固然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對立，而另一面也恰好足以消滅民衆組織，使民衆渙散得像一盤散沙！只有經過輿論的喚起，在抗敵救亡情緒高漲的狀況之下，人民自動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自衛，才可能有廣大的真正的民衆團結。此外什麼團防、保甲、自治……事實上都已經變成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剝削人民的工具！同時，也只有真正的民衆組織受到壓迫的時候，漢奸隊伍才會假借「民衆」的名義，鬼魅現形：這種教訓，我們在華北不已經受得夠了嗎？

輿論是民族的神經系；牠溝通民衆的意志，指導民衆的行動。然而，在目前，我們所有的輿論是什麼？牠隔離民衆的意志，麻醉民衆的抗敵情緒；他幫助敵人，去欺騙中國民衆。這種漢奸輿論的造成，是誰的責任呢？

敵人以華滅華的毒計，每一個項目都有人替牠嚴密的執行。假如這種亡國的政策，不立刻給牠一個澈底的糾正，我們便不可能相信當局是爲民族的前途打算。這不但民衆不能諒解，連統治階層內部也不能相互諒解，甚至父子、兄弟、夫婦中間恐怕也不容易諒解。

* * * * *

四年多的時間是過去了，我們所得的是什麼？我們所受的又是什麼？失地，這由三省變爲四省，以至日下的六省！在不久的將來，也許要擴充到九省！國民經濟是由衰落到了日下的總破產！

在這四年間，我們所聽到的，是「準備」兩個字，準備的成績又是怎樣呢？

有人說：我們要待粵漢鐵路完成以後，接濟方面才有把握。事實是怎樣呢？粵漢鐵路的完成，爲時尚遠，而平漢、津浦、北寧、平綏四路，先已經落入敵人的掌握之中了！敵人又已經決定在漢口設立特別海軍陸戰隊。恐怕粵漢鐵路完成之日，北首的終點漢口又在敵人的勢力之下了！

有人說：我們應該等待着，等到日蘇戰爭的爆發；我們不能搶先去作蘇聯抗敵的前衛。是的，我們應該顧全民族的利益，而不能傀儡般的犧牲了自己，作別人的前鋒或者前衛。然而，事實上，一部分的中國人民——東北漢奸部隊——却已經做了敵人進攻蘇聯的前鋒了！敵人的目的，是想在「反共」的口號之下，用軍事聯盟的束縛，以更大的規模，驅使全中國人民，做進攻蘇聯的先鋒。我們主張中國人民必須立刻奮起抗敵，爲的是要把自己的民族，從滅亡的路上救回來，爲的是要使全國人民，不至在敵人的驅使之下，作爲進攻蘇聯最前線的炮灰。這並不是我們要搶先和敵人作戰，而事實上，是敵人的計劃，安排好先滅亡中國，再進攻蘇聯。爲了別人的利益，甚至爲了敵人的利益，而不惜犧牲民族的力量和前途，那是只有漢奸才會做的。

有人說：我們要在外交方面，得到歐美列強的同意，要牠們可能以經濟力量幫助我們，然後才能對敵人作戰。是的，我們應該充分的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以補充自己的力量。但是，爲了這種矛盾的運用和補充的取得，至少我們要能維持一個半殖民地形態下的領土完整和門戶開放。倘使我們的前途，是趨向敵人獨占形態下的完全殖民地化，歐美列強，誰又肯來投資補充我們的實力？更基本的，我們還得認識：任何的帝國主義都不會希望中國能夠戰勝別一個帝國主義，以取得民族解放。

這一層，我們在最近的報紙上，看到「英國不願阿比西尼亞戰勝意大利，而依然希望意大利能夠保持牠的威望」的消息，就可以完全明白。老實說：目下真心希望中國能夠戰勝敵人的，只有蘇聯、土耳其和若干弱小國家，以及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我們要找國際的同情，只能在這一方面努力，而絕對不能對任何的帝國主義存着幻想。

* * * * *

不客氣的說，我們過去不但在外交上犯了極大的錯誤，在整個的國策上，也犯了極大的錯誤。過去四年間「準備」的成果，那裏去了呢？有人告訴我：是在「安內」的工作上消耗淨盡了！「剿匪」的代價，有人估計出來是每名八萬圓！我們聽了，只有痛心，只有痛哭！

在四年前提出「安內攘外」問題的時候，我是極端主張非攘外無以安內的。然而結果，當局是走上「先安內而後攘外」的路線。幾年來，在「前方軍事剿匪後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之下，殺戮了多少的勇敢有爲的英俊青年！毀滅了多少的田園廬舍！消耗了多少的槍械彈藥！到了今日，外無以攘，內未得安。「外力」積極「內侵」的結果，連安內的基本地帶「長江腹地」都受到敵人的威脅。這樣的下去，恐怕不久就要到「無內可安」的末日！想到這種種，我不能不大聲疾呼：我們不能再自

殺·的·手·段·傷·耗·民·族·的·元·氣！我·要·用·整·個·的·赤·誠·懇·求·你·們·趕·快·掉·頭·來·救·救·青·年·救·救·中·國！

顯·然·的·「反·共」的·口·號·目·下·已·經·成·為·敵·人·和·漢·奸·殷·汝·耕·輩·的·騙·人·工·具·這·還·值·得·大·吹·大·擂·嗎？
中·國·人·民·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內·戰·大·家·槍·口·一·齊·向·外·大·家·一·齊·聯·合·起·來·抗·戰·自·衛！在·停·止·內·戰·的·前·提·之·下·我·們·也·承·認·：兩·個·交·戰·團·體·是·免·不·了·「爾·詐·我·虞」的·那·樣·我·們·就·應·該·選·派·民·間·的·代·表·團·到·「前·方」去·隔·斷·雙·方·的·火·線·監·視·雙·方·對·於·停·戰·條·件·的·忠·實·履·行·我·們·要·幫·助·雙·方·劃·分·抗·敵·的·防·線·成·為·一·致·對·外·的·巨·力。

非·立·刻·停·止·自·殺·的·內·戰·決·不·足·以·言·抗·敵；非·立·刻·組·織·民·衆·的·力·量·也·決·不·足·以·言·民·族·解·放·假·如·政·府·真·有·抗·敵·的·決·心·就·應·該·馬·上·停·止·「剿·匪」同·時·准·許·人·民·做·隔·斷·火·線·的·工·作；假·如·政·府·真·個·想·在·短·時·間·內·完·成·抗·敵·的·準·備·就·應·該·馬·上·開·放·民·衆·運·動·撤·消·新·聞·封·鎖·在·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戰·爭·中·主·要·的·準·備·便·是·民·衆·的·組·織·和·人·民·抗·敵·情·緒·的·喚·起·摧·殘·民·衆·組·織·壓·迫·抗·敵·言·論·而·還·要·高·談·準·備·那·不·是·自·欺·使·必·然·是·欺·人·說·人·民·團·結·自·救·要·使·政·府·為·難·那·更·是·漢·奸·的·理·論·政·府·即·使·還·要·和·敵·人·往·來·然·而·牠·不·應·該·而·且·沒·有·權·力·禁·止·人·民·作·抗·敵·救·國·的·運·動·只·有·印·度·朝·鮮·以·至·埃·及·的·政·府·才·會·禁·止·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只有民衆的團結奮起，可以使敵人喪膽。在華北學生運動未開始以前，敵人可以自由拘捕、殺戮中國人民。于學忠有數萬的大軍，不但不能保護人民，而且不能保護自己；河北省政府要受敵人的搜查，省政府衛隊要被敵軍解除武裝，加以掌頰、唾面、便溺滿身……的非人侮辱。在天津學生運動開始以後，一萬餘的羣衆衝向敵人的租界，高喊「打倒××帝國主義」的時候，敵人的對待，却只有緊關鐵門，滿布鐵網，以阻止羣衆的前進；敵軍司令只好告誡他的兵士，勿槍傷一個中國的學生，以免引起中國大衆的憤怒。到現在爲止，敵人再也不敢任意拘捕中國人民。這些，都不是親敵官吏妥洽外交的成果，而絕對的是民衆團結抗敵的成果。親敵官吏所得到的，只有領土和主權的喪失，人民的橫被殺戮，以至漢奸隊伍「自治」運動的抬頭。

只有人民團結起來，只有民衆抗敵情緒的高漲，中國人民方可能有生命財產的保障，中國民族才可能取得解放。這個結論，還有人能加以反對嗎？

機械論者在這裏，也許要批評我們忽略了武器的作用。我要告訴他：我們決不會忽略武器的力量。我們不但主張組織民衆，而且主張武裝民衆，救國運動中英勇的學生和民衆，用血和肉和軍警的大刀肉搏；如果能把他們武裝起來，那種力量的偉大，還會怕什麼敵人？我們是「反唯武器論者」，然

而不是「反武器論者」。只有主張效法甘地以無抵抗主義失地讓國的軍閥、官僚，才可能有時做「反武器論者」，而有時變做「唯武器論者」！

我們要高喊：武裝抗×！民衆武裝合力對外！

二五·一·二五·大眾生活·

最低限度的犧牲決心

自從去年冬天華北偽自治運動發生以後，當局平時艱苦製造成功的御用輿論，很迅速的轉變爲漢奸輿論，民衆組織在摧殘壓迫之後，不能立刻起來反抗這種漢奸的偽自治運動，不能立刻起來糾正這種漢奸輿論；反而任聽漢奸組織烟民，冒充民衆，來推進偽自治運動。在那個時候，凡是稍微有點良心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悲憤填胸，有的甚至于痛哭零涕。我在慘痛的當中，訂立下來一個決心：

「準備犧牲六個月的苟安，準備犯任何形式的愛國罪！」

爲甚麼說六個月的苟安呢？因爲照當時的情形，華北有偽自治運動的抬頭，上海公共租界更有以日人爲副隊長的特別政治偵探的設置；華北的智識份子，敵人可以自由的拘捕，綁架，甚至殘殺！倘使那樣的下去，誰能保證上海不在六個月以內遭受同樣的命運呢？

說到愛國罪，廣義的說，牠在近年來已經殺害了不少的英勇純潔的青年；狹義的說，杜重遠依然在監牢裏面。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代喊得震天價響的「反帝」，後來也成爲罪名；在最近各處學生運動中，被拘捕，被慘殺的更指不勝屈！

假如敵人的勢力真個到了上海——當然，一部分早已經在上海，假如上海變成華北一樣，那末像我們這一班人，在良心上決不肯做漢奸，做賣國賊，在本質上又不配做順民——敵人決不要有高深知識的順民，到那時也免不了是一個犧牲，然而，倘使到了那無可奈何的時候再犧牲，除了留一個歷史上的英名以外，對於民族的貢獻，是十分不夠的。到不如提早六個月下犧牲的決心，我們還可以在敵人沒有到達我們的面前的時候，喚起民衆，組織民衆，準備和他們拼一個你死我活；那樣，也許到了六個月之後，不但民族前途顯現一線的曙光，我們自己也同時可以得活路。即使我們自己得不着活路，我們與其坐待敵人的利刃加胸，也不如先嘗試我們自己當局對於我們壓迫的滋味。這一點點提早犧牲的決心，我想每一個不願意做漢奸，做賣國賊的知識分子，都是應該具備的。

自從去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的青年們奮起以後，我感覺到自己的責任格外重大，同時也感覺到這一點點提早犧牲的決心，是千萬不能再沒有。我讀了青年們在冰天雪地中，用熱血去洗無情的利刃的報告，幾次的不禁痛哭。我想，我們有點地位的人如果能站出去說幾句話，也許青年們可以少受一些壓迫；我們有點經驗的人如果站在他們的前面去指導他們，也許他們可以少受一些不必要的犧牲。

以後，我參加了今年的「一二八」紀念會，我親自領略到民衆的情緒是如何的熱烈——他們甚至要說「不流血不快」，我又感覺到慚愧。爲了民族的利益，我們要保持這火一般的熱情，而不能輕易的去消耗牠；同時我們還要使這種熱情擴大起來，使牠流注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裏。然而，我把這種火一般的熱情和我自己所有的這一點點的提早犧牲的決心比較一下，我覺得自己太不夠了。

所以我要認定這一點點的提早犧牲的決心，是最低限度的犧牲決心。我不敢對知識份子有過高的希望，而只希望他們大家都具備這一點點的最低限度的犧牲決心。青年們爲了民族的前途，毫不猶豫的提供自己的血肉，我們還不應該有這一點點的犧牲決心嗎？

良心陣線與無恥陣線

在四年六個月的國難當中，事實的表現，使大多數的中國人民都認清了敵和友。他們認清了實際上的敵國和友邦，同時也認清了國內的敵人和友人。

事實實在是太顯明了。目下國內的鬥爭，主要的並不是理論之爭，不是主義之爭，不是黨派之爭，也不是人民對整個統治階層之爭，而是有良心的大眾和少數無廉恥的官僚、軍閥、漢奸，以及流氓之爭。這是良心陣線和無恥陣線的對立。

這種說法，也許有人認為太唯心了。其實不然。羞惡之心，是非之心，抑暴扶弱之心，以及抗敵禦侮之心，是本能的，是一切沒有受過奴化教育的麻醉，沒有喪盡天良的人們都具備的。中國國難嚴重到這個地步，中國人民受敵人的欺侮和屠殺到這個地步，我敢說，除了少數的漢奸以外，全體人民都主張「抗敵第一」；負責任的人只要天良未泯，也在那裏責備自己過去不抵抗主義的失算。爲了良心的驅使，他們都不顧自己的利害；爲了前途的認識，他們更都情願犧牲了目前的利益。只有極少數甘心賣國，甘爲漢奸的人，才在那裏靠着主子的勢方向中國人民耀武揚威，才會用壓迫屠殺人民的成

續向主子去獻媚，表功，才會認愛國有罪，才會替敵人辯護。

然而，到了事實已經十分顯明的今日，到了是非能由人民的本能可以判斷的今日，大多數良心未泯的人們的口頭閒話，就可能造成巨大的呼聲。這種巨大的呼聲，就要使一切虛偽的欺騙宣傳，失去牠的力量。且看在整個的漢奸輿論之下，人民的忿怒只有高漲。一切對於救國陣線裏領導人物的造謠毀謗，一切對於救國陣線離間搗亂的陰謀，何曾發生半點的效力；只有證明作偽者的心勞日拙而已。

事實實在太顯明了，危機實在太迫切了，牠們可以打動每一個不願做漢奸順民的良心。救國陣線裏的同志們，你們努力，加緊的努力！我們有這樣廣大的同情，有這樣廣大的良心陣線，決計不是少數漢奸國賊們所能征服的！我們一定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民族解放鬪爭中的幾個最低要求

一 緒言

革命理論自然是很高深的，革命要求却必然很淺近。這裏所謂淺近，並不是膚淺或者淺薄的意思，而是大衆迫切需要，大衆聽了馬上理會的意思。比方，「給我麵包」，「給我工作」，「讓我活命」，「我們不願意做亡國奴」……一類的要求，牠們可以打動每一個人的心坎——也可說是由每一個人的心坎裏發出來。牠們淺近得和家常便飯一般，然而有很高深的理論做基礎，有很精密的現實觀察做動機。

爲甚麼是有高深的理論做基礎呢？比方，如果這種要求，只由每一個人單獨的提出，那就變成叫化子的乞憐。那是多麼的懦弱可恥？那何嘗還有一絲一毫的革命意義？只有由幾千幾萬的羣衆口中一齊喊出來，才會表現出來火一般熱烈的革命情緒。然而這中間，便包含着「是可以變質」的哲學定律；而孫中山先生積四十年革命經驗所得着的一個寶貴教訓，也就是「必須喚醒民衆，共同奮鬥。」

爲甚麼要有精密的現實觀察呢？比方，假如我們在中國也提出「給我麵包」的要求，那便是笑死人。因爲，在中國，是只有極少數人有福氣吃麵包的，大多數的人民簡直沒有懂得麵包是什麼東西。我們只有提出「給我飯吃」的要求，才是大衆的要求，大衆聽了才會懂得。所以，要求的提出，是必須充分了解當地和當時的現實的。

真理是永遠存在的，然而真理由書本裏跑出來，變成大衆心坎中的公理和正義，却必須恰好的適應當時當地的現實，而化爲大衆迫切的要求。有些人以爲革命陣線中用不着公理和正義，那是很錯誤的。固然空談公理正義，而不用有組織的羣衆力量做基礎，那就要成爲一個幻想者；然而，倘使只知道革命的行動，而不知道緊緊的把握住公理和正義，那便要變成失敗的革命，或者甚至要變成反動。整個人類進化的目標是真理，而整個人類進化的途徑，却就是公理和正義。革命勝利的時候，必然是革命要求變成大衆心坎中的公理正義的時候。

在目下的中國，大衆所要求究竟是什麼？這，因爲大家的地位不同，理論不同，所提出自然也不能盡同。但是，由一般的輿論所反映給我的，由我心坎裏所歸納出來，下面的幾個最低要求，也許可以代表大衆的意見。

二 一個民族革命的標準

中國民族很迫切的需要一個解放，中國民族不可能由殖民地化的道路走上解放，中國民族要經過一個民族革命才能取得解放；這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我們應該怎樣進行民族革命呢？在這裏，我們如果提出理論問題，也許話太長，而且大家也不容易一致，我們還是提出一個切實的標準，那就是：我們不爲蘇聯，也應該爲土耳其。

日本明治維新的標本，已經是歷史上的陳跡了，我們不能夢想的去追求。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路線，是帝國主義的路線；中國在本質上，不配去模仿，在環境上，不可能去模仿。他們一個是正在侵略弱小民族，一個是正在要求殖民地，而且正在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站在半殖民地地位，在同情於被侵略者的意義之下，我們不應該替他們歌功頌德。我們再去模仿所謂「清代中興功臣」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嗎？他們是清室的功狗，而不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因爲他們出賣民族利益，壓迫民族革命，清室固然得以苟延殘喘，中國民族却因此走上殖民化的路！我們還要進一步的走殖民化的路嗎？走這種可恥的路線，可能復興中國民族嗎？

過去九年間的事實所告訴我們的，是中國在朝秦暮楚的模仿日本、意大利和德意志之後，在夾雜的追慕、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的政策之後，已經不自覺的走上印度、朝鮮的路了！民族革命而要取得印度、朝鮮的結果，那是萬萬要不得的！

三 整個國策的重估

歷史上在大敵當前仍然埋頭內爭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滅亡。在現代國家意義之下，國防軍更絕對不容許在內爭上作孤注之一擲。中國已經不是閉關自守的時代了；列強虎視眈眈，國防軍的任務是如何的重大，還能夠以歷史上的「平亂靖難」自足嗎？二十五年來致力內爭的結果，很顯明的擺在我們的面前，還不應該深自警惕嗎？

「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在平常時也許可以收效，然而決計不能運用在敵寇深入的非常時期。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沒有這樣運用成功的先例，而過去四年七個月的教訓，更已經充分的證明：這是亡國滅種的政策，是中了敵人「以華滅華」的毒計！因此，對於這整個的國策，應該有澈底的糾正。我們應該以攘外求安內，以抗敵求統一，以舉國一致對外覓取民族的生機。

事實上，假如中國的民族革命不失敗，假如從一九二七年以後，我們能退一步而爲土耳其，那末，我們在這九年中間，即使不免有革命的戰爭，然而決計不會有革命陣線內部不斷的自相殘殺。共產勢力便沒有活動的餘地，而西南也不至有分裂之憂。就是爲了革命的失敗，爲了政治中心主張的動搖，爲了大家對於民族前途的渺茫，然後才有各自爲謀，分道揚鑣的慘劇。革命失敗以後的投降外交政策，尤其是一切國內糾紛的導火線。自從「一九一八」事變以後，對外多一層屈辱，內部即多一層裂痕。這顯然是因爲外不能攘，所以內未能安；倘使再把外不能攘歸咎於內之不安，那顯然是顛倒因果的說法。

危機實在太迫切了！大家都得平心靜氣的把這個國策重估一下。平時即使有不能調和的政治主張，到現在都應該在保持民族生存的一點上統一起來；過去即使有不能和解的冤仇，到現在都應該因爲見到大敵當前而渙然冰釋。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分家，已經從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永見的口中，證明是中了敵人的離間。我們聽到了是如何痛的心，倘使再因爲這種的錯誤歷史，故步自封，民族前途還堪問嗎？負責任的人們，在這時必須以昨死今生的勇氣，下斬釘截鐵的決心，與人民更始。我們那時候應該是和家人父子一般，大家擁抱着痛哭一場，用眼淚澆盡過去一切相互間的誤會和憤

四 國際關係的重建

在國際關係上，我們應該利用一切國際的矛盾，然而不能做國際矛盾的犧牲品；我們應該接受一切國際的援助，然而不能認敵爲友。

過去四年七個月的中國，顯然已經做了國際矛盾的犧牲品——帝國主義製造反蘇聯戰爭的犧牲品。爲了要促成日蘇衝突，英國曾經勸我們放棄東北四省，給日本作爲進攻蘇聯的根據地，作爲牠担任進攻蘇聯前鋒的禮物。這在英國，自然不妨慷他人之慨。然而我們，爲甚麼要甘願做英國投機外交的犧牲品？即使少數人想以自己的愛憎，顛倒了民族的友敵，而仍然認蘇聯爲永遠的大敵；他們借刀殺人，也不能愚蠢到先殺了自己吧？以自己的血肉爲餌，以促成二虎之爭，天下有這樣的笨漢嗎？

到現在爲止，英國製造反蘇聯戰爭的企圖，顯然已經遭遇到失敗，而中國却做了一個無名的犧牲品！原因是這樣：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進攻蘇聯是牠的義務，然而不是牠單獨的義務，併吞中國是牠的權利，而這個權利是可以單獨掠奪的。如果不是歐洲方面的德意志、波蘭和芬蘭等國，在英國的

指導之下，同時進攻蘇聯，日本是不會單獨行動的。以目下蘇聯軍力的強大，日本自然不敢冒這樣的大險，單獨進攻蘇聯；一片荒野的西比利亞，即使僥倖奪到手，牠也找不到可以解決經濟危機的市場。在歐洲方面，因為蘇聯和平外交政策的巧妙運用，因為弱小國家逐漸的覺悟，不願意做反蘇聯戰爭的犧牲品，因為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再因為帝國主義國內革命勢力的抬頭，英國雖然用全力來製造反蘇聯戰爭，事實上成功的成分恐怕是很微。

日本帝國主義傳統的大陸政策，本來是以併吞中國為骨幹。在目下，牠要和緩國內的經濟危機，要和緩法西斯化少壯軍人的盲動，頂便宜的方法是一步又一步的併吞中國。在從前，牠是用自告奮勇擔任反蘇聯前鋒的姿勢，用需要一個進攻蘇聯根據地的理由，向帝國主義國際提出占領中國東北四省的要求。同時，牠只是不斷的犧牲少數的步哨，在蘇聯和外蒙邊境製造一些糾紛，作為國際宣傳的烟幕。這一套把戲，演得有點使別人看厭了。「圖窮匕見」，在所謂廣田三原則當中，牠就老實不客氣的向中國提出「合作防共」的要求了！這裏我們得注意，牠的侵略外交，是公然的走上併吞全中國的新階段了。牠以前的所謂「合作防共」，表面上的對象還是蘇聯；現在「合作防共」的刀鋒，却已經公然的轉向中國了！

在這敵人刀鋒已經公然轉向着中國的時候，我們所感受着的刺激，是怎樣的嚴重？但是，我們的對內對外政策，似乎都不曾有一個澈底的糾正。我們是繼續的準備做國際矛盾的犧牲品，我們是繼續的認敵爲友！在蘇蒙協定的事件當中，我們對於日僞軍進犯外蒙的時候，不曾提半字的抗議，而獨對於蘇聯和外蒙締結一個互助公約，却要再次的抗議。這等於對國際聲明：中國承認日本在外蒙有自由行動之權。甚至，外交部抗議之不足，再來一個製造輿論，張大其辭。這表示這個醜劇的演出，還並非盡由於日本的挾持，而是一貫的認敵爲友政策的延續；目的所在，仍然逃不出移轉人民目光，使人民忘記了日本的侵略。

五 外交方式的糾正

在上述的國際政策之下，我們更主張澈底糾正目下的外交方式。我們要求提高人民在外交上的威力，以免敵人的無理要求，以免不肖官吏的私相授受。我們要有公開外交，要有民衆外交；簡單的說，要有一個革命外交。

帝國主義征服殖民地一貫的詭計，就是唆使當地的統治者壓迫人民，而以實力保護其政權爲

交換條件。滿清官僚和北洋軍閥的一貫錯誤，就是在外侮臨頭的時候，依然是用執行敵人意旨向敵人獻媚，用壓迫民衆的威力向敵人表功；他們不但對敵人表示甘心賣國，而且表示有權可以賣國。一個爲民族利益打算的政權，牠就決計不能那樣做。牠要喚起人民的反抗，提高人民的威力，向敵人表示官吏沒有忍讓、屈辱，以至賣國的自由；牠要用組織民衆和領導民衆的力量，向敵人表示牠有捍衛國土的能力。

秘密外交是帝國主義製造戰爭的手段，而同時是征服殖民地的手段。製造戰爭爲甚麼需要秘密外交呢？因爲帝國主義戰爭的意義，是不可告人的；而頂頂不可告人的部分，便是殖民地的分割部分。征服殖民地爲甚麼需要秘密外交呢？因爲在帝國主義，這是最可恥的盜竊勾當，是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而在殖民地統治者，這是賣身契的締結，自然也要在暗室之中。當然，帝國主義的手段是很毒辣的。牠在用威逼利誘的手段一次和殖民地統治者締結不可告人的密約之後，便用這個污點，永遠的鉗制他。「一次失身，永遭蹂躪」這是封建婦女被惡棍要挾的弱點，也就是殖民地統治者受帝國主義鉗制的弱點。

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中國和帝國主義間的秘密外交，少不了要得着辱國喪權的結果。爲了辱

國喪權對不起人民，便反過來要求帝國主義嚴守秘密，因此便受牠的挾持，而成爲積重難返的祕密外交，辱國喪權也便無所底止。九年來的中日外交有沒有祕密契約呢？事實告訴我們，必然是有。且看，在政治負責人物一再聲明何梅協定並不存在之後，何梅協定已經千真萬確的存在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如果再不頑守着「一次失身，永遭蹂躪」的封建婦女的意識，民族的前途真是不堪設想！「蝮蛇螫臂，壯士斷腕」爲民族打算，應該立刻把過去中日外交上的祕密文件，儘量公布，同時宣告一切沒有向人民公布的外交條約，一概無效。

六 公開的戰爭準備

人類是有靈性的動物，民族是有人格的集團；中國民族如果還要齒數於人類，我們認爲早已超過了最大限度的容忍。在離「九一八」事變四年七個月的今日，我們更沒有理由再言準備，就是退一步而言準備，也只能用隨時作戰的決心，作公開戰爭的準備。如果連準備都不敢公開，那顯然還沒有隨時作戰的決心。還有，我們在準備當中，組織民衆不但是主要的部門，而且也是唯一可操勝算的部門；然而，組織民衆是必須公開進行的。

爲甚麼組織民衆是唯一可操勝算的準備呢？以我們的財力及生產力，倘使還想在武器的購置和物質的補充上和敵人競賽，那是永遠處於劣敗地位的。我們只有在組織民衆上和牠競賽，那末，不論在量的方面或者在質的方面，我們都可操必勝之權。從量的方面講，人口數我們和牠是四·五與一之比。從質的方面講，公理和正義都在我們的手裏；中國人幫日本侵略中國，是最可恥的漢奸，而日本人幫助中國民族爭取解放，却是世界上頂頂榮譽的英雄；順逆之勢是很分明的。

爲甚麼必須有公開的準備呢？本來，在敵探、漢奸密布的今日，所謂備戰的秘密原不過是「掩耳盜鈴」。特別是在組織民衆的工作上，我們必須旗幟鮮明，目的堅定，然後可能號召全國的民衆，熱烈參加，然後可以使腐化官僚和無恥漢奸，銷聲匿跡。不豎起抗×的大旗，而僅僅爲組織民衆而組織民衆，人民不但因爲不感到興趣而敷衍了事，組織起來之後，也有極大的危險性。這種沒有政治意識、沒有堅定目標的民衆，一旦敵人到來，是隨時可以變成有組織的漢奸的。倘使再是爲了對內的目的而組織民衆，那危險性更大：那種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政治訓練，恰好就已經是漢奸訓練。此外，還有利用封建的地域觀念，模仿過去時代的保甲制度，在「保境安民」的口號下面組織起來的民衆。這種民衆，在平時就已和統一民族戰線的旨背道而馳；一旦敵人侵入，這種組織便會立刻變成「九

「一八」事變後的瀋陽地方維持會——一個過渡的漢奸組織。以後，瀋東戰區內的保衛團，也曾經發生同樣的變故，我們能忘記這種教訓嗎？

事實上，目下許多官僚化的民衆組織，目的就在消滅民衆組織。許多偷生怕死只求保存祿位的官僚，依然是漠視民衆奮起足以救國的必然性，而重視民衆奮起足以動搖政權的偶然性。他們都在致力於以麻醉人心的手段維持一個平常時期的治安，靜候敵人來開刀，而不知——也許不敢——用戰時人民總動員的方式，去造成一個非常時期的治安。那還談什麼民衆組織呢？

七 思想的徹底解放

現代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時代進步的產物，是和人類文化合流的。中國是世界的一環，中國民族解放工作，是和全世界被壓迫大眾的解放工作合流的。在這種意義之下，我們就可以明白：我們不能拒絕現代的思想潮流，也不能違反世界大勢。爲了要使文化工作在民族解放鬥爭上發生力量，我們必須澈底解放思想，努力於文化的推進，努力於世界潮流的吸收。

爲甚麼日本帝國主義要高談「王道」呢？爲甚麼牠要尊崇佛法呢？爲甚麼牠更要利用封建偶

像呢？就因爲這一套法寶，是奴化教育、愚民教育的利器。在過去，牠已經用「王道」佔奪我們的東北四省了！在日下，牠正想用佛法侵奪華北，侵佔蒙古；同時，他還用「天不滅日」的迷信口號，在華北和華南訓練漢奸部隊。

遙遙相對的，我們這裏，在過去也有人談「王道」，也有人舉行「金光明道場」，更有人放棄邊疆的人民不顧，而專門捧邊疆的偶像。在日下，思想依然是到處受壓迫，文化是依然到處受摧殘。他們是剛剛幫了敵人的忙，替牠訓練成功大批的無恥漢奸和懦怯的順民。

用反動手段對付反動，我們是必然要失敗的。因爲，這種無恥的勾當，沒有人會肯志願的來幹的，於是，便少不了要有金錢的收買，於是，在財力上，敵人又佔了便宜。即使能夠取得一時勝利，我們用消滅文化的手段去爭取一時的勝利，也是得不償失吧？

從酷刑拷訊說到民族道德

張佩文女士因爲她的丈夫譚峻岑遇害，發表了一篇泣告全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書，寫得沉痛異常。內中最足以動人的一段是：

「……先夫爲山東黨務主要幹部份子，加之其在民族救亡運動上之努力，表現赤胆忠誠，尤爲暴日所注視。適廿四年一月二日省黨委張葦村被刺案發生，省主席韓復榘乃於暴日脅迫指使之下，非法捕禁先夫於軍法處，希圖以酷刑造成冤獄，藉遂其摧殘民族救亡運動，以達其取媚日本帝國主義之私衷。

憶張案發生之當夜，先夫偕同志數人在濟南東方評戲院聽戲。次晨方知張葦村之被刺。隨即率領工作同志努力偵稽兇犯，竟至寢食俱廢；韓復榘初亦與先夫再三會議稽兇辦法。乃忽於張案發生後之第五日，在會議場上突將共同扣負稽兇責任之人施以捕禁。此種舉動內幕與夫軍閥媚敵賣國之個中消息，已不啻爲當時全國同胞所共喻。韓復榘於非法捕禁先夫之後，便一本以酷刑造成冤獄之原則，將先夫交與盜匪出身現爲韓心腹爪牙之偵緝隊長劉耀庭及殘毒如狼之執法隊，用盡封建

時代所不能有之種種刑具，嚴加拷勒。刑施之慘，計暈死於刑具下者三數次，全身骨折筋斷者七八處，而每次刑拷之後，遍體鱗傷，口鼻血湧，猶餘事耳。嗚呼！不徒酷吏周策臣之殘酷，法王路易之狠毒重見於今日之中國，所幸先夫以湘人剛毅強之素性，始終不以殘暴之慘刑而自成招。嚴刑之後，繼以利誘；幸而未能鑄成冤獄證據。且韓曾將先夫自衛手鎗送上海工部局檢驗彈紋，與刺張子彈絕不相符。此已爲當時山東人士所共悉。在此事實大白之後，韓復榘又一面秉承強敵意旨，猶曲意責以嫌疑；一面以先夫爲中央所派，既受此殘酷之刑罰，恐出獄後有所不便，不能不有所顧忌，故仍不依法開釋。旋以各方友好黨國先進紛紛負責保釋，至此韓亦自知無以自解，乃多方藉詞推脫。同時將先夫解押公安局獄中，固猶鐵索瑯瑤，遇同盜匪；冤獄囚閉，遲延至今！

自去歲年底以來，暴日更急劇展開其侵吞我華北之進行。收買漢奸流氓，圖普遍發動其所謂『自治運動』而一般認賊作父甘心出賣民族以苟延個人名位之國賊漢奸，反爭先恐後紛紛投效獻媚。先夫譚峻岑先生，便不能不在此漢奸賣國媚日的事實下，於本年三月九日夜間慘被殺害於山東公安局獄中！

先夫之被殺害，山東政治當局韓復榘輩，猶冀一手遮天，朦蔽民衆，誣爲『自縊身死』……」

我讀了之後，情不自禁的弔下淚來。我和譚峻岑先生不相識；我所以要下淚，是因為譚峻岑先生的遭遇正是全國救亡陣線被捕諸同志的遭遇，我再聯想到北平青年郭清的遇害，便不能不下同情之淚。我想救亡陣線裏的同志，一定是和我同感的。

我們對於這個案件應有下列的認識：

一、酷刑拷訊和用威逼利誘的手段使別人喪失政治道德和政治信仰，是最近幾年來雷厲風行的一件事，是普遍全國的一件事。

二、這種方法，在日下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所及的地帶，正在經過牠的代理人政權，作為製造漢奸順民的工具。

三、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民黨內許多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們，便也同樣的受到了威脅。

除了譚峻岑案件之外，北平還有幾位教授和幾百個青年都在遭遇同樣的命運。梁東偽政府甚至已經公然採用國民黨強逼共產黨黨員自首、投降的手段，去強逼國民黨黨員自首、投降。在這民族危亡逼於眉睫的時候，我們決不能站在旁觀的地位，認為這是國民黨「自作自受」，而要澈底的明白，這是整個民族元氣被摧殘，民族道德被摧毀的嚴重問題。國民黨裏作法的原也不過是少數人，而

受害的却是多數的善良分子。

爲甚麼反對暗殺和優遇政治犯會成爲全世界的政治道德信條呢？這除了若干理論問題之外，主要的可說是基于政治家推己及人的同情心。如果統治者要用暗殺手段去對付政敵，那末，這種罪惡風氣的傳播，剛好就使統治者自身要受到同一的危機。同樣的，統治者因爲自己有堅定的政治信仰，他就不肯用壓迫手段使他的政敵失去了政治信仰，因爲自己需要他的左右有不屈不撓的政治道德，他就不能用壓迫手段使他的政敵失去了政治道德。如果政治信仰可以隨便動搖，政治道德可以隨便墮落，那種卑劣風氣的造成，就可以使統治者本身有隨時崩潰的危機。尤其在國難嚴重的中國，我們是應該如何的培養民族道德，使人民大家都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道德，應該是如何的崇尚氣節，維護公理正義！我們必須使敵人的收買和誘惑手段完全消失作用，然後可能有堅不可攻的民族陣線。

然而，以賣身投靠爲生活的三朝元老們，以及朝秦暮楚的投機分子，他們自己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必使大家都動搖了政治信仰而後快，他們自己喪失了政治道德，必使大家都喪失了政治道德而後快。等到大家都成了無恥之徒，他們就不至被吐棄于全社會了。這種情形對於民族危機是如何

的嚴重；他們這一類沒有心肝的人，是不會顧到的。這種漢奸訓練，無疑的是替敵人做了開路先鋒。而且，我還確實的知道，他們的一部分，已經很無恥的投到溧東偽政府去，用過去強逼共產黨黨員投降的手段，去強逼國民黨黨員投降的，也就正是他們哩！

慘痛中的張佩文女士，國民黨內有良心的人們，全國同情于譚峻岑的人們，我們要認識這是整個的民族問題，你們要明白，這種情形普遍在全國各處，每天死亡在酷刑之下和因為威逼利誘手段而喪失政治道德的，恐怕不下于數十百人！你們僅僅悲痛于譚峻岑之死，是不夠的，你們必須立刻設法救出來正在受着和譚峻岑一樣遭遇的幾千幾萬人，你們必須努力根本消滅這種政治上的黑暗！

我讀到了張女士文字最後的一段「……在此國威凌夷，社會黑暗之現狀下，國法雖或難伸，社會應有公理，強鄰雖然橫暴，人心當未盡死，幸我全國同胞，以同一命運之中國民衆，共爲切身利害伸張是非，驅除此賣國媚日之蝨賊。抗禦此亡我國家殺我同胞之暴日，衝破此社會之黑暗，爭取全民族之自由。則先夫之死爲不死矣……」我甚佩服她的見解，見解的透澈，已經恰如我們的期望。但下文一個轉灣，却又是「……佩文以一弱女子，上侍翁姑，下撫弱女，遭此慘變，昭雪莫由，隱痛何極！此恨綿綿，將隨濟水泰岱而何時或已耶……」我們就見到「良母賢妻主義」是如何的惡毒！因爲拘束在

「良母賢妻」的窠臼當中，張女士感覺到一個矛盾：爲了要做良母賢妻，她就不能做「私恨國仇」的昭雪工作了！張女士，你是「全國同胞」中之一員，你雖然有「上侍翁姑，下撫弱女」的責任，然而要知道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當中，大多數人的家庭責任和社會環境都還不如你呢。有許多人在「無隔宿糧，有八口家」的環境之下，都在努力救國呢！他們都因爲感受着自已的痛苦，而格外努力于民族解放工作呢！他們都覺悟到，只有取得整個民族的解放，然後可以得着自身的解放呢！你能夠輕輕的因爲「良母賢妻」的責任，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民族解放責任嗎？我以為你應該立刻以待死之身，奮不顧身的去領導這一個和民族解放工作有密切關係的反對酷刑運動。那樣，不但是崑崙不死，你的功績，尤其可以歷千秋萬古而不朽的！

怒吼吧，長江流域的大眾！

爲了銀行的業務關係，一年兩次的長江旅行，差不多是經常的。

長江兩岸的沃野一片，誰見了都會起無限的羨慕；怪不得，別人是要眼紅了。

可憐得很，這一片沃野的長江兩岸，大部分的點綴品，仍然是幾椽茅舍和幾葉帆船。有極少數使我們見了會感到驚奇的點綴品，却就是使我們見了又會感到驚心動魄的點綴品，那便是帝國主義的兵艦，掛洋旗的外國輪船，和帶有國際托辣斯意味的外國火油公司的油棧和碼頭，一切現代的設備，大部分是別人的。幾隻中國輪船和一些「無關閥旨」的民族工業，掙扎在帝國主義的天羅地網中，差不多是力竭聲嘶了。我所乘的招商局輪船，也就是力竭聲嘶中掙扎着的一個。我們坐在頭等艙裏，物質享受雖是夠得舒服；然而，一想到中國船業的危機，再想到民族民生的危機，不能不覺得「坐不安席」而發生了無限的彷徨。

沿江所看見比較偉大的民族工業，多半還是會左時代的遺跡。漢陽兵工廠、第一紗廠、大冶鐵廠、以至招商局，都是他們手創的。在最近的幾十年當中，國家不但沒有這樣偉大的計劃，甚至連這有限

的遺產，都在荒廢着。所謂建設大計，大部分是在享樂方面——在洋樓大廈和汽車道的建設上面，作「錦上添花」的勾當，而不會替民族前途和大衆生活做絲毫的打算。說文明變成少數人的專用品嗎？那還是很客氣的批評。事實上，他們還沒有毅力，創造一些獨立的專用文明，而只是依附在租界裏面，在別人的懷抱當中乞取一些餘瀝呢；可恥的！可恨的！怪不得他們要在「自覺」之後，追慕着曾左的偉大了！

沿江除了少數建築在中國人的肩膀上的外人產業，和一些用民脂民膏造成的新建築物之外，大部分的房屋，是一年不如一年的破舊下去，沒落下去。除了一些爲奉迎上司起見而描寫在磚牆之上的無聊標語，青白分明的映入眼簾之外，大多數是連大水沖洗過的痕跡，都沒有刷新過。官僚們，你們看到了沒有？你們是應該看見幾條鮮明的標語而喜呢，還是應該看見了滿目的大水痕跡而懼？你們的下屬，在巴結上司方面，是夠得投機了，夠得乖覺了，而且夠得盡心了。不看見，那新描上去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標語旁邊，還隱約的露出一「打倒帝國主義，鏟除封建遺孽」的舊話嗎？這也許足以迎合你們的心理吧？但是，對於這滿目的大水瘡痍，有什麼人過問呢？幾十萬萬元一年的捐稅用在何處去了呢？

流不盡的長江，流得盡的人民膏血；

措得了的口號標語，措不了的滿目瘡痍，民間疾苦；

賣得了的少數人的廉恥，心肝，賣不了的民族歷史，大衆熱血。大衆熱血變成了長江的怒潮，沖洗了一切阻礙我們衝向時代汪洋的障礙物。

* * * * *

武漢是大非昔比了！運輸上聯運制度的發展，使許多貨物可以由產地直接運至銷地，進口洋貨可以由海口直接分配到內地，出口土貨可以由內地直接裝至海口。這樣，就使這帶有半封建意味的集散市場武漢，成爲「強弩之末」。工廠的停工和減工，使這長江中游的新工業集中地點武漢，也「黯然無色」。四周的軍隊漸漸的開拔了，武漢「曇花一現」的軍事繁榮，也成了過去的陳跡。目下支持武漢的「市容」的，表面上是幾條新造的馬路和幾處新落成的建築物，而骨子裏是桐油的漲價和日貨的傾銷。那中間受益的是什麼人呢？這問題大部分已經用不着解答，需要解答的只有桐油漲價的一部門。牠是便宜了封建殘餘的商業資本——買辦資本，而很少便宜給生產的農民。

用來對付徒手青年救國運動的戒嚴令，已經因爲「學潮」的平息，而在慶幸的口氣之下取消

了。但是，夜間寂寞的旅舍中，依然有囊囊的皮靴聲來給牠一些「繁榮」。憲兵們全副武裝，「如臨大敵」的來檢查旅客。他們威力的對象，據說也不過是無抵抗的平民；幾次的向高級武人頭上搔癢，結果都是抹了一鼻子的灰！憲兵的作用，原來不過是如此！許多熱心執行職務的憲兵同志，聽說都垂頭喪氣的，歎息於「公事不好辦！」

在帝國主義勢力下走不上工業資本的正路的中國商業資本，可走的本來就只有買辦資本，投機資本和享樂資本的歧途。旅館，飲食店和娛樂坊，自然就成爲資本墮落的一個途徑。在過去虛偽繁榮的時期中，旅館是發了橫財的人們麻醉良心的大本營；在那當中打打牌，叫叫條子，胡裏胡塗的就把「我們爲甚麼要做人」的哲學問題「消遣」過去了。武漢在虛偽繁榮過了之後，接着曾經來過一個「特貨繁榮」。在昏天黑地中得着麻醉人民神經系的利益的官商們，也隨時在旅館當中花費一些作孽錢，藉以「排遣」一部分「良心的責備」。目下，特貨繁榮又成過去了，旅館裏的老闆們，正在愁眉苦臉，却又來一個制他們死命的××運動。

在目下，在許多的國家裏，我們都看到回光返照的封建性的意識形態，和在舊社會制度下沒落的自由主義起了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碰了壁，在資本獨佔消滅了多數人的自由競爭的可能性

的今日，沒落的自由主義者便不可避免的向着賭博、投機，以及淫靡的方向去開展他們的活動。自然，這是罪惡的；但是這種罪惡的糾正，只有建立新的社會制度，解除一切加於人類的不需要的經濟和天才的阻礙和桎梏，使大家重新可能自由發展他們的本能。然而，法西斯主義下回光返照的封建意識，一面是用暴力壓迫人類思想向新時代的發展，而另一面是用暴力遏止一部分人的趨向墮落的自由主義。因為他們的動機依然是爲着保持現制度，他們暴力所及的，自然也只限於平民，而全部的特權階級，依然是在深如海的「侯門」裏，照常度着淫靡的生活。日本法西斯政權下的禁止娛樂場所男女同座，以及禁止男女教員和男女學生間的來往，就是這種畸形現象的一個代表。

在中國，在租界和內地的對立當中，這種現象也存在着。本來，在墮落的娛樂資本的發展上，固然需要一個「放浪形骸」的自由，在工商業資本正常的發展上，也需要一個行旅的往來自由。但是，帶有落後意識和封建割據意味的地方官吏，是往往要借戒嚴，維持治安和維持善良風俗的名義，來干涉人民的私生活，和旅客的自由來往的。許多地方對於寄宿旅館的旅客，甚至需要保人。這樣，一個過路的生客，便要投宿無門了，誰又敢於輕易出門旅行呢？在外人管轄下的租界，在這上面却依然保存着一些沒落的自由主義精神。雖然也有許多人批評租界是「藏垢納污」的地方，然而，藏垢納污豈

止限於租界？而且，租界所加於中國的毒害，主要的不是藏污納垢問題呀。

這種對立，如果存在於隔隣的兩個治權之下，那種影響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武漢的新生活運動及不到租界，於是，旅館事業就由華界移到租界裏去了。據說，法租界市政收入，因此每年增加了十萬元，因此移轉過去的「墮落繁榮」，當然是有幾百萬元了。我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說「墮落繁榮」應該維持，而是說國家當前的嚴重問題，絕對不在「講小節，矜細行」。在更嚴重的帝國主義勢力問題不解決——連租界都還不能收回的前提下，「講小節」和「矜細行」剛好是「爲淵毆魚」，我們再想到幾千萬的東北同胞和華北同胞，都正在敵人的毒化和奴化政策之下，更會覺到這一類粉飾太平隔靴搔癢的勾當，是見秋毫而不見輿薪了！

怒吼吧！中國！

能爭取前途光明的，不是孫傳芳式的格言牌；

而是大衆在怒吼當中準備犧牲血和肉。

教我們見小忘大，因內忘外嗎？這是敵人的陰謀毒計。

我們應該聽從嗎？絕對不！絕對不！

怒吼吧！大衆！
 怒吼吧！中國！

漢口前面的一段長江，是資本主義化——帝國主義化了。漢口側面的襄河，却依然是封建殘餘勢力盤踞的所在。沿襄河的碼頭，是在封建性的「行會」和「幫頭」的割據之下；有的只許五金業的帆船停泊，有的只許雜糧業的帆船停泊，有的只許從某處來的帆船停泊。在中國，在無論那一處，這種勢力都成爲人類進化的障礙；各地的帆船往往利用碼頭的佔有，以抵制輪船運輸。然而，牠的勢力，往往是剛好足以阻礙力量微弱的民族資本，而不能阻礙勢力雄厚的帝國主義資本。帝國主義可以用外交的力量驅策當地的官僚軍閥，可以用金錢的勢力收買官僚軍閥，以及當地的紳豪，可以用巨大的資本勢力建築新港灣，而避免和封建殘餘勢力的衝突。然而，民族資本呢？牠唯一解決的方法，只有勾結官僚、軍閥和當地的紳豪了。中國的民族資本，因此便留存着封建殘餘的勢力！

沿襄河兩岸的五金行、鐵行、棉花行和雜糧行，他們對外是做了進出口洋商的代理人，而完成牠們的買辦資本的使命；對內是保留着行會制度，而向農民進行封建性的剝削。

甚至碼頭工人，也保持封建性的獨佔。工頭一面用暴力排斥外來的工人，保持自己部屬工人出

賣勢力的獨佔，而另一方面是向工人進行他的封建剝削。工人的工資，是每件二分，而工頭要在這上面徵收百分之二十的貢銀。工頭，在繁榮的時代，每天的收入要達六七十元；然而，他自己只須在家裏抽大烟，玩女人，而不必工作。他派出許多小工頭，替他做監督工人和稽核征收的工作。這種制度，差不多國內到處都存在着，甚至連新式產業中間也往往保留着。這便是十年來官辦工人運動的成績呀！

內地工頭之所以能爲工頭，據說是在兵差上替當地官僚幫忙，因而取得他在政治上的地位。簡單的說：他是和官僚紳豪們勾結，而幫同他們剝削勞苦大衆的。在租界裏，工頭却要得着帝國主義勢力的扶植。在上海租界裏，有幾位工頭受到洋人輪船公司的賞識，竟能在剝削勞工上面，得着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元的財產。這又是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勾結的一個例子了。

長江是年年在怒吼。

沿長江的大衆，還只是細碎不斷的呻吟。

呻吟有何用呢？只增加了恥辱和苦痛。

我們要把細碎的呻吟打成一片，變成了大衆的呼聲；
只有大衆的呼聲，大衆的怒吼，才能爭取我們的生存。

誰是內戰的挑撥者？

我是救國陣線的一分子，救國陣線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消弭內戰，促成抗×」這當然便成爲我個人當前的主要任務。

我們對於西南事件的態度是這樣：我們對於西南督促中央抗×絕對同情，然而希望他們不要超過督促的限度；我們熱望中央誠意接受西南的督促，因爲這種督促代表人民的公意。我敢說：西南冬電的主張，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會感動流淚，這是幾年來國內實力派的空谷足音，對於這種空谷足音，我們如果不是喪心病狂，如果不曾受敵人的收買和麻醉，是決計不肯忍心害理加以惡意的估量的。我更很坦白的說：我們不但贊成西南實力派這樣做，而且希望全國實力派都這樣做；我們要用人民的力量，在「抗×第一」的前提之下，造成國內的和平與統一；我們不但反對未來的內戰，而且主張停止現有的內戰；只要大家都認定「抗×第一」的原則，內戰是必然可以停止的。

我在南京的時候，聽到華北方面負責人表示：倘使中央和西南發生內戰，華北在三天之內便要落入敵人之手。我聽了真是焦急欲死了！如果中央和西南爭奪湘南數縣之地，而把華北數省拱手讓

人，那真太令人痛心了；那對於民族，真是太殘酷了！中央和西南即使有不可解的仇怨，華北數千萬人民，何負於國家？過去對外一省一省的放棄，對內一寸一寸的苦攻，已造成目下的慘況，倘使這次中央和西南再陷於內戰，那實力消耗的結果，恐怕所喪失者還不僅是華北，而要使全國都因無以抗敵而至滅亡！這是每個有心肝的人都感到寢食不安的。

用一切代價消弭內戰，盡一切心力把這個可能的罪惡內戰轉變為一致抗敵的神聖戰爭，這是每一個不願意做奴隸的人都應該努力的事。然而，一個名流學者胡適之，竟在本日上海大公報星期論文中以「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題目，而發出挑撥內戰的論調！胡先生說「中央政府應該用全力勘定叛亂。殷汝耕背叛中央，中央應該明令宋哲元討伐。」這是完全對的。但是，胡先生把西南看成和殷汝耕一樣，那完全是顛倒是非，淆亂黑白。胡先生發出這種可恥可恨的論調，是必然要被人民唾棄的。胡先生很明白：殷汝耕到現在不曾被討伐；胡先生不主張中央先討伐殷汝耕，而僅僅在主張討伐西南的時候，輕描淡寫的提出討伐殷汝耕做一個陪襯；這對於他自己，是強辭奪理的硬拉「討伐殷汝耕」的題目，來掩飾主張討伐西南的無理取鬧；而對於西南，顯然是極惡毒的一個比擬；這種極惡毒的比擬，不但要使西南將士灰心，而且要使全國人民以後不敢再言抗×

西南的行動，至少到現在爲止，不會超過督促中央的限度；我在南京看到西南的來電，在滿腔的熱情中，依然具有顧全大局的苦心；這種態度，都只值得大衆的同情，而絕對不能忍心害理的加以惡意的猜度。敵人一貫的毒計，便是用共產黨的罪名，加諸反日份子，使全國人民以後不敢再言抗×。現在如果再有人把「親日」「叛亂」的罪名加諸西南，那即使不是敵人的詭計，至少是和敵人的武斷宣傳手段異曲同工！許多西南親日的消息，都出自日本武官和東京方面，那個內幕更值得我們注意。我還記得馮玉祥氏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奪取多倫的時候，同樣的報紙上是大吹大擂，說馮氏受人利用，說他的軍火係由日人供給，說他軍隊裏有日本顧問。那時只有我做一個獸大，寫一篇論文發表在新社會，請國人從行動當中認清誰是秦檜，誰是岳飛。目下的所謂輿論，彷彿是和那時候差不多；然而，畢竟今日的馮玉祥已經是大家公認的決心抗×的一個軍事長官。我現在請大家平心靜氣的再把過去的事實和目下的情形比量一下，不要再一味的作違心之論。正氣消沉和公道不彰，是亡國滅種的一個因素，我們是絲毫不能忽略的。我再痛哭流涕的籲請全國大衆：我們只能在親日的體系當中找求漢奸的因素；而千萬不能歪曲的在抗×的體系當中找求漢奸的因素。親日派的重要分子，像殷汝耕、劉石蓀一班人，現在所做的是什麼勾當，已經夠使我們明白了。說敵人會花錢來推動

一個抗×行動，那簡直是笑話；說敵人會採用這種冒險投機的策略，想在抗×行動中取得親日的利益，那我們的敵人，恐怕早就因為輕舉妄動而失敗了！

目下最嚴重的問題，是中央和西南會不會發生內戰的問題。倘使真是不幸的而發生新的內戰，那不但西南中了敵人的奸計，中央又何嘗不同樣的中了敵人的奸計？而像胡先生一班挑撥內戰的人，在客觀上便剛好是執行了敵人挑撥離間的使命！只要我們能使這種可能的內戰，轉變為對外一致抗敵的戰爭，那便是我們極大的勝利，而同時是敵人極大的失敗。我們得明白：推動西南督促中央抗×是一件事，而促成中央和西南間的內戰，是剛剛相反的又一件事；前者是促成抗×的神聖事業，而後者是消滅抗×的罪惡勾當。站在救國陣線的立場，我一面是希望西南持重，而另一面尤其希望中央持重。我希望國內實力派，在這時候要多多從事於政策之爭，而不要再從事於政權之爭；希望他們在對外的抗敵戰爭上競賽，而不要再在內戰上競賽。

我很熱情的希望全國上下，都熟讀一遍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永見的一個談話；在那個談話當中，他告訴我們十年以前的一個國際陰謀。他告訴我們：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時候，倘使國共不分家，中國革命便有成功的希望；那樣，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便要完全消滅，而日本所受的損失為

最大；因此，日本軍部就派他和松室二人，到中國來挑撥國共分家。帝國主義的陰謀結果是成功了，十年來帝國主義的勢力，是一天一天的膨脹，而中國是一步又一步的走上殖民地化的路！從永見的談話聯想到防共協定，再聯想到目下挑撥內戰言論的囂張，不能不使我們感覺到：這是帝國主義一貫的陰謀！也許在十年之後，會有人告訴我們這一貫陰謀的後半段，那中間當然包括這一筆挑撥內戰言論的帳目。然而，那時候的中國，也許已經變成××帝國主義的屬國；中了這種陰謀的人們即使痛悔，也已經無及了！

頂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目下挑撥內戰言論的策動者，便是親日派，自然，內中有許多不過是盲從而已。胡先生一向是和平主義者，他一向主張對日本忍讓；但是，他這次對於西南事件，却是一個主戰者。胡先生的和平主義那裏去了呢？胡先生的和平主義是只對外不對內嗎？我正式向胡先生提出質問：胡先生這種論調，到底是出於良心，還是受人利用？如果不是出於良心，我還要請胡先生告訴我們：究竟是什麼人指使他，究竟是那一派勢力策動他？

我承認，在南京的體系當中，有很多的抗×分子；尤其，在青年軍人中，抗×的情緒大多數是很高漲。但是，我還要大聲疾呼的指出：帝國主義的陰謀網，是密布在全中國，南京當然不能除外，而且在南

京的陰謀網，只有特別的週密。這種陰謀網經費的來源，半公開的有××××，祕密的更是不計其數。這種陰謀網的內容，包括金融、財政、文化、輿論……等種種部門。這種陰謀網運用的方式，可以有直接的包圍，也可以有間接的影響；可以威嚇，也可以利誘；可以正面提出，也可以反面烘托。這種陰謀網裏面的分子，有老奸巨滑的官僚政客，有自私自利的名流學者。他們手段的毒辣陰狠，決計不是頭腦純潔，思想單純的抗×陣線中的青年分子，所能窺破分毫的。以蘇聯黨政組織的完整嚴密，依然要不斷的受國際陰謀的破壞；那種陰謀力量的強大，就可想而知了。據我個人簡單的估計，在所謂「以親日手段達到抗×目的」的政策之下，陰謀網中的人物，是在進行「以親日手段達到降日目的」的路線。

因此，我得大聲疾呼的告訴全國抗×戰線中的戰士：你們一面要注意民衆的力量，一面也不能絲毫忽略帝國主義的陰謀網。這種抗×障礙物的掃除，也是你們的一個重要任務。

胡先生提出統一問題；關於這問題，我是始終堅決的主張；我們只能以攘外求安內，以抗×求統一，而絕對不能夢想在一統之後抗×。我認爲中國過去有一種極危險的辯證法的發展，就是政府的政策，是對內重於對外；因此，對外是屈辱不計，而對內錙銖必較；然而，就因爲對外屈辱愈多，內部糾紛便愈甚，隨而，對內用力更大，而對外屈辱愈多。這種發展，到九一八已經是一個突變；等到再一個突變

發生的時候，恐怕就是亡國滅種的時候。用全部的力量來剋服這種亡國滅種的發展，而使之轉變爲有利的發展，是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當前任務；而救國陣線消弭內戰促成抗×的主張，目的便在使大家都了解對外重於對內。

老實說，我們如果能以過去四年九個月對敵人容忍的態度對付國內，八九年來的內戰，就可以完全避免。我們在痛定思痛之餘，應該明白，在目前，對內的容忍，只有使人民同情，使人民信仰，而恰好可以增加中央的威信。倘使在這時候，還是很褊狹，很淺薄的主張以討伐保持中央的威信，那真是太沒有心肝了！

自然，我也同樣的認定西南方面也有帝國主義國際的陰謀網。這個陰謀網在西南的開展，同樣的是挑撥內戰，消滅抗×。然而，到現在爲止，西南所表現的，不但沒有受陰謀網的支配，而且剛剛是打擊陰謀網的。說西南有日本的軍械就是聯日的左證，那是十分淺薄的。中央又何嘗沒有日本的軍械呢？甚至在歐洲大戰的時候，德國還有法國製造的槍炮呢！當然，在每一次的革命行動當中，必然有存心出賣革命的官僚政客；西南有少數官僚政客奔走南北，想投機出賣這個抗×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敢說西南大多數的將士，是純潔的，是決心抗×的，而且是永遠不願意被少數人出賣的。關於西南

的一切，我正式主張遣派民間代表團，前往視察；這個代表團的任務，除了視察真相以外，同時要使西
南不要超過督促中央的限度，完成消弭內戰促成抗×的任務，以粉碎帝國主義的陰謀網。

總之，目下國內有很清楚的兩條陣線：一條是帝國主義陰謀網支配下的漢奸陣線，牠的目的在挑撥內戰，消滅抗×；另外一條是有良心的不願做亡國奴的大衆所結合成功的救國陣線，牠的目的在消弭內戰，促成抗×。全國的同胞，你們究竟願意站在那一條陣線呢？時機太迫切了！一分一秒也不容許猶豫了！正氣不容消沉，是非不容混滅，你們趕快運用你們最鄭重的判斷，盡你們最大的努力吧！

第四編 中國經濟

改進中國經濟問題

——向經濟學社年會提出的一篇論文——

一 緒言

外交可用宣傳，學術不容假借。幾十年來國事的一團糟，與其說是因為軍人不懂政治，無甯說是因為政治家不懂經濟；與其說是因為政治家不懂經濟，更無甯說是因為學者不顧事實。日本佔據東三省了，政治家還認為是偶然的衝突，一部分的學者還認為是這不過是日軍閥的野心，舉國皇然不知所措。倘使政治家懂得一些經濟，何至於此？倘使學者顧到一些事實，又何至於此？九一八事變以後二十二個月的經驗，足夠告訴我們，這是事實上不可避免的經濟鬥爭，而不是偶然的野心的發作吧？

亡羊補牢，究勝於坐以待斃，倘使從今日起，我們能不向空談，根據事實作理論的探討，也許可以使全民族早點得着出路。第一，我們必須放棄了自身的利害關係，以純潔的良知作客觀的判斷。因為，倘使事實已經造成了無可移易的趨勢，以根據成見而下的虛偽的判斷，也決無補於自身的利害。為

了要指白爲黑，自己先戴起墨晶眼鏡來，白的依然不改其爲白吧？第二，我們更必須坦白的，毫不猶豫的提出自己認定的理論。我們倘使僅僅以虛偽的理論自欺，其禍猶小，倘使爲要迎合某一部分人的心理，公然以虛偽的理論去欺人，那就變成民族的孟賊，真理的罪人！美利堅的御用的經濟學者，在最近的五六年當中，愚弄了多少人？結果呢，沒辦法依然還是沒辦法，虛偽的理論依然暴露出來牠的虛偽！

二 最近世界經濟的幾種趨勢

我們要改進中國的經濟，恐怕決不能離開世界的潮流：我們要研究中國問題，恐怕也決不能漠視國際間的形勢。因此，我們在提出關於改進中國的經濟問題之前，不能不先舉出世界經濟的幾種趨勢。

第一個問題，當然是目下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恐慌問題。這個恐慌的終極到底怎樣恢復繁榮的可能性又怎樣？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先要研究這次恐慌所以特別嚴重的原因。依照資本主義下的分配方式，資本家是以資本的使用取得分配，而工人則以勞力的出賣取得分配。資本家所得的分

配——利潤，通常要遠多於他們的消費，而工人的消費，却不能超過他們所得的分配——工資。這樣，在生產社會中通盤計算起來，商品的生產量必然要超過消費量，而超過的部分，就代表利潤當中資本家所不能消費的部分。這一部分剩餘的商品，要歸生產社會以外的人——不參加生產的第三者——去消費。這第三者，就是中產階級和殖民地人民。資本家要把剩餘商品賣給他們，換取金錢，以圖資本的聚積。

我們無論分析那一個生產機關的決算表，都會發現同樣的事實——生產設備不斷的增加，這就代表一部分資本的聚積。同時，科學的發明，使機械的生產力猛烈的擴大，機械逐漸的把工人排擠到生產社會之外了。這樣，生產結果的分配，資本所得的成分，逐漸的擴大，而勞力所得的成分，却要逐漸的減少。這裏，我們更必須把「生產結果的分配」和一般所謂「贏餘的分配」分得清楚。許多的生產事業在恐慌中不能分配贏餘，然而整個的資產階級却依然得着鉅大的生產結果的分配。失業的增高表示勞力所得的分配成分的減少，而商品的過剩却正是代表資本所得的分配成分的擴大。盈倉滿谷的過剩商品，有屬於工人的嗎？鉅大的生產結果的分配所以不能轉變為優厚的贏餘的分配，那是因爲商品對於貨幣的跌價。倘使我們以商品的數量來計算生產結果的分配，自然就可以看得出

資本所得的成分的鉅大了。

然而，這資本所得生產結果的分配，牠那剩餘的部分，在目前却不能得着有偉大消費力的不參加生產的第三者。中產階級，早已經因為坐吃而山空了。殖民地也逐漸有牠們自己的工業了，牠們的中產階級也逐漸的消滅了。現社會所有不參加生產的第三者，只有失業工人，然而失業工人是沒有購買力的，是不能吸收剩餘商品的。這就成為目下生產過剩和失業互為因果的經濟恐慌。

這樣，目下的恐慌所以嚴重若此，簡單的說一句，是因為目下經濟制度不能容納目下的文明——也可以說是因為目下的分配制度不能容納目下的生產力。這層，連胡佛氏的退任贈言中都隱約的表示過了。依照目下的大勢以前趨，將來自然會有一天機械完全代替了人工。那時，一面有全體工人的失業，而一面有幾乎全體的商品的過剩。試問人類的社會，能夠容許那種狀態的發生嗎？

如上所云，要救治當前的恐慌，根本的自然只有澈底的改造目下的社會制度。然而，照國際間形勢看起來，帝國主義恐怕還要嘗試最後的一注強心針——戰爭。在主觀的方面，牠們是想要以武力奪取別人的市場，毀滅別人的生產力；在客觀的方面，戰爭的結果，可以使過剩商品在軍需上消耗淨盡，偉大的生產力在砲火中破壞淨盡，失業的羣衆在戰場上犧牲淨盡。那樣，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間

的繁榮，就可以再度發現了。我們且想想，這樣的殘忍的方法，是解決人類社會問題的合理方法嗎？
 次的大戰中，已經使俄羅斯變成共產國家；這次的大戰，同樣變化不會更普遍嗎？

有人以為我言之過甚嗎？羅斯福的復興方案，已經告訴我們，破壞是復興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而戰爭的序幕，早已在中國開始了！

* * * * *

在資本主義動搖的當兒，德意志忽然高高的豎起來，泛繫主義的旗幟。有人因此以為這是資本主義世外桃源的一條新路。泛繫主義能夠成功嗎？在理論上，我們只須研究在泛繫主義之下，利潤是否完全消滅。利潤一天不消滅，由利潤而轉變的恐慌自然也不會消滅。在事實上，我們且看意大利是否能夠逃出恐慌的潮流？然而統計告訴我們，意大利的失業人數，在歐洲大陸佔第二位，意大利的經濟恐慌，並不下於任何的資本主義國家。意大利或者要誇耀過去十年中的建設成績，然而，在過去十年中，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過牠的繁榮。這是經濟恰好走到繁榮的一階段，而並不是泛繫主義的奇蹟。因此，我們就可以斷定希忒拉在德國的完全失敗，因為他剛剛趕上經濟衰落的一階段。

目下，美國又在高倡什麼國家經濟主義了。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國家主義，本來是猛進不

息。所謂國家經濟主義，本來不是什麼新鮮的玩意兒，羅斯福不過是提出這個名辭向國會要求較大的威權罷了。國家經濟主義在政治方面表現的，就是經濟復興政策。這政策的內容，如剷除四分之一的棉麥，一面固然可以提高物價，然而一面却要增加雇農的失業；以公共建築消容失業工人，在英國已經失敗過了；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資本家已經表示反對，結果大不了也是一個「陽奉陰違」可能實行無阻的恐怕只有增高關稅壁壘，然而那種以鄰為壑的政策，徒然使生產格外過剩，使整個的資本主義格外顯出牠的動搖。要之，利潤一日存在，生產便一日更過剩，帝國主義便一日要以殖民地為尾閘。希忒拉政權下的德國如此，羅斯福政權下的美國也是這般。最後的一着，恐怕德國只有向奧匈進行吞併，而美國只有向中國擴充市場，戰爭就此開始了！

三 中國目下的經濟改進問題

說到中國的經濟改進問題，我們先要認識中國的經濟狀態。我們可以說中國不應該走上資本主義的路，然而不能說中國現在不受資本主義的支配。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民族資本不足道，然而不能說中國沒有私有資本。事實上，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中國是國際資本主義支配下的一個次殖民

地，這個次殖民地，在世界經濟恐慌之下，受着更嚴重的剝削。

在這個嚴重的剝削之下，我們倘使要言建設，便不能不顧到國防，而說到國防，却又不能不言建設。爲什麼言建設須先有國防呢？殖民地生產力的膨脹，既然是帝國主義的致命傷，毀滅殖民地的生產力，便成爲帝國主義一致的需求。在一二八戰事中，爲什麼三友實業社、永安紗廠和商務印書館會成爲敵人砲火的焦點呢？那中間的命意，已經是不言而喻了。無國防而言建設，這是怎樣的危險呀！然而，所謂國防云者，既非舊式的城堡所能奏功，更非專講對內的軍備所能奏效。一切現代戰爭的設備，既無能離於科學，自更無能離於建設。因此，言國防又不能不言建設了。

然而，生產的建設，已爲帝國主義之所嫉視，國防的建設，自更非帝國主義之所能容忍。於是核心的問題，就成爲別人能否容許我們建設的問題，本來，在帝國主義中間，有的注重在資本的輸出，有的注重在重工業品的輸出，而有的注重在輕工業品——消耗品——的輸出。大概輸出重工業品的，往往連帶要輸出資本。因爲重工業品如鋼鐵，機械……等，事實上至少有一部分要變成投資。這樣，我們似乎可以利用這中間的矛盾，解決我們的建設問題！我們歡迎資本和重工業品的輸入，而排斥輕工業品的輸入。

但是問題依然不是那樣的簡單。第一，虎視眈眈的日本，牠是以輕工業立國的。不單是牠的對華輸出，以輕工業品爲主，甚至連牠的對華投資，也是以屬於輕工業的紡織業爲主。她對於中國的建設，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牠的軍事勢力，事實上已經取得太平洋的霸權，任何一國的對華投資，倘使沒有得着牠的許可，牠可以隨時用軍事勢力來破壞一個乾淨。這種的形勢，已經要使投資國就憂，而中國的內亂，更使牠們覺得「一動不如一靜」。即使勉強的投一點資，恐怕只限於通商口岸，然而通商口岸是頂頂容易給敵人破壞的。

看吧，無關閔旨的所謂美國棉麥借款，空洞的所謂國聯技術合作，和未證實的英國借款，已經引起日人的抗議了。依我個人的觀察，日本非貫徹她的所謂亞洲門羅主義，置中國於附庸之列，決不肯罷手。東三省的侵略，既然還不能解決牠的恐慌，因之就連帶而及華北。華北協定的急於簽字，原想保留當地的元氣，恢復當地的購買力，可以做牠的傾銷的市場。無如，經過長時期剝削後的民衆，汗血早已乾枯，兵火之後，恢復尤難立致，東三省軍隊退入關內以後，供應浩繁，人民更疲於奔命。日就衰頹的購買力，已經是無可藥救了。同時，因爲英美荷各國本部和殖民地對於日貨的排斥，要使日本感覺到對華的侵略，有進一步的必要。因此，在最近的將來，日人在華南恐怕有暴烈的行動。這行動的焦點，大

約是福建。因為福建是日本華南侵略的大本營，一向就視為禁巒的：隔海與台灣相對，在太平洋的防守上面，形勢尤其切要；而恰恰在抗日的十九路軍之手，更使牠覺得不放心。目下，英借庚款在福建築路，日本已經引為口實，牠的通信社又散布美飛機輸入福建的消息。我要請國人一致注意這種嚴重的暗示，談建設尤不可忘記了國防上的危機！

上面所說的，是建設與國防的關係，現在再說建設與民力的關係。目下國內的財政狀況，可說是國家財政，依賴通商口岸；而地方財政，仰給於農村。依賴通商口岸的結果，是「授柄於人」，而仰給農村的結果，却變成「竭澤而漁」。被認為國家財政命脈的關稅及鹽稅，負擔自然什九轉嫁於農村，而關稅的徵收，更形成倚外貨以度日的苦境。地方財政，本以田賦為主要來源，而建設所需，亦往往唯農村是賴。目下田賦的征收，有的附捐數倍於正稅，有的預借已逾四十年。五、六十年間的外貨的剝削，二十餘年的內戰的摧殘，和近來幾年間的天災人禍，農村經濟的破產，本來已經是無可諱言，怎能再當得起這樣的負擔？

建設的中心，似乎集中於汽車道的建設。這種交通的設備，有助於輕巧的工業品的侵入，而無補於笨重的農業品的輸出；利於農民之羣趨都市，而未能招致工商業家之開發農村。這樣的建設的費

用，取諸農民，而以後的剝削，仍加諸農民！再加以外來的農產物，或以廉價傾銷，或以借款方式變相傾銷。一面有工業品的傾銷增加農民的支出，一面更有農產物的傾銷減少農民的收入。雙釜伐樹，不亡何待？

上文云云，不過提出建設中所應考慮的幾個問題。然而，頂主要的問題，恐怕還是經濟制度的問題。我們應該鼓勵私有資本呢，還是應該限制私有資本，或者甚至消滅私有資本？我們不能含混的咀咒資本主義。事實上，十九世紀以後的人類文明的進化，資本主義有牠的不可泯沒的勳勞；不過，在目前，資本主義已經到了風燭殘年的時代。我們應否重新把牠擁立起來，作為將來社會革命的一個對象，自然是一個問題。在這資本主義矛盾百出的時候，人民能不能容許我們把牠擁立起來，又是一個問題：倘使我們要擁立資本主義的話，結果究竟是鞏固國際資本主義在華的勢力，還是增厚民族資本的勢力，那更是一個大大的問題。倘使我們含混的主張擁立資本主義，使國際資本和民族資本同處保護之列，那結果，國際資本一定要併吞民族資本。因為萌芽的民族資本決計不能和強有力的國際資本角逐，我們要特別保護民族資本嗎？那又要引起帝國主義容許不容許的問題。這問題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老實說：我們倘使沒有一個租界作外人在華設立工廠的餘地，連關稅的增加都要引

起武力的干涉！

我們要限制私有資本嗎？依目下情形而言，私有資本可說是用不着我們限制。有人主張努力建設國家資本，就在那當中兼寓限制私有資本的意義。但是，用什麼方法建設國家資本？利用外資嗎？能得到幾許的數量固然是個問題，而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可能引起的戰爭又是一個問題。這些，上文都已經說過了。還有一點是很重要：就是在限制私有資本的狀態之下，整個的私有財產制依然保留着。在保留私有財產制的條件之下，廉潔是可能的嗎？倘使廉潔不可能，有效的管理便不可能，國家資本的發展便根本沒有希望。關於這層，我們用不着作許多理論上的工夫，只看看過去和現在的國營事業的一般的成績就可以知道。固然，其中也有辦理得很整飭的，然而，大多數還是一團糟吧！幾年以來，天天談廉潔，然而效果怎樣？有時雖然也懲辦了幾個貪官污吏，恐怕也不過是「竊鈎者誅」罷了！

四 結論

總之，外交上沒有強有力的對策，不足以言經濟的改進；社會制度沒有確定可循的途徑，也不足以言經濟的改進。我們在外交上，究竟應該仿照德國的先例，公然對外表示貧困之餘不能再受剝削

呢，還是依舊諱疾忌醫，粉飾太平？

倘使是前者，那末，我們必須管理貿易，鼓勵生產工具的輸入，而屏無謂消耗品於國門之外。假如帝國主義憑藉租界以圖拒抗，我們就不惜加租界以反封鎖。萬一牠們以武力相加，我們要不惜放棄沿海各口岸。事實上，一個和內地隔絕的口岸，不過是死口岸，而以砲火奪取市場，所得的也不過是一塊糜爛的肥肉。日本在上海和華北的戰事之後，所以急於言和，就是想到糜爛的肥肉不能受用；而牠所以敢在上海戰事之後，再發動華北的戰事，却是看準了這懦怯的民族，不能忍受較大的犧牲。其實，倘使我們不怕糜爛，牠又何肯真個加以更大的糜爛？

當然，這樣的一個對外政策，不可能在目前的社會制度上發展出來。倘使我們依舊認目下寄在租界附庸于國際資本主義的幼稚的民族資本為國家的生命線，我們便不能下這樣的決心。倘使財政上的運用仍舊依賴現行的貨幣，財政的來源仍舊抑給于通商口岸，即使下了這樣的決心也終歸於慘敗。所以，這樣的一個強有力的政策必然是對外對內兩方面的。而這樣的一個兩方面的政策，牠的嚴重性恐怕就不下於孫中山先生遺囑裏所倡導的民族革命。

反過來說，倘使我們依然要保持這終須崩潰而且已經在崩潰中的現社會制度，那末，外交上就

只有諱疾忌醫，粉飾太平，讓外交官保持他們的虛偽的體面。同時，我們只有避免犧牲，整理殘餘，以作帝國主義的續命湯。那還何用談什麼經濟改進？

二二·九·一五·大晚報·

崩潰中的中國經濟社會

爲甚麼要在國慶聲中提出「崩潰中的中國經濟社會」的這樣一個不吉的問題呢？第一，是因爲崩潰是一件事實，現況無可慶又是一件事實，用不着再粉飾太平欺騙大眾，也用不着癡心妄想來安慰自己。第二，可慶和不可慶是相對的，在流戀舊時代的人們認爲不可慶的，甚至可悲的，在追求新時代的人們要認爲可慶。在女人生孩子的一件事情上，同情於生產的痛苦，就要替女人悲哀，而希望傳種接代的人却要對新生的孩子告慶。

我們提出這「崩潰中的中國經濟社會」問題，可以分四點來申說：（一）中國農村破產的特質，（二）農村破產的原因，（三）農村破產中農民的暴動，（四）中產階級的沒落。

什麼叫做中國農村破產的特質呢？照歷史的路線看起來，封建殘餘的中國農村組織，牠的崩潰本來是必然的，但是目下中國農村破產的意義，還並不是那樣的單純。牠在縱的方面，固然帶着歷史上封建制度崩潰的遺跡，而在橫的方面，是更嚴重的受着國際資本主義崩潰的影響。資本主義在恐慌的時候，原料價格的低跌，要較工業品爲甚。因此，生產原料的農村，牠的衰落狀態也較工業爲甚。資

本主義的發展，本來要以封建殘餘的中產階級和殖民地爲外苞，然而在資本主義崩潰的時候，外苞必然同時或者先崩潰。目下中國農村的破產，就是外苞崩潰的一種形態。因此，我們應該認定這封建殘餘的中國農村的破產，不是代表封建制度的崩潰，而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崩潰。倘使我們一定要說明牠和封建制度的關係，我們或者不妨說：這是資本主義崩潰中封建殘餘的肅清。

農村破產的原因，第一是國際資本主義的剝削。代表這種剝削的，就是貿易的入超。貿易入超的數目，從民元起至民二十一止，已經有銀圓六十九萬萬圓之鉅。這種剝削，是兩方面的。一面是工業品的剝削，使農村中固有的手工業消滅，農民的生活所需多數依賴工業品。像目下，農民的衣服的問題，幾乎全數仰給於洋布或者「仿製洋布」；農民的燈火離不了煤油。另一方面是農產品傾銷，像幾年以來，棉花、小麥和米的大量輸入——去年洋米的輸入關平銀一萬一千九百萬兩之鉅，佔輸入品的第一位。這種傾銷的結果，使國內農產物跌價，而造成嚴重的「穀賤傷農」的狀態，以工業品的傾銷增加農民的支出，再以農產品的傾銷減少農民的收入，這是對於農民的「雙斧伐樹」式的剝削。

農村破產的第二種原因是內戰。民國以來內戰的次數，規模較大而牽涉及中央政府的，有二十次，規模較小限於一隅的，次數更多——單只是四川一省就有二十一次。內戰中直接間接的損失，自

然是無可稽攷，有人估計牠是一百萬萬圓。所謂內戰，背後提線的，自然往往是帝國主義的列強。所以上述的兩種項目可以歸納在「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大項目之下。

第三種原因是國內工業品侵入。站在整個民族資本的立場，我們可以不必提出這個問題，而站在農村的立場，却不能不連類而及於這一個項目。以輕工業爲主體的新興工業，大體上和經紀階級——買辦階級——還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差，可說是準經紀階級。印染工業的原料，自然多數是洋布——甚至是日布，織布廠所用的棉紗，也多數是洋紗。甚至紗廠裏所用的棉花，麵粉廠所用的小麥，洋貨也佔重要的成分。這樣，目下的新興工業，不但牠自身要剝削農民，而且還要幫同帝國主義剝削農民。以上的三種原因，我們更可以把牠們歸納在「資本主義的剝削」的大項目之下。

第四種原因是天災。民十八西北的大旱災，民二十長江的水災，和今年黃河的大水災，損失自然也是不可勝計。天災本來是和帝國主義無關。然而說到天災，便不能不連類而說到中國的建設工作。這樣，終究又要牽涉到帝國主義。現制度下中國一切的活動，都逃不出是經紀階級——買辦階級——的活動。幾年來所謂建設，足以稱述的，恐怕除了汽車道，便只有洋房大廈。這種建設的背景，是建築材料和汽車的經紀人的活動，而談不到什麼計劃。這種無計劃的建設的結果，一面是加緊的剝削農

民——這種剝削的方式，就是所謂建設捐、公路捐等等，而一面甚至不能減少災患。在湖北和江蘇，甚至發生過水利官員侵吞公款和溺職的事情，這可見「人謀不臧」的結果，不單是不能減少災患，事實上反增加了災患。倘使這許多建設費用，能急其所急，用在災患的預防工作上面，至少可以使損失減輕大半。

第五種原因，是苛捐雜稅，這在上節已經提出一些了。據申報的通信所說，江西、毗連赤區的地帶，每畝田要繳納四十圓的捐稅，這或者可以做苛捐雜稅的代表。苛捐雜稅的剝削的收入一半是經過經紀階級之手，流入外洋，換回來殺人——殺中國人——的飛機、大砲和種種的外貨，一半是經由貪官污吏的私囊，或者以現金方式集中於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商埠，或者變成商埠中的洋房大廈。

上面所舉各種農村破產的原因，幾乎盡數和資本主義有關。所以，我們或者可以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農村破產的中心原因。

農村貧困的結果，必然是農民的暴動，有主義有計劃的暴動，就是革命，而無主義無計劃的暴動，就是流寇。有人說：匪禍是農村破產的一種原因，那是騙人的話。事實上，所謂匪禍不過是農村破產後必然的結果。農村破產的原因不除，而想用軍事上破壞的力量消滅匪禍，同時再用苛捐雜稅維持

軍需，那個直接的結果，便是農村的加速破產，而間接的結果，便是農民暴動的猛烈化，這就是汪精衛先生所謂「以言剿匪，則滋蔓難圖」了。江西的紅軍，牠的行動對不對，是另外一個問題，然而不能不認牠是農村破產後必然的農民的暴動。牠的「滋蔓」的事實，證明牠的經濟條件的適宜。倘使再照孫科先生的報告，他們居然已經會實行平均地權的策略（見大晚報），那就成爲有主義有計劃的革命了。至少，我們對於這種事項的判斷，因果不可顛倒。

最後，我們提出中產階級的問題。有人說：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會消滅，而且一時無法消滅，所以，中國的社會革命不可能。關於這問題的檢討，我們應該先研究：中國的中產階級是怎樣的組成的？依我的觀察，中國的中產階級的組織成分，是農村裏的地主和城市裏中等以下的經紀階級。倘使這種解釋是適當的，那末，我們就沒有理由說中國的中產階級沒有沒落。事實上，所謂農村的破產就代表地主的破產——貧農和僱農本來是無產可破的。經紀階級呢，他們的財產大部分是商品，而一小部分是農田。年來物價跌落的結果，他們的商品的價值大大的減縮了；而農村的破產，他們的農田也變成不值錢。東三省市場的被奪和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及華北的軍事行動，使整個的經紀階級根本動搖。在這兩年中間，有幾處商埠裏商店數目減少了一半，有的減少了三分之一。中等以下基礎較弱的

商家，有的已經「關門大吉」，有的正在力竭聲嘶的掙扎。在一二八滬戰之後，大多數的商店不願復業。多數的商人，公然喊出情願大難早臨，免受「欲死不得欲生不能」的痛苦。這種種一切，還不能證明中產階級的沒落嗎？

農村的破產和中產階級的沒落，表明中國的社會必然的要發生革命，也可以說革命早已開始。我們要留戀舊時代嗎？那就只有痛哭流涕以至於自殺。我們只有追求新時代，然後能得到一線的曙光。我們怕痛苦怕犧牲嗎？流血是產母不可免的犧牲，她只有忍痛為嬰兒而犧牲！我們要減少犧牲嗎？減少革命阻力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因為犧牲是阻力所造成的呀！

中國經濟的過去與今後

一 緒言

我們一提起中國的經濟問題，便立刻聯想到，除了這幾個現代化的都市之外，還有廣漠的半封建的農村，還有逐水草而居的蒙、藏游牧民族，還有未開化的苗、獠民族，……複雜錯綜，真覺得無從說起。本來，歷史上沒有清一色的社會制度，也沒有劃然的清晰的時代分界。所以，這種複雜錯綜的現象，是不足怪異的。我們研究一個民族的經濟，只須在這複雜錯綜的現象裏面，提出某一種現象為中心，再說明其他種種的重要經濟現象對於那中心現象的關係。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的經濟，也是這樣。我們提出農村經濟為問題的中心，再說明集中在都市裏的新興民族資本和偉大的國際資本對於農村經濟的關係。這並不是因為「農村經濟」是一個時髦的名詞，所以認它為中心，而實在因為在殖民地的經濟形態裏面，農村經濟的確是一個主角。方式是這樣的：高高的盤踞在上面的有國際資本主義，深深的被壓迫在底下的有半封建的農村社會，介於兩者之間的，有都市裏的買辦階級。附屬於買

辦階級的，有都市裏的新興民族資本，農村裏的經紀階級，和軍閥官僚的政治組織。同樣的遭受壓迫的，還有從農村裏逃避出來農民化身的工人。

二 中國農村衰落的縱斷面的觀察

中國農村的衰落，決不是偶然的。依照歷史的路線，這半封建的中國農村，在這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形態的時候，衰落本來是必然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本來要以封建殘餘為營養的外殼。資本主義的發展愈高，它需要封建殘餘外殼的營養料也愈多。然而，封建殘餘所有的營養料，本來是有限的；經過了不斷的吸吮，自然是一天一天的枯竭下去，而至於無以應付。一面需要日高，而一面供給日減；這是資本主義和封建殘餘間的矛盾。因為營養料供給得不充分，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更要尖銳化起來，而表現動搖的狀態。在動搖的時候，資本主義為苟延殘喘計，不能不向封建殘餘下「竭澤而漁」的辣手——加緊剝削；而在加緊剝削之下，封建殘餘內在的矛盾也尖銳化起來，由馴服的殖民地人民的本質，蛻化而為強烈的反抗。這樣，資本主義和封建殘餘，各因內在矛盾的尖銳化進而為相對矛盾的尖銳化。矛盾尖銳化的結果，是雙方經由突變而蛻化為新的經濟形態——新的社會制度。這是歷

史演進的路線，是社會變化的方式；而半封建的中國農村，目下恰到了由衰落而轉歸蛻化的階段。

上面的一段話，為清晰起見，有加以說明的必要。第一，資本主義為甚麼要以封建殘餘為營養料呢？這是剩餘價值貨幣化的問題。原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商品的生產量必然要多於參加生產者——資本家和工人——的消費量。這多餘的部分，拿單獨的一個生產機關——一個工廠或者一種企業——來說，就是資本家的利潤；拿整個的生產關係來說，就是剩餘價值；而拿政治的單位——國家——來說，出超——廣義的出超，包括無形輸出——可以代表它。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中，依着利潤——剩餘價值——的存在，生產過剩是必然的。這種代表剩餘價值的過剩商品，必須要先化為貨幣的形式，然後能經過利潤的分配，以成就資本的累積。而在剩餘價值貨幣化的時候，它只有找封建殘餘做它的對手。所謂封建殘餘者，在國內就是中產階級，在國外就是殖民地人民。有些人認參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高級勞工，智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官吏……為中產階級，這是錯誤的事實上，他們是資本主義的協助者或守衛者。在他們的中間，高級的是分沾利潤的，而低級的是和工人一樣受掠奪的。依嚴謹的解釋，中產階級必然要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無關。他們既非勞工，又非資本家，而是封建時代殘餘下來的貴族和素封之家。他們不依賴利潤或工資度日，而只依賴祖先的遺產

——這遺產裏面，不包含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工具。他們的支出，必然要大於他們的收入：就是因爲這一點，中產階級才配做資本主義營養的外壳。資產階級是收入多於支出的，而中產階級是支出多於收入的。中產階級之所失，就是資產階級之所得。資產階級就是用代表剩餘價值的商品瀝取中產階級的金錢，以完成自己資本的聚積。這樣，中產階級是首先做了資本主義營養的外壳。

在資產階級資本的聚積愈多生產力愈大的時候，中產階級就慢慢的沒落下去。資產階級乃移轉目光於殖民地人民，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就帝國主義化了。殖民地人民是經濟落後的民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他們起初是不知道的。帝國主義征服了他們之後，就可以代表剩餘價值的工業品向他們輸送。有時雖然也換回來一些原料品，然而價值當然比較的要低微。輸出於殖民地的工業品多，而由殖民地輸入的原料品少，這就是帝國主義的出超。出超的數目，就代表剩餘價值貨幣化的數目。就是在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出超上面，殖民地做了資本主義的營養的外壳。所以，殖民地貿易的入超，是必然的。除非在殖民地裏面帝國主義的資本勢力充分發展之後——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由貿易的剝削轉變爲資本的剝削之後——殖民地貿易入超的狀態是不會改變的。

在說明資本主義爲甚麼要以封建殘餘爲營養的問題之後，我們再說明第二個問題。就是：資本

主義和封建殘餘間的矛盾是怎樣會尖銳化？所謂資本主義下資本的聚積，就是生產力的增大和剩餘價值成分的擴大。新式生產工具的設置，可以使資本家用較少的勞工，生產較多的商品——可以由一個工人頭上榨取到以前在幾個工人頭上榨取到的剩餘價值。這樣，因為代表剩餘價值商品的增加，帝國主義必須要向殖民地輸出更多的商品。再因為帝國主義農村工業化之後，它不單是不再需要殖民地的原料，而且還要向殖民地輸出農產品。而同時呢，帝國主義向殖民地資本的輸出，使殖民地工業勃興，對於帝國主義工業品的需要，反而減少。殖民地人民經過了長時期的剝削之後，購買力本來已經是一天一天的衰退下去，殖民地裏的新興工業，對於帝國主義固然是一種矛盾，而對於封建殘餘的農村却是更進一層的剝削。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農產品的傾銷，農民不單是在消費上面受資本主義的剝削，在生產方面也受資本主義的壓迫。結果，因為農產品價格的跌落，他們的購買力加速的衰退下去。一面帝國主義要輸出更多的代表剩餘價值的商品，而一面殖民地却只能吸收更少的外來的商品，這是資本主義和封建殘餘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一天一天的尖銳化起來。

這半封建的中國農村，就在這種矛盾尖銳化的今日，發現了極度衰落的現象。這樣一個勢所必

然的極度的衰落，決計不是什麼救濟所能爲功。中國農村的前途，只有蛻變的一條路。所謂蛻變，當然是農村的工業化。不過在什麼制度，什麼方式之下工業化，那依然是一個問題；且等下文加以討論。

三 中國農村衰落的橫斷面的觀察

在縱斷面的——歷史的——觀察之後，我們再進行這個問題的橫斷面的觀察。因爲中國的經濟是殖民地的經濟，所以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設施，都依着殖民地的形態而發展。整個的經濟建設，是帝國主義替我們打樣的。有人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是畸形的發展，那還是很客氣的說法；因爲「畸形」兩個字不過是表示偏頗的意義。痛快的說，中國目下的經濟組織是倒置的組織。就是中國幾年來一切新經濟的設施，都是爲帝國主義的利益着想的；對於中國民族，不單是沒有益處，反而只有加重的剝削。這本來是殖民地經濟一定的狀態，是不足爲奇的。

因爲目下的經濟狀態是倒置的，所以，一切天然的或是人工的一般認爲有利的經濟條件，都變成了民族的禍害。海岸線的綿長，本來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條件。然而在中國，這五千餘哩的海岸線，恰變成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鎖鏈；因爲海岸線的曲折而形成的口岸，却變成了民族的吸血疣。每年

以貿易入超的方式由這幾十個口岸流出去的金錢，民二十是關平銀五萬二千四百萬兩，民二十一
是五萬五千六百萬兩，今年一月至十月止，已經達銀圓六萬五千萬圓。總之，這幾十個吸血疣近年來
每年在貿易上要向每個中國國民平均吸吮約二圓的汗血。

然而，貿易的入超，還不過是口岸對於農村的剝削的一種方式。除此以外，還有國際資本——外
人在華產業——和新興民族資本，也是以口岸爲大本營向農村施行攻擊的。帝國主義向殖民地的
輸出，要由商品的輸出進展而爲資本的輸出，本來是一定的趨勢。而入超的代價，就地轉變成爲帝國
主義在殖民地的生產資本，也是常有的慣例。帝國主義在華的事業投資，一九〇二年僅有美金五萬
零三百萬圓，一九一四年，就增爲十萬零八十四萬圓，一九三一年更增爲二十五萬三千一百萬圓
（根據 C. F. Renner 的統計）這二十九年間的增加，是五倍而強。倘使以美金一圓合國幣三圓換算，
那末，增加的數目，就達國幣六十萬零八千四百萬圓。這中間的大部分，恐怕就是由入超代價轉變而
來的——我曾經計算過，這二十九年間的入超總數，是七十九萬萬圓。這許多在華的外資，或者以商
品生產的方式向農村施行剝削，或者以交通器具的方式便利商品對農村的剝削，自然都是使農村
衰落的主要元素。幾微的新興民族資本，依附其間，也一例的以農村爲推銷商品的尾閥。它的勢力固

然是微薄，而其對農村的攻擊則一。這種微弱的民族資本，因為集中在帝國主義砲艦勢力控制下的口岸，所以，在中國民族發動對外鬭爭的時候，它必然的要和敵人妥洽，甚至向敵人投降，以保全它自己的資本利益。

河流本來也是天然的經濟條件之一，然而在中國，它們却變成帝國主義的侵略網。口岸對農村的剝削，是大部分靠河流完成它的作用的。為甚麼上海進口的外貨要算為各口岸之冠呢？這自然是長江的力量呀！不單是這些河流上來往的商品大部分是舶來品，甚至連來往的汽船也大部分是外國汽船。民二十一的汽船進出口噸數，往來外洋的，英船占百分之四二·二一，日本船占百分之二〇·九五，華船祇占百分之九·七四；往來國內的，英船占百分之四四·七一，日本船占百分之二一·四九，華船也僅占百分之三二·五二。這樣，河流到底是中國民族的經濟利器，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就可以十分明白了。

此外，人工的交通工具——鐵路和汽車道——也不過是補河流之不足，而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補充網。鐵路的建築，除了直接的成為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尾閭之外，建築的方式，也完全依着帝國主義的便利。本來，就民族經濟的觀點來說，鐵路的分布，是應該着眼於國內產業的開發和國防的

設施。然而，中國的鐵路，却只顧到商品的運輸和旅客的便利。因為商品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的商品，而旅客也逃不出是帝國主義的經紀和剝削的標的物，自然而然的，鐵路是成爲帝國主義侵略的補充網了。汽車道的建設，對於農村的打擊，尤爲嚴重。建設的經費，既然大部分以田賦附加，派捐和派銷公債的方式取之於農村，運輸的作用也只能助輕巧的工業品深入農村，而無補於重笨的農產品運銷都市。這裏，我要聲明，我決不像義和團那樣反對一切文明的設施，而不過是指出文明的設施在殖民地經濟下的特殊性；我們決不能主張廢除一切文明的設施，而應該研究如何改變殖民地的經濟形態，使這一切文明的設施，能變爲發展民族的工具。

以口岸爲大本營的商業，它的買辦階級性，在這次上海福建幫反對國貨產銷合作協會事件上面，已經充分的暴露出來，用不着我費辭。以上海租界爲總準備庫的金融，也必然的變成吸血虜的形態，而成爲倒置的經濟組織的結晶品。上海一隅的現銀，在民八的時候僅有四千萬圓左右，目下却已經到了五萬萬圓。十四年間的增加是十二倍！

就是居住在內地的軍閥、官僚、地主和紳豪，也大多數成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他們向農民搜括得來的金錢，或者以購買軍用品的方式流入帝國主義的囊橐，或者變成租界裏面的高樓大廈，或者

變成中外銀行的存款；事實上都不外是把農村裏所有的金錢搬到帝國主義的勢力圈裏面去。他們提出「維持秩序」的口號，然而這個口號的背景，不過是替帝國主義維持一個和平的市場，使它們可以向中國民族進行更精密的剝削；這樣才算盡了他們做代理人的職務。我並不是說社會秩序不應該維持，而是說在殖民地的經濟形態之下，「維持秩序」不能有更好的意義。

「匪」是一般人所認為是農村破產的原因的。我曾經指出，這是農村破產的必然的結果。歷史上許多「鋌而走險」的變亂，就是古代的政治家也承認是「民不聊生」的結果。當然，歷史上的農村恐慌，和目下的農村恐慌，內容是不同的。歷史上的恐慌——封建制度下的恐慌——是生產不足的恐慌，就是所謂饑荒；而目下的農村恐慌，却是長時期剝削之後，民窮財盡的恐慌。生產不足的饑荒，只要第二年雨水調勻，農作豐收，恐慌就自然可以過去。因饑荒而起的匪，自然也可以用剿撫兼施的方策，使之平服下去。目下的恐慌就不然，饑荒固然成爲恐慌，農作豐收也要成爲恐慌。民十八的大旱和民二十的大水，人民遭受財產的損失和食糧的缺乏，損失的補充和缺乏的供給大都仰給於國外。農村因爲金錢急激外流的結果，自然就成爲恐慌。去年各處農作豐收了，恐慌不單是不過去，而且還是格外的深刻化。因爲，農村經濟本來已經是日趨衰落，而外國農產物的傾銷造成農產品空前的跌價，又給

農民一個重大的打擊。有人在那裏埋怨農民不安分，在豐年也要暴動；這是因為他沒有懂得歷史演進的意義。

四 中國經濟今後的動向

這因衰落而瀕於破產的農村，它在歷史的路線上，只是工業化的一條出路。由半封建的農村的崩潰，蛻化而為工業化的農村，這是各國歷史所同然的。中國農村工業化的方式，逃不出下列的三種：（一）民族資本的農村工業化，（二）國際資本的農村工業化和（三）社會主義的農村工業化。目下的問題是：中國農村的工業化要採取那一種的方式？

我們不能說社會的變化應該取何種的方式，而只能說社會的變化祇能取何種的方式，社會的變化是不能用個人的意志定下一個理想的方案。那末，我們先問：中國農村可在民族資本勢力之下工業化嗎？世間一切的私有資本，只能流向安全而且有利的途徑。為甚麼中國的新興民族資本要集中口岸呢？這並不是因為中國的資本家沒有心肝，而實在因為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口岸，保護比較周密。有些軍閥官僚埋怨中國的資本家不把資本投到內地去，而沒有想到自己的洋房和存款也

一例的都在租界裏面。這樣，在整個的民族資本附庸於國際資本，整個的經濟組織在倒置的形態中存在着的時候，民族資本的農村工業化是不可能的。

我們再問：中國農村可在國際資本勢力之下工業化嗎？只有殖民地的政權，穩定在一個帝國主義勢力之下，農村才有工業化的可能。對農村的投資，和工業投資完全不同。工業投資可以集中在甚小的帝國主義炮艦控制下的口岸，而對農村的投資必然要深入廣漠的內地。這是非有絕大的政治勢力的保護不行的。事實上，中國歷來的統治者，對於人民的汗血可以讓別人榨取，而對於土地却不肯隨意任外人收買。這就是所謂「守土有責」。中國因為土地的龐大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對立，過去的幾十年當中既然沒有任何帝國主義能在中國確立一個單純的治權，今後國際資本的農村工業化自然更談不到。在這半封建農村經濟崩潰暴動盪起的時候，只有農村資本的外移可能，而決沒有任何資本輸入農村的可能。帝國主義自身正在矛盾而將近崩潰的時候，恐怕也沒有從容的時間容許它們工業化中國的農村。

那末，中國農村的工業化，恐怕只剩有社會主義的一種方式——就是農村在國有農場和集合農場制度之下工業化。恐怕也只有在一種方式之下，倒置的經濟組織可以變為順置，而一切文明

的設施，可以供我們的利用。然而，這個過程又是怎樣呢？

當前的災荒問題

一 是天災還是人禍

跟着人類文明的進步，天然的力量一天一天的減退——天然差不多已經變成人力的征服品了。有時牠雖然還要掙脫羈絆，肆其虐焰，而造成天災；但是在人力的控制之下，天災的損害力往往是有限。我們看到國外的來電，大書特書的天災，死傷人數也不過幾十人以至幾百人。這幾天報紙上轟傳的日本大水災到現在也僅僅不過淹死了二百三十人罷了。

只有在中國，我們除了有恐慌循環之外，還有天災循環。我們所有的恐慌，不但是比別國嚴重，而且循環的週期比別國短促。而我們所有的天災，循環的週期，在最近的幾年中間，也有日趨短促之勢；恐慌在歷史上，已經和所謂「災旱連年」的「末世」時代差不多。至于災情的嚴重，我相信更是中外古今罕有其匹了！最駭人聽聞者，則為湖北天門一縣，初傳淹斃十萬人；在岳口附近張家港，撈獲死屍一萬四千具（見七月十八日申報），以後報告數目減少甚多。但仍達一萬二千人（見八月三日

申報。中國人的性命，真太不值錢，無怪固執着馬爾塞斯人口論的經院學派經濟學者，認為中國需要以「大屠殺」手段解決人口問題了。

中國雖然以「災荒之國」著稱，但是，水利一項，自古就列為要政。「水利不修」成爲主要的「亂源」，歷史上是迭有記載的。我在過去的幾年間屢次的指出：中國的建設工作，首要的應該是水利建設。而不是高樓大廈和汽車路的建設。近年以來，水利建設雖然是比較的有关注意了。但是，注意的程度，依然是十分不夠。否則，災荒的循環，決不至如是其速，而災荒的嚴重，也決不至如是其甚。「人謀不臧」差不多已經成爲「定論」。假如有人提出是天災還是人禍的問題，恐怕我們至多也只好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吧！

二 災荒和封建勢力

任何的一個社會問題，往往都不是偶然的，並不是我歡喜提出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兩種勢力，而是深刻一點研究中國問題之後，我不能不有這樣的了解。就說水災問題吧！我們能否認長時期的官僚政治，使百政廢弛，水利失修，是災荒深刻的主要原因嗎？我們能否認軍閥的混戰和割據，使災荒

格外嚴重化嗎？官僚挪用水利款項，事前無防災建設，臨時又無搶險經費，致災情慘重，這是一件常有的事情。而軍閥在內戰中掘堤決水，以為自己戰略之助，也是斑斑可攷的事蹟。這雖然是幾個偶然的顯例，但是，官僚之漠視水利和軍閥之以隣為壑的必然性，却已經很明白的表現出來。

任何的國家需要一個統一，而封建勢力却是中國統一的內在障礙物。經過了幾次的革命之後，這個內在的障礙物究竟勢力低落了幾多，真是一個問題。而在最近的水災當中，便有甲省掘堤決水入乙省，乙省又掘堤決水入丙省的以隣為壑的怪事！

這封建和割據方式的防災和救災，都已經忘記了整個的民族。這是災荒中的現象，然而也是中國政治經濟各部門普遍的現象！

三 封建勢力中的土地問題

封建勢力的表現，也依然不是少數軍閥官僚的偶然的行動，而是整個中國社會性的反映。乾脆的說：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勢力的基礎。

在最近的水災當中，我們讀到下列的新聞：

「蘇省府在邳縣所築聖羊山堤、聖母山堤，引起魯人誤會，認爲以隣爲壑。八月三十日突來魯民兩千餘人，強將兩堤挖潰，狂流洶湧，漫溢出堤，中運水勢因而陡漲。」

——九·一·大晚報——

「海州防黃會電省及導淮工程處，請轉飭灌雲拆除四壩：『查六塘堤潰，東海、沐陽共守柴米河，冀圖萬一；當時灌雲退守鹽河，祇顧局部，不顧大體，業經陳明。現灌雲又在鹽河以東六里處之岑池、白蜆、牛墩、四河、高築水壩，阻止柴米河下注入海，以致柴米、叮噹等河堤頻相崩潰，全部勢將陸沉！……』現東海人民惶惶不安，已謀武力強挑灌境各堤，放水入海云。」

——九·三十·天津益世報——

我們讀了上面的新聞，真不啻是一個中國整個政治經濟的縮影！正是因爲這種封建割据形態的存在，政治經濟的各部門都有「只顧局部，不顧大體」的封建勢力的分布，所以內政是省自爲政，甚至縣自爲政，對外是小局苟安，與夫一隅之戰！

因爲最近黃災中的經驗，於是當局便有重劃省界的擬議。他們認爲假如省界劃得合理化一些，省與省間對於治黃及防黃問題的矛盾，就可以消滅了。但是我們看了上述的新聞之後，便知道這不

僅是省與省間的衝突，而且是縣與縣間的衝突。在事實上，對於水利和水患問題的衝突，甚至村和村中間，也是很嚴重的。在農村中間，連同住在一村內的甲姓和乙姓都往往要因水利問題而械鬥，乾脆的說：中國的水利變成水患，以及水患中以隣為壑的種種矛盾，並不是省和省以至縣和縣中間偶然的衝突，而實在是成爲目下封建勢力基礎的土地私有制發展的必然結果。

四 沙田湖田和水利建設的封建性

跟着人口的增加，用墾沙和填湖的方式以增加耕地的趨勢，隨而嚴重；水災也同時嚴重了！沙田和湖田，向來是紳豪的專利品，而同時是官僚的搖錢樹。比方，今年在江的右面漲了一塊沙，當地的紳豪便馬上占爲己有；勾通了沙田局內的官僚，用很低的代價領得部照，沙田就很合法的屬於他們了。以後，再在沙田沿江的一面，築了一條隄，江面也自然就少了。明年江左又漲了一塊沙。當地的紳豪也如法泡製，自然，私有的沙田便一天一天的多，而江面便一天一天的小了。

湖的情形，也正是這樣。只要是當地的紳豪，他們所有的沿湖的土地，會一天一天的放大，而沒有人會出來說半個「不」字。大規模的做法，他們還可以設立墾殖公司，和官僚串通一起，而大量的化湖

爲田。湖田日多，湖面日縮；湖的儲水量減少的結果，水災就自然日趨嚴重了。

要之，土地私有制既然是封建勢力的大本營，和土地有密切關係的水利設施，自然要充滿了封建性。於是，在中國的建設事業中，除了交通運輸方面的帝國主義勢力外，我們在水利方面又見到封建勢力。

五 結論

目下水災嚴重的原因，不但由於水利消極的失修，而且也由於水利積極的封建性的建設——水利建設因此往往便變成水患之源。而封建性水利建設的基礎，却就建築在土地私有制上面，所以，要根本解決災荒問題，只有先解決土地問題。零零碎碎的主張「以田還湖」「以田還江」……是不會有多大的效果的。至于怎樣解決土地問題那是本題以外的文章了。

中國國際貿易之檢討

一 緒言

在一個統計事業落後的中國，有久遠歷史的海關報告數字，自然是比較可靠的數字。但是倘使我們單只是很機械的引證一些海關數字做根據，不更辯證法的研究那些數字底內容，而貿然的就此去論斷關於中國的一切，那便有時不免要上當。這是形式邏輯底缺點，也就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地方。

用地域的觀點去研究中國問題和用中國國民經濟的觀點去研究中國問題，是絕對不同的兩件事。比方，在中國的工業，並不一定是中國民族工業，而且，非民族工業占了很重要的成分。所以標了「在中國製造」的商品，倘使有人認為就等於「中國國貨」，那便變成笑話了。

有一位金融界先輩遊歷了中國內地之後，慨然的對人說：「住在上海的人，真不啻是置身異域！」上海是中國的「經濟首都」，把「上海」和「異域」聯繫在一起，中國到底已經是如何的景象呢？

我以為今日做中國人民的，倘使依然不起一些「請問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的感想，那就真變成沒靈魂的動物了！

但是，受了較深的麻醉教育的人們，却不願意聽到這些。我們多說幾聲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他們就要譏笑這是在玩弄「洋八股」。我真奇怪：為甚麼用自然科學的定義，說中國是大陸國或者溫帶國，都不算洋八股，而用社會科學的定義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就算洋八股呢？好在，真理畢竟是真理，而事實也畢竟是事實；一談到現實問題，誰在玩弄洋八股，就會很明白。如上文我們說到中國民族工業，說到上海，誰還能對半殖民地的稱謂，加以否認嗎？

剛剛相反的，只懂得形式邏輯的帝國主義代言人，才是玩弄洋八股。「中國底一切都是中國的」，這是典型的形式邏輯的說法。這種說法，一面固然籠統武斷和不切實際，一面却是欺騙中國人民的極好詞令。這才是道地的洋八股。

本文的目標，就是想多揭露出來一些關於中國國際貿易問題的「真相」。在輸入方面，我們除了依照海關報告推求出來原料品和製造品間的興替之外，還應該進一步根據別種資料，找求出來這種興替對於中國民族工業的影響。在輸出方面，我以為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是中國在原料供給

的途徑上，究竟已經進展到什麼地步。對於入超問題，我們要把入超是否有害於中國的問題，作一個分析；而東北被奪以後入超底形勢，更應該指出以促一般人底注意。在輸出入國的分析上，要聯繫到國際對中國的形勢；而在輸出入港的分析上，更應該注意到所謂中國經濟畸形的發展問題。

二 國際貿易衰落中的中國國際貿易

自從一九二九年世界大恐慌爆發以後，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現實的國家主義突破了幻想的國際主義。關稅壁壘之高築、匯兌統制和限制輸入之嚴厲施行；中古時代的鎖國主義，在新的姿態之下重新表現出來。經院學派的「國際分工」迷夢，至此遂打得粉碎；資本主義不能致世界於大同，已經是「圖窮匕見」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國際貿易所受的打擊，自然是十分嚴重。依據一九三四五年國際統計報告，最近五年間世界貿易和中國國際貿易數字是這樣：

（單位美金百萬圓）（註）

表一：世界貿易與中國貿易之比較

（註）美金成色，以未貶值前之純金一·五〇四六三格蘭姆為準。

全世界

	輸	入	輸	出
一九二九	三五、五八五	三三、〇二一		
一九三〇	二九、〇七六	二六、四八三		
一九三一	二〇、七九五	一八、九〇八		
一九三二	一三、九七二	一二、八九五		
一九三三	一二、四八四	一一、七四〇		
一九三四	一二、〇一一	一一、三六四		

東本東本東本東本東本東本東本東本
北部北部北部北部北部北部

	輸	入	輸	出
一九二九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九三〇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九三一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九三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九三三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九三四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一〇、四六二

中國

面，中國貿易底衰落是特別的厲害罷了。

觀於上列的數字，可知對外貿易之衰落，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並不獨我國爲然。不過在輸出方面，中國貿易底衰落是特別的厲害罷了。

三 中國國際貿易在國民經濟上的重要性

在世界列國中，中國國際貿易底地位，是很低微的。牠和歐美許多先進國家比較，固然是望塵莫及；就是在亞洲，不但比不過日本，而且還在印度之下，輸出貿易甚至比荷屬東印度和英屬馬來亞都

(註) 原數字爲估計數，已照國聯統計月報修正。

要少。因此，有許多人便在那裏歎息：這樣一個土地廣大、物產豐盈的國家，國際貿易地位，要低落到這個地步！

我個人的意思，以為中國目下對外貿易之不振，自然是一種不良的現象；不過，對外貿易是不是中國國民經濟底重心，我們在國民經濟觀點上，應該不應該過分重視對外貿易，却是另外一個問題。關於這問題，我們可以分三層來解答：

第一、在理論上，一個國家底對外貿易，原不過是國民經濟之一部門，而並不是國民經濟重心。也可以說：對外貿易是國民經濟建設底一種手段，而並不是國民經濟建設底目的。什麼是國民經濟重心呢？那自然是產業。而只有在產業開發以後，對外貿易之發展，對於民族才有利益；不開發產業而空談發展對外貿易，那恐怕逃不出是拿汗血去掉換消耗品吧？自然，產建設業也不能不利用對外貿易，以取得新式工具之供給！因此，對外貿易便成爲國民經濟建設的一種手段。但是，我們當然不能說：國民經濟建設是發展對外貿易的手段。這些，本來都是很粗淺平凡的理論；是因爲近來有一班「買辦迷」的學者，過於「醉心」對外貿易，所以不惜在此地反復說明一下。

第二、在國際貿易過程中，受益的往往是帝國主義，而損失的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什麼「有無

互通」「各得其所」……一套話，準確性都是有限度的。倘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也要倡出這一套調子，那不是受愚，便是自欺，或者更是有意欺人。殖民地 and 帝國主義間的貿易，初期往往是原料和工業的交換。因為殖民地生產手段底落後，牠必須用較長時間的勞動結果——較大的價值——去調換帝國主義較短時間的勞動結果——較小的價值。這種不等價交換底結果，殖民地貿易底入超往往是必然的——要呢，除非是天然條件特別有利。這種時期經過了之後，殖民地工業品輸出，也許會慢慢的增加起來，而且可以由入超變為出超。但是要注意，那輸出的工業品並不是殖民地民族資本底生產結果，而是帝國主義寄生資本底生產結果。一個生產落後的國家，必須在初期就定立下來以對外貿易為國民經濟建設底手段的政策，利用當時比較有利的天然條件——如地廣人稀的條件，以農產品去調換生產工具，很迅速的建立起來民族工業基礎，使上述的不等價交換時期縮得很短，牠才能儕於富強之列。否則，假如只是無條件的、盲目的高倡發展對外貿易，那末，不等價交換時期底延續，就可以使民族力量消耗淨盡，而帝國主義反可以利用這個時機，發展牠的寄生工業資本，當地的民族工業便要永無抬頭之日。目下的中國，差不多已經是這樣的情形；我真不解，何以我們的經濟學家，竟還要主張儘量接受成本低廉的外國消費品，以提高人民底「幸福」。我想，用中古時

代的生產手段的人民，而想要永遠儘量的享受現代的消費，那只有「天降之福」吧？

第三、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大陸國，即使在有無互通底意義之下，國內貿易之開發，也較對外貿易尤為重要。就是在目下工業生產尙未發達，我們只要能夠改良運輸，消滅封建方式的國內市場割據和阻礙貨物流通的苛捐雜稅，至少也可以減少一二億元的輸入。然而，我們的士大夫們，却要一味提高對外貿易底重要性，以消滅大家對於國內貿易的注意。我們有國際貿易局，有國際貿易協會，何以對於國內貿易，沒有同樣的組織？固然，推銷國貨和農產運銷合作的組織，是有了一些了；然而，牠們的工作方向，或者是片面的注重工業品，或者並不注意於國內市場。

我提出以上的三點，並不是說我們應該重新閉關自守，而是希望大家站在國民經濟底立場，給對外貿易一個公允的估價，為對外貿易訂立一個正確的政策。倘使仍然想做恢復國際貿易繁榮的中流砥柱，只在推銷別國底過剩消耗品和供給別國以原料品的方向努力，那就只有促進中國底殖民地化。

四 中國國際貿易價值的變化

中國近年對外貿易底衰落，上文已經列舉以美金表示的價值，約略的加以說明了。現在再把海關報告的數字，列表如下（單位百萬圓）

表二：中國對外貿易及指數

民國元年	輸 入		輸 出	
	指 數	數	指 數	數
六年	八五六·一	一一六·一五	七二一·二	一二四·九四
十一年	一、四七二·三	一九九·七六	一、〇二〇·〇	一七六·七五
十六年	一、五七八·一	二一四·一一	一、四三一·二	二四七·九三
十八年	一、九七二·一	二六七·五五	一、五八二·四	二七四·一二
十九年	二、〇四〇·六	二七六·八五	一、三九四·二	二四一·五一
二十年	二、二三三·四	三〇三·〇〇	一、四一七·〇	二四五·四六
廿一年	一、六三四·七	二二一·七六	七六七·五	一三二·九六
廿二年	一、三四五·六	一八二·五五	六一一·八	一〇五·九八
廿三年	一、〇二九·七	一三九·七〇	五三五·二	九二·七二

照上列的數字，自民元年至民二十年為止，貿易增加甚速。增加原因，在民十八年以前幾年中間，自然是由於當時世界經濟，尚在繁榮；民十八年至民二十年間的增加，却是由於金貴銀賤底反映——中國物價底高漲。關於這點，我們參看表一，就可以明白——以美金計算，那時期中的貿易額，已經銳減。

民二十一年以後貿易減少之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各國紛紛放棄金本位，中國幣價在國際匯兌市場中，不斷高漲，進口貨價由外幣折合國幣，無形減少，出口物價也因為外幣跌價被迫降低；而主要的原因，却是由於「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後國內經濟之衰落和東北七口貿易額之不復列入海關報告。我們假如把「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七口貿易額仍舊列入，那末，民二十年以後的貿易額應如下表（單位百萬元）

表三：「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所喪失之貿易額（註）

（註）本表數，字採自一九三四—五年國聯統計年報，原文資料，聲明係根據我國海關報告及僑滿財政部之貿易報告，而

除去中國本部和東北間的貿易。這些數字，大體當然不會錯，不過是否完全正確，還不敢斷言；尤其，二十二年所列中國本部的輸出額，較表二所列者為大，是很可懷疑的。因為一時不及做這個考據工作，一切姑照原文。

計」欄，作成另一組指數，加以比較：

我們爲明瞭東北貿易喪失底嚴重性起見，最好是把民十五年以後的貿易額，先根據海關報告數字作成一組指數，再把民二十一年以後所喪失的東北貿易額加入之後——即根據表三底「合計」欄，作成另一組指數，加以比較：

表四：喪失東北貿易後之貿易價值指數

民國十五年	喪失東北後之貿易指數		假定不喪失東北之貿易指數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民國十五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二十年	一二七	一〇五	一二七	一〇五
二十一年	九三	五七	一〇三	七五
二十二年	七七	四六	一〇二	七三
二十三年	五九	四〇	九〇	七〇

看了上表的數字，我們便可以見到：單就貿易額而言，東北四省底喪失是給中國民族怎樣的一個打擊！對於入超的關係且待下文說明。

又，年來私運底猖獗，自然也和貿易額底減少有關；這層也在下文討論。

五 中國國際貿易量的變化

對外貿易量的變化，和國際收支是沒有關係的。牠所能表示的，在輸入方面，是人民享用底進步或者退步，然而還要加上國內貿易項下各口岸淨輸入，和國內生產狀況。在輸出方面，可以表示人民勞動報酬底增減——假如輸出數量不變，而價值減少，自然是人民底損失。然而，這也要和輸入方面比較；倘使輸入方面也是同樣的情形，那種損失也許已經在消費底便宜上面得着了抵銷了。這種意義，本來在輸入物價和輸出物價指數的比較上，已經可以見到；譬如，中國輸出物價和輸出物價指數，近年來是在剪刀形的發展着——正和別國工業品價格和農產品價格間的發展一樣，這顯然表示中國人民是大大的吃虧。但是，倘使同時能在貿易量的數字得着一些結果，也是很有興趣的。

關於貿易上量的變化，在若干國家裏，是有官書的報告的；牠是用重量來表示的。自然，這種表示

是很不精密的；然而，因為量底單位太複雜了，一定要「布幾疋」「呢幾碼」「米幾担」「糖幾斤」——的表示起來，又不免過於繁複；所以，這個統計是很困難的。

中國海關報告，自然有各類商品底數量，但是並沒有單純以重量表示的總數。船舶進出口的噸位是有統計的，但是包括航行近海和內江的船舶，而且是載重噸數，不是裝貨噸數；所以和對外貿易量的問題無關。我們要在這問題求一概略的解決，依然還是要應用物價指數。我們拿民十五年基準的物價指數除表四民國十五年基準的貿易價值指數，——以輸入物價指數除輸入價值指數，輸出物價指數除輸出價值指數——應該可以得着一些量的增減底概念。（註）

表五——由物價推求出來的中國貿易量的變化

年 份	喪失東北後之貿易量指數		假定不喪失東北之貿易量指數		上海物價指數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民十五年	100.0(100)	100.0(100)	100.0(100)	100.0(100)	100.0	100.0
二十年	84.5(127)	97.7(105)	84.5(127)	97.7(105)	150.2	107.5
二十一年	66.9(93)	63.1(157)	73.4(103)	83.0(75)	140.2	90.4
二十二年	58.2(77)	56.1(46)	77.1(102)	89.0(73)	132.3	82.0
二十三年	44.7(59)	55.8(40)	68.1(90)	87.6(70)	132.1	71.7

上表括弧內的數字，就是表四所列的貿易價值指數。我們拿量指數和價值指數比較一下，要得着一個可怕的趨勢，就是：

- (1) 輸入方面，量指數經常的低於價值指數；
- (2) 輸出方面，量指數經常的高於價值指數。

這就是說：因為輸入物價和輸出物價剪刀形的發展，我們在輸入方面享用上的減少，甚於金錢支出之減少；而在輸出方面，收入代價之減少，則甚於交出商品之減少。假如目下的輸出入物價能和民十五年一樣，或者輸入輸出雙方物價，各依同等的比率漲落，而不是剪刀形的發展，那末，這幾年來的入超數，就可以大大的減少。這一點，且待下文加以分析。

中國購買力之衰落，本來在貿易價值指數上，也已經可以看得出；可是用量指數來表示，衰落狀

(註) 民十八年以後輸入物價底高漲，與稅率增高有關。如欲求更準確一些的「量指數」應該再把這個因素加入，加以糾正。年來進口稅「平均稅率」增加底形勢，經濟統計月誌有下列的數字：

年份	平均稅率
民十七年	三·八九
民十八年	八·四七
民十九年	一〇·三七
民二十年	一四·〇九
民廿一年	一四·四五
民廿二年	一九·七四

二十三年	棉花 九〇・三	鋼及鐵 八六・二	米 六五・八	機器工具 五〇・三	紙 四九・六	金屬製品 (註) 四三・〇	化學製品 四二・〇	煤油 三九・八	顏料 三八・九	車輛船艇 三七・〇
二十二年	米 一四四・七	棉花 九六・七	小麥 八八・二	煤油 八七・四	鋼及鐵 八八・八	金屬製品 (註) 六三・一	棉布 五九・二	紙 四九・七	糖 四二・二	顏料 四〇・〇

(註) 所謂「金屬製品」係指「機器工具」及「車輛船艇」二項以外之製品。

(乙) 輸出品

二十三年	茶 三六・一	棉紗 三三・三	蛋及其製品 四〇・二	桐油 二六・二	生絲 三三・五	皮貨 三三・七	金屬及其製品 二二・五	花邊 一九・四	棉花 一五・二	豬鬃 一五・一
二十二年	生絲 四八・八	棉紗 四〇・〇	蛋及其製品 三六・五	茶 三四・二	桐油 三〇・三	棉花 三〇・二	金屬及其製品 三六・五	綢緞 二六・二	皮貨 二五・一	花邊 一九・六
二十一年	大豆 六六・一	生絲 五二・〇	蛋及其製品 四四・三	雜糧 四〇・〇	茶 元六・六	荳餅 三六・八	棉花 三三・二	花生 三〇・三	棉紗 二九・八	綢緞 二六・八
二十年	大豆 一八八・〇	生絲 一三三・〇	荳餅 八五・一	蛋及其製品 五八・八	棉紗 五三・三	雜糧 五三・〇	茶 五八・八	煤 四四・四	花生 四三・六	棉花 四三・〇
十九年	生絲 一七〇・一	大豆 一四九・〇	蛋及其製品 九二・二	荳餅 七二・一	雜糧 六三・九	桐油 四七・六	煤 四三・二	皮貨 四一・四	棉花 四二・三	茶 四一・〇
民十五年	生絲 二四七・二	荳類 一八八・二	荳餅 二五・六	植物油 八九・四	蛋 五九・五	棉花 四八・二	綢緞 四三・三	生皮 四三・〇	煤 四二・一	茶 四〇・八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位	第七位	第八位	第九位	第十位

我們檢閱上表，最堪注意的一點，就是棉布輸入，由第一位降到第十位以下，棉紗由輸入之第六位轉變為輸出之第二位，棉花在輸入方面，由第二位升至第一位，在輸出方面，由第六位降至第九位。這是一般人所認為中國紡織業底進步；甚至認為是中國由原料供給國變為工業品輸出國的特徵的。

關於這個問題底解答，我們應該先研究所謂中國紡織業，牠的內容究竟是怎樣。依據華商紗廠聯合會發表的數字，中國紡織業中，各國資本勢力之分配，有如下表：

表七：中國紡織業各國資本勢力之分配

	華廠所占百分數	日廠所占百分數	英廠所占百分數	共計
紗錠	五七·九七	三八·一二	三·九一	一〇〇
線錠	三二·四七	六六·九〇	〇·六三	一〇〇
織機	四八·八五	四四·四〇	六·七五	一〇〇

所謂佔民族工業第一位的紡織業，表面上的數字已經是這樣——內裏的華廠基礎動搖，日廠進展不息的情形，姑且不提——誰能說中國紡織業底進步，就能代表國民經濟的進步呢？中國倘使

照這條路線轉變為工業品輸出國，是中國民族的利益嗎？

其次棉布輸入的銳減，我們也不能用「國內紡織業進步」一語，糊裏糊塗的把牠敷衍過去。因為，棉布的消費，是平民生活底寒暑表；着眼於國民經濟的人們，是應該給牠一個明確的分析的。我們且把棉布進口價值、棉花消費量、棉紗輸出價值及棉布輸出價值四項數字，分列下表，加以察看：

表八：中國消費棉布力量變遷之推測

	十九年	二十年	廿一年	廿二年	廿三年
棉布輸入價值(單位百萬元)	二〇六·一	一六七·一	一一三·〇	五八·二	二六·八
	——根據海關報告				
棉花消費量(單位千担)	八、九三九	八、八五九	八、九六五	九、〇九五	九、四一八
	——根據華商紗廠聯合會報告				
棉紗輸出價值(單位百萬元)	二九·五	五三·三	二九·八	四〇·〇	三一·三
棉布輸出價值(全上)	一五·三	一九·一	一六·七	一九·六	八·七
	——根據海關報告				

從第一項數字，我們可以看到：棉布輸入價值之低落，實為可驚。然而，這並不要緊，只要同時棉花

消費量增加很多，那末，國內紡織業發達，生產棉布也許足以補償輸入棉布之減少。可是，依上表第二項數字，五年間棉花消費量之增加，僅僅不過四十七萬九千担；不論照百分比或者照價值計算，較之棉布輸入減少的形勢，都「不啻天壤」。無疑的，棉花消費底增加，遠不足以抵償棉布輸入底減少。然而，這依然不能確定人民消費棉布之減少。因為，倘使我們本來有很大的棉紗和棉布底輸出，那末，即使棉花消費量增加不多，而這種輸出之減少，也可以抵償棉布輸入之減少。但是，第三項及第四項數字，表示這種輸出之原來數字和增減情形，都是無足輕重的。所以，由上表以觀察，我們可以斷定：年來人民生活之低落，依然是可怕的。

自然，東北四省之被佔，是要影響上表底數字的。不過，民十九年棉布輸入價值中，屬於東北七口者，僅五千萬左右；而東北四省人口，亦僅三千萬人，與全國人口四億五千萬人比較，其影響於棉花消費量者，不過百分之六·六七。所以，我們即使估量到民二十一年以後棉布輸入和棉花消費都因為失地的關係而自然或者應該減少，但是，這種減少成分，依然不足改變上述人民生活低落之趨勢。

第二點使我們注意的，就是糖輸入之減少——由民十九年之一億三千四百萬元跌至民二十三年之三千三百萬元。這一部分固然是由於人民購買力低落和失地關係；然而，主要的原因，却是由

於年來糖進口稅率提高後私運之充斥。糖和人造絲私運變成某國浪人和軍人底專利事業，已經成爲公開的祕密。這種超不平等條約的侵略，連美國經濟攷察團報告裏，都已經大書特書的指出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能相信「苟且」可以「圖存」嗎？

第三點使我們注意的，是生絲輸出額由民十九年之一億七千萬元降至民二十三年之二千三百萬元。這很顯明的，是由於日絲在海外市場之傾銷。

第四點是大荳輸出額在民十九年達一億四千九百萬，而至民二十三年，僅有十數萬元。這完全是東北失地底關係；因爲大荳是東北特產。

七 輸出入國地位之變遷

遠東市場之奪取，是近數十年來帝國主義間的一個重要問題；爭奪的手段，不單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的，甚至是軍事的。年來日本對中國的軍事行動，也不過是爭奪中緊張的一幕罷了。這內中的情形，我們在對外貿易輸出入國底消長上面，可以得着一些解釋。

現在根據海關報告，把主要輸出入國五年來地位之變遷，列表如左：（單位百萬元）

表九：主要輸出入國地位之變遷

	(甲) 輸入				
	民國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英國	一六八・七	一八六・九	一八五・七	一五四・〇	一二四・六
香港	三四〇・二	三四六・〇	九四・五	四八・五	二九・六
英屬印度	二〇五・九	一三二・七	三九・六	三四・八	三二・二
日本	五〇九・七	四五二・一	二三一・三	一三二・四	一二六・九
台灣		八・六	四・〇	二・三	二・六
美國	三六二・一	五〇〇・七	四一九・五	二九七・六	二七一・七
法國	二六・五	三三・八	二四・二	二三・八	二二・四
安南	四三・九	一七・九	八一・六	七五・五	四一・六
荷蘭	一六・七	二一・一	一三・七	一〇・七	七・七
荷屬東印度	七五・三	八五・四	九一・七	七九・五	六三・四
德國	一〇七・七	一三〇・一	一一二・〇	一〇八・〇	九三・四
(乙) 輸出	九九・四	一〇一・五	五九・四	四九・二	四九・八

香港	二五七・〇	二三七・二	一二二・一	一二五・一	一〇一・〇
英屬印度	二六・五	二八・三	二九・一	二四・五	一八・四
日本	三四五・〇	三九六・六	一七一・六	九七・四	八一・二
台灣		二四・五	一一・二	三・五	三・四
美國	二〇六・六	一八九・〇	九五・〇	一一四・八	九四・四
法國	六六・九	五三・五	三五・八	三二・四	二一・一
安南	六・六	三・九	四・二	四・三	四・八
荷蘭	七〇・二	七七・二	一三・三	一二・二	一四・七
荷屬東印度	一九・七	二一・二	九・〇	七・六	七・一
德國	三六・九	三六・六	四六・九	二一・一	一九・二

上表所列各國底取捨標準，我覺得應該先加以說明：

(1) 英國之外，再列香港及英屬印度，是因爲後二處在我國貿易上所佔數字，的確是相當的重要；同時，我們致慮英國在遠東的地位時，也應該把殖民地關係，擇要加入。

(2) 台灣在我國貿易上，地位並不重要；但是，因爲在民十九年時，台灣貿易，海關報告上尙與日本混在一起，所以，爲比較計，只好將其列入。

(3) 法國和荷蘭，與我國貿易關係，都並不大；但是，法屬安南和荷屬東印度，與我國貿易關係，却不算小，所以就牠們一併列入。

從上表我們所能看到的，第一是英國在華勢力，並沒有多大的衰落；貿易減少的成分，遠較美日爲微。香港貿易，本來大多數是通過貿易；牠原來不但是中國和南洋各埠間貿易底集散港，而且兼及日本、台灣以至歐美各國；同時，華南各埠的國內貿易，也往往經過香港。近年來貿易數字之低落，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爲我國海關變更辦法，對於輸入品儘量查明起運地，輸出品儘量查明最後目的地，所以並不是實際的衰落如此嚴重。還有，我們倘使把英國屬地貿易數字，一併加入計算，就可以看得出：英國在中國貿易關係，依然是很大。因此，我們或者可以推定，英國對於遠東問題，是不肯對日本作甚大的讓步的。

第二、美國在中國貿易底進步，在「一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民二十年中，是可驚的。這種進步，一面促成日本向中國的軍事侵略；而另一面，也要使美國格外重視太平洋問題。有人以爲在美國的貿易總數中，中國所占成分甚微，因此認爲美國不至關心中國問題，尤不至因爲中國而開罪於貿易關係更大的日本；這是完全錯誤的。我們不必提出美國向外的發展，只剩了太平洋一條路，也不必提出美

國人心目中對於中國市場希望之遠大，而只須想到一點：萬一美國能夠戰勝日本，奪取了中國市場，美國原來輸出於日本的原料，就可以自己加工而直接輸入於中國，不必再經由日本之手，加了工之後輸入於中國。

第三、日本在我國貿易上，本來是佔了領袖地位；「一九一八」事變之後，却成了一落千丈之勢。可是，牠在東北貿易底發展，是可驚的。據日本大藏省發表的數字，近三年間日本對「滿」及關東州貿易，有如下表：（單位日金百萬元）

表十：日本對東北貿易之發展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輸出	七七・四	一四六・五	三〇三・一	四〇二・〇
輸入	一三二・一	一二八・三	一六八・一	一九一・四

日本向東北輸出畸形的發展，一部分和中國目下私運問題有關。因為大連成爲華北私運底中心點，已經是不可爭的事實；而上述數字中，運赴關東州的，常占三分之二左右；那中間就包含着私運貨物底來源。但是，大部分還是代表日本在東北的新投資。「一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東北的投資，據

近日報載，實達日金五億圓之鉅；照上述對東北輸出數字底發展，這個報告應該是正確的。但是，所謂日本對東北的投資，大部分還是用在軍事上的設備，如軍用鐵道、公路、飛機場、電台以及軍港底建設，那原料都必然是用對東北輸出方式供給的。這種含有火藥氣味的輸出畸形的發展，日本自然也知道不能持久，而這種輸出所轉變的投資，那穩妥性和收益，更是一個大大的問題。所以，一面顧慮到對華貿易穩定的發展及戰時資源之供給，一面再看到日本商品之到處碰壁，牠就下決心獨佔中國市場。這是目下太平洋問題底一個癥結。

最後，我們看到：法荷二國，對中國貿易關係，雖然不大；然而，他們的殖民地對中國的貿易關係，却不算小。因此，我們應該認識，牠們對於太平洋問題，也不見得是一味袖手旁觀的。

八 輸出入港地位之變遷

輸出入港地位之變遷，比較的不算大。上海是始終維持着牠首席的地位，不過有日趨重要之勢；在最近兩年間，牠不但在輸入方面占了過半數的貿易，在輸出方面也占了過半數。依據民廿三年的貿易數字，除了上海占總額百分之五五·四二外，天津占百分之一一·二九，居第二位；膠州占百分

之五·三二，居第三位；廣州占百分之五·一四，居第四位；九龍占百分之五·一二，居第五位；漢口占百分之二·六七，居第六位，此外不必提了。

大連在「一九一八」事變以前，原占第二位，而且是最大的出超港，哈爾濱和安東，當時也是比較重要的出超港；這幾個港口貿易之喪失，使中國入超額自然的加大。

上海在民八年以前，本來是一個最大的出超港；民八年出超數，就達一億四千萬元。目下呢，牠轉變為一個最大的入超港；民廿三年的入超數，達三億二千八百萬之巨。長江流域之貧窮化，在這裏可以找到主要的原因；而現銀不斷流入上海的形勢，也可以得着一個解答了。

九 貿易入超與金銀移動

我們研究貿易入超問題，最好是同時研究金銀出入超狀態。現在先根據海關報告作成下表：

(單位百萬元)

表十一：貿易入超與金銀移動

年 份	銀		金	
	入 超	出 超	入 超	出 超
民前七年	三四一·五	一一·二	一一·〇	一·五
民前二年	一二八·〇	三四·〇		
民四年	五五·五	二八·六		二七·一
九年	三四三·七	一四四·三		二七·三
十四年	二六七·二	九七·四		一·六
十九年	六四六·四	一〇三·九		二五·八
二十年	八一六·四	七〇·八		五〇·〇
廿一年	八六七·二	一〇·四		一〇九·三
廿二年	七三三·七	一四·四		六九·四
廿三年	四九四·五	二五六·七		五一·六

高，上文已經說過了。廿一年入超底增加，東北失地問題，影響甚大；東北七口該年出超數，實達一億五

民十九至二十年間入超之激增，是由于銀價猛跌所反映的輸入物價之高漲和進口稅率之提

千八百萬元。不過，從廿一年以後，因為日本在東北軍事建設底猛進，東北貿易也變成入超了。

因為白銀在國際市場上曾經變成普通商品，所以，我們在研究中國貿易問題時，最好是把白銀移動狀態同時加以注意。國際間幣材底移動，本來是最後平衡國際收支的一種手段；但是，過去幾年間白銀底移動，却完全是商品性的。這種移動不但不能平衡國際收支，而且要增加平衡國際收支的困難。比方，民九、十九、二十各年，一面貿易入超甚大，而另一面白銀入超亦甚大。中國除須以金貨償付貿易入超外，還要以金貨償付白銀入超，不然呢，便要負債。大概，十數年來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時候，往往是銀價趨跌的時候。因為白銀底產地和主要市場，都在國外，所以，生產過剩的現象，先見于國外，跌價也先起于國外。這時，中國銀價往往要比國外高，白銀便要大量流入；即使銀價並不較高，白銀在中國的地位，那時候也較國外為佳——在國外，白銀是普通商品，要負擔儲藏費用，而在中國，不但沒有負擔，而且可以賺取利息。這種地位的差殊，也可以誘致白銀底流入。民九、十九、二十各年，白銀流入數量頗大，而當時銀價，均在趨跌；這就完全是商品性的表現。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國際收支處于順勢的表現——認白銀流入是正貨底輸送，那是錯誤的。

貿易入超底利害問題，目下各方意見，頗不一致。自然，倘使我們處今日時代，還要固執着重商主

義的見解，認一切貿易入超都于國民經濟有損，那不單是機械論者，而且是陳腐頑固的機械論者。但是，反過來，倘使我們拾取一二歐、美經濟學家底唾餘，而認一切貿易入超都斷然無害，或者甚至有利，那也逃不出是機械論者。入超之爲利爲害，是要檢查入超底內容才能決定的。

入超有利論者之見解，第一是說中國應當注重國外貿易，應當儘量享受外國成本低廉的物品，這點已經在上文加以批評了。第二是說入超所轉變的國際投資，可以使中國工業化。這一層是要細加研究的。

先看輸入品底內容吧。在海關報告內，與工業建設有關的輸入品，重要的只有「金屬」、「機器工具」、「車輛船艇」、「他種金屬製品」四類，我們且把這四類輸入品底價值和輸入總額及入超總額比較一下（單位百萬元）

表十二：輸入品中有關工業建設項目之成分

	民十九年	民二十年	民廿一年	民廿二年	民廿三年
金屬	一一七·六	一三二·二	九三·九	九七·〇	一〇三·九
機器工具	七二·二	七一·五	四九·八	三〇·六	五七·三

車輛船艇	四六·五	四五·二	二九·五	三六·三	三七·〇
他種金屬製品	六七·一	六六·三	四四·三	六三·一	四三·〇
合計	三〇三·四	三一五·三	二一七·五	二二七·〇	二四一·二
輸入總額	二、〇四〇·六	二、二三三·四	一、六三四·七	一、三四五·六	一、〇二九·七
入超額	六四六·四	八一六·四	八六七·二	七三三·七	四九四·五

我們一看上表，就可以看到：有關工業建設物品之輸入額，不單是在輸入總額中，所占成分甚微，就和入超額比較，也不如遠甚。這已經很顯明的告訴我們：過去中國輸入貿易之進展，以及入超之增加，與工業化問題沒有多大的關係。我們倘使再檢查一下輸入有關建設物品底內容，恐怕還要發現：那中間充作租界中高樓大廈建築之用者，恐怕所占成分也很大；而供一般日常應用之需者，為數也決不在小。此外，含有高度奢侈性的汽車，私人飛機以及軍用物品所佔成分，也相當的重要吧？那樣，能留給工業建設之需的，還有幾何呢？

自民十七年進口稅率提高以後，國內工業一度發展，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然而，這新發展的工業，屬於外資者究有若干，屬於民族資本者又有若干，託庇于租界者更有若干。倘使把這三點再加研

究，那末，這幾微的「工業化」究竟與中國國民經濟有多少關係，也成爲問題之問題了！

從另一方面看，輸入品中，農產物——尤其糧食——輸入金額，是如何的巨大，我們一看表六，就可知道。有人以爲這也是和我們有利的，因爲糧食底大量補充，可以防止「大屠殺」。我們在災荒的時候，不得不輸入糧食，這是對的；但是，倘使說我們應該任聽這種狀態延長下去，預備永久的接受國外成本低廉的消費品，而不設法免除這多半是由于「人謀不臧」的水利設備廢弛和封建割據的水利建設所造成的「天災」，更不設法去運用這逐年補充糧食的大量資金，以作糧食自給的企圖，那能算是爲中國國民經濟打算嗎？

糧食之補充，能否防止「大屠殺」，還是一個問題。我們只看近年糧食大量補充，而屠殺依然未減，可見這一味藥，不能根治這一種病。恐怕中國「大屠殺」底原因，往昔固然是往往由于糧食問題，而自從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以後，軍閥官僚對人民的屠殺，以及軍閥的內戰，大部分還是和糧食問題無關吧？

在國際貿易的觀點，我們最好是把過去的白銀輸入，也當作商品輸入看待。倘使那樣，民廿一以前幾年間的入超數就要加大了。這大量的入超，自然要有一部分變爲外人在華投資。這種投資，除上

文所說，一小部分變爲外人直接經營的在華產業以外，大部分的投資，恐怕就在租界地產上面。這就造成民十八、九年間上海地產畸形的發展。這種發展，在當時是使市民受到高度的剝削，使資金由內地流入上海，更使資金由生產部門移到地產投機上去；而在今日却成爲金融恐慌底重要因素。我們且再估量一下：這種無計劃的，受動的由入超轉變爲外資，和中國國民經濟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我們應該歡迎這一類的外資嗎？我們應該歡迎這種入超嗎？

十 結論

中國應否重視對外貿易？中國應否無條件的重視對外貿易？中國應否因襲過去的方式，重視對外貿易？這是當前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的解答，上文已經指出：對外貿易不是國民經濟底重心；國民經濟底重心，是民族資本底發展，而對外貿易只能作爲發展民族資本的手段。我還指出：目下中國的對外貿易，是半殖民地底對外貿易；這種貿易，對中國損失很大，所以早就應該訂立下來以對外貿易爲建設民族資本的手段，使這種貿易時期縮短。我更指出，就中國的天然條件着想，中國對國民經濟建設的努力，應該是傾

向着自足自給的途徑，注意于國內貿易底發展，而不是盲目的提倡對外貿易。

這全世界注目的「遠東市場」中國人自己爲甚麼不注意一下？假如說我們可以放棄國內市場，而以爭取國外市場爲補償，那恐怕逃不出是替敵人打算、欺騙人民、轉移人民目光的一種說法吧？沒有飛機、軍艦和大砲作對外貿易保障的中國，憑什麼力量去奪取國外市場呢？自己家裏被盜匪洗劫的人，能到盜匪窩裏去掠奪嗎？然而，似乎還有人覺得：爲整個的國際貿易自由計，中國應該首先撤廢關稅壁壘，以資提倡呢！中國到這種田地，還能夠，而且應該，做這樣一個全世界砥柱中流的英雄嗎？

然而，中國底貿易問題，也正和其他問題一樣，並不是容易解決的，更不是可能單獨解決的。半殖民地性在理論方面的發展，是容易糾正的；因爲真理畢竟是真理，而事實畢竟是事實。半殖民地性在政治、經濟各部門事實的發展，便非有絕大的努力，不易加以改革。貿易部門半殖民地性底表現，第一，是帝國主義勢力，不但侵奪了我們國外的市場，而且強占了我們國內的市場；不但把持了工業品消費市場，而且支配了原料品供給市場——棉花市場就已經在日人底支配之下了。第二，是封建勢力，不但用政治勢力割據國內市場，而且用商業資本勢力，阻礙貿易。先說政治，報紙上不是時常看見，苛捐、雜稅或者是改頭換面的依然保存，或者是巧立名目變本加厲嗎？就說最近的事實，上海雜糧商正

以罷運手段，對付廣東麵捐呢！此外「省的專賣」、「省的官營」、「省的統制」……一切割據市場的把戲，都在掛着簇新的招牌，一套一套的搬演出來！說到商業資本對輸出商品的剝削，金融商業報記者近來有一種很有興趣的調查。他說：中國桐油底生產成本連同運至美國費用，每磅不過美金三分，而苛捐、雜稅和牙行，居間商的剝削，却往往要到美金一角以上；合計起來，要超過美國桐油底生產成本——每磅美金八分；居間商不但要剝削農民，而且要攙和雜物，使中國桐油品質變劣，信用盡失。這樣，封建商業資本不但在價格上使中國出口業沒落，在品質上也使牠沒落！其實，中國底農產品如棉花、小麥、大荳……等，那一種不有同樣的情形？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而不是在桐油上面偶然發生的。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專談貿易問題，甚至空談貿易問題，還是沒有用的。我們即使有很正確的觀察和很合理的主張，實現這種主張的前提又是什麼呢？我們能用和平磋商的方式，使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任聽我們的主張在和平中具體化嗎？這是本文以外的問題了。

對於土地村公有制之意見

我們讀一讀各國的歷史，社會主義的國家固然要有一個土地革命，資本主義的國家也要消滅封建形態的土地制度。

中國土地問題要求一個解決，這是許多人都承認的。我在「當前的災荒問題」一文內，曾經指出中國災荒之所以嚴重，根本的原因依然是土地問題。此外一切封建勢力的存在，差不多都在土地制度上建築牠們的基礎。

不過，一提到解決土地問題，有些人便要談虎色變，認為這是過激的手段。而原則上同意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上，也有種種不同的主張。閻錫山氏的主張，要算是大胆而比較澈底的一種。

對於反對黨的鎮壓政策，大抵有兩種：一種是用極端的嚴峻手段硬幹，如意大利的墨梭里尼政權和德國的希忒勒政權，另一種是相當的採取反對黨的政策以減低牠在羣衆當中的煽動力量的手段，保持民主制度各國裏的政黨多用之。閻錫山氏以解決土地問題爲防共主要手段的主張，就是採用後一種政策。

就大體來說，閻氏的辦法，是經過周密的考慮的。不過就中國一般的狀況來說，地方政治，大半廢弛，地方自治，也還虛有其表；要運用這種機構去解決這嚴重而且複雜的土地問題，恐怕那結果，紳豪和農民之間，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擾亂一定是免不了的。地方政府對付這種擾亂的政策，假如是偏袒紳豪，便違反了拉攏農民以防共的本旨；假如真個要使農民滿意，那所採取的恐怕就成了一種革命手段。閻錫山氏之爲政，一向是以穩健著稱的；山西省的幕僚體系，據說比較是有點把握。閻氏知山西之深，遠過我們；也許這種政策，在山西試行是不至有失的吧？然而，在這整個「但求無事」的局面當中，能不能廣爲推行，真是一個問題。

其次，農民的貧窮化，田租的負擔，固然是一種原因；而苛捐雜稅和兵差的剝削，重要性也並不亞於田租。何廉氏所提出「耕者有其賦」的現狀，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假如解除了農民田租的負擔，而依然保存，或者反要乘機加重農民的捐稅負擔，那結果便要十分悲慘。

又其次，舶來品和工業品對農村的剝削，我們在輸入物價和輸出物價剪刀形的發展以及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剪刀形的發展上，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山西省目下的省統制經濟，能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呢？倘使不能的話，那末，改革土地制度的效果，又是可懷疑的。

要之，目下的經濟組織，往往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我們要解決經濟上某種問題的時候，必須要
把全盤統籌一下。

國民經濟建設的先決條件

國民經濟是什麼？這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是特殊的針對着帝國主義經濟，買辦經濟和封建經濟而言。

帝國主義經濟是指種種一切含有侵略意味的外人在華經濟活動，尤其是外人在華的產業——牠不單是剝削中國的勞苦大眾，而且也摧毀中國的民族資本。且看，華商紗廠不是已經幾乎被外商紗廠打倒了嗎？

買辦經濟是指一部分——也許是大部分——中國資本家的經濟活動。他們或者是本意上就在幫助外人在華經濟活動，或者是在不知不覺中幫助外商資本打倒民族資本。

封建經濟是指運用特權或者特殊勢力——不是資本勢力——向人民進行超經濟的剝削的經濟活動。如地主，高利貸資本主，鹽商，牙行，開設官銀號發行不兌現紙幣的軍閥官僚，以及借統制經濟名目實行私人壟斷工商業的新軍閥新官僚，他們的經濟活動都是封建經濟。他們不但要剝削勞苦大眾，而且要阻礙民族資本的發展和國家的統一。他們不但要剝削勞苦大眾的經濟利益，而且要

剝削勞苦大眾的身體自由；甚至要使勞苦大眾賣妻鬻子，以供給他們的剝削。所以說：他們的剝削是超經濟的。

這三種經濟雖然寄生在中國領土之中，然而危害中國民族的。這三種經濟一日存在，中國國民經濟便一日不能發展。他們不但阻止了中國國民經濟往社會主義開展的路，而且也阻止中國國民經濟往資本主義開展的路。中國假如照目下的方向走向工業化，那就逃不出是畸形的殖民地的工業化。換一句話說，就是上述三種經濟進一步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根本消滅。

所以，在中國而言國民經濟，主要的任務，就在消滅寄生的帝國主義經濟，買辦經濟和封建經濟。倘使我們只是從教科書當中了解國民經濟的意義，就把牠抬出來大吹大擂，而忘記了半殖民地經濟的特殊性，那就是替帝國主義做「虎張」，而變成一個買辦經濟學者。

*

*

*

*

*

*

思想較高的青年們，也許要覺得：假如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向着資本主義發展，那末，勞苦大眾所得着的，依然只是痛苦和貧困。

自然，假如中國可能有一個國民經濟的建設，我們決不會希望牠向資本主義發展，時代和環境

也決不會容許牠向資本主義發展。不過，在理論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和國民經濟下的資本主義，實質是不同的。

第一、在殖民地的資本主義之下，經濟上畸形的發展要格外嚴重。比方，都市的畸形發展，和農村的特殊衰落，固然是資本主義各國共同的現象；然而，在帝國主義勢力特殊的掩護之下，中國少數都市畸形的發展，要超過一般經濟因素所能造成的限度。而在封建勢力特殊的——超經濟的——剝削之下，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也遠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上。

第二、對於產業工人的剝削，在殖民地裏也是格外的嚴重。帝國主義在國內，還要相當的保持紳士的面目，而且還要儘可能的保持民主主義的面具；對於工人，還要相當的採取改良主義者的懷柔政策。甚至到了不得已而施行法西斯化的恐怖的時候，依然不能不抬出「保護勞工」的騙人口號。可是，對於殖民地工人，他們的猙獰面目就要毫不客氣的擺出來了。比方，對於工人的鞭撻，凌辱，甚至屠殺，是只有在殖民地才變成爲「司空見慣」的。因此，帝國主義國內的工人，可能變成「貴族工人」；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剝削得來的利潤，可以分給他們極小的一部分，使他們能爲帝國效勞，以維持帝國治權于不墜。

第三、在文化方面，帝國主義在國內還要儘可能的保持「思想自由」的口號——自然，到最後的法西斯階段，是連這個口號都取消了。而國家呢，也還不能不以財政收入的相當成分，作為教育和文化的用度。而在殖民地，帝國主義却要毫不客氣的施行愚民政策。殖民地人民的技術教育，必然是工具主義；而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教育，必然是奴才主義。

所以，我們應該明白：一個國家如果是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之下資本主義化，牠在資本主義長成過程中，社會上必然有很大的進步；而在殖民地的狀態之下資本主義化，一開始，就使社會進化受到障礙，勞苦大眾雖然是一樣的受剝削，然而程度是顯有高低。我們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說中國應該爭取國民經濟發展下的資本主義化，而是說中國勞苦大眾的要求解放，應該是格外的迫切。

* * * * *

中國怎樣才能建設國民經濟呢？我們應該是由國民經濟建設中間爭取民族的解放呢，還是在爭取民族解放之後才能談得到國民經濟建設？

在這裏，迷醉在教科書裏面的流俗經濟學家，見解便和我們不同。他們過去是高談建設和國力的補充，而目下是高談幣制救國。過去沙土上的建設計劃，所得到的結果是「民窮財盡」，顯然是碰

壁了。沒有國防的國力補充，所得到的結果，也不過是招致敵人進一步的破壞，顯然又是碰壁了。由第一道防線大吹大擂的建設，退到第二道防線很可憐的只敢說補充，再退到第三道防線就只敢抬出一小部門的幣制。以後將怎樣退呢？他們是要退到中國的「堪察加」去了！這樣的國民經濟建設，究竟還是解放民族，還是使民族在國民經濟建設當中一步一步的滅亡？

一個國權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國家，而要高談國民經濟建設，本來是太不量力。爲了幣制改革以後發生出來的問題依然很多，甚至牽動到更大的國際收支問題，平衡預算問題，以至外交問題，許多幻想般的計劃又出來了。什麼管理匯兌以減少入超哩，採行遺產稅和所得稅以增加財政收入哩……說了一大套。可是，外交如何應付呢？就沒有人談到了。

是的，管理匯兌和採行遺產稅及所得稅，都是現代國家應該做的事；但是，沒有具備現代國家條件的半殖民地，却不配談這些。我們一提出管理匯兌，採行遺產稅和所得稅等問題，立刻就牽動了更基本的外人在華治外法權問題和租界問題——總而言之，是不平等條約問題，是帝國主義勢力問題。這更基本的帝國主義勢力問題一天不解決，租界裏面的洋商，便可以提出他們的治外法權，以對抗我們種種一切管理匯兌和推行新稅制的法令；有財產的中國人——這中間包含着實辦經濟和

封建經濟的勢力，也照例的用「掛洋旗」的方法，以逃避國稅的徵收。這裏，我們還得注意到：如果管理匯兌只及於華商銀行，如果遺產稅放棄了財產的大本營上海，而只向內地的中小都市和農村裏去徵收，如果所得稅放棄了主要來源產業利潤，而只向薪金階級榨取；那不單是不公平，沒出息，而且是病民的。

然而，這都是以後的問題了；在目前，即使國際收支依然不平衡，財政依然入不敷出，匯價還可以維持。目前的重大問題，到是因為幣制改革而引起的外交問題——日本帝國主義干涉我們的幣制改革。且看，連一個幣制改革都受別人的干涉，怎樣談國民經濟的建設呢？

*

*

*

*

*

*

我曾經說過：管理貨幣是超過了半殖民地國權的一件事；半殖民地國家如果要管理貨幣，牠或者只可以進一步的投降帝國主義，借牠們的力量來完成這種管理，或者呢，只可以用民族革命的力量來完成這種管理。現在談到更大的問題國民經濟建設，我也是作此感想。假如我們想在保持現狀之下進行國民經濟建設，那所得的結果，恐怕只是帝國主義經濟，買辦經濟和封建經濟的外面，戴了國民經濟的招牌。

然而，有人認為我們可以很爽快的放棄了港口，到我們的「堪察加」去建設國民經濟。

如果我們真是和敵人作一個你死我活的革命戰爭，我們自然應該準備最後退到我們的「堪察加」去；但是，假如是很懦怯的不戰而退，拿出蘇俄歷史上「退到堪察加去」一句表示奮鬥到底的激勵話做掩飾，那是中國人民所不能同意的。退到「堪察加」去再預備打出來，那只有革命戰士能夠做，而決不是主張望風退却，志喪氣奪的失敗主義者所能效顰。失敗主義者所能做的，依然逃不出過去中國軍閥官僚有退無進的把戲。而且，退到「堪察加」去，還得有強有力的革命羣衆做中心，然後退了之後能進。倘使一個有保守領土，保護人民的職責的政府，爲了少數人的苟安，很輕易的放棄了十分之八的領土和人民讓敵人去蹂躪，而退到「堪察加」去組織一個小朝廷，我相信民衆是不會擁護牠的，而且要痛恨牠的。那樣，牠憑什麼力量打出來，甚至憑什麼力量自存呢？此外，假如退到「堪察加」之後，依然不過是由甲帝國主義的懷裏出來跑到乙帝國主義的懷裏去，那又更不必談了。

所以，就是退到「堪察加」去建設國民經濟，也依然是一個民族革命。放棄了民族革命便談不到退到「堪察加」去，更談不到國民經濟建設。

因此，我們不能不有一個結論：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先決條件，是民族解放運動——民族革命；

中國只能經過民族解放運動取得國民經濟建設，而決不能經過國民經濟建設取得民族解放。

二四·一二·五·生活知識·

第五篇
雜文

婦女與婦女運動

婦女運動的主觀的動機，往往是不外使婦女——參加運動的婦女——由「家庭人」的地位，變爲「社會人」。然而，婦女運動的客觀的需要，却不是那樣的簡單，她們——參加運動的婦女——是要負起改造社會的重大使命的。倘使參加婦運的人們，忘記了客觀的需要，而只單純的有了一些主觀的動機，她們便變成了個人主義的婦女運動者。那個結果，便不外今天在甲雜誌裏刊登一個自己的「玉照」，明天託乙通訊社發表一篇自己的「談話」，後天背着一個團體名義去拜見闊人……於是而買空賣空的政客技倆，互相標榜的「文閥」醜行，都要和盤托出了。等而下之，便成爲「××花」、「××后」……的把戲，是從所謂「名流」之手，博取一個「捧」而「捧」的代價，必然是「供玩弄」了。她們不單是不能解放婦女，甚至不能解放自己；不單是不能解放自己，反而把自己加重了一層束縛，加深了一層羞恥。

然而，怎樣才能應客觀的需要而負起改造社會的重大使命呢？有些人以爲她們只須去干涉張家的老太太虐待媳婦，李家的少奶奶毒打婢女，周家的老爺遺棄髮妻……就算已經負起改造社會

的使命。固然，張家的媳婦，李家的婢女和周家的妻子，都是相對的受壓迫者。然而，工廠裏面幾十萬的女工，她們所受的壓迫，不更厲害嗎？深深的被壓在社會的最下層的幾千萬幾萬萬的貧苦婦女，她們自己沒有意識到把她們的痛苦向做婦女運動的太太，奶奶和小姐們陳訴，而做婦女運動的太太，奶奶和小姐們，也許沒有機會和她們接近；她們的命運，不更是悲慘嗎？這樣的婦運，豈不是「明察秋毫，而不見與薪」？

有些人感覺到她們不應該專做消極的「干涉」工作，而應該做一些積極的鼓勵工作。於是，一月中旬開一個兒童比賽會，二月下旬開一個家具展覽會……撮取精華，以資觀摩。却沒有想到人家的孩子們連三餐都不能飽，怎有資格來仿效這牛奶、蜜橘、雞蛋和麵包喂養起來，法蘭絨包裹起來的「模範兒童」呢？更沒有見到：別人家連火鉗都買不起，怎有福分來夢想這「模範家具」呢？這和故事中的皇帝，聽說人民沒有飯吃，便問「他們爲甚麼不吃肉糜？」可說是先後輝煌。

於是，有幾位外國回來的女士們，便覺得歐美各國的參政運動，是值得販賣過來的。雖然在「以黨治國」的條件之下，「政」是不容許隨便「參」的——除非先做了要人們的太太，但是準備工作，不可不做；尤其在這「憲法」已在起草的當兒，更應該加緊準備。她們却沒有把歐美所謂憲政，更深切的

研究一下，了解牠是怎樣的一件欺騙人的玩意兒。她們更沒有看到，在許多的所謂立憲先進國裏，憲法是連騙人都已經騙不過了，只可以撕毀了牠而毫不客氣的拿出來極端的反動面目——獨裁。在中國，滿清皇帝和袁世凱也都玩過這一套把戲，我們對牠的印象怎樣？最近，是連滿洲偽國都在那裏弄這玩意兒呢！我們要明白，在現制度下的所謂婦女參政運動，對社會是一種欺騙，而對自己也不過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現。充其量，也不過是博得一個可以「顯親揚名」的女委員或者女議員的銜頭，使報紙替她們多做些起居注，多刊登幾張她們的「玉照」罷了。

徐名鴻被殺了，他的遺書要求蔡廷楷將軍替他寫一塊「社會主義者徐名鴻之墓」的墓碑。徐先生原來是為要得着「社會主義者」的銜頭而進行他的「社會運動」的！反過來說，他並不是為社會而進行社會運動。戴着社會主義的面具的個人主義者，到底是原形畢現了！參加婦運的人們，你們究竟應該為婦女而運動呢，還是應該為「婦女運動者」的銜頭而運動？

倘使你們是準備為婦女而運動，你們便應該放大眼光，看到這佔婦女的最大多數的勞苦婦女羣衆。你們更應該見到，社會運動是整個的，婦女運動不過是社會運動的一面，而勞苦婦女羣衆也不過是勞苦羣衆中的一部分。「在美國，黑色的奴隸不解放，白色的工人也不能解放；在英國，愛爾蘭的

被壓迫羣衆不解放，英格蘭的工人也不能解放。」在任何的一國，整個的勞苦羣衆不解放，婦女也不能得着解放。在次殖民地的中國，整個的民族沒有解放，婦女也談不到解放。

要在這樣的一個輪廓之下，我們才能找到婦女運動的意義。我用十二分的誠意，希望參加婦女運動的人們，脫離了「被欺」的領域，消滅「自欺」的幻想，放棄了「欺人」的勾當，大踏步的向婦女解放的康莊大道邁進！特別是中國的參加婦運的人們，是要站在反帝的民族鬥爭的陣線裏，認清她們的地位，認清她們的目標。

我的來年計劃

我的來年計劃，簡單的說一句，是要更密切的適應時代潮流而已。

對於潮流兩個字，很容易引起誤會。許多人以為慕沙里尼在意大利的運動，希特勒在德國的運動，和羅斯福在美國的運動，也是一種時代的潮流。那就大錯了！

時代是沿着曲線前進的。長江的水，誰都知道是向東流的。然而在有幾階段，牠是向西流的。倘使我們只見到那小小的一階段，就斷定長江是向西流的，那不是笑話了嗎？時代也是這樣，整個的人類史向着進化的方向走，中間却免不了有幾個小小的階段向着反動的方向走。倘使我們認為時代就是這樣的前趨，那末，等到有一天轉到了順勢，必然要成爲岸邊的落伍者。所以，這裏我們必須放大我們的眼光，把整個的歷史作全盤的觀察，藉以明『大勢』之所趨。不然呢？必定要因爲拘泥於『小局』而迷了自己的前路。

然而，所謂適應潮流云者，決不是坐以待時的意思，是必然要有行動的。我在行動方面可以告訴諸位的，就是『生活後退思想前進』八個字。我深深的明白，倘使我再在生活方面求前進，我必然要

騎上『爲現時代掙扎的虎背。』即使我安於目下的生活，我必然也要成將來時代中一個不適宜的人，因爲我覺得目下的生活太高了。我必然要先把我的生活降到水平線附近，然後，我纔有勇氣爲將來的時代奮鬥。然而，倘使我不是同時在思想方面求進步，恐怕慢慢的我要認不清自己的環境，我也許就要錯認了時代。所以，一面在思想方面求進步是萬萬不可少的。也就在思想前進的過程中，我可以得着內心的安慰。

半殖民地型的中國知識分子

所謂半殖民地型的知識分子，是在封建的日坯子外面，鍍上了帝國主義的黃金的。他們是半殖民地的特產，中國自然出產的很多。在外國人口中的所謂『高等華人』和若干作家所命為『士大夫』的一流人物，固然是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地型，就是自命為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也往往免不了帶幾分半殖民地型。

假如我們調查中國知識分子的履歷，他們或者是『縉紳之裔』或者是『系出名門』——封建的閥閱，自可當之無愧。間有不然者，那在俗語說起來便是『沒來歷』，打起官話來，就叫做『身家不清白』。這種人在學校裏，高貴的同學們往往『羞與爲伍』的。

這一班『閥閱少年』，在家庭裏所受的教育，逃不出是『出人頭地』，『顯親揚名』，『人上人』……一類的封建英雄思想。在家裏擺少爺架子，頤指氣使，罵僕人，打了頭……都是他們的拿手戲。封建的本質是十分完備的。進了學校之後，再讀了美國十大富豪傳……一類的修養書籍，在原来的封建英雄思想外面加上了資本主義的個人思想，就打好了半殖民地型的基礎。倘使再到外國去留學

一下，帝國主義的黃金，就鍍得格外濃厚了。

半殖民地型知識分子的個性，是浪漫疏忽自私，和不守紀律。他們在職業上頂自然的出路，是官僚，買辦，以及清高一些的教授和自由職業者。他們有時候『襲祖先餘蔭』變成一個實業家，使會使嶄新的專業官僚化。在許多地方，所謂實業家，便是當地的『土皇帝』。他們有時候『際會風雲』，握到政治上的權威，便要充分暴露出來他們的顛預無能和粗忽，對內要『草菅人命』，而對外却要『喪權辱國』。『甯子敵寇，不予家奴』，是典型的官僚外交政策；可是，這兩句話便具備了十足的半殖民地型知識分子的風度。『不予家奴』是秉承了『罵僕人，打了頭』的封建家庭教育，而『甯子敵寇』却是秉承了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教育。這種人對內是威風凜凜的封建英雄，而對外却是千依百順的帝國主義的順民。

這一班人的生活，也是複形的。在許多學校裏，一面有了嶄新的足球隊、藍球隊、學生會……；而另一面也有封建的同鄉會，和變相的以地方命名的學會、協會……之類。在校裏各種團體中活動的人們，同時可以向外結交官僚、軍閥，以至流氓。封建勢力裏外結合之後，封建的派別、幫頭、社、堂……就在學生隊伍裏形成起來，而恫嚇、綁架、械鬥……一類封建的把戲也就在『學府』裏演出來。

新官僚的生活，是到社會裏來以後的半殖民地型知識分子生活的標本。他們一面需要帝國主義勢力下租界洋房的新式設備，但是同時需要封建閥閱的『僕從如雲，一呼百諾』。中國新官僚生活的奢華複雜連外國富豪見了都要咋舌。

我寫這篇短文的動機，是因為在社會上遇到的，這一種典型的人實在太多了。我說牠是半殖民地型，因為在中國，提出這名稱來格外使人注意；其實呢，逕稱之爲『殖民地型』到是更邏輯一些。

我現在希望兩件事；第一，是今後的中國青年不要再做半殖民地型知識分子；第二，是能有一位文學家寫一本阿斗正傳，充分點描寫半殖民地型知識分子。

我的研究動機和研究經歷

有舒服生活可過的人，可以很逍遙的說：人是爲生活而生活的。過不了生活的人，他們的觀念兩樣了。他們一定會想到：倘使他們不過是爲着生活而生活，那到不如不生活。

本來，倘使人類不過是爲着生活而生活，目下的人類，就應該和其他的動物一樣。是因爲人類有比生活更高一些的人生意義——有進化的企求，然後，目下的人類纔能有超越一切其他動物的威力。說得詳細一些：飽暖是一切的動物都需要的；所差的，是人類除了飽暖之外，還需要一個進化，而其他的動物，需求卻止於飽暖，於是，他們就自然而然的落伍了。

爲了人類要有進化的企求，所以我們說：人們要負起歷史的使命來——人們應該不斷的推進文化。然而，所謂文化云者，牠的意義是必須加以解釋的。在人羣裏的矛盾十分尖銳的今日，有一部分人是慣以文化消滅文化的。這種事情，自然是古代也已經有，不過不像今日那樣厲害罷了。比如意大利最近是向阿比西尼亞去『宣揚文化』去了；牠的「文化」是殺人的飛機和大炮。這是推進文化呢，還是以文化消滅文化？這一套的『文化』，我們應該讓牠發展嗎？

除了這一套反動的『文化』以外，社會上裝着文化的招牌，執行殺人不見血的代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任務的，正多着呢！一種文化倘使不以大眾的利益為基礎，那結果是很危險的。一個從事於文化的人，倘使不站在大眾的立場，那結果必然要變成人類的蝨賊。像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現在是在幫助墨索里尼去殺戮阿比西尼亞人民去了。

在文化上，『為研究而研究』的態度，本來也只有喫飽了飯沒事做的人，纔可能採取的。他們比『為生活而生活』的人，自然是高一些——他們自己總以為已經負起歷史的使命來了。然而，他們的危險性，是很大的；到不如醉生夢死的『為生活而生活』的人，不至於傷害人類。為『研究而研究』的人，便可能做以文化消滅文化的人，也可能做代少數人設法剝削多數人的人，因為他們根本不曾想到大眾的利益。所以，我們說：文化是必然要以大眾的利益為基礎的。

* * * * *

凡是一個有志氣的人，不管他所抱負的是社會主義或者是個人主義，不管他所受的是舊教育或者是新教育，都必然要發生一些『志不在溫飽』的感想。所以，為『生活而生活』就是在溫飽的階層中，也會有許多人不覺得是不夠。這一些不夠的感覺，已經是一個人生哲學的問題，不過還是很粗

淺的罷了。

爲了『志不在溫飽』於是，『爲研究而研究』的態度就要出來了。只有在體會到勞苦大眾的可憐生活之後，纔會覺得『爲研究而研究』，依然不是做人的法則；於是，纔會進一步到了『爲大眾利益而研究』的態度。這種種的曲折，在一個小資產階級層裏的知識分子，往往是必然要經過的。但是，假如他所有的，只止於一些『惻隱之心』，而不能把人类的歷史和社會制度作一個明白的分析，再從社會制度的改革方面找出一條自然的大道，他就要變成一個慈善家或者一個宗教的社會主義者。那樣，他的志越是可嘉許的，然而，他的行動卻依然要錯誤。爲了他自己還不曾了解改革社會、提高人類幸福的大道，他所指導別人的，當然也是一條錯路。那樣，他在本意上固然是謀大眾的利益，而結果或者反而要妨礙大眾的利益了。

歷史所指示給我們的大道是什麼呢？這話說來很長，詳細的只可到社會科學的書本上去找。簡單的說，歷史告訴我們：人類進化到了某一階段時，社會上會形成少數人壓迫而且剝削多數人的狀況；這多數人假如想從那壓迫和剝削中間解放出來，他們只好用革命手段和少數人抗爭；那樣，他們一定可以以多勝少而達到解放的目的；此外一切哀求、磋商……的方法，結果是等於『與虎謀皮』。

是沒有用的。上面所說的某一階段，是指歷史上某一種社會制度到了衰老的階段。

* * * * *

上面說了一篇，還沒有說到本題；不過是說明一般人所應當採取的研究態度罷了。以下說一些關於我自己的研究態度。

我是一個生長在『差堪溫飽』的『鄉紳』家庭裏面的人；很幼少的時候，就不知不覺的上私塾讀書去了。當時讀的，自然還是『古人之書』；『大丈夫志不在溫飽』的一套聖賢、英雄思想，自然是有人會灌輸給我的。又因為我的天才比較的高，許多師長也讚許我並不是一個止於溫飽的人。受了這種聖賢、英雄思想的驅使，在『出頭人地』、『顯親揚名』的企圖之下，『爲生活而生活』的沒出息思想，大概是從少就不曾有過。但是，所謂推進文化的歷史的使命，那時還是完全沒有懂得；我所以要讀書，唯一的目的就在個人的『功名』和人類毫不相干。研究興趣也談不到，因為當時的讀書，如三字經、四書、千家詩……之類，根本我就不十分懂得那中間的意義，那里還談得到研究呢？我那時所感到興趣的，是圖畫和手工，但是師長是不許我做的，幾次都因為畫人像和做玩具，被師長處罰。

後來慢慢的長大了，『古人之書』中的意義，纔漸漸得了解。於是我在『國文』一科上，就起了

研究興趣。我除了會模仿『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辭以外，還曾經玩過『賦詩』『填詞』一套的『風雅』把戲。假使我那時候就是這樣的努力下去，也許我現在要做存文會裏面的一尊古董呢。

然而，我那時已經在『學堂』裏面了。英文的學習，使我知道世界上還有語言和文字一致的人類。相形之下，使我感覺到這滿紙『古人之言』的中國文，實在是太艱難；在一張『國文』占着很多時間的課程表上面，我覺到中國人真太苦了——讀好了『國文』差不多沒有餘力研究有用的科學了。

這種感覺和研究『國文』的興趣，成了一個矛盾。大概就是這種矛盾的發展，使我後來很早的在『五四』運動之前，就傾向語體文，而把那費過苦功的『詩、詞、歌、賦』一脚踢開。

對於發明家的偶像崇拜，在當時的『學堂』裏也已經很熱烈了。因此，我在少年的時代，便常常有做發明家的幻想。那時候我心目中的發明家，自然也是很神祕的一件東西——神祕得和聖賢、英雄一樣。所以，這種幻想，和『大丈夫』的志願，實在是『殊途同歸』的。我在十六歲那一年，我父親教我進商業學校的時候，心裏很不高興；因為這和我做發明家的志願不符。進了商業學校以後，我除了依舊用於『國文』以外，對於算學也十分用心，準備能找到一個機會改去研究自然科學，因為那

時候，以為只有自然科學裏可能有發明。我還記得我會經用了許多工夫發明兩條幾何學上關於多角形諸內角之和的定理，在學生雜誌上發表，當時我的算學教師，都很肯定的說這是我的發明。我後來漸漸的脫離自然科學的研究了，這個「發明權」的下落，也就不去注意了。這一個謎，到現在我還希望有人來解答。在中國社會裏——甚至在許多資本主義社會裏，發明權往往是被少數人獨占，而大多數人的發明，是會被埋沒的。

我進商業學校的第二年，就開始讀一本薄薄的經濟學。當然，現在看來，那本書不單是簡略，而且是膚淺。可是在當時，我讀到緒論裏「通商大埠，常位於大江大河下游」一句話，就十分傾倒，覺得牠能夠表示我一切古書裏找不到的知識。以後再讀到「以最少勞費取得最大效果」的經濟原則，更是讚歎不置。讀者也許要奇怪：我當時何以那樣的幼稚。其實呢，「讀死書」出身的我，做文章要使別人不懂，腦海中還記着「行不由徑」的古訓；對於經濟學，自然是要驚奇的。

於是我對於經濟學就起了研究的興趣了。自然，研究所得到的，還是十分淺薄。商業學校畢業以後，爲了家庭負擔不起學費，我就到金融界裏去做事了。這又是十分違反我的「聖賢英雄」思想的；我對於打算盤、記帳簿……一類的「市僧生活」，自來是十分鄙視的。記得在校時有一位先生告訴

我應該多練習寫字和珠算；我就想反問他：難道我應該希望自己將來做書記、做帳房嗎？聯想到目下許多青年，到了社會裏去之後，不是向『升官發財』的路上去做『政治投機』，便是想脫離社會去學『出家革命』。這自然是封建社會的反映，然而，聖賢、英雄思想的教育，也負着很大的責任。我想，目下覺悟的青年，一定會明白：我們固然要負起對於民族和社會的責任，——歷史的使命，然而是在做書記、做帳房，甚至在勞工的當中來負起這種責任的。我們一離開了工作，就離開了現社會，就不會了解現社會。不了解現社會的人，而要高談改造現社會，那就是所謂『閉門造車』。這都是聖賢、英雄思想所傳給我們的領袖慾、風雅慾以至享樂慾所造成的錯誤，覺悟的青年們是萬萬不能再上牠們的當的。

*

*

*

*

*

一個聖賢、英雄思想所薰陶出來的青年，到社會裏去往往要覺得『不得志』，甚至覺得『無處容身』——要呢，除非是極少數的得『祖先餘蔭』的人們。社會上的『領袖人物』畢竟是為數無幾；公私機關裏的『小領袖』也是為數不多。那裏能夠容納這許多聖賢、英雄思想的青年呢？而且，一個初到社會裏去的青年，憑什麼能力去做領袖呢？在政治方面，少數得『祖先餘蔭』的人，的確有時

可以『青年得志』做長官去『草菅人命』——然而，那是幾多的糟多？不能『青年得志』的人們，有的就只好向僕役、人力車夫……一類勞苦大眾擺架子，以發洩他們的領袖慾，有的就只好悲觀、發牢騷。

我到了社會以後，初期就在『飲酒賦詩』發牢騷中間過生活。經濟學的研究，也停止了許多時。畢竟爲了敵不過生活的壓迫，事實教訓我還只有從新修養一些喫飯的技術——服務金融界的偏於技術的知識。在那幾年中間，我除了練習珠算、簿記和英語以外，對於金融市場、銀行組織、銀行業務、商業法規……等的確是研究得很多。業務接觸上所給我的經驗，着實也不少。我在金融界裏一些學術地位，還是那時候打下基礎的。

大概，從零碎的對於某一經濟部門的了解，聯繫到整個的經濟組織，已經不是很容易的事；再從經濟聯繫到政治，也需要適當的時間，而從經濟政治的研究再聯繫到哲學，更是比較的煩難。反之，研究過哲學理論的人，要把那種理論聯繫到現實的經濟、政治現象上去，再很精微的聯繫到經濟、政治的各部門——能夠在任何的部門當中找到哲學的意義，也要經過較長的過程。比方，『人是爲什麼生活的？』一個問題，答覆起來還比較容易。『我們爲甚麼要找職業？』『我們對於職業應該取什麼態

度』……一類問題，就比較不容易答覆了。「米價漲了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們從正確的經濟學觀點上，應該給牠怎樣一個了解？」這個問題，就更加複雜了。假如你是站在形而上的哲學的觀點，你也許要說：這種喫飯、穿衣的小事情，和你不相干。假如你是站在爲少數人謀利益的哲學的觀點，你也許要說：這伴着一般物價的高漲而高漲的米價，可以使經濟回復繁榮，是很好的一件事。假如你是很機械的站在爲大衆謀利益的哲學觀點上，你也許要說：米是農產物，農產物的漲價是對於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有利益的。只有你是很辯證法的站在爲大衆謀利益的哲學觀點上，你才會進一步的研究：目下米的所有者，到底是大多數的農民，還是少數的居間商；即使農產物漲價，如果農民所消費的工業品漲價漲的還要多，農民是不是反而要吃虧？

實踐和理論，是不能分離的。但是，社會上有許多人天天只知道吃飯、做工——只知道實踐，而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吃飯、做工。他們成了爲生活而生活的工具；成了和貓、狗一樣的動物。另外一方面，更有許多人整天的躲在研究室裏，埋頭讀書，不問外事——只知道理論，而忘記了實踐。他們成了爲研究而研究的書獃子。這兩種人都沒有懂得做人的道理；前一種人變成了普通的動物，而後一種人變成新式的『僧道之流』。

我呢，爲了生活的緣故，不能不工作；而爲了聖賢、英雄思想的深入，又不能不研究。然而，工作和研究——實踐和理論——的聯繫，就很困難了。把偏于技術的理論應用到工作上面，是比較容易的；但是，這種純技術的理論和實踐的連繫，結果不過造成了高等工具的地位，在人生的意義上，是萬萬不夠的。許多在技術方面有高深的造詣的人，不但不能替人類謀利益，反而成了一個以文化消滅文化的罪人。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爲他們只能在技術方面做到一部分的理論和實踐的聯繫，而不能在哲學下面，做到整個的理論和實踐的聯繫。然而，這個答案依然不夠。因爲，如果他們所認識的哲學，是爲少數人謀利益的哲學，在那種哲學下整個的理論和實踐的聯繫，是十分危險的。政治舞台上許多大人物，他們都不是工具，他們都十分了解哲學——爲少數人謀利益的哲學，然而他們是人類最大的害物——有意識的反動者。墨索里尼、希特勒和馬可尼，便是這一類人的代表。

聖賢、英雄思想發動我的研究興趣，聖賢、英雄思想啓示我應該爲大衆謀利益，然而它却使我走錯了研究的路線。爲了要爲大衆謀利益——『關心民間疾苦』我那時候覺得我不能專在技術方面做研究工作，而應該注意到政治。但是，在聖賢、英雄思想之下，技術和政治是無關的，甚至社會經濟也和政治無關——政治是只須憑少數人的賢明理想和英雄行動，而可以不問環境，不顧事實的硬

幹起來的。在這種錯誤的觀念之下，我不能不認定政治的研究是神聖的，而技術的研究是卑鄙的。我初期的政治論文，就往往對於經濟很忽略。以後漸漸能夠把政治和一般經濟聯繫起來了；然而，對於比較專門的經濟部門——如同和我的職業有關係的金融，我依然弄不清楚牠的政治意義。那時有人要求我寫一些專門關於金融的論文，我往往要覺得沒有興趣而加以拒絕。即使寫了，也依然是爲技術而技術的，一點都不能在那中間提出我的政治主張——有時反而違背我的政治主張。許多人批評我：一談到和本身利害有關係的金融，我的態度就改變了。這一點，我是承認的，但我要聲明：這是不自覺的。大概處在某一種環境之中，思想就不能不有所宥蔽吧？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寫了一篇貨幣金融所反映出來的中國社會，發表在文化季刊上面，才算把我的職業有關的貨幣、金融問題弄個清楚。在那篇文字裏，我用我所知道的事實，解釋帝國主義和封建兩種勢力在貨幣、金融中的成分。從表面看來，這種工作是不難做的；但是，在事實上，中國許多對於社會性問題的論文，一部分是從農村經濟着眼，另一部分是從都市裏的工商業資本着眼，很少着眼於貨幣、金融問題的。即使有人寫了一些，然而，畢竟因爲他在這問題上的認識不夠，資料不充，不能解釋得十分透澈。而我呢，恰好是在寫那篇文字的時候，才能夠把平時關於貨幣、金融的研究和政治

見解統一起來，很明確的認識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到處存在着。所以，我當時是覺得十分快活的。

* * * * *

哲學上的方法論，我是不曾用過很大的苦功的——其實，對於整個的哲學，我所讀的書也很少。我讀過了二三本篇幅不多的關於唯物辯證法的書籍，另外隨時在雜誌上看了幾篇關於唯物辯證法的論文，腦海裏只有了一些很基本的印象。是在以後的寫作和辯論當中，才慢慢的把我對於唯物辯證法的了解提高起來。換一句話說：我是在實踐當中得着更高的理論的——我對於唯物辯證法的了解，也正是依着辯證法的法則而發展的。

有一次，我正在寫一段關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文字；在上半段，我指出這兩種勢力是互相勾結，向中國民族壓迫的。到下半段，我寫到中國各地封建性的貨幣的存在，在華外商也十分痛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又是互相衝突了。這樣，我就遭遇到了一個困難：前後文自相矛盾，而無以自圓其說。在這時候，我如果只懂得形式邏輯，我或者只好抹煞後一種事實。而很武斷的一口咬定：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中間只有勾結，而絕對沒有妥洽。自然，這種理論是很脆弱的；因為，只要有人指出一些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衝突的事實，我的理論就要完全慘敗了。而在事實上，我又變成一個抹煞事實自

欺欺人的人。同時，如果我是一個相對論者，我也許要下一個結論：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勾結，是相對的；牠們也許可以勾結，然而也許可以發生衝突。究竟是衝突還是勾結？我就處在『游移兩可』之題了。

多僥倖的，我剛在這時候找到了一個有力的工具——唯物辯證法。我運用『統一的對立』的法則，解決了形式邏輯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再運用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法則，糾正了相對論者的『游移兩可』態度。我得着一個正確的結論：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勾結，是必然的，而牠們的衝突是偶然的。牠們中間的衝突，是『統一的對立』。這種對立的發展，是依着『正、反、合』的法則，而成為另外的一個統一——就是所謂『合』的階段。那就是更有利於帝國主義的中國新幣制吧？

這樣的一個領悟，是會使人雀躍的。我在和別人辯論遇到困難的時候，往往得着唯物辯證法的一枝生力軍，使我取到了勝利。限于篇幅，恕我不能一一列舉了。

* * * * *

我在上文已經指出：我對於金融問題的研究，初時是和我的政治思想對立的。這一個對立的統一，使我的思想發展到更成熟的一個階段，這個發展本身就是辯證法的。

現在還留下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爲甚麼要修養技術？我們是爲吃飯而修養技術嗎？許多前進的青年都在這樣的問。

自然，飯是不能不吃的。不過，倘使專爲吃飯而修養技術，那也逃不出是工具主義。那不單是可恥，而且也可憐。

我看了蘇聯的電影生路，使我對於這問題得着了答覆。因在生路中，一個小偷兒能夠用很高的剪綰技術，竊取了一位女太太皮大衣的後面一塊。後來，這個小偷兒被政府捉到皮鞋工廠裏做工去了；他就運用他的剪綰技術，裁剪皮鞋坯子，而得着很好的工作成績。原來，連剪綰的技術都可能運用在建設的工作上面的呀！

我提出這一段劇情，當然不是說，青年盡可學偷兒的剪綰技術；而是說，舊社會裏一切的技術，到了新社會裏去很科學的改變了意義之後，都有很大的貢獻。比方，在現社會裏，有專以諂媚、侍候少數權貴的技术求富貴的人。他們到了新社會裏去之後，假如同樣的能運用他們的熟練的諂媚、侍候技術到醫院裏去博取疾病大衆的歡心，那個意義自然也是很大的。你想，這一套卑鄙的技術，到新社會裏去都居然會有利于大衆，其餘的就可想而知了。

本來，新社會的建設，就靠着舊社會的遺蔭。把舊社會裏一切爲少數人謀利益的設備和行動，改變爲替大衆謀利益的手段，便是建設新社會的條件。這種條件的取得，自然是要經過極大的鬭爭，而決不是空想所能達到的。

蘇聯目下建設的成功，他的基礎，是由鬭爭取得的；而技術、工具以至文化，卻是舊社會留給牠的。比方，舊社會留給牠的蒸汽機，牠就無論如何都不能放棄。

所以，修養一些技術，爲自己打算，是希望可以解決目前的吃飯問題；爲大衆打算，是準備着將來更有意義的貢獻給新社會；爲人類歷史打算，無疑的也是提高了文化水準。就是因爲在目下不合理的社會當中，有了很好技術的人不見得能夠解決吃飯問題，即使能解決了個人的吃飯問題，也絕對不見得有利于大衆，而現社會裏種種一切的矛盾，更要阻遏技術的修養和文化的提高，所以我們主張改造社會制度。我們應該是爲了技術和文化的緣故努力社會的改造，而不能因爲社會之不良放棄了技術的修養。

* * * * *

以上很拉雜的寫了一些，寫的時候也很想寫得容易懂。當然，這是不夠詳細的，然而至少希望讀

者能得一些研究經濟學和修養技術的意義。

最後，我希望青年們不要做爲生活而生活的人，也不要做爲研究而研究的人，更不要做因不滿生活而不願研究的人。我們爲了大衆的利益，爲了歷史的使命，我們不能不研究。

中學生
二十五年一月號

封底